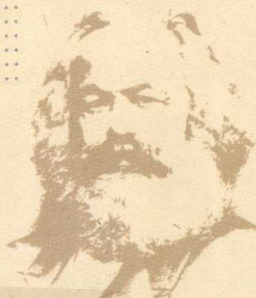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A GUIDE TO POST-MARXISM

周凡◎著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后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争议的一种理论。自其诞生以来，对它的诛伐可谓一波未止一波又起，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激烈的交锋与诘问驳难之中，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特有的思想品格与独创性的阐释路径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成为众多理论家与学者回应的对象。

ISBN 978-7-5117-0379-8



9 787511 703798 >

定价：56.00元



本书获得中央编译局2005年度出版基金资助

获得中央编译局2005年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获得2006年度中国博士后研究基金资助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A GUIDE TO POST-MARXISM

周 凡◎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 周凡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117 - 0379 - 8

I. ①后…

II. ①周…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151 号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

引 言	1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1
二、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始与初步探索	7
三、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	11
第一章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踪迹	34
第一节 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与“后马克思主义”意谓	37
第二节 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后马克思主义	42
第三节 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与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宣称	46
第四节 后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艰难浮出”	50
第五节 阿兰·图雷纳的行动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	59
第六节 市民社会与琼·柯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层理论	64
第七节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	70
第二章 接合理论	89
第一节 接合的一般界定及理论提升	93
第二节 接合与意识形态	98
第三节 接合与阶级霸权	107

第三章 霸权的磁性	119
第一节 “egemonia” 的起源及其基本意义	120
第二节 霸权的葛兰西式阐释	125
第三节 莫非对葛兰西霸权的解读	135
第四章 霸权的谱系学分析	158
第一节 卢森堡：自发性与双重空场	161
第二节 考茨基：三重简单性与零度	164
第三节 对“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	167
第四节 在遮蔽与解蔽之间：“迂回表达”	174
第五章 自发性及其后马克思主义诠释	180
第一节 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及其政治意义	180
第二节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	201
第六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之维	230
第一节 拆除最后的棱堡：解构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	231
第二节 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	239
第三节 解构实证性的社会概念	251
第七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266
第八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	310
第一节 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	311
第二节 由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	315
第三节 由“对立的政治”到“对抗的政治”	324
第九章 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339
第一节 卢卡奇与后马克思主义	339

第二节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	345
附录一 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364
附录二 拉克劳与莫菲简介	388
参考文献	393

引 言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以及“后学”的鼓噪和喧嚣中，后马克思主义渐渐进入国内学术视听之中。而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争论和探讨无疑又给作为国外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带来言说的相关性氛围与可能的激发性的碰撞界面和空间。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还颇多疏离隔膜，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也相当混乱，并且臆测攀附，讹言衍生，谬种流传，以至于妄谈“后马”而不知“后马”真为何物。在此情景之下，追溯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源流，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不管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延伸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激进理论^①，它的突出特征是一方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系列的质疑与批判，另一方面又继续推进全球解放的革命规划，从理论立场上看，它代表着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① 由于在本书正文中将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行详尽阐述，所以在此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暂且不作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性规定，而只对其主要特征进行大致描述。

的一种思想转型和战略调整。正如马恰特（Oliver Marchart）所正确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成其为一个学派，而只表示一种思想倾向。^①就其起源和具体的生成过程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取径，譬如，拉克劳和莫菲主要基于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解读，而赫斯特和辛德斯主要基于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阐发。就其学术范围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均有其阐释者和代言人。“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②照此，我们可以区分出政治理论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就其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也不一概等同，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和取向也不尽一致。

但是，正像艾伦·伍德所言：“不论这一运动多么复杂，也不论其所有成员事实上并不都认同相同的原則，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基本逻辑。”^③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并且这种解构在覆盖面及深入的程度上均已超出了“修正主义”的意义。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④，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主义，而且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载着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

① 马恰特：《什么叫后马克思主义》，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4年第4辑，第215—220页。

② A. M.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2.

③ *Ibid.*, p. 3.

④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1.

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巢臼。

其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棱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领域是服从内生规律的一种自我调整的空间”^①，即是说，经济的自规范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它排除了所有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的决定原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中立性的生产力发展的依赖，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当事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表现为社会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最后必须根据经济利益来说明，表现为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

其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后马克思主义从两个层次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它首先废黜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放弃这一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任何认识论优势；继而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表象”这一概念之上，它预设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这种“认识论话语”的错误在于把话语客体当作非话语或超话语，即锁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因素的对应关系。

其四，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移植出政治斗争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冲蚀与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无非是激进的大决裂式的原型目的论表象，它既是总体逻辑的理论结果，又是本质主义总体观的实现，因而它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象。在大写的革命的名义下，人类普通解放的承诺成为特殊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验设置必须被粉碎，革命主体的单一性必须被废弃，而革命场域要转换，革命方式要改变。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拉克劳、莫菲）把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5.

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这一解构想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正是在建构的维度上，后马克思主义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①在这个综合性的新话语景观中，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缝合（suture）、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以一种近似中药方剂的配制方式掺合融会在一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原则——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借助霸权接合的逻辑，后马克思主义着力营造和构筑一种祛除了本质主义和总体内在化倾向的非还原论的社会建构主义、政治多元主义以及文化多样性诉求，这从几个方面获取了清楚的表达与展示：其一是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其二是历史的随机性；其三是社会的非闭合性建构；其四是一种新的主体概念和对抗观念；其五是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六是一个摆脱了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孕育与产生在时间上并不同步，有的国家要早一些，而有的国家则要晚一些。从大的时段上看，后马克思主义是属于20世纪下半叶的“精神现象”——这一“精神现象”的产生，源于一个重要而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针对继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许多理论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图式：E. 曼德尔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概念，R. 达伦多夫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丹尼

^① Mark Cowling, Paul Reynolds: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0, p. 258.

尔·贝尔则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同一变迁景象：与原子能、信息论、控制论、新技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显现出对经济危机的巨大克服能力、对“尖锐矛盾”的化解以及对多种多样异质的对抗性社会因素的包容。随着社会日益科层化、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布、阶级对抗的性质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面对这一变化，“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竭力为这些新现象著书立说，以对这些明显的区别作出解答。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①

欧美国家（尤其是英美）的政治统治努力表现出一种相当温和的民粹主义风格（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意识形态伪装麻痹了劳工运动，瓦解了工会的组织与团结功效。S. 霍尔曾将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权策略精练地概括为“右派的归化”过程——右派成功地占有了“人民”，它的观念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复兴、广泛的保守统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强的“人民民主”色调。“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②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乃是这种右翼民粹政治长期熏染的结果。

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后马克思观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触发其解构性冲动的主要原因。随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白领的增加，新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无产阶级越来越少数化、边缘化。许多左派理论家十分关注这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形成严重挑战和冲击的现象，纷纷从理论上调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或者试图瓦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兹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阶级”（a non-

^① F. 詹姆逊：《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第13页。

^② F. 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7页。

class of non-workers) 这一概念, 主张向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道别, 认为无产阶级已不是什么“阶级意识”的匮乏和缺失问题, 而是这一作为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质疑直接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路向。

如果新左派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却仍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取信心, 那么他们至少还有一片借以安慰和寄托的领地, 然而, 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与败绩, 最终使新左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根基性的动摇。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 无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对此, 拉尔夫·密里班德作出了经典的概述: “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 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 毛主义幻想的破灭, 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 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 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 便天生地带有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 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 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① 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治的失势使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发生了质疑, 正是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氛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长与生成。

70年代末, 新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进入了一个思想危机阶段, 一方面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衰微, 一方面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在这非同寻常的起落之间, 左派思想发生了陡转激变, 阿尔都塞忙于“自我批评”, 普兰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 高兹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赫斯特和辛德斯则抛弃了阶级政治。从总体上看, 左派由前“68”对阶级主义的过度张扬蜕变为对阶级政治的厌恶和弃绝, 左派思想的这一逆转所带来的理论震荡已不是对无产阶级理论的信任度的降低问题, 而是对阶级和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反思与考量。正如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 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开篇所宣告的那样: “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过去的明显的真理——分析的

^① A. M.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9.

古典形式和政治预测、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的意义和目标——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础的那些历史变动的突然崩临而受到严重挑战。”^①就左派思想演变的轨程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左派思想低落与危机的表征，同时又是企图走出迷途的渴望与尝试。

而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为后马克思主义敞开了一种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绝好的素材性的支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性解放及同性恋运动、争取黑色及棕色人种权利的斗争、反全球化运动、反体制化运动、反战的和平运动等等，这些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异质的社会构成因素和斗争形式展示出了各种具体的压迫的多样性、微观化与不可化约性，并大大强化了后现代政治对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的关怀与依重，而这恰恰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冲突的深入扩展和新政治主体得以合法建构的情境性。

二、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始与初步探索

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 作为语词是个外来词，而作为语词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传入中国的^②，但是，在当时，这个多少有点匪夷所思、怪模怪样的“洋词”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关于“西马”的探讨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这个“后马”当然只能“后来”的事。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后马克思主义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最早见于 1992 年 11 月 20 日的《国外理论动态》刊载的《英国学者莱克拉奥谈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

^② 《国外社会科学》杂志 1982 年第 7 期 (第 57—60 页) 刊载的 S. 朱罗维奇的《评〈人类的发展和社会〉》一文评述了南斯拉夫著名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B. 朱尔杰夫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一书中对“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深刻批判，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朱尔杰夫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这部著作中用“后马克思主义”来指称苏联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赋予“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意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这与我在本书中指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意义上相去甚远。1984 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的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这本书中，贝尔也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

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共产主义》(莱克拉奥即 Ernesto Laclau, 现通译为拉克劳)一文,此文由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 No. 10, 1991)上的拉克劳的一篇访谈(原标题为“What Comes After 1991?”)摘译而成。由于那时《国外理论动态》仅仅是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一份内部参考性读物,对外并不发行,所以这篇珍贵的文献并不为大多数学者所知晓。我国最早撰写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论题的学者是当时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老师,不过,他写的那篇《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一文并没有发表在国内的刊物上,而是刊载在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11月,总第5期)上。我国最早挪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阐释自己学术思想的学者则是李泽厚先生,他在香港1994年《明报》月刊(第7、8、9、10四期连载)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哲学探寻录》,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人活着”的一个段落,李先生这样写道:

从世界情况看,人“如何活”的问题远未解决,“活得怎样”只是长远的哲学话题,但由“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却似乎可成为今日一条探寻之道,特别对中国更是如此。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框架来解释或吞并中国传统,而很可能是包含、融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继续前行,它将成为中国传统某种具体的“转换性创造”;由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可能成为世界的某种“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①

这是中国学者首次把“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关联起来加以运用的一种可贵尝试,只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李泽厚先生的文章由于在香港发表,他的这种表述与尝试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而后马克思主义最终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则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两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中国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真正拉开了序幕,而这距离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期和热烈的争鸣阶段已经很遥远了。由于国内

^①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第167—168页。

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讨只是近年来才次第展开，总体上看，尚处于起始阶段，所以，对于国内的研究，在此不作叙述与评论。

至于国外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与学术探讨，大部分作品已收入我主编的两部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文集中。^①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由拉克劳、莫菲的名著《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1985）所引发的，在该书出版之前，国外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文并不多见，比较重要的只有洛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1981 年发表的《我们时代“缺席的革命”：对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变化的新原理的反思》、皮尔逊（Christopher Pierson）1984 年发表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理论：对国家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最新进展》、阿内森（Johann P. Arnason）1984 年发表的《进步和多元主义：对阿格尼丝·赫勒的历史理论的反思》以及卡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1985 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② 《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出版之后，国外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探讨才真正活跃起来，除了被收入我主编的两部文集集中的文章之外，80 年代后期比较重要的学者还有多尔迈尔（Fred Dallmayr）^③、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④、霍华德（Dick Howard）^⑤、罗森塔尔（John Rosenthal）^⑥、埃米森（Mike Emmison）^⑦ 等人撰写的文章。

① 这两部文集是 2007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

② 对于这三篇文章的详细出处，可参见第一章第六节的注释。

③ Fred Dallmayr: Hegemony and Democracy: A Review of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hilosophy Social Criticism*, 1987, 13, pp. 283 - 296.

④ Stanley Aronowitz: Theor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Social Text*, No. 16 (Winter, 1986 - 1987), pp. 1 - 16.

⑤ Dick Howard: The Possibilities of a Post-Marxist Radicalism, *Thesis Eleven*, No. 16, 1987, pp. 69 - 84.

⑥ John Rosenthal: Who Practices Hegemony? *Cultural Critique*, 9 (Spring 1988), pp. 22 - 52.

⑦ Mike Emmison Paul Boreham and Stewart Clegg: Against Antinomies: For A Post-Marxist Politics, *Thesis Eleven*, No. 18 - 19, 1987, pp. 124 - 142.

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国外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扩展与深入。1990年,穆泽利斯(Nicos P. Mouzelis)在专著《后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历史定位。1993年,巴罗(Clyde W. Barrow)在《批判的国家理论》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在经济学方面,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也骤然多了起来,比如,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对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①,科布里奇(Stuart Corbridge)^②和基利(Ray Kiely)^③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的研究。当然,90年代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被研究的人物来看,最多的仍然是关于拉克劳、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这些研究比之于80年代中后期更加细致具体,学科分布与主题延展也更加宽阔,比如,米克利奇(Robert Miklitsch)对后马克思主义修辞学的分析^④,戴利(Glyn Daly)^⑤和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⑥对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形而上学关系的考辩,伯南斯(David Bernans)对后马克思主义“语言游戏”的批判^⑦,而集中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义的文章则有约翰·沙拉瓦纳姆都(Johan Saravanamuttu)发表于*Sojourn*杂志1995年第10卷第1期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Post-Marxism: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戴利发表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1999年第四

① George Steinmetz: Regulation Theory, Post - Marxism,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6, No. 1 (Jan., 1994), pp. 176 - 212.

② Stuart Corbridge: Post - Marxism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Beyond the Impasse, *World Development*, Vol. 18, No. 5, 1990, pp. 623 - 639.

③ Ray Kiely: Marxism, Post - Marxism and Development Fetishism, *Capital and Class*, Vol. 55, 1995 (Spring), pp. 73 - 101.

④ Robert Miklitsch: The Rhetoric of Post-Marxism: Discourse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Laclau and Mouffe, Resnick and Wolff, *Social Text*, No. 45 (Winter, 1995), pp. 167 - 196.

⑤ Glyn Daly: Post - Metaphysical Culture and Politics: Richard Rorty and Laclau and Mouff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May 1994, pp. 173 - 200.

⑥ Simon Critchley: Metaphysics in the Dark: A Response to Richard Rorty and Ernesto Laclau, *Political Theory*, Vol. 26, No. 6, December 1998, pp. 803 - 817.

⑦ David Berna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Ordinary Language: Grammatical Peculiarities of the Class Struggle "Language Gam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1, No. 2 (Summer 1999), pp. 18 - 37.

卷第2期上的《意识形态及其悖论：幻想与享乐的维度》(Ideology and its Paradoxes: Dimentions of Fantasy and Enjoyment)，对拉克劳、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评论则推兰德利(Donna Landry)和麦克莱恩(Gerald MacLean)的著名论文《重读拉克劳和莫菲》^①以及伯特伦(Benjamin Bertram)的《对拉克劳、莫菲的“革命”政治的新反思》。^②

三、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

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还是一种萌动的“思潮”或者是具有一定开启性或先导性的“运动”，那么，90年代后期以降，它才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早在1986年即对后马克思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的左翼学者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在1998年的《退出阶级》第二版序言中就不无感慨地说道：“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许已经成为往事！”^③当一个事情成为人们追忆的往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历史的洪流已把它揉回到了远离当下场域的“对象性存在”的位点上，也只有在这样的时空距离的拉开或疏远之下，它才能够真正作为哲学反思对象与“返观内照的、幽暗无色的精神劳作”(黑格尔语)以更为完整、更为清楚的方式相遭遇。也正是在艾伦·伍德面对10多年前自己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猛批”而顿生“些许不安”之际^④，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汇编了《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1998)，美国学者安娜·史密斯(Anna Marie Smith)则出版了长篇学术专著《拉克劳和莫菲：激进的民主想象》(1998)。1999年，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教授托费因(Jacob Torfing)推出了《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与齐泽克》，而阿迪蒂(Benjamin Arditi)和瓦伦丁(Jeremy

① Do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Rereading Laclau and Mouffe,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4, No. 4 (Winter1991), pp. 41-60.

② Benjamin Bertram: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Boundary*, 2, 22: 3, 1995 (Fall), pp. 81-110.

③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introduction, Verso, 1998, 亦可参见《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第1页。

④ 同上。

Valentine) 则出版了《争辩》(Polemizing)^①。这四本书可以看作是西方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加以“学术化”讨论的一个响亮的前奏。在这个前奏之后,人类走到了两个世纪的转折点上,而随着2000年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迎来了它生机勃勃的繁盛时期。无论“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本身是否被人们认可,无论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遭到怎样的质疑,无论在当下的汉语学界后马克思主义以何等“前沿”的姿态出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在人类进入第二个千禧年之际,国外学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已经从一开始的激烈反应和争鸣过渡到较为平和、冷静和深入细致的学术探究。

(一)

后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争议的一种理论。自其诞生以来,对它的诛伐可谓一波未止一波又起,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激烈的交锋与诘问驳难之中,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特有的思想品格与独创性的阐释路径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成为众多理论家与学者回应的对象。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状况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有一个因素在此特别有必要加以着重申明,这就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的拉克劳和莫菲仍保持着一种旺盛不衰的理论创造与阐发的能力。

无论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角度还是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在当代国外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都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自1985年面世以来,在左翼、右翼及中间阵营中均激起了持续不断的理论争鸣和探讨热潮;其影响的领域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

^① Benjamin Arditi and Jeremy Valentine: *Polemizing: The Contingency of the Commonplac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诸多学科。这本很薄的小册子^①似乎蕴藏着相当丰厚而密集的理论沉淀，以至于西方学者对它的“开掘”虽已历 20 年却全无消歇之迹象，主要以它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已有六七部之多，而长篇专题论文更是层出不穷。对于这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研究景观，美国学者乔纳森·迪斯金（Jonathan Diskin）和布莱尔·桑德勒（Blair Sandler）曾感慨地说道：“这么多年以后，我们还在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作出回应，大量的文章对这部著作提出足够多的问题、评论和批判（既有肯定性的也有否定性的）——无论如何，这是他们著作具有重要价值的表征。”^②

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 1985 年后迅速扬名，不仅在于拉克劳和莫菲的声明和独具匠心的运用，来自左派的此起彼伏的指责和叫骂从反面所起的“广告宣传”效应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出笼不久，艾伦·迈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阶级》（1986）一书对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并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者”（NTS）；拉尔夫·密里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而诺曼·杰拉斯则在《新左派评论》专栏上与拉克劳和莫菲展开了激烈的“充满怨恨”的辩论：杰拉斯先是在《后马克思主义？》（1987）一文中嘲讽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拉克劳与莫菲随即发表《无需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作为答复，继而杰拉斯又以《没有实质内容的非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与莫菲的真正回答》（1988）一文对拉克劳与莫菲再迎头痛击。作为对这一辩论的关注和回应，80 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论家纷纷撰文介入其中，其中著名的有尼科斯·穆泽利斯（Nicos P. Mouzelis）、D. 霍华德（Dick Howard）、M. 拉斯廷（Michael Rustin）、G. 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等。面对各种异议和批评，拉克劳在《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对他和莫菲的后马克思

^① 其英文版尚不足 200 页，德文版（*Hegemonie und radikale Demokratie: Zur Dekonstruktion des Marxismus*, Passagen Verlag, 1991）也只有 282 页。

^② Jonathan Diskin & Blair Sandler: *Essentialism and the Economy in the Post-Marxist Imaginary: Reopening the Sutures*, in *Rethinking Marxism*, Fall 1993, Volume 6, Number 3, pp. 29 - 30.

主义立场义无反顾地再度进行了守卫与辩护。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作“拉克劳—莫菲事件”（The Laclau-Mouffe affair）。正是这个沸沸扬扬的“拉克劳—莫菲事件”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带入了高频的甚至是增殖性的使用中。90年代以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詹姆斯·彼特拉斯（James Petras）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

进入新世纪以来，拉克劳与莫菲继续活跃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前沿地带，2000年，拉克劳与当代西方著名左翼思想家齐泽克和巴特勒联合推出《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而莫菲则出版了《民主的悖论》。前一著作侧重于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提供更为深入的哲学方法论根据，这主要涉及到对普遍性概念的后现代诠释问题，而后一著作则集中探讨现代民主的悖论及其多方面的政治的、理论的意义。拉克劳与莫菲所信奉的非缝合性、非封闭性、非固定性的理论主张同样适用于他们本人的理论活动，在他们那里，后马克思主义俨然也是一个“飘浮不定的能指”。拉克劳曾断言，“能指的固定程度与它在既定话语形式中的流传成反比”^①，如果这一论断能够成立，那么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马克思主义何以在当代经久流传。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经问世就凝固不变、供人观瞻的经典，相反，它是一种“后经典”，它要对经典加以“置换”（displacing），对经典施以“后化”（posting）。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能指是一个空位。这一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后马克思主义”本身——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能指的空位。但是，切不要对这个所谓的“空位”产生误解，“空位”也是一个“位点”，它并不是虚无，并不是人尽可占的位置。很多传统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后马克思主义竟敢对“传统”说三道四、“后来后去”而其自身又很难“捉摸”很是恼怒光火，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就十分鄙薄地把后马克思主义称为“皇帝的新装”，然而，冷静下来想一想，这终究也是雷诺兹对“能指的空位”的另一种误解而已。公允而论，如今已年过古稀的拉克劳眼下正在埋头撰写《难以捉摸的普遍

^① 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第99页。

性》(*Elusive Universality*) 这部新著,说他十几年来的理论努力宛若“光着身子”的游走与自欺,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够令人信服的!

2000年,在英国伦敦著名的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 Verso出版社为即将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第二版举行了一次高级学术研讨会,拉克劳与莫菲与英国当代许多知名的“新左”理论家,如霍尔(Stuart Hall)、弗雷泽(Nancy Fraser)、布莱克鲍恩(Robin Blackburn)、马西(Doreen Massey)等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参加该会议的一位学者披露,这次会议虽然是一次商业发布性的“推介会”,但它却既有品位和趣味,同时又极具批判性和学术性,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学术研讨是在被投射了红色的大厅里进行的:在一所摩登艺术殿堂内的红色的氛围下,“房内房外,没有流血,没有革命,但人们都清楚,有某种东西,它可以清楚地说明:我们为什么仍然要采取行动,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里并提出一些‘蹩脚’的问题”。^①当人们已不再为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而困扰的时候,当人们不再为了填饱肚皮而发出抵抗的怒吼的时候,当物质的极度匮乏和生活的赤贫与困苦渐渐远离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当经济的剥削与政治的压迫不再以狰狞的面目让人无法承受的时候,当支配与宰制以更加巧妙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潜入到生活的角角落落的时候,我们如何向权力关系挑战?我们如何在实践中抒发一种组织化的不满?我们如何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展现我们作为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所固有的不可根除的对抗维度?在后革命的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成为遥远的神话,在告别革命的喧嚣声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俨如冰川纪的故事,但是,依然存在某种东西,它深深植根于人类的禀性之中,埋藏在道德良心的深处,寄寓在“人的条件”之内,而在某种状况下,这种东西会以激进的方式喷射而出。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表达并组织后革命时代红色激进想象的一种话语途径。在一定意义上,泰特现代艺术馆的“红色”宣讲大厅,本身就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符号:这种红色并非是宣讲大厅的本色或固定不变的色彩,它是临时的投射,是一种布置,是一种设

^① Alessia Contu: A Political Answer to Questions of Struggle, *Ephemera*, 2 (2), 2002, p. 160.

计，一种想象性的建构！

2001年，《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二版终于面世，在这个硬皮精装的新版本的开端，我们可以读到拉克劳与莫菲于2000年冬天撰写的再版序言，在这个序言里，拉克劳与莫菲虽然像艾伦·伍德一样抒发了重读旧作的感慨，但相比之下，拉克劳与莫菲显然更加自信，他们并没有像艾伦·伍德那样承认自己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陈述上或判断上存在缺憾”^①，相反，他们反而“惊奇”自己16年前所作的判断不但切合于当时的背景，而且“自那以后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简直就是我们书中提出的模式的翻版，在那时我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当代的讨论中变得更为突出了”。^②也正是在这个再版序言里，拉克劳与莫菲再次自我确认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

2005年，拉克劳发表了长篇著作《论民粹主义理性》（*On Populist Reason*）^③，在这部著作的扉页上赫然写着：“To Chantal, after 30 years”。30年前，拉克劳与莫菲刚刚开始理论合作，那时，他们正在构思写作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走向民粹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的第四篇论文）；30年后，拉克劳重新回到民粹主义这一论题上。窄看上去，拉克劳似乎是出于怀旧而重叙“旧题”，毕竟，1985年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和1990年的《关于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都没有专门直接论及民粹主义问题；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如克拉尼奥斯卡斯（John Kraniauskas）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拉克劳在阿根廷的民粹主义历史经历以及他随后对民粹主义加以理论探讨并试图把民粹主义的逻辑普及到整个政治领域的理论努力，拉克劳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重构以及他对激进民主的阐释所作出的贡献将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民粹主义也为拉克劳新近对于‘普遍性’的哲学思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introduction, Verso, 1998, 亦可参见《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第1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vii, Verso, 2001.

③ 拉克劳的《论民粹主义理性》出版不久，潘尼札（Francisco Panizza）主编了《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镜》（*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Verso, 2005）这部回应性的论文集。

考以及他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思想的涉入提供了基础。这就是拉克劳的理论规划：把‘民粹主义’通过‘霸权’转化成‘政治’，而《论民粹主义理性》就是对这一规划的总结。”^①

克拉尼奥思卡斯无意之间道出了拉克劳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善于把政治策略层面的东西“转化”成一种政治逻辑，尤其擅长于把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转化”为“纯哲学”思考，同时又在“纯哲学”问题中“投射”或者说“移入”政治问题，因此，拉克劳总是晦涩的、模糊的、歧义的，他好像高深莫测，见头不见尾，见尾不见头。而莫非则“透明”得多、“清纯”得多、“安静”得多，她不像拉克劳那样如诗人一般“跳跃”着思考，而是稳稳当当，一板一眼地运用哲学智慧去观照当代政治问题。当拉克劳充满玄思地就普遍性、偶然性以及主体构成问题而大谈拉康、黑格尔的时候，莫非则温婉可人地娓娓讲述她对罗尔斯、对卡尔·施米特的独特解读。2005年，莫非推出了她的最新著作《论政治》（*On the Politics*）。这本在厚度上与《民主的悖论》（2000）相当的小册子，以简练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透彻地分析了“politics”与“the political”的区别，进一步重申了对抗作为政治的一个根本维度的不可根除性，并以更为犀利的锋芒剖析了“政治的终结”这一“后政治”观念的危险性。《论政治》既是一部阐发政治特性的理论杰作，同时又是一部针砭时弊的、“异见性”的或者说是“反潮流”先锋。莫非认为，当代政治的“时代精神”充满了一种浮夸性的盲目乐观，好像以为通过对话，通过协商，通过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性”，人类就可以告别冲突，走向一种没有敌人、没有对抗、甚至没有“我们—他们”差别的自由和谐世界。莫非提醒人们要对这种“后政治”视野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因为这种观念不仅扭曲了政治的本性，而且无助于当代政治困境与难题的真正解决。在《论政治》中，莫非再次宣称：没有对抗就没有政治，对抗是不可根除的，政治永远不会终结。

^① John Kraniuskas: Critique of Pure Politics, *Radical Philosophy*, No. 136, March/April, 2006, p. 48.

(二)

谈后马克思主义无法回避拉克劳与莫菲，谈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如此。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它们有时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即便如此，仍然无法绕开拉克劳与莫菲。之所以要在谈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仍然面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活动”，这不仅是因为拉克劳与莫菲是许多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并且在有些个案中他们是唯一的对象；而且还因为有很多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活动”激发或引起的，还有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就是由拉克劳与莫菲的领导或指导下进行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与阐发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总是纠葛在一起，互激互动，同步推进，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探索不断激起新一轮的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的研讨热潮。

单就拉克劳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辐射性影响而论，拉克劳长期执教的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政治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1982年，拉克劳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创建了一个“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项目”（the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Program），这个项目相当于我们国内大学里的“研究基地”或“研究中心”，它最初只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后来发展到也培养博士研究生，拉克劳就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任主任。20多年来，从这个“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项目”走出了一大批年轻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拉克劳和莫菲：激进的民主想象》的作者安娜·史密斯、《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与齐泽克》的作者托费因都曾经是这个“项目”的博士研究生。目前，这个“项目”聚集了一批非常活跃的学者。正是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系的这些学者的研究与著述活动给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气象。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系也因它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蜚声全球。英国学者朱尔斯·汤申德（Jules Townshend）在2004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规划：迄今为止的故事》中把这些人称为“埃塞克斯学派”（the Essex School），他说：“拉克劳与莫菲在培养年轻的学者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学者最近发表的作品显

示出他们在理论上已经走向成熟，他们无愧于‘埃塞克斯学派’这个称号。这个学派颂扬‘话语理论’的效能，其大部分成员在‘下游’以‘具体实在’的形式把拉克劳与莫菲的‘本体层面’的概念诸如“等同与差异的逻辑”、“错位”等等应用于分析各种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其中有少数几个人尝试对‘上游’的精深的理论枝节加以改进或发挥。”^①

汤申德所说的“埃塞克斯学派”中试图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加以“精致化”的少数几个处在“上游”的人大抵是指豪沃斯（David Howarth）、德文尼（Mark Devenney）、诺尔弗（Aletta J. Norval）、斯塔夫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格林诺斯（Jason Glynos）。汤申德之所以把这个人挑出来，是因为这几个人近年来都有重要的理论性作品发表，豪沃斯于2000年出版了专著《话语》；斯塔夫拉卡基斯于2004年发表了长篇论文《形式主义的悖论：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希腊宗教民粹主义的教训》；^② 诺弗尔于2000年发表了论文《我们用语词所做之事：意识形态分析的当代探讨》，2004年发表了论文《解构之后的霸权：不可判定性的后果》；^③ 德文尼于2002年发表了论文《批判理论与民主》，2004年出版了专著《当代理论中的伦理与政治：在批判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④ 格林诺斯于2003年发表了论文《激进民主的精神实质，或者什么是真正的政治行动？》。^⑤ 这些理论作品涉及对后马克思主义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

① Jules Townshend: Laclau and Mouffe's Hegemonic Project: The Story So Far, *Political Studies*, 2004, Vol. 52, p. 283.

② Yannis Stavrakakis: Antinomies of formalism: Laclau's theory of populism and the lessons from religious populism in Greec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4, 9 (3); 另外，斯塔夫拉卡基斯还是《拉康与政治》（*Lacan and the Political*, Routledge, 1996）一书的作者。

③ Aletta J. Norval: The Things We Do With Words—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Ide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2), 313–346; Hegemony after deconstruc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undecid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4, June, 9 (2); 诺弗尔在1996年出版了专著《解构种族隔离话语》（*Deconstructing Apartheid Discourse*, Verso）。

④ Mark Devenney: Critical Theory and Democracy, in A. Finlayson and J. Valentine (eds.): *Politics and Post-structur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176–192; *Ethics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Theory: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Marxism*, Routledge, 2004.

⑤ Jason Glynos: Radical Democratic Ethos, or, What is an Authentic Political Ac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003, 2, (187–208).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颠覆性“再生产”、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后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同化、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气质”等一系列更加专门化的理论问题。

而汤申德所说的在“下游”干“实活”的人是指像巴罗斯 (Sebastián Barros)、卡斯塔诺拉 (Gustavo Castagnola)、格里格斯 (Steve Griggs)、巴斯托 (Steve Bastow)、克洛赫西 (Anthony M. Clohesy)^① 等一批曾经在埃塞克斯大学“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项目”学习过或工作过并且只从事一些实用性调研或仅仅做对策性分析工作的学者。2000年，由豪沃斯、诺弗尔和斯塔夫拉卡基斯做主编将一部分应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剖析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斗争或运动的文章汇编成文集（由一篇导论和14篇文章组成），以《话语理论和政治分析：身份、霸权与社会变化》^② 为题出版，拉克劳亲自为这部文集撰写了前言。这部文集“草根性”的微观案例分析，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覆盖范围最广的运用“埃塞克斯话语方法”透视当今世界形形色色“非阶级”的大众抗议活动的性质、界限、策略与模式的最出色的作品。在这部文集中，我们可以从话语分析的独特视角了解到阿根廷庇隆主义的民粹主义运动、法国的新社会主义及第三条道路、北爱尔兰新芬党的政治活动、英国曼彻斯特的新“环保”抗议、墨西哥的革命秘教仪式、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建构、土耳其的基耳马主义想象、南非的黑人意识与非种族的民主运动、香港的同性恋与政治认同、中美洲的妇女斗争、绿色意识形态的出现，如此等等光怪陆离、异相纷呈的真实“斗争场面”。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部文集并不是对事实的无立场的杂乱陈列，它的细碎、它的零散、它的错杂、它的超既定性本身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主体的构型的“无型之型”的绝妙展示。质言之，《话语理论和政治分析：身份、霸权与社会变化》里呈现的事实是一

^① 克拉赫西也写过理论性文章，Anthony M. Clohesy: *New Labour Ideology: Assessing the Post-Marxist Critiqu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2, 7 (1), 39-56。

^② David Howarth, Aletta J. Norval and Yannis Stavrakakis (ed.):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Identities, Hegemonies and Social Chang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桩桩“后马克思主义事件”，或者说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来以抽象艰涩而受到抱怨，比如默克罗比就断言：“因为拉克劳一心关注历史特殊性，所以他在写作里才不那么具体。他无法详细阐述身份形成的机制，因为它们是特殊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他的政治哲学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抽象性。”^①但是，如果默克罗比读到了《话语理论和政治分析：身份、霸权与社会变化》这本书，他可能就要部分地改变他的看法了：正是因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比比皆是，所以拉克劳无须直接地停留在这种历史特殊性面前，目前缺少的不是事实，而是用以看清事实的“普照之光”。拉克劳并不是没有详细阐述身份形成的机制，他的整个理论努力都倾注于寻求政治身份构成机制的理论阐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话语理论和政治分析：身份、霸权与社会变化》是对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生动、最具体、最详尽、最通俗的“例释”。如果想实实在在读懂拉克劳与莫菲，浏览一下这部后马克思主义“叙事诗”当不失为一条便捷之途。

(三)

无论从拉克劳与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还是从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来说，都可谓无人出其右。而且，像拉克劳与莫菲这样坚定不移地、无怨无悔地自我宣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能有几人？有些人只是拿这个概念去“说事”^②，有些人则仅仅乐于把这个标签贴在别人身上。话又说回来，是不是谁只要自我“标榜”一下他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把他划入“后马克思主义阵营”？那么他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的合法拥有者？西蒙·托米（Simon Tormey）和朱尔斯·汤申德在2006年出版的《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这部专著里就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① 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② 比如，在拉克劳与莫菲之前使用“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Dieter Pasemann（1977），A. Marras（1978），Jack Jones（1978），Richard Lowenthal（1981），Mark Oromaner（1982），Salvatore Abbruzzese（1983），Johann P. Arnason（1984），Italo Vaccarini，他们都只是用“后马克思主义”来描述某种思潮或运动，而并没用于自我指称。

托米和汤申德之所以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提出来，主要是针对后马克思主义界划中的两种极端倾向：一种倾向是只把拉克劳与莫菲认定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只将他们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认作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文本”（比如诺曼·杰拉斯、尼科斯·穆泽利斯等人）；另一种倾向是把后马克思主义描述为一种根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思想运动，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是这一倾向的代表。托米和汤申德对这两种倾向都持反对态度。托米和汤申德同西姆一样不赞同仅仅把后马克思主义和拉克劳与莫菲两个人“挂钩”，而是让更多的人共同拥有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并且在把诸如利奥塔、鲍德里亚、德里达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一些像哈特曼（Heidi Hartmann）、巴特勒（Judith Butler）、哈拉威（Donna Haraway）之类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归入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方面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却又主要是针对西姆于2000年发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而作出的批判性回应。托米和汤申德与西姆的主要分歧在于，他们认为“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一直回溯到20世纪早期”^①是不恰当的，也是毫无裨益的，这不仅无助于对后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把握，反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

我们知道，《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一书中，西姆在集中论述了拉克劳与莫菲（第二章、第三章）、保罗·赫斯特与巴里·辛德斯（第四章）之后，紧接着是两章“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before post-Marxism）（I、II），一章专论“从卢森堡到法兰克福学派”（Luxemburg to the Frankfurt School）（第五章），一章专论“杂交的马克思主义”（Hybridising Marxism）（第六章）。对于这两章，西姆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发现诸如卢森堡、卢卡奇这样的早期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中的异见倾向（dissenting tendencies），考察结构主义的马

^① Simon Tormey &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 2.

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及存在主义给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多少有点意料不到的助益”。^① 西姆在作了一番并不轻松的追溯性的漫游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不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早就存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偏离”、“异见”甚至是“抵制”，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潜流”。^② 依西姆之见，一股“后马克思主义的潜流”从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就没有停息地在潜移默化，好像在那里耐心地等待、蓄势待发。1968年，这股“潜流”终于冲出一个裂口喷涌而出。

托米和汤申德明确反对西姆的“潜流说”。他们并不否认后马克思主义有其“源”、有其“流”，但是，后马克思主义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源”，它也更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流”。托米和汤申德坚持认为：“激发拉克劳与莫菲写作的特定问题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和用于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它的有效性和实际价值受到了质疑。这与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审视的东西并不相同。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等人与其说是因为看到马克思主义已经枯竭才进行他们的理论探索，还不如说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借用卢卡奇的用语）和繁荣而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图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用其他思想体系或其他的理论观点去取代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情感。”^③ 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导论中，托米和汤申德主张把“1968年”作为一项求解中介的“参数”引入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勘察和质性界定的考量之中，因为，1968年是“双重终结”的一个“临界点”：1968年“布拉格之春”代表“东方马克思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而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由这一“双重终结”的理论信号、理论呐喊、理论反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70.

② Ibid., p. 71.

③ Simon Tormey &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 2.

思、理论沉淀杂合而成的多声部的“变奏曲”。

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2000)与托米和汤申德的《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2006)突出地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在后马克思主义界定上的两种主要不同趋向:一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乃是蕴藏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叛逆因素和背离倾向或修正意图在20世纪中后期之后的集中爆发;而另一种则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产生严重失误与挫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空前得势、作为一种政治动员与斗争策略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的当代困境之下,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剩余”的激进情感的激荡之下寻求一种消解总体化与威权主义幽灵的另类解放途径的理论努力与尝试。前一种理解高度重视历史的脉络与长时段理论渊源,并由此承认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如果在这个方面“更进一步”的话,就有可能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境遇中的最新表现形态;后一种理解则特别强调现实的维度、当下的情境与问题域以及理论发生与建构的特殊性,这种理解如果过于极端化,就会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隔离开来,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全新理论操作。

需要指出的是,西姆虽然像一个考古学家似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发掘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蛛丝马迹”,但他本人并没有像约翰·巴尔达基诺(John Baldacchino)那样径直把卢卡奇、阿多诺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①,也没有像约翰·莱希特(John Lechte)那样将汉娜·阿伦特1950年代批判极权主义的作品也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②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1998)中给后马克思主义下的著名定义^③强调的也是“异见倾向”与后现代理论的结合,并没有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

① John Baldacchino: *Post-Marxist Marxism: Questioning the Answer*, Avebury, 1996.

② John Lechte: *Fifty Key Thinkers*, Routledge, 1994.

③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 可参阅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下),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第65页。

的各种“偏离”或反对意见直接称为后马克思主义。也许西姆所用的标题“Post-Marxism before Post-Marxism”会使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产生某种误会，以为在拉克劳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几十年前早就有了后马克思主义。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在行文中可以看到，西姆是相当严谨的，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地说，并不能把后马克思主义大幅度地“前移”之责归于西姆。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英国的老左派拉尔夫·密里班德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们为了将后马克思主义牢牢钉在“新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上而大翻历史旧账；这一翻不要紧，爱德华·伯恩施坦也就被“翻成”了“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者”。受密里班德和詹姆逊影响的学者又进一步用后马克思主义来指称与伯恩施坦同时代而又立场相近的人，比如，道格·布朗（Doug Brown）就称20世纪初期著名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后马克思主义者。^①再演义下去，所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略有微词或者以批判性阐发的人似乎都有可能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英国当代学者格雷格尔·麦克伦南把G. D. H. 科尔1948年写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说成是“较旧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②顺此滑移，好像就没有了尽头，后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了一个毫无时段限制的完全“漂浮”的能指，它可以“漂”到马克思那里^③，也可以“漂”到黑格尔那里^④，甚至可以“漂”到卢梭那里——凯文·因斯顿（Kevin Inston）新近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让-雅克·卢梭对异化的

① Doug Brown: Thorstein Veblen Meets Eduard Bernstein: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Mobilization Pol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Sep. 1991; 25, 3; p. 693.

② Gregor McLennan: Post-Marxism and the Four Sins of Modernist Theorising, *New Left Review*, 218, July 1996; 可参阅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下),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第37页。

③ 说马克思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曾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据说马克思在晚年企图修改自己的学说,比如,丹尼尔·贝尔就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提出了不同于第一卷的“第二模式”。

④ 众所周知,齐泽克就称黑格尔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①。

菲利普·戈德斯坦 (Philip Goldstein) 似乎是为了抵制这种任意扩大后马克思主义值域的做法, 2005年, 他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这部专著中给后马克思主义“收缩”了覆盖范围。在他看来,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来自于一种思想运动或者某一个学派, 后马克思主义也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汲取营养、借鉴方法, 但是,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是共同拥有一种最重要的鉴别性的身份特征: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阿尔都塞和(或)福柯著作的影响, 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阿尔都塞和(或)福柯学说的重写或修改”。^② 按照这一标准, 戈德斯坦认为最有资格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是斯蒂芬·雷斯尼克 (Stephen A. Resnick) 与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D. Wolff)、福柯、拉克劳、莫菲、朱迪斯·巴特勒, 皮埃尔·马舍莱 (Pierre Macherey)、托尼·本尼特 (Tony Bennett) 和约翰·弗劳 (John Frow) 这些人。虽然戈德斯坦的这本书写得有些粗糙, 但在学理上比较集中一贯, 而且在了解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方面, 特别对于了解托尼·本尼特、约翰·弗劳、皮埃尔·马舍莱在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领域中的后马克思主义尝试与突破方面,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指要性材料。如果读者觉得这本书还不足以对“文化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全面而透彻的把握, 还可以求助于英国学者保罗·鲍曼 (Paul Bowman)^③——多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探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化研究带来的构成性影响, 他的大作《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2007年由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④ 2007年, 除了有《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问世之外, 还有马恰特的新著《后基础主义的政治思想: 南希、勒福尔、巴迪欧和拉克劳

① Kevin Inston: Jean-Jacques Rousseau's "Post-Marxist" Critique of Alienation, *Philosophy Today*, Fall 2006; 50 (3).

② Philip Goldstein: *Post-Marxist Theory: An Introduc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 2.

③ 保罗·鲍曼是《拉克劳、莫菲与后马克思主义》一文的作者, Paul Bauman: Laclau, Mouffe and Post-Marxism, in J. Wolfreys (ed.): *The Edinburgh Encyclopedia of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799-808.

④ Paul Bowman: *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Politics and Interven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的政治差异》^①，2008年则有泰尔本（Göran Therborn）的综论性著作《从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版^②，2009年则有利特尔（Adrian Little）和劳埃德（Moya Lloyd）主编的论文集《激进民主的政治》^③，这三部著作是近三年来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四）

国外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的确认至今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有增无减的学术兴趣，“对象的不确定”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多的探索欲望和追根究底的念头和劲头。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众多学者以种种不同路径切入后马克思主义这一“众说纷纭”的主题，他们以学术追问的方式不断更新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不断重塑后马克思主义“外形”，不断扩大后马克思主义边界，不断丰富后马克思主义探讨的问题域，不断密切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政治生活的关联。当人们概览最近几年国外学者专论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时，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些作品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比，出现了若干新趋势，表现出许多新特征，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后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独特“风景线”。

1. 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在欧洲，不仅英国、法国和德国越来越多的学者涉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他国家也不时响起此落彼起的“应和之声”，例如，在比利时，2001年有卡彭蒂埃尔（Nico Carpentier）和德沃斯（Patrick De Vos）的《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一个社会分析框架和工具》^④发表，2002年有坎特利（Fabrizio Cantelli）的《尚塔尔·莫菲的反本质主义的政治哲学：

① Oliver Marchart: *Post-Found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Difference in Nancy, Lefort, Badiou and Laclau*,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Göran Therborn: *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Verso, 2008.

③ Adrian Little and Adrian Little (ed.): *The Politics of Radical Democrac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Nico Carpentier, Patrick De Vos: *The Discourse Theory of Laclau and Mouffe as Framework and Instrumentarium for Social Analysis*, *Ethiek & Maatschappij*, 2001, 4, 4, Dec., pp. 3-30.

后马克思主义与泛女性主义之间的理论空间》^①发表。在芬兰，2005年有罗曼-拉戈斯皮兹（Sari Roman-Lagerspetz）和埃里克·拉戈斯皮兹（Eerik Lagerspetz）的《尚塔尔·莫菲民主理论中的“政治”与基础问题》^②发表。2003年，丹麦学者N. 安德森继托费因之后奉献出了一部析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新作《话语分析策略》。单就英语国家而论，也不只是英美和加拿大频起“后马”之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左翼学者也是隔洋聒噪、独有“格调”，比如，西澳大利亚大学政治系的索尔·纽曼（Saul Newman）对“后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对比诠释就别出心裁、新见迭出。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探讨已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播散”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按诺曼·莱文的说法，后马克思主义是“对后工业社会、后贫穷和全球第一世界成员的规划。它也许并没有对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成员的需要进行呼吁……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术语，而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③莱文的这一说法搁在后马克思主义孕育期、生产期以及它兴起的早期阶段也许是合适的；但是最近10来年，很多迹象表明，莱文的这一说法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1997年贾巴尔（Faleh A. Jabar）主编了一部《后马克思主义与中东》的文集^④，1998年卡尔帕纳·米斯拉（Kalpana Misra）在其《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借用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后邓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⑤。21世纪初的最初几年间，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学者纷纷以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分析本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结合本地区政治斗争的实际情况阐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以自己特异性的本土文化背景和地方性的政治眼光与学

① Fabrizio Cantelli: Chantal Mouffe's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A Conceptual Space Between Post-Marxism and Extensive Feminism, *La Revue du Mauss*, No. 19, 2002.

② Sari Roman-Lagerspetz, Eerik Lagerspetz: "The Political" and the Problem of Foundations in Chantal Mouffe's Theory of Democracy, *Politiikka*, Vol. 47, No. 3, 2005, pp. 218-229.

③ [美]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8—9页。

④ Faleh A. Jabar (ed.): *Post-Marxism and the Middle East*, Saqi Books, 1997.

⑤ Kalpana Misra: *From Post-Maoism to Post-Marxism, The Erosion of Official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Routledge, 1998.

术视野去解读最初兴起于大西洋世界的理论“洋特产”。比如,2000年有阿根廷学者鲍隆(Atilio A. Boron)的《有争议的遗产:“后马克思主义”与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①,2002年有戈里埃尔(Claudio Gorlier)的《非洲语境中的后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适用性》^②,2004年有巴西学者门顿卡(Daniel de Mendonca)的《当代政治学中的对抗观念:来自话语理论视角的分析》^③、越南学者萨瑟兰(Claire Sutherland)的《通过话语理论的民族建构》^④,等等。中国学术界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时段活跃起来的,短短几年间,已经取得颇为可观的成果。

2. 随着英美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卡斯托里亚迪斯著作的译介次第展开,也由于卡氏1997年逝世所引发的纪念活动的牵动,近几年来,对于卡斯托里亚迪斯与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乃至整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研究明显地多了起来。我们看到,西姆在2000年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中只是将卡斯托里亚迪斯放在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萌芽”的章节(第六章末尾)中加以考察,并没有将卡斯托里亚迪斯直接划归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列,可是,2001年之后,将卡斯托里亚迪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加以研究的学术作品频频亮相,著名的左派杂志《论纲十一》(*Thesis Eleven*)仅在2005年度就发表若干篇讨论卡斯托里亚迪斯思想的长篇学术文章,当代西方一些颇为知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比如琼·柯亨)也纷纷介入对卡氏的评说。新西兰左翼学者奥杰利(Chamsy Ojeili)坚持认为,卡斯托里亚迪斯是与拉克劳与莫非“最类同”的标准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他特意反向模仿杰拉斯

① Atilio A. Boron: *Embattled Legacy: “Post-Marxism”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Karl Marx*,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7, No. 4 (2000), pp. 49–79.

② Claudio Gorlier: *Post-Marxism in an African Context: the usability of Antonio Gramsci*,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Fall 2002.

③ Daniel de Mendonca: *The Notion of Antagon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Theory*, *Revista de Sociologia e Política*, Junho, número 20.

④ Claire Sutherland: *Nation-building Through Discours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1 (2), 2005, pp. 185–202.

的用语，写了一篇论文《有实质内容的后马克思主义：卡斯托里亚迪斯与自治规划》。^①可以说，托米和汤申德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2006）中把卡斯托里亚迪斯作为一个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放在第一章加以论述，这本身就是近年来卡斯托里亚迪斯研究骤起与升温的反应。也可能由于对卡斯托里亚迪斯思想研究的扩展与深化，与卡斯托里亚迪斯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法国左翼思想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也在新世纪渐渐进入了诸多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视线之中。而关于卡斯托里亚迪斯与勒福尔的研究又可能引发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划的新争议，因为这两个理论家不仅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而且一直不遗余力地猛烈批判后现代主义理论。卡斯托里亚迪斯对这个作为前缀的“后”字尤其反感，他多次说过，这个“后”字无非表达着一种屈从、一种绝望、一种无力。这就意味着后现代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需要重新加以审理。

3. 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向其他学科和领域渗透、蔓延，从而使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更加纷繁多姿、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格局。在激进政治经济学领域，被测定具有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论，不仅仅是调节学派（法国调节学派：Michel Aglietta, Robert Boyer, Alain Lipietz；德国调节学派：Joachim Hirsch, Roland Roth）。最近几年，对以下人物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一是对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的激进政治学的研究（他们的代表作《民主和资本主义》已有汉译本）；其二是对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经济理论的研究^②；其三是对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经济理论的研究^③。在文化研究领域，对伯明翰文化研

^① Chamsy Ojeili: Post-Marxism with Substance; Castoriadis and the Autonomy Project,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2, 2001, pp. 225 - 239.

^② 他们的代表作是《知识与阶级：对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③ 他们的主要作品有：*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co-authors: Antony Cutler, Athar Hussain), Routledge & Kegan Paul, I 1975, II 1977;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Macmillan Press, 1977.

究学派中坚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哲学化”色调，比如，2001年，哈斯金斯（Ekaterina Haskins）尝试探寻霍尔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关系^①；2003年，怀斯（J. Macgregor Wise）深入考察了霍尔对马克思的解读^②；2005年，斯科特（David Scott）全面铺开了对霍尔伦理学的讨论^③。在社会学领域，探测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所寓含的后马克思主义要素成为最新的学术时尚，这方面较好的作品是格林·戴利（Glyn Daly）2004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激进政治经济学：卢曼、后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④，2003年，丹麦学者N.安德森在其《话语分析策略》一书中对卢曼的话语理论的特征进行了专题讨论。^⑤在宗教神学方面，与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不仅有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福音传道（Evangelism）活动也与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趣的“对接”。2005年，沃伦·布雷克曼发表长篇论文《在祛魅与政治神学之间民主：法国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回归》，详细地审视了宗教神学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熏陶”与“濡染”。^⑥

4. 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更加细化、深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外学者对拉克劳与莫菲的研究多集中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理论性质及他们思想的演变轨程上，而新近几年，对拉克劳与莫菲思想的探讨显现出一种“分割包围”、“定点突破”的招式，学术化趋势也更为突出。就“分”字而论，有研究他们的话语理论的，有研究他们的“政治社会学”的，有研究他们的“身份政治”的，也有研究他们的激进民主思想的；就“点”而言，有锚定于“霸权”的，

① Aristotle Meets Stuart Hall in the Age of Disciplinary Anxiety, *Topia*, Fall 2001, Issue 6.

② Reading Hall Reading Marx, *Cultural Studies*, Mar. 2003, Vol. 17, Issue 2.

③ Stuart Hall's Ethics, *Small Axe: A Caribbean Journal of Criticism*, Mar. 2005, Issue 17.

④ Glyn Daly: Radical (ly) Political Economy: Luhmann, Postmarxism and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1: 1, February 2004, p. 1-32.

⑤ Niels Åkerstrøm Andersen: *Discursive Analytical Strategies: Understanding Foucault, Koselleck, Laclau, Luhmann*, The Policy Press, 2003.

⑥ Warren Breckman: Democracy Between Disenchantment and Political Theology: French Post-Marxism and the Return of Religion, *New German Critique*, Winter 2005, Issue 94, p. 72-105.

有直指“接合”的，有专论“对抗”的，还有叩问其“能指的空位”的，很多研究锚定于某一分支问题、某一重要概念或者是他们对某一相关思想资源的“挪用”来展开较为深入而细密地拷问。关于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葛兰西主义的关系的探讨就特别具体、特别细致，比如，彼得·艾夫斯（Peter Ives）从葛兰西早年对语言学的研究到拉克劳与莫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来探测、发掘他们思想的关联性与共同点^①，亚当·莫顿（Adam Morton）通过展示对葛兰西的双重解读来超越拉克劳与莫菲的“偶然性逻辑”^②，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从反基础主义的视角透析新葛兰西主义话语理论对于观念史考察的重要价值^③，而奈杰尔·格里维斯（Nigel M. Greaves）激烈痛斥拉克劳与莫菲由于对葛兰西本人一向着力突显的其作品的语境缺乏起码的判断因而严重误读了葛兰西的著作^④。

对拉克劳与莫菲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另一个表现是将“拉克劳与莫菲”两人“拆开”，由“拉克劳与莫菲”并提合称过渡为“分而论之”。比如，2000年亨利·维尔特迈耶尔（Henry Veltmeyer）发表了《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对欧内斯托·拉克劳的评价与批评》一文^⑤，安德鲁·诺里斯（Andrew Norris）尤以专论拉克劳为“偏好”，《反对抗：论欧内斯托·拉克劳的政治思想》（2002）、《欧内斯托·拉克劳与“政治”的逻辑》（2006）是他专攻拉氏研究的两篇力作。而专门论述莫菲思想的人也是大有人在，比如上文所述的卡彭蒂埃尔、德沃斯、坎特利诸人。把“拉克劳与莫菲”

① Peter Ives: Language, Agency and Hegemony: A Gramscian Response to Post-Marxism,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8, No. 4, December, 2005, pp. 455 - 468.

② Adam David Morton: A Double Reading of Gramsci: Beyond the Logic of Contingency,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8, No. 4, December, 2005, pp. 439 - 453.

③ James Martin: The Political Logic of Discourse: A Neo-Gramscian View,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8 (2002), pp. 21 - 31.

④ Nigel M. Greaves: Why Gramsci Rolls in His Grave: An Attempt at a Rescue from Laclau and Mouffe, 该文是提交给2004年4月在林肯大学召开的英国政治研究会年度会议的论文。

⑤ Henry Veltmeyer: Post-Marxism Project: An Assessment and Critique of Ernesto Laclau,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7 No. 4, Fall 2000, pp. 499 - 519.

分开论述，自然是有利于瞄准对象、理清线索、集中问题，从而展开更为有效的规范性探讨，应该说，这是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学术研究由泛泛而论、总体粗描走向纵深开掘、深度耕犁的一种必然要求，因为对任何对象的认识，不经历由整体直观到分割解析的“抽象化”过程，都无法达到真切的把握和透彻的洞察。

但是，这种由“合”到“分”的转变，确实也隐含着将拉克劳与莫菲的思想本身加以区别的潜势。2003年，马克·温曼（Mark Anthony Wenman）的一篇论文将这种潜势戏剧化地激变为一种“学术实在”。^① 马克·温曼一反多年来“拉克劳与莫菲”不分家的惯常做法，提出要把“拉克劳与莫菲”改为“拉克劳对莫菲”，他认为“拉克劳与莫菲”两人的思想存在重大差异，这一差异长期以来因《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巨大成功而被遮蔽了，而实际上，自《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之后，他们两个再也没有联名著述过，而是各行其事，自说自话。马克·温曼甚至把“拉克劳与莫菲差异说”返用到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分辨查验上，认为“拉克劳与莫菲”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已经存在了，为此，他细心甄别《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哪些章节是拉克劳所写，哪些章节出自莫菲之手。马克·温曼的结论是：拉克劳主要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负责，这种政治理论仍然建立在对总体性观念的拜物教之上；而莫菲则主要在公民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内活动，因此应当把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莫菲的激进民主的多元主义规划有效地加以区分。颇有兴味的是，马克·温曼的“拉克劳与莫菲差异说”抛出几年后，拉克劳与莫菲二人竟置若罔闻、不置一词，真不知这是对马克·温曼的轻蔑还是对马克·温曼的默许？

^① Mark Anthony Wenman: Laclau of Mouffe?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29, No. 5, 2003, pp. 581-606.

第一章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踪迹

后马克思主义的孕育与产生离不开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而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形态，它更需要一种概念性的统合与命名。理论离不开概念，而概念并不是无本之木，所有的概念无一例外地都有自己的历史，“尽管这部历史可能蜿蜒曲折，必要时会涉及其他问题或不同的平面”^①，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概念是一桩有关衔接、剪裁和互为印证的事情。由于概念包括了自身所有的组成部分，概念是一个整体，但同时又是一个零散的整体”^②，探索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不能不进行概念性的考察，而进行概念性考察，就不能把它作为一孤立的断片，而是要把它放在概念本身的“梭行”与“飞掠”的历史“变式”之中（德勒兹语）。就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缓慢沉积过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各种运用在政治情境及学术范围上不尽相同，其表义也有诸多差异，然而，作为一个共同的指符，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光怪陆离的运用中，毕竟有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和某种共同指向，在营造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及形成后克思

① 德勒兹·加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② 同上书，第220页。

主义的问题域方面，这些运用和理论阐发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价值”。^① 下面我们就转入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非平衡发展史”的总体考察。

后马克思主义在构词上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加上固定的修饰语以表示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这种做法已司空见惯，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加上一个“后”字词缀所形成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却多少有点令人费解，让人不着边际。迄今为止，我们已发现了四种写法：postmarxism（托马斯·杜克赫蒂在其1990年发表的“After Theory: postmodernism/post-marxism”中用的就是这一书写方式），post-Marxism，*post-Marxism*（*post* 斜体），*post-Marxism*（Marxism 为斜体）。千万不要小觑这种书写之差异，它透射出多层意味：其一，就像后现代思潮并非统一的学派一样，后马克思主义亦非独家门户，有各种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取向，其意涵是多维度的；其二，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它有一个渐进地成形和凝结过程，它的理论担负有一个递加的进度；其三，在“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加上连字符，恰切地折射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系：它闪开一段距离感并展示出一种断裂感，它离开，但同时又守护着。正缘乎此，斯图亚特·西姆感慨地说，后马克思主义是“残余的乡愁”（a residual nostalgia）。^②

现在，人们一提到后马克思主义，就情不自禁地把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联在一起，好像后现代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既具有时间先在性又具有逻辑先在性，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是“因”，而后马克思主义是“果”，后现代主义是“蔓”，后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蔓上结出的“瓜”，在此一视域下，好像这“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后现代”情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如此之想，当然有其一定的缘由，毕竟“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不仅具有相同

^① 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36页。

^②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

的构词方式，而且在一些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中也确实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某种方法，更有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后现代哲学家。但是，如果完全把后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事业，或者不加分析地把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那么就会产生许多学术上与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我们不能仅仅用理论分析的方式与工具来断言一种理论的性质，更应该从理论的内容、核心观点出发来把握理论的实质。爱德华·伯恩斯坦应不算什么后现代派吧，岂不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高呼其为“第一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①；黑格尔也谈不上后现代哲学家吧，而斯拉沃热·齐泽克则断言黑格尔就是“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②。丹尼尔·贝尔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由此，雷诺兹曾问道：“马克思是最早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吗？”）^③，斯图亚特·西姆断言“卢卡奇早期著作，特别是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已显示出后马克思主义方向”^④，而约翰·巴尔达基诺（John Baldacchino）在他的专著《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则干脆直接把卢卡奇和阿多诺归入后马克思主义的大脉络之中^⑤。约翰·莱希特将汉娜·阿伦特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归入后马克思主义^⑥，由此观之，完全在后现代界域之内来审视后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而将后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则是过于轻率的结论。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进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迷宫，对这一称谓进行一番“考古学”的追溯。

① F. 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6页。

②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③ Mark Cowling, Paul Reynolds: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0, p. 276.

④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

⑤ John Baldacchino: *Post-Marxist Marxism: Questioning the Answer*, Avebury, 1996, p. 4.

⑥ John Lechte: *Fifty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 Routledge, 1994, pp. 175 - 200.

第一节 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与“后马克思主义”意谓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词源学追溯与考察中，头一个应该提到的恐怕就是匈牙利裔著名物理化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教授（Michael Polanyi, 1891—1976）。虽然麦克伦南把 G. D. H. 科尔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1948）及卡尔·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51）归于“较旧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①，但是，在这两个文本中“后马克思主义”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而波兰尼在其长篇哲学著作《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一书中却明确地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波兰尼在这部全面表达其哲学思想的宏篇巨帙中，提出了他的后批判哲学的知识学，系统论证了知识的个人性和默会性，阐述了知识的信念寄托、知识的形成与展示的内在信仰承诺。这种后康德哲学的个人知识论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一词出现的哲学语境。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明显受到了康德先验观念论的影响，因为他也像康德一样从认识形成的个人建构出发，并把知识理解为观念性现象而不是对纯客观的物本身的复写。但是，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在很大程度上脱出了康德哲学的框架，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颠覆性的识见。康德把知识中的个人性诠释为直观形式和普遍的先验范畴；而波兰尼所说的知识的个人参与则是指个人的信念、求知兴趣、热情、不可言表的默会因素以及个人特有的技艺、独特的经验和灵悟。在他看来，“在每一项识知行为中，都有着知道什么正在被识知的个人的默会与充满热情的贡献；这一系数不是简单的不完善，而是一切知识必不可少的成分。”^②此外，他虽然和康德一样强调信仰的重要性，但是在康德那里，信仰高于知识，并且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是严格分置的，二者有一条断裂的鸿沟；而波兰尼恰恰相反，他

^① G. McLennan: Post-Marxism and the Four Sins of Modernist Theorising, in *New Left Review*, 218, July-Aug. 1996, p. 59.

^②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9页。

强调的正是信念与知识的不可分离性，他断言：“信念是一切知识的源泉。默会同意与求知热情、群体语言与文化遗产的共享、融入志趣相同的共同体，这些都造成了我们赖以掌握事物的、对事物本质幻象的冲动。没有任何智力，无论它多么具有批判性或创造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信托框架之外运作。”^① 由此他试图把康德的调节性原则替补进知识的构成性机制之中，主张必须消除信念陈述与事实陈述之间任何形式的区别，正是在把信念、文化、道德，甚至社会组织形式都纳入知识构造机制中的意义上，波兰尼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一种“后批判哲学”。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将知识的具体生成和存在状态置于宏远辽渺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此言述默会神契的意义、它的形式及其达成的诸种条件，也就是讨论知识的类型学或者说是知识的意识形态学，因而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默会神契以思想的自由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前提，但同时，我们的默会能力又决定了我们对某一特定社会的依附，并在这一社会的框架之内维持我们的求知、艺术、公民和宗教的生活部署，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信仰的召唤，但这充满着高度的危险，波兰尼尖锐地指出：“现代唯科学主义原来竟与过去的教会一样残酷地禁锢着思维。它并没有为我们种种最有活力的信念留下什么余地，它迫使我们用滑稽而不恰当的词语把它们伪装起来。被这些词语框住的种种意识形态把人类最高的渴望罗致麾下为毁灭灵魂的暴政服务。”^② 因为看到了默会的个人性与共享的达成之间、思维与社会权力之间、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波兰尼对以科学面目出现的信仰体系对信念和自由所造成双重的扭曲和伤害予以了激烈的抨击——如果没有信托纲领，自由就不是实在的，而如果没有了自由，信仰就蜕变成政治机器隐含的驱动力。所谓极权主义就是以追求最完美的自由为信仰招牌而疯狂践踏自由、剥夺自由的一种教义，顺着这样的思路，波兰尼自然而然地把默会共享的形成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

现在，人们一谈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福柯，

①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8页。

② 同上书，第265页。

其实波兰尼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进入了这一主题，他已经从知识与权力、特别是信仰与权力的关系的层面上对极权主义的根源作出了论证。在波兰尼看来，不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斯大林式的独裁，它之所以能形成，它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就在于它对信仰的伪装与滥用，它把福利性的实在的东西放在崇高而庄严的信仰名义下走私、偷运，它把人类完满自由的实现放在对当前具体自由的荼毒之下来许诺。“追求独立思维的伟大运动给现代心灵注入了一股不顾一切拒绝所有似乎绝对地与个人无关的知识的思想（其实并不绝对与个人无关），而这又反过来意味着关于人的一种机械观，这种观念必定会剥夺人的独立思维能力。这样的客观主义必然代表着福利和权力意义的公共利益，并因此而使自由走向自我毁灭。”^①

对极权主义后果的极度反感，对道德倒位的伪装形式的深恶痛绝，使波兰尼把斯大林的死亡和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的终结描述为朝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② 迈出的第一步，“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这一措辞，在波兰尼那里包含着一种理论解放的意味。他把在 1956 年匈牙利和波兰革命中达到高峰的思想解放过程称为“真理的革命”，把它们当作是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真实表达。出于对极权主义的激进自由的欺骗性的警惕，波兰尼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保持一种谨慎的姿态，他坚持认为：“在自由社会流行的不公正的特权只能通过精心的安排分阶段地逐步减少。那些要在一夜之间把它们废除的人只会建立更大的不公正来取代它们。”^③ 这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在维护某种文化权威和某种价值信念正统性的同时贯彻思想的独立性，也就是波兰尼一直表述的对自由和权威的合理性张力的维持。正是在对如此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展望中，波兰尼提出要通过抑制任何激进的建立正义与博爱的行动（即革命行动）来维护政治自由。为了避免使人陷入可怜的奴性状态中，为了自由主义的理想不再倒位成现代极权主义学说，我们首先必须接纳保守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只能在基本的宪政主义

①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29 页。

② 同上书，第 372 页。

③ 同上书，第 376 页。

确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行。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称，是从批判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的角度提出的，借助这一术语，波兰尼表达出了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欢快告别，所以从其最确切的意涵上，这个“后马克思主义”应该称之为“后斯大林主义”（Post-Stalinism）。但这里的问题是，波兰尼并没有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他没有想到斯大林时代的一些暴政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进行的。在他看来，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是一致的，斯大林时代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对道德的扭曲、对自由的荼毒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悖论式的”^①特征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展现。这就是说，在波兰尼的视域中，斯大林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斯大林主义，正缘乎此，波兰尼才将“斯大林死后苏维埃政权逐渐出现的人道化”以及“从那时以来一直在进行，而在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中达到高峰的思想解放过程”^②描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

在《个人知识》这部“后批判哲学”的巨著中，“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仅仅出现在一小节的标题中，并且这次“现身”也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一次，它似乎被淹没在个人知识论的浓墨重彩和默会神契的厚实论证之中而显得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但是，按照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的内在逻辑，知识的构成及其言述体系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信仰寄托和个人系数，那么，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作为一种言述体系又怎能是一种无信念、无信仰的纯客观的表达呢？波兰尼自己也坦率地表示，“我要把我的哲学变为我的基本信念的宣言”^③，“我相信，我的目标必须是发现我真诚地相信的东西并把我觉得确信的东西形式化”^④。这意味着，明确地拥持并宣布一种鲜明的信托纲领是后批判哲学的个人知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其逻辑一贯性的自我验证。波兰尼借助于“后批判哲学”这一措辞所激发的灵感

①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② 同上书，第373—374页。

③ 同上书，第411页。

④ 同上书，第409页。

杜撰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用语，正是为了描述一种寄托框架或者说是一种真诚的信仰告白，从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所表达的东西乃是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的内在原则在政治思想与信仰上的落实与贯彻。

就像后批判哲学的知识学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认识论的颠覆一样，波兰尼“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中的“后”字所蕴含的也是颠覆之意。而无论从文理脉络上，还是从波兰尼的基本理论立场上，这个“后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意义都折映出两重性：一是它的否定性，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信仰的拒斥，因为，从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出发，无论何种信仰都不会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自己“浇铸成科学的肯定形式”^①，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的道德渴求，“它保护着种种道德感情免受疑为唯情论的指责并同时使它们给人一种科学的必然性的感觉”^②，从这个意义上，“后”显然可解释为“过后”或“终结”。二是它的肯定性，它指向的是一种反激进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因为波兰尼不主张把资产阶级对自由的追求完全当作是该阶级物质利益的体现，也不赞同将资本主义的自由作为一种虚伪的意识形态加以全盘剔除，正如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强大的生产力一样，也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接受合理的民主与自由理念，从这个方面看，“后马克思主义”中的“后”又可以理解为“后来”。至此，我们从波兰尼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分析中得出结论：波兰尼所使用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指意符号，并不是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那里获得的灵感，他主要是基于对被斯大林所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抨击，而从后批判哲学的比附意义上提出这一术语的。

如果谈论波兰尼对 20 世纪晚期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首要的并不在于他是最早使用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哲学家，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思想情境性或者说它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域，从大的方向上给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言说定下了一定的基调，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说，它不是

①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② 同上书，第353页。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分、某一命题或某一原理，而是在整体的意涵上对之进行指摘和攻击。二是把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批判、极权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虽然波兰尼只是从信仰的伪装与滥用的角度笼统论之，但从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皆注重于意识形态分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总体性的批判上，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显然就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三是把后马克思主义与反激进主义和拒绝革命的保守主义以及重申自由宪政主义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可以说，这三方面都直接影响了丹尼尔·贝尔，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及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无疑对70年代末期以来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催生作用。

第二节 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在20世纪50年代被“启用”的较新的词汇，在60年代不仅没有昙花一现式地倏然消失，反而获得了后继性的运用并在一定范围流传。著名民主理论家麦克弗森（C. B. Mcpherson）在1964年发表于《加拿大经济学与政治科学杂志》（*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上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Post-Liberal-Democracy?*）^①就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并对它的基本含义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界说。^②在这篇文章中，麦克弗森感于当时常被谈论的“后资本主义

① 此文后来被收入1973年麦克弗森的论文集《民主理论：补救的尝试》中。

② 20世纪60年代，除麦克弗森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使用过“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比如，1965年，哈斯纳（P. Hassner）发表在《法国政治科学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5, 1, Feb. 40-66）上的《寻找统治阶级：关于种种学说史的争论》一文中使用了“关于新阶级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post-Marxist theories of the “new class”）一语。1968年，斯托克温（J. A. Stockwin）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Vol. 41, No. 2, summer, 1968）上撰文《日本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吗？》（*Is Japan a Post-Marxist Society?*）（此文是斯托克温提交给1967年11月7日在圣安东尼学院召开的远东高级研讨会的会议论文）；1969年，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在《人与社会》（*L'Homme et la Société*, 14, Oct-Dec, 1969, 49-62）杂志发表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写在朗格的〈政治经济学专论〉出版之际》一文中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学者”（post-Marxist scholars）这一表述。在该文中，戈德曼称卢森堡、布哈林、卢卡奇和科尔施这些反斯大林主义的学者为“后马克思主义学者”。

(post-capitalism)”和“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作了这样的评述：

目前，对被叫作“后资本主义”的东西的不精确的论述之作纷纷涌现。同样使用这一术语的时事评论员和理论家们也很容易谈到后马克思主义。两种情形中包含的观念是相同的：都暗示着如今（在前面）被加上连字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并且它已被某些确实相当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在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中，尽管人们不能否认，表面上与旧的东西相似的事物仍然随处可见，但是，人们或许能通过把它叫作“后—某某”（即在它前面加上词缀“后”），而驱除它的核心精神。如此一来，由于从任何可接受的社会伦理来看，旧式的资本主义难以得到正当的辩护，所以达至它已让位于其他东西的结论就变得十分有益。由于旧式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地陷入困境，所以人们或许能通过宣告它的逊位或被取代而更容易地对它加以处置。^①

麦克弗森的这一评述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理论家已在谈论“后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同“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描述性概念，与“旧式资本主义”相应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而与后资本主义相应的当然也就是“后马克思主义”了。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表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已超出了原来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以至于能够对这一结构模式提供有效分析范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变得无能为力了；其二，麦克弗森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复合词中的“构件”作了经典性的诠释：连字符表示一种断裂，而“后”字表示一种祛除和置换，在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中，从表面看，“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东西似乎还持存着，“表面上与旧的东西相似的事物仍然随处可见”，但实质性的东西已悄然改变，麦氏用的是 *exorcize its spirits by calling it 'post-'*, *exorcize* 的本意是驱魔、祛魅

^① C. B. M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71.

之意，这说明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是在最大程度地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以至于仅仅用“修正主义”来描述后马克思主义已不那么恰当了。

令人惊奇的是，麦克弗森在60年代对后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这种勾画与80年代颇为时兴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赋予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是基本吻合的！这是否意味着在60年代实际已经存在着确定的后资本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一文中，麦克弗森指出，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它日益成为一种被管理的经济——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定价公司所管理，以使之对管理及技术资本达到充分的运用；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所管理，以追求劳动力的充分使用和整个制度体系的稳定性。“以如此方式被管理的资本主义和任由生产单位处于无控制的竞争状态的旧式的资本主义确实不大一样，然而，我还是说，这种状况只允许我们说资本主义发展了，而不是说它已被取代了。”^① 同样，马克思主义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既定体制对事实上的变化的一种适应，并且这种适应依然保留着原先的体系的基本设定”。^② 麦克弗森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像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还没变到必须用后资本主义来描述的地步一样，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变化也没有变到必须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语词才能妥当地加以指认的程度。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麦克弗森提出了两个切实需要认真加以回答的问题：“第一个是，难道说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Liberal-democratic theory）已经变得与它的最初的表达形式相违甚巨以至于必须要给它配一个新的名称？换言之，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post-liberal-democratic theory）？我将说，答案是：不。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对这一理论加以发展变化以至于变到值得给它起上一个新的名号吗？换言之，

^① C. B. M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72.

^② Ibid.

我们需要一种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吗？我将说，答案是：是的。”^①显然，在麦氏看来，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旧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面对正在变化着的资本主义已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最大幅度的“革故鼎新”，以便能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的当代语境并揭示其现实的发展趋向。我们还没有阐述精当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但我们确实需要它。颇为遗憾的是，尽管麦克弗森抱怨当时一些理论家关于后资本主义的谈论过于粗糙、散漫、不精确，然而他本人对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的论述既缺乏完整的理论分析，也令人难以获得清晰的印象，麦氏只是提出一种展望和期待。但麦克弗森的工作无疑具有先导性的意义，因为他确立了对破坏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有效的颠覆性接合的“独占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批判定向，并大胆信誓后自由主义的民主承诺，在80年代，拉克劳与莫菲对新自由主义“反民主攻势”的谴责，鲍尔斯和金蒂斯对新霍布斯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抨击，都是在承继着麦氏的抱负和设想并使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的观念具体化、概念化、理论化。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鲍尔斯和金蒂斯在他们合著的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民主与资本主义》（1986）一书中，对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特征以及它对自由主义的矫正和扭转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述，他们认为，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将

继续扩展个人的权利，并因而使财产权和国家权力的行使变成民主的、负责的。它肯定代议制民主和个人自由这种传统的民主形式，并且筹划独立于国家的新颖的社会权力形式主义……后自由主义的这种展望无疑是自由主义时代本身抱负的结果，它还在两个方面与自由主义传统截然决裂。它把个人描述为积极地致力于不断改革自身和他人的能力、情感和友情的天生的社会存在；它不是把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描述为用于国家过度权力的有益栅栏，而是描述为经济依

^① C. B. M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72.

赖的基石，人民主权的障碍。^①

在鲍尔斯和金斯蒂看来，后自由主义的民主既肯定杰弗逊对生产手段的分散控制的信誓，同时又肯定马克思关于生产的分散化不能采取个人财产所有制形式的断言。但是，无论杰弗逊的个人财产普通化还是马克思的私人财产集体化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由民主的个人权利取代财产权并实现经济领域的民主控制，正缘乎此，他们颇为自信地宣称：“今天的民主理论也必定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它保持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统治的敏锐关注，但包纳着多种形式的统治和社会冲突的多种区域，并且克服马克思主义（和卢梭）表达的行动理论。”^② 显而易见，鲍尔斯和金斯蒂已经明确地把后自由主义的民主认同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以及他对后自由主义民主的倡导与展望从民主理论补救、拓展与深化的论域上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

第三节 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与 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宣称

无论在社会学的发展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中，我们都不应忘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1970年6月在苏黎世召开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小型国际讨论会上，贝尔表示，他虽然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且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多有背离，然而，他还是乐于被人较为客观地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的发言稿以“后工业社会：思想演变的过程”为题刊于1971年冬季号的伦敦《评论》杂志上）。但贝尔在这之前可能就已使用过后马克思主义一词。道格拉斯·拉米斯在

^①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斯蒂：《民主与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8—230页。

^② 同上书，第237页。

《激进民主》一书中甚至说：“在美国，像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早在冷战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就发展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①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贝尔不仅详尽地论述了他早在1959年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观，还对前此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一步加以阐述。^②值得一提的是，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东渐史”上，贝尔可谓是最早的一位理论家，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贝尔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中文^③，而在1989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中，赵一凡在介绍贝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还特意提到了贝尔本人愿意接受“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这表明，早在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一词就已经以中文形式在贝尔名下“登陆”中国。我们国内学界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并研究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但是很少有人论述贝尔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而此一疏漏，有可能割断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的历史关联并悬置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语境考察，从而导致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狭隘的理解和臆测妄断。

我们看到，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贝

① 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② 20世纪70年代，除丹尼尔·贝尔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使用过“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比如，1976年，约翰·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在《社会学与社会》（*Sociologie et Societes*，1976，8，2，Oct.，7-36）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利益》（*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Interests*）一文中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比如，普兰查斯）”一词。1978年，马拉斯（A. Marras）在《视觉艺术》（*Artes Visuales*，No. 17，Spring）杂志（墨西哥）发表的《革命进程与电信媒介的组织》一文中使用“后马克思主义现实”（post-Marxist reality）一语（新媒体对革命动员与宣传的作用）。1978年，杰克·琼斯（Jack Jones）在《异议》（*Dissent*，1978，25，2（111），spring，pp. 209-218）杂志上发表的《深度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Depth Conservationism: A Post-Marxist Ideology?*）一文中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概念。1978年，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La Voix et Regard*）法文版中明确提出要在社会理论中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该著1981年出了英文本）。

③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

尔想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他的工业社会理论提供一种理论支撑，所以他不仅将后马克思主义置于第一章的开头来加以讨论，而且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节的标题，并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虽然他的研究取向和材料运用都是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的。

针对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评论，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可以从马克思本人那里获取借以构想的根源。那么，希尔斯何以漏掉了马克思呢？贝尔多少有点嘲讽式地说道：“或许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贝尔认为，虽然马克思将社会变革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体制，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构的描述并不是一套图式而是两套图式：第一套图式是在《资本论》第一卷表述的，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垄断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社会分化为两大对抗阶级：资本家和无产者，其他第三种人（地主、农民、手工业者）都将消失，当生产资料集中的劳动社会化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时候，外壳就要炸毁了，社会主义就会诞生。在贝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图式并不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而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设想，它脱胎于“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假设模式。到了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马克思已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三大重要变化，一是新银行制度的出现使资本的储蓄社会化；二是作为股份公司运作结果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产生了新型职业；三是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增加。贝尔认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表述了第二套图式——资本积累形式的变化，产业经理和“指挥劳动”的大量涌现，白领工作的扩大，利润的社会化。在贝尔看来，正是马克思的第二个图式预示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20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②

贝尔承认马克思的第一套图式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古典马克思主义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的主导思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是微弱而闪烁的，它所表现的倾向大大地“打了折扣”，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抗的理论强音淹没了第二图式。贝尔指出，历史的事实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并没有按照“强图式”进行，相反，它是“弱图式”的进一步展开。贝尔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对马克思没有充分预见到的结果作出了经典的刻画：“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①显然，贝尔吸纳了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制度而是同一官僚科层体制类型的变体的观点，认为这些社会结构性征象是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共同具有的，所以他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最大效力就在于把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同收一囊之中的共时性诉求。合理性的追求必然导致科层化的增强从而使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这样一来，“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贝尔看来，“新中产阶级”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产物，带来了一个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不曾料到的明确的政治后果：它改变了阶级体系的社会学性质，也就是说，社会阶级的对抗性质及状态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言的日益简单化、二元化并最终造成一种单边的发展轨道。

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变迁一直构成贝尔关注的重心，他以挑战的姿态向马克思的第一种图式所蕴寓的二元阶级模式发难。但是，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把批判引向了对马克思的整个社会分析逻辑的质疑。贝尔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尚表现出对政治秩序、官僚机构的直接关注，但是，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思维方向发生了变化：集中注意社会而不是国家，注意经济而不是政体，即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从政治学到社会学的演变。“马克思认为一切基本的社会关系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来自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都是经济关系；不可能有政治和军队那样的独立政治阶级或秩序。”^②正因如此，贝尔坚信，在马克思那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90页。

里，政治没有自主性，它不过是社会力量的反映。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特殊决定论是成问题的。

我们看到，贝尔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它是对后工业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理论观照和提升，尽管贝尔声称他不会像欧洲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陷入关于新旧工人阶级的冗长乏味的辩论，但实际上他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变革方案明确地采取了弃绝态度，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所要表明的无非是：由社会关系的复杂化、阶级的多元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已使古典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整体的方式摧毁制度结构的革命模式成为不可能，因此，社会的改变只能从社会制度全盘废除转向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良，正因如此，贝尔才反复指责马克思忽视了政治的自主性，极其强调“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轴变化中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他本人也没有深入政治领域，而且对后工业社会政治自主性何以可能、何以完成的问题也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图景，况且他关于马克思的第二套图式之说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贝尔之所以在后马克思主义谱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贝尔开创了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因素的先河。尤其是他把对马克思的阶级模式的批判置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阐释之中，这一点正切合于当代后马克思主义着力缔造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维度的学理进路。

第四节 后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艰难浮出”

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即“后资本主义”概念所表达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即“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所表达的东西）。有些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解释的失效而得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有些人主要是基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与挫折而得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有些人也可能基于这两个方面的综合影响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如果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背景的残缺而对后马克思主义作出偏颇之论。如果我们妄下断论说，所谓后

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主题，它似乎难以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构成经验之中，实则大错特错矣！事实上，70年代以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从时间上要早于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与莫菲为代表），并且我们看到，在著名社会学家汤姆·巴托摩尔（Tom Bottomore）1983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在“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条目下进行的（该条目的撰写者是安德鲁·阿拉托）^①，这说明早在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思想界已经确立起来了，而这一确立过程的重要场域之一便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经历和思想情境。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早使用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是匈牙利左翼激进分子伊万·塞列尼（Ivan Szelenyi）和乔治·拉康德（George Konrad），他们在合著的《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具有独特视角和分析深度的新知识分子阶级理论，他们虽然仍沿用阶级的概念，却明确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构成历史的代言人和进步的承担者的断定，而把知识分子阶级权力的到来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把自己对新知识分子作为阶级所作出的论证和理论阐释宣称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②

新知识分子论在塞列尼和康拉德那里以更复杂的方式被阐述，他们的著作将知识分子资讯丰富的历史社会学语境与对一个社会体制的系统分析联系起来，与古德纳把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所进行的理论透视主要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同，塞列尼和康拉德关于新知识分子阶级的观点的主要参照背景是他们具有构成性政治经验的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尽管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组成成分复杂的混合物，这一宽泛的名称下面可以有界线分明的种种不同划分，比如科技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官僚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边缘知识分子等；尽管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它

^① Tom Bottomore (ed.): *Dictionary of Marx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pp. 355 - 361.

^② George Konrad, Ivan Szele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p. 4.

在政治权力场中的作用、它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等都颇具争议性和模糊性；尽管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小部分跻身于权力中心层面；但塞列尼和康拉德一直固执地坚持：中心性的计划结构的存在可以看作是赋予知识分子以阶级利益的特定场域，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目的和技术的熔合、国家与社会的同一化，是内在于再分配的中央计划的结构性的位置之中的，它构成了所有特权与权力的根源。所有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技术型的、官僚型的，还是人文型的，抑或是边缘型的，它们都被圈入体系的掌握之中从而形成对其他社会阶级特别是直接生产者的优先地位。

我们看到，塞列尼和拉康德的观点明显指向苏联极权主义模式，虽然难免有偏激之处，但他们的论述毕竟涉及现代性和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一重要问题。由革命的党到建设的党的转向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作用的微妙变化，因为国家的现代化确保了官僚权力向各个层面的扩散和增殖，随之而来的便是管理知识阶层的迅速增长，对效率的着迷、对工作场的控制取代了原先的雅各宾主义的激进革命干预，创造性的革命动员于是蜕化为意识形态依附，批判性的文化话语堕落为阐释性赞同。正如塞列尼和康拉德指出的：“清除所有受任何个人动机鼓舞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展示任何独立行为），这正是精英阶层无限权力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那些享受这一特权但是又顺从得足以从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人，被迫放弃所有的创造性，并只好采纳国家统治机器工作人员的思想。”^①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经济理性化不可抗拒的影响的扩大，奏响了管理型现代主义者和技术知识分子胜利的凯歌，而新型知识分子在有效维护理性化社会主义秩序的同时，也被极权主义国家重新塑造。

塞列尼和康拉德的核心观点正在于把国家看作是“新知识分子阶级”产生的重要动力机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认为，市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机制是分层的两个主要原则，它们对处于资本和劳动间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增殖负责。而反对把这些新知识分子视为一个阶级的

^① George Konrad, Ivan Szelenyi :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ich, 1979, p. 189.

关键论据是，在西方并不存在任何能够将他们的利益同质化并能统一那些在此起作用的分层机制的离心倾向的原则和结构，而且，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加以合法化的原则必定构成与其他人的对抗：私人财产和议会国家内获多数派地位的政治代表制。

撇开新知识分子阶级论的普适性不论，单就它在国家社会主义语境之下来说，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构成一个阶级的论点有赖于如此的主张：完全能发现同质化的、统一性的原则和机制。对塞列尼和康拉德而言，“目的论的合理性再分配”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国家的中央计划机制一道，完成了这一功能。这就是说，尽管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着权力斗争，新知识分子阶级还是共同分享“合理性的再分配”与计划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正是国家的这种结构担保了知识分子地位的优越性和特权身份的正当性诉求。

从历史上看，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新特点——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布尔什维克党对国家的渗透——激发塞列尼和康拉德提出了对在那里发现的分层和权力的机制所作的被他们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诚如琼·柯亨所言，塞列尼和康拉德对“知识分子阶级”的认定和论证确实表现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冲动”（post-Marxist impulse）^①，因为这种冲动明显地以两种方式展示出来：“一是，国家被看作一种分层机制，这一机制并不反映社会的阶级关系；二是，从分析看来，在一种要求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批判的政治规划的情景之下，市民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②但是，我们发现塞列尼和康拉德的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冲动由于重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套词（如生产方式）的使用仍然在场而不断地受到挫抑，特别是，他们并不是追求“政治优先性”的主题，而是集中于计划者（再分配者）的政治、经济功能。对剩余的控制和分配对他们的阶级分析仍然是关键。塞列尼和康拉德想把他们的著作当成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资本论”，由于反复运用那些由批判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资本主义而引发的范畴，尽管他们有后马克思主义意向，但是他们的系统

^① Jean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2, p. 17.

^② *Ibid.*, p. 17.

分析（在古德纳那里是完全没有的）在关于这些社会中支配和分层的结构方面并没有表达出什么新的东西。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琼·柯亨指出，塞列尼和康拉德的“新知识分子阶级学说”还称不上是后马克思主义，恰当地讲，它应归入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sm）之列。^①

按阿拉托的划分，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修正主义”（Revisionism）、“马克思主义的复元”（即回到马克思）（Renaissance of Marxism）、“重建马克思主义”（Reconstruction of Marxism）[亦称作“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这四个阶段。“修正主义”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复元”把列宁主义也作为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即新马克思主义）”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挑战（如无产阶级的特权地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变化的生产关系模式等）；而“后马克思主义”则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断裂——它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定的相关性并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同时它也仍然张扬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是，它完全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与范畴进行了“清洗”。我们或许可套用孙中山先生当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来形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②

但许多原来持“修正主义”立场的人，在转到“新马克思主义”界域之后并没有停下来，在理论上他们走得比塞列尼和康拉德更远。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为他们所坚持的理论立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大多遭到当局的逮捕、关押或流放，套用拉克劳与莫菲的一句话，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视域真正称得上是“艰难浮出”。70年代以降，东欧国家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明确转入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主要有：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库龙（Jacek Kuron）、莫泽列夫斯基（Modzelewski）、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基思（Kis）、瓦热达（Vaj-

^① Jean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Amherst 1982, p. 14.

^② 冯沪祥：《超越新马克思主义》，嵩山出版社印行，1988年3月，第62页。

da)、本斯 (Bence)、巴赫罗 (Rudolf Bahro)、吉拉斯 (MiloAn Djilas) 等, 而赫勒 (Anges Heller) 80 年代初的写作 (*A Theory of History*) 也应归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内。^①

在东欧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 科拉柯夫斯基特别引人注目, 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著述甚丰的哲学家, 也不仅因为他个人几乎经历了一个从“修正主义”到“回归马克思”再到“新马克思主义”最后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全程式的漫长演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 在 1956 年之后, 当波兰许多“修正主义者”在否定斯大林主义的范围内拒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时, 他已从多方面对列宁主义产生了质疑和批判; 而 1968 年之后, 当东欧许多具有党员身份的理论家主张回归马克思之时, 科拉柯夫斯基已开始把理论批判的矛头指向马克思本人。迈尔斯 (David Myers) 认为科拉柯夫斯基是在 70 年代末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②, 他可能是按《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第三卷的完成 (1976) 或全书的出版日期 (1978) 来界定的, 但是, 要知道, 该书第一卷的补写、修订与改动在 1970 年就已结束, 而科拉柯夫斯基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只是体现在第三卷中, 在第一卷中科拉柯夫斯基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已昭然若揭。

在第一卷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 科拉柯夫斯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概念、国家概念、无产阶级概念、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和批驳。在科拉柯夫斯基看来,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含糊不清的, 它的基本命题如果解释得严格, 就违反正常的理性, 如果解释得不严格, 就是十足的老生常谈,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一点也不“科学”, 充其量只表达了一种大团圆的希望, 但“怀有这种希望的人在思想认识上的地位决不比别人优越”。^③ 科拉柯夫斯基认为,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

① Simon Tormey: *The Post-Marxist Critique of Marxism: The Case of Agnes Heller*, in Mark Cowling, Paul Reynolds (eds):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0, pp. 280-297.

② 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 赵培杰等译,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第 467—470 页。

③ 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 马元德译,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第 423 页。

动机：其一是浪漫主义动机，它体现为马克思取消中介，消除对抗，使社会价值达到统一一致。科氏认为，这种理想在工业社会中只有通过专制政府才能实现，废除中介就意味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直接的绝对的同一，就意味着权力的分散、三权分立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性政治。其二是普罗米修斯主义动机，它表现为马克思相信人作为自我创造者的无限能力，无产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大写的人”，科氏认为，这一主题已经导致经济上的唯意志论和通过警察手段来组织社会生活。其三是唯理主义的、决定论的启蒙运动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超出近代哲学的范围。基于这种识见，科拉柯夫斯基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修正的，也不可能使之富有成效。“作为一种解释体系，它已经死亡，而且它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地用之于解释当代生活、预见未来或培育出乌托邦规划的方法。”^① 他进而宣布：“现在，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解释世界也不能改变世界：它只是作为一种口号被用来组织各种利益，而这些利益大多与马克思主义当初所认同的相去甚远。”^②

不难看出，科拉柯夫斯基的基本立场和 20 世纪 50 年代末波兰尼所达到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波兰尼当时是“以偏概全”式地由批判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而错误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行了根本的否定，即是说，波兰尼没有将马克思的原典与教化式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科拉柯夫斯基则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和主要命题本身的问题性出发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混同在一起，但他仍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极权主义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其根源也不仅仅是信仰的滥用与伪装，而问题恰恰就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本身上，正是出于此一判断，科拉柯夫斯基才把批判的目标直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然而，我们认为，科拉柯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定位和定性无疑存在着许多臆测、武断和谬误之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责难

^①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29.

^② *Ibid.*, p. 530.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科氏的说法根本就没有严格的理论论证。他的一些命题往往自相矛盾，前后相违：他有时在谈到某一点时清楚地表现出彻底否定的倾向；而有时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思想的优越点。比如，他也坦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所作的更加详细的历史分析和政治分析，表明他们本身并不是自己的‘简化论’公式的俘虏”^①，“每当马克思谈到细节时，他确实没有把他的假说夸张到这样荒谬的极端”^②，“这些话都不表示马克思考察历史的原则是空洞的或没有意义的东西。正相反，那些原则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很难否认假使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如目前情况完备而精密了”^③。

可以说，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能表达当代世界的新变化表示根本的怀疑，并且不再对这一解释范式的哲学基础抱以任何信守和膺服，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后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时的共同“症候”。对科拉柯夫斯基来说，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一个逐渐“祛魅”的过程，它最终呈现的外观使一度投出的热情和执著难以合情合理地得到定位——毕竟走了那么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即便现在突然感到了一种“错觉”，但它毕竟构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并塑造了一代人真切的思想际遇和心路历程，正如利奥塔德所描述的：“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曾经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它以辩证法的名义，本身包含了抽象普遍性的裂隙与矛盾以及具体普遍性的悖论和无限运动。通过经验和反思，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明白了陷入一种特定生活、观点，一种特定语言，并且只能通过冲突和悖论来摆脱它，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啊！”^④

我们知道，波兰尼在 50 年代末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本来就是针对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而发的，而科拉柯夫斯基在 70 年代初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实际上是对 1968 年“布拉格之春”和当时波兰的

① 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马元德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第 414 页。

② 同上书，第 418 页。

③ 同上。

④ Jean-Francois Lyotard: *Peregrination: law, form, ev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0.

“社会运动”以及法国“五月风潮”的理论反思与回应。所以，东欧社会主义的现实经历以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变化是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语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何以在“苏东剧变”的酝酿、发生前后“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增殖为一种广泛的思潮与运动。

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从“现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思想倾向，不是像麦克弗森和贝尔那样聚焦于现实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提出什么“后自由主义的民主”或“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而是根据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集权、专制，针对性极强地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阿拉托曾正确地指出：“从哲学上讲，后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对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曾经论述过的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的一种再思考，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后马克思主义是‘回归马克思’工作的直接继续。在科拉柯夫斯基的带动之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倾向于把马克思对内在于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性中的异化的解决——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民主同一当作一种必然的独裁主义而加以拒斥。”^①所以，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诉求一般是主张重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制度性中介，并把社会运动作为市民社会的积极建构性因素。

众所周知，波兰的“社会运动”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活跃的：50年代后期有“工人委员会”，60年代有“工人自治代表会议”，70年代有“工人保卫委员会（KOR）”和“民族解放阵线”，80年代初有“团结工会”，波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就是“社会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先锋。这清楚地表明，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和现实批判意向非常鲜明突出——以“社会运动”来消解国家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从而建构一种与国家概念并不完全同一的多元化的自治性市民社会。也许正是由于过于直接、过于急切的政治干预指向，东欧后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以激进的方式提出并引发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他们似乎缺乏从理论上进一步“建构”的耐心和细密，比如，他们拒斥了马克思在市民社会问

^① Tom Bottomore (ed.):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1991 (该辞典为1983年的 *Dictionary of Marxism* 的第二版), p. 358.

题上对黑格尔的批判，而又没能提出自己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充分阐释，恰如阿拉托分析的那样，这使得“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难以澄清他们与黑格尔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批判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这种批判只是简单地被抛开（科拉柯夫斯基就是如此），那么这些理论家就近乎为资本主义社会做辩护，如果这种批判至少部分被接受（瓦热达就是如此），那么理论家就得为一种可能的市民社会规划——它不仅从极权主义国家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它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中走出来——作出概念化的理论说明，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在1980—1981年波兰社会运动中已经凸显出来，但是这一理论反思却没有跟上现实的实践”。^①然而，无论如何，东欧后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质点的拓入对8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无疑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且不说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以及对长期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琼·柯亨正是沿着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拓的思路及问题性在“接着说”，就连拉克劳、莫菲及齐泽克对葛兰西的、马克思的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阐发都是这一线路的自然延伸。

第五节 阿兰·图雷纳的行动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

波兰的社会运动引起了法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他试图创造性地从社会运动中“抽象”出一个非决定论的建构主义的行动理论空间，这个人就是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1925—）。^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图雷纳就一直关注发达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现实社会主

^① Tom Bottomore (ed.):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1991, p. 358.

^② Alain Touraine 又译为阿兰·图南（尹大贻先生在《结构主义时代》一书中使用的译名），阿兰·图海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行动者的归来》所使用的译名）。图雷纳是法国当代重要社会学家，其思想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政治上他坚持左翼立场，是一个不动摇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主要著作还有《行动社会学》（1965）、《工人的意识》（1966）、《乌托邦共产主义：1968年5月的运动》（1968）、《五月运动：反叛与改革》（1971）、《后工业社会》（1969）、《社会的生产》（1973）、《后社会主义》（1980）、《团结工会：对波兰社会运动的分析（1980—1982）》（1982）、《劳工运动》（1984）、《行动者的归来》（1984）、《现代性批判》（1992）、《何谓民主？》（1994）、《我们能否共同生存？》（1997）等。

义国家的社会运动，致力于从社会运动的视角给社会理论确立一个新的分析维度，1978年，他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La Voix et le Regard*，法文版）中明确提出要在社会理论中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①在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图雷纳是在20世纪70年代继丹尼尔·贝尔之后明确将自己的理论分析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的社会行动理论（*la théorie de l'action*）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9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产生了构成性影响。也许正是充分考虑到图雷纳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谱系中的重要地位，约翰·莱希特在其《当代五十个思想家》一书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章中，列出了五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紧排在拉克劳后面的就是阿兰·图雷纳。^②

图雷纳将集体行动者和他们的斗争模式作为社会分析的出发点，由此探寻社会运动的性质、规划和利害关系。但是，图雷纳并不认为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可以叫作“社会运动”，他划分了三类集体行动：一是防御性的行为，它与具体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利益保护有关，这种冲突形式通常不带有普遍性意义；二是明显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斗争，这类行为旨在修改决定、影响决策或者变革制度体系，这一类型的集体行为虽然具有普遍性诉求，但却心甘情愿地接受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和策略的制约，从而成为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行动的附庸；三是以主体的名义、要求主体真正发挥它的自主作用并最终使主体摆脱一切权力与从属关系的束缚的自治性行动。依图雷纳之见，只有第三种集体行动才配享“社会运动”的美名，因为“社会运动之出现，既与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强调其客观重要性的革命形势无关，也不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学家的一番演说或某种政治导向的作用而引起的。它的形成是一个能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行动者的能力造成的，即是说，这个行动者既投身于社会冲突之中，同时又能捍卫社会生活的准

^① 《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法文版于1978年问世，英文版于1981年出版。

^② John Lechte: *Fifty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 Routledge, 1994, pp. 175 - 200; 约翰·莱希特在该书“后马克思主义”一章中列出的五位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依次是：阿多诺、阿伦特、哈贝马斯、拉克劳、图雷纳。

则；此种社会生活准则不会变成行动者自己的利益，因而也不会消灭对方”。^① 质言之，图雷纳不是从先验的社会意识规定或者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样式去“认定”社会运动，而是从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关系的建构场所来把握社会运动的规范性和创造价值。因为，把社会构想成由内在逻辑驱动的社会体系的观念，必然导致对社会运动的表象主义的理解，在这种视域下，社会行动只不过是“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的表演性释放，图雷纳要拒斥的正是这种“体系”与“阶级”之间关系的先验设置。他甚至激进地认为，同时谈论体系的矛盾和社会行动及冲突是不可能的，通过诉诸事实中的更高秩序——不论这一秩序是形而上学、历史哲学或进化理论——来评价社会行动的规范性，必然造成对社会行动所关涉的创造及引发的动力的盲视，从而使主体的自主性集体行动从属于某种权力或政治意识形态。图雷纳反复强调社会运动要以主体概念为中心，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使社会运动（不论它是何种社会运动）不蜕变成政治工具，从而把它从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中解脱出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掩盖了社会运动的本来面目，不让人们知道所有一切这种类型的社会运动都是为了给主体以自由——不是社会真空中的政治自由，而是在涉及统治、财产和权力的社会关系中的自由。由此可见，一个社会运动既是对某种权威的斗争，同时又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憧憬而进行的斗争”。^② 可以清楚地看到，图雷纳一方面强调社会行动对本质的优先性，一方面将行动的社会功能纳入到社会本身的自生成之中，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图雷纳对社会行动在社会关系中的构成性作用的理论阐释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的奇妙结合。

由于社会运动不是单个个体的行为，它的发生、发动和开展如果根本没有总体性观念的设计和引导，而纯粹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那么社会运动的理论说明本身便会陷入尴尬的悖论。图雷纳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并非要将社会关系的所有规定都一扫而空，而是力图将社会关系从劳动结构或生产方式的传统中心场域中解放出来，这就像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

^① Alain Touraine: *Pourrons-Nous Vivre Ensemble?*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7, p. 151.

^② *Ibid.*, p. 156.

行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样。在图雷纳看来，马克思虽然把社会关系当作总和、总体看待，但由于其本质主义的作祟，这种总体具有不可忍受的还原论倾向，这使得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都浸泡在简单的阶级关系之中。图雷纳竭力打破社会关系与经济机制、结构矛盾和被归结的利益的固定联系，而将社会关系视为向对立的解释开放的文化领域之内种种对手间具有规范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正缘乎此，我们看到，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图雷纳虽然仍使用阶级这一概念，但它的意义规定已发生巨大的变化，阶级不再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而纯粹从社会行动方面来界定，它被看作是那些将自己的特定利益认同为历史真实性的人们与寻求重新取得对拒绝给予他们的历史性的控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围绕历史真实性（知识的定义和模式、研究的类型、文化样式等）的斗争构成了每一历史行动体系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变成了同义词，它们表达的无非是在社会规范和惯例构成上的有意识竞争。

有两种努力发生在图雷纳这里：一方面，尽力将阶级斗争与体制或政治权力的改变的联系松开，这可以叫做去中心化；另一方面，是将阶级斗争与社会运动同一起来，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争夺社会行动规范的创建与解释权的活动，这可以叫做重新中心化的过程。就像他本人所总结的那样：“我希望建立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最终归之于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的，因而也是归之于那种为了对文化领域进行社会控制而发生的冲突性行动的，是这些关系和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那里所无以获得的中心价值，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在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那些除了国家再也看不到任何敌人的人所拒绝承认的。”^① 图雷纳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实质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再概念化而将社会运动从对历史发展的附属（马克思主义）、从对秩序的附属（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从对权力的附属（后结构主义）中拯救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严格区分了两种分析轴心：历时轴心和共时轴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体系、

^① Alain Touraine: *The Voice and the Eye: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4.

矛盾、革命和发展的主题下所作的分析被定位于历时轴心，这种历时轴心所指向的行政国家和政治行动乃是对秩序或制度的改变的分析所关涉的对象，它把国家当成从一种历史行动体制向另一种行动体制演进的关键因素，所有的社会范畴都锚定于同国家的关系之中，在这里，对立发生在指导国家和历史改变的统治精英与被统治精英所支配的大众之间；因为革命与社会运动明显不同，它向国家发难，它诉诸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改变。

而社会正常功能的发挥、规范的创造与解释、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被定位在共时分析的轴心上，在此，基本的社会对抗发生在把自身认同为历史性的统治阶级与力图建立一种对立的文化模式阐释的大众阶级之间。这种斗争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模式那样构筑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而是引入一种规范阐释和文化模式惯例化的替代方式。共时轴心所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不再以国家为直接对象，社会冲突不再把夺取国家政权视为不可避免的目标，社会行动不同于策略性的工具性行为，社会运动不是社会功能失常的表现而是社会机体健康的表现。通过两种分析轴心的区分，图雷纳确实凸显出了各种斗争形式在社会本身自生产过程中的建构性意义，在历时分析轴心下表现为边缘性的斗争方式，在共时分析轴心之下一跃而成为担负规范主导阐释权的中心。这种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使社会运动成为社会集团建构其自身、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各种社会运动被带到一个平面上，而这种等同性的平面消解了等级式的分层机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权，社会运动在这种视野下远离了无序的混乱、激烈的崩溃偏向以及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它成为新规范和新认同的策源地，成为社会自身得以激活和机理更新的契机。

图雷纳对社会运动的性质与特征的规定透出了浓厚的后马克思主义气息，尽管这种阐述以社会学的方式进行，但它的理论抱负和实际的理论任务已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边界。因为这种对集体行动的新诠释广泛地触及到了主体概念、阶级概念、国家理论、革命学说以及人类解放和政治的真正意义等哲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界定，并且他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重塑了社会自我生产的空间、政治的中介与反应界面和集体主体的自治性要求。从这个意义上，图雷纳的社会理论无论在广

度和深度上均超过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学说，而且图雷纳把社会建基于集体主体的行动之上的动态式的建构主义把握方式对拉克劳与莫菲在“politics”与“the political”之间、“society”与“the social”之间的著名区分以及对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ory practice）的强调都具有直接的启示性和先导意义，以至于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提到图雷纳时，称赞他的分析“非常有趣”。^①

图雷纳企图扩大社会运动的空间和范围并赋予集体行为者的斗争以中性的文化意义和民主的政治目标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两种轴心的关系，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社会运动和国家的关系，在图雷纳这里都没有清楚的理论说明，更为要害的还在于，种种社会运动既然都在为争夺文化规范权和历史性而斗争，那么，最终获得文化霸权地位的社会集团又是以何种机制连接不同利益集团并得到认同的呢？特别是，当一种不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社会运动与志在推翻国家为目的的社会运动来建构社会认同时，它们间的共识如何在民主的政治空间下面达成呢？这些都是图雷纳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困境所在。

第六节 市民社会与琼·柯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层理论

20世纪80年代是“后马克思主义”术语从“沉积层”演变为被“露天开采”的“景观时代”，西方一些相当重要的学者纷纷撰文，试图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进行理论化阐释，比如，1981年，理查德·洛文塔尔在《交锋》杂志（*Encounter*）上发表《我们时代“缺席的革命”：对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变化的新原理的反思》^②，该文第一次明确地把后马克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69.

^② Richard Lowenthal: The “missi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reflections on new post-Marxist fundamentals of social change, *Encounter*, 56, Feb-Mar, 1981, p. 10-18; 理查德·洛文塔尔（1908—1991）是德国著名学者，主要研究民主、共产主义、世界政治。

思主义的兴起与革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缺席”联系起来，将后马克思主义指认为一种后革命时代的“革命焦虑”，从而肯定了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激进内涵。当然，在这一术语的建设性的运用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琼·柯亨（1946—）作出了更为积极的贡献，她在1982年出版的《阶级与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①在该书的导论中，琼·柯亨宣称，她的这项研究试图“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层（stratification）理论奠定基础，以使这一理论能够在不忽视马克思主义成就的情况下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与创新。我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指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进行反思并从中解脱出来，同时又仍继续从事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彻底批判工程”^②。在她看来，新马克

① 20世纪80年代初，除理查德·洛文塔尔和琼·柯亨外，还有一些学者也使用过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比如，1981—1982年，奥罗曼纳（Mark Oromaner）在《社区学院评论》（*Community College Review*, Vol. 9, No. 3, pp. 50—55, winter 1981—1982）上发表的文章《社区学院与阶级结构：一种辩证的透视》（*Community College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中使用“古德纳对阶级结构与斗争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Gouldner's post-Marxist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and struggle）这样的表达。1983年，艾布拉泽斯（Salvatore Abbruzzese）在《国际社会学活页》（*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1983, 30, 74, Jan—June, 186—187）上发表的文章《逻辑与社会：后马克思主义思想》（*Logic and Society: Post-Marxist Thought*）中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概念。1984年，皮尔逊（Christopher Pierson）在《社会》（*Sociology*, Vol. 18, No. 4, November 1984）杂志上撰文《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理论：对国家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最新进展》（*New Theorie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ost-Marxist Analysis of the State*），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1984年，阿内森（Johann p. Arnason）在《国际实践》（*Praxis International*）上发表的文章《进步和多元主义：对阿格尼丝·赫勒的历史理论的反思》（*Progress and Pluralism: Reflections on Agnes Heller's Theory of History*）中将赫勒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1984年，瓦卡利尼（Italo Vaccarini）在《社会学研究》（*Studi di Sociologia*, 1984, 22, 3, July-Sept, 327—343）上发表的文章《社会学理论的教训》（*The Lesson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指出，该杂志自1963年创刊以来，其主要理论框架有“结构功能主义、后功能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1984年，威尔科克斯（L. I. Wilcox）在《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5, Issue 1, pp. 129—148, Apr 1984）上撰文评论卡尔弗顿（Calverton）30年代中期的著作，说卡尔弗顿此时已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与理论退出，并说他的著作“暗示了美洲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些东西”。1985年，卡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 No. 3, 1985）杂志上发表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ism, Post-Structuralism, Post-Marxism?*）一文，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描述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等人的思想。

② Jean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Amherst 1982, p. 2.

思主义者尝试发展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级理论的企图一开始就陷入偏见之中，因为他们首先预置了这样的一个前提：对生产关系、社会—经济集团、资本主义再分配机制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是当代市民社会的逻辑和潜在的激进社会运动的关键所在。为了揭示新马克思主义的新阶级理论的困境所在，琼·柯亨列举并分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四种基本类型：寻求替代性的革命主体来完成原先指派给无产阶级的任务（马尔库塞）；关注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劳工结构的变化，提出一种新的劳工战略的“新工人阶级”理论（马勒和高兹）；普兰查斯和赖特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古德纳、塞列尼和康拉德等人的“新知识分子阶级”理论。在对每一类型的逻辑思路进行详细探析之后，琼·柯亨得出结论说，这四种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都没有试图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综合物的基础性前提作出批判性的评价，每一种探讨立场均抽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特定方面作为其对当代社会进行修正的阶级分析的基础，而缺乏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分析必然无以达到对分层的新形式、社会运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出充分的、非教条的审理。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学者，琼·柯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批判紧紧围绕着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而展开，但她并不是接受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恰恰相反，她认为正是这一分析，在阶级理论的核心之处，是必须要加以重估和改动的。基于此种考虑，她仔细甄别出蕴含着马克思阶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和体制性的诸因素，在对它们进行内在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一种批判性的分层理论。琼·柯亨的主要论据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开始就背负着市民社会分析的重荷，而这种分析一直在两个完全相反的冲动之间纠葛撕扯：首先，按照对当时主要社会运动的分析，它努力表达私人领域（家庭）与公共领域（国家）之间新关系的社会性；第二方面是，将社会领域和工人运动都还原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和矛盾的趋势。而后者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完全优势说明了原先对具体的现代分层原则的分析变成了一种教条式的阶级理论。如果不对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作出修正，就不可能发展出新的批判性分层理论——它面向社会运动发言或者说估价

结构性矛盾，因此，我使用分层这一术语而不用阶级这一概念。”^①

在琼·柯亨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态度比之于黑格尔来说，辩护性更少并且更具双重性，对马克思而言，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既可以看作是自由、自律、个体性和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是统治、限制、异化和不平等的诸种新形式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认为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市民社会只有从政治国家或专制权力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存在的时候，代议制民主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这表现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合理内核的认同与吸取。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又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是把国家作为市民社会的前提，而是相反，他坚持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的基础，而且，不论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都是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随着阶级利益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而产生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而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必将一道消亡。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这一内在紧张关系并不是琼·柯亨非议之处，她所诟病的是马克思将公民的、政治的、司法的、规范的和文化的要素化约为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学中的从属方面，质言之，马克思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市民社会化约为资本主义社会，而马克思完成这一化约的最重要的手段正是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琼·柯亨认为，任何将阶级关系描绘为现代社会统治和解放的普遍基础的分析都内在地具有双重倾向，一方面，如此的分析妨碍了对那些不符合阶级关系结构或者不能视作是阶级工具的统治的基本形式的认识；另一方面，它通过把冲突性利益、需要的结构以及这一领域的合法基础看作是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外观性的表达，模糊了以社会和国家之区分出现的社会领域的复杂性。

^① Jean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Amherst 1982, pp. 2 - 3.

马克思分析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洞见是：如果没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民主和自由问题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由此，马克思把社会问题之最终解决的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这一普遍的历史主体。琼·柯亨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将工人运动、政治民主斗争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综合成‘辩证的’总体的宏大努力，但是，马克思把政治的互相作用化约为阶级关系的工具性，把市民社会化约为资本主义，导致他将政治化解为社会问题”。^①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柯亨看来俨然已成为通达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路障和绊脚石，她提出批判性分层观无非是要寻求一种理论替代，恰如她自己所概括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的分层方法应该能够使结构矛盾、危机的趋势和分层机制符合于当代社会体制，并在摒除了经济和社会—经济的阶级斗争的优先性的预设下，来评价各种社会运动的潜势。”^② 市民社会不会随资本主义而消亡，相反它会沿着多元化、异质性、民主形式的多样化的方向与社会主义汇聚在一起。用琼·柯亨的话来说：“市民社会制度和内在动力，民主政治文化的固有活力，并不排除社会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市民社会。”^③

十分明显，琼·柯亨并不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完全荒谬的思想虚构，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置于根基处来凸显它的本源性的这一取向仍然是当代思考不应跃过的关捩点，问题是，我们不能从生产方式“规定”市民社会的视角将其化约为“经济基础”。跳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模式，跳出二元对立的阶级对立模式，在“分层”的视域下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自发性、自治性和自我调节性的建构空间，这是柯亨理论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正是在积极为市民社会概念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和普遍的规范设计的意义上，柯亨称自己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④ 在1992年出版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中，琼·柯亨和阿

① Jean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Amherst 1982, p. 51.

② Ibid., p. 195.

③ Ibid., p. 228.

④ Jean L. Cohen,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2, p. 2.

拉托对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和这一理论的性质作了相当精确的描述，这一描述对我们恰切地把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或许具有“解蔽”与“澄明”的功效，所以把这段较长的引文摆在这里似乎很有必要：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任何立场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但是，如果一个人意欲避免以反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用为一种形式的支配作出的辩护来换取为另一种形式的支配所作的辩护的话，那么，他必得承认这种可能性：马克思确实确立了某些批判性的优越点，而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继续存在，这些优越点就不能被抛弃。在很多情形之下，这意味着对马克思的主要概念进行重新诠释或重新建构，这意味着导向一种更新的理论规划，这一规划远远超出了任何版本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及法兰克福学派）的规范和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正是这种理论规划，我们愿意将其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标题之下来加以描述。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其术语如何的不同，它们的共同立场是修正马克思在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作出的等同化，是修正马克思旨在使国家和社会一致化的种种政治方案。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像葛兰西那样充分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民主之下市民社会的持久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的存疑乏信，而且他们对维护市民社会保持着一种标准的想往。后马克思主义也有别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在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作出等同，而后马克思主义总是试图把激进民主或者现存各种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激进多元主义的改造变换成为理论探讨的主题。^①

从这段话中，我们发现《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1992）与《阶级与

^① Jean L. Cohen ,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2, pp. 70 - 71.

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1982）在表述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及理论内涵时有一个重大的变化：琼·柯亨在《阶级与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一书中只是将后马克思主义与市民社会问题关联起来，而并没提及激进民主，当时她虽提到了“多元主义的市民社会”，但绝没有用“激进多元主义”这样的表达，而《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则刻意将市民社会与激进民主或激进多元主义联结在一起，这表明在1982年和1992年之间有人从激进民主的角度重新对后马克思主义作了理论上的拓展，并且这一拓展在影响上远远超过了琼·柯亨和阿拉托仅从市民社会问题阐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定。不言而喻，从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这一变化恰恰就是拉克劳与莫菲1985年《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所带来强有力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增殖效应。

第七节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

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中，拉克劳与莫菲只是这一概念的众多后继使用者之一。对于这一点，拉克劳与莫菲二人也直言不讳，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英文第二版序言中，在重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时，他们写道：“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本书的序言中，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标签，它仅仅边缘性地显现出来。”^①然而，这一“边缘性地显现”却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演变进程中，拉克劳与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确实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以至于人们言“后马克思主义”则必提“拉克劳与莫菲”，拉克劳与莫菲几乎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台湾有些学者索性将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2001, xi.

论直接称为“拉克劳与莫菲理论”。^① 国外学者也是着力凸显拉克劳与莫菲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优先地位：保罗·雷诺兹称拉克劳与莫菲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② 艾伦·伍德认为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总结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终结论”，因此它是一个“美丽的范型”；^③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则说，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是“最深刻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④ 斯图亚特·西姆称拉克劳与莫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代表”；^⑤ 道格拉斯·拉米斯（Douglas Lummis）把拉克劳与莫菲的这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当代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著名小说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 1932—）的小说相提并论。^⑥ 保罗·雷诺兹曾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E. 拉克劳和 C. 莫菲明确地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仅仅出于这个原因，也导致他们的著作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发展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⑦ 似乎拉克劳与莫菲二人不经意地喊了一声“后马克思主义”，于是他们就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了。其实问题远非这么简单。问题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丹尼尔·贝尔、伊万·塞列尼和乔治·康拉德以及阿兰·图雷纳都曾明确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就没有获得后马克思主义旗手的美名呢？在 80 年代初期，琼·柯亨也曾把自己的分层理论标识为后马克思主义，她为何就没有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呢？拉克劳与莫菲所以能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宣称，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独特性。

① 何方：《政治民主、拉克劳与莫菲》，载《当代》，1991（62），第 145 页。

② Mark Cowling, Paul Reynolds: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0, p. 263.

③ A. M.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47.

④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9 页。

⑤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12.

⑥ 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 页。

⑦ Mark Cowling, Paul Reynolds: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0, p. 263.

一、拉克劳与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运用

拉克劳与莫菲在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论中，第一次把他们的理论阐述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

通过缩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谱妄及有效性范围，我们与这一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即以它的范畴来把握宏大历史的本质或根本意义的强烈的一元论渴望——发生了决裂，我们的著作的总体倾向是不是这样的呢？毫无疑问，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只有我们抛弃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式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任何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post-Marxist terrain）。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抱有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不过，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正是通过把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生成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显示出来（development），并对它另外的一些方面加以抑制（inhibition）或消除（elimination），我们才建构出一种霸权概念——这种霸权概念，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种为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的民主而斗争的有用工具。^①

这是该书唯一一处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第一次出现了书写形式上的差异。可以肯定地说，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20多年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运用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4.

获得了如此精细的阐述与充分的概念化。这段诠释性文字概括了整个著作的核心要旨，并把他们的理论思考的文理脉络突出地展现出来；而“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似乎很难能感受到是从外面借来的，也不容易辨明他们是在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来记录自己的理论特征，还是以其独特的理论阐述重新规定“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符。

说到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研究刚刚起步，很多人对 *post-Marxist* (*post* 为斜体) 和 *post-Marxist* (*Marxist* 为斜体) 表示的意思不甚明了，以至于臆测迭出，谬见不断，比如有人认为斜体的“*post*”可解读为“*anti*”，*post-Marxism* 也就表示 *anti-Marxism* (反马克思主义)；而 *post-Marxist* 中的非斜体的“*post*”可解读为“*after*”，*post-Marxism* 也就表示 *after-Marxism* (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实，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导论的全文及后马克思主义出现的这个段落看，拉克劳与莫菲的本意并不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或对立的后马克思主义形态，他们所以要以字体的倾斜变化造成书写外观上的差异，是强调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 (*relevant*)。 *post-Marxist* 表明他们过去曾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他们曾经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辩护者，但现在他们已超越了这一理论地平线，所以斜体的“*post*” (拉丁词，“在后”，如 *post meridiem* = *afternoon*) 在这里主要是时间意义上的 *after*，*Marxist* 在这里用的是“正体”，表示他们曾经走过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实际上，在这一段的前面，拉克劳与莫菲已对他们何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反思的出发点给予了清楚的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传统——通过它，阐发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才成为可能。对我们而言，这一出发点的正当性完全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 (*it constitutes our own past*)。”^① 而 *post-Marxist* 是凸显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虽然不再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3-4.

论界域之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建构和再激进化，但这一思想规划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为其借以滥觞的根据，并且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非斜体的“post”除具有一定的时间意味外，还有空间秩序或等级程度上的延伸、转换之意（如 postgraduate, postdoctoral），相应的，也就用斜体的 *Marxist* 表示一种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和激进主义方案。笔者认为，不仅斜体的 *post* 与正体的 *Marxist* 之间以及正体的 *post* 与斜体的 *Marxist* 之间在意涵是一致的，而且 *post-Marxist* 与 *post-Marxist* 之间的意涵也是统一的，质言之，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描述同一个理论对象，而这同一个理论对象无论是与一些东西“决裂”还是对另一些东西“改造”，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当然，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如艾伦·伍德、诺曼·杰拉斯、詹姆斯·彼得拉斯等）认为，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介入”方式表明他们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学者（如米歇尔·巴利特、朱迪斯·巴特勒、安娜·史密斯等）坚持说这种“介入”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无论如何，就拉克劳与莫菲本人而言，他们一直坚信他们的理论探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在一次访谈（1990）中明确地说：“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它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①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范畴的违反与决裂，不仅不会妨碍他们对激进的人类解放事业的执著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而且，正是这种违反和决裂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已改变了的社会政治及文化条件下有可能融入新的话语形式并对之发生建设性的影响。

英国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西姆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以及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他从总体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c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201.

上对后马克思主义持一种辩护性的立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特征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控制性方面、一般的总体化理论、神化马克思以及个人对共产主义所要求的体制的服从。

拉克劳与莫菲确实没有“发明”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提供的东西是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以来滋生出来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零碎的、孤立分散的反对意见加以理论化，《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最大的优点是：它使我们能够将这些零散的反对意见变成一种理论视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达到这样的共识：一种新的理论立场已经在这一时期逐渐展现出来了……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让-弗·利奥塔和让·鲍德里亚的情形就是这样）；而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就拉克劳与莫菲的风格来说，就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从外在特征看，后马克思主义是各种兴趣的不稳定联合，但把它们连在一起的东西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的视角，可以把后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在其人生经历中一度把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抑或其思想发展进程曾经被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的那些人从后结构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或女性主义的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抵制性的或修正性的回应。^①

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两种书写形式的差异在拉克劳与莫菲那里表现的是过去的忠诚与现在的超越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入乎其中与超乎其外的关系，那么，在西姆的眼里，这种差异则分明标示着两种具有紧张关系或相对立的理论态度：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抵制与背离（消极性态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积极性态度）。拉克劳与莫菲对两种书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

写的区分是自身思想发展的纵向比较，而西姆则使之溢出拉克劳与莫菲自身思想历程并凸显其横向的共时性维度。虽然西姆也承认两种“后马克思主义外观”（post-Marxism in both its main guises）^①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怀旧之情和后现代思想的吸取方面是共通的，但是，他毕竟认为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外观”可以各自分立独存，而这意味着单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内容的否定或脱离就可以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鉴别性因素。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西姆才在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的萌芽。西姆甚至杜撰出“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before post-Marxism）这一提法——后面的“后马克思主义”指拉克劳与莫菲及其追随者的后马克思主义，前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系指“暗含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类似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和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潜流”^②，西姆的做法就是在卢森堡、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阿尔都塞、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思想中寻觅“后马克思主义成分”。这一思路的实质是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内部长期以来业已存在的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异议、偏离和被当作是“异端”的另类阐述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它的恰当性和优越点在于把拉克劳与莫菲的思想置于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之中来加以考量，而其不足之处在于只是分析了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某些连续性，而没有指出其断裂点和理论旨趣的悬殊，并且它潜伏着可能导致把“后马克思主义”脱离某种必要的时限而进一步“前移”的危险。

二、葛兰西主义在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生成中的作用

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中作出了许多大胆的论断，诸如，“卢卡奇的早期著作显示了后马克思主义方向”，“‘否定辩证法’预示着后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至少在隐含的意义上，马尔库塞已涉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布洛赫开启了某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阿尔都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

^② Ibid., p. 71.

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起了很大的激发作用”。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他却偏偏漏掉了一个不该漏掉的人物——这个人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掠过了这个人的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也无以把握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这个人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名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巴丽特曾指出：“《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实质性的论点取决于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的解读……对于拉克劳与莫菲来说，葛兰西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因为他代表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以达到的最远点以及理论问题性的内在局限。”^①在一次访谈（1999）中，鲍曼（Paul Bauman）问拉克劳：如何评价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的关系？如果只从德里达、拉康、福柯那里汲取理论滋养而没有葛兰西的“恩惠”，会有后马克思主义吗？拉克劳不无动情地答道：

就“后马克思主义”而论，答案非常简单：不。如果没有葛兰西，我们的整个思想规划是不可能的。我并不是说它不能以别样的方式得到阐发，不过，那将不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你一定得想到：我们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脱出，我们才开始建立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维特根斯坦传统的对话。对于我们所喜爱的那种特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葛兰西的中介是至关重要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建构的所有基本范畴都起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解构，而重新阐述、重新发挥葛兰西的范畴一直是我的作品的主旋律。^②

拉克劳与莫菲在 20 世纪 60 年代都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70 年代中后期开始从葛兰西的思想中借取思想资源来反批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他们认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在克服意识

① Michèle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Polity Press, 1991, p. 63.

②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Polemics and Academics: An Interview with Ernesto Laclau*, *Parallax*, April 1999, pp. 171 - 172.

形态的经济决定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但是，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始终受到根深蒂固的阶级还原论的限制和损害，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concept of hegemony）则打开了走出阶级还原论的可能性。在葛兰西看来，政治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是经济结构的产物，而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成分为取得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在这一建构性过程中，某一历史集团的意识形态要素（element）将其他意识形态素材“收编”、“缩合”到这样一种境地：其他历史集团心甘情愿地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成分的从属性表示“同意”，这样一来，具体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组织赞同（organizing consensus）的政治实践，葛兰西把具体意识形态确立其主导权的建构过程称之为霸权（hegemony）。霸权概念的意义重心在葛兰西那里，已不是普列汉诺夫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对其同盟——农民的领导权，而是道德上、思想上、智识上的领导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直接将葛兰西的 hegemony 译为“文化霸权”。支撑葛兰西对霸权概念进行拓展的基本理念是：在一个主导权已巧妙地渗透到文化、教育、宗教、工会、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私人组织等等之中的情形之下，以暴力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就像在战斗中仅仅攻占了“外围的壕堑”，但在纵深地带一个个坚固的“堡垒”仍然蹯踞在那里，也就是说，完整国家 = 政治国家 + 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实行直接统治，而“市民社会”却是霸权操作的场所，只有在市民社会获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方能真正确立历史集团的统治地位。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蕴藏着极其珍贵的脱出阶级还原论的思想酵母：其一，在葛兰西那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主体都是阶级主体；其二，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必然具有阶级归属；其三，社会阶级并不必然具有一个意识形态范型。基于对葛兰西的这种解读，拉克劳与莫菲坚决主张存在着非阶级的中立性的意识形态因素——中性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获得某种阶级性，并不是由于这一历史主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先验决定的，而是意识形态因素耦合式（coupling）建构的结果，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意识形态因素的接合原则（articulative principle）造就了具体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比

如，民族主义话语孤立地看并不必然具有特定的阶级性，作为一种中立的意识形态因素，它可以被“接合”（articulate）到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也可以被接合到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中，也可能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成分，还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要素。所谓接合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组成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话语聚合在一起从而“造就”出一个有机的具体意识形态的方式，由于具体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也就是某一意识形态要素取得主导权的过程，所以，接合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有效建构霸权的方式。拉克劳与莫菲在70年中后期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提炼并“萃取”出接合这一概念。“articulation”一词本来就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用语言清楚地表述，一是把分离的东西通过联结装置构成一个统一体。拉克劳与莫菲同时取其双重意义，将之提升为一个理论概念，以表示某一意识形态要素“占据”主导权固然是一种“连接”，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不是用强力去消除异己的因素，也不是强制性的灌输，而是通过春风化雨般的“有效的语言表达”让“外在”的因素不自觉地成为“内在”因素，至少是让其感到它不再是“外在”的东西。不难看出，接合概念是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的“moral and intellectual hegemony”（道德的、智识的领导权）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解读”，至少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接合”是对葛兰西霸权概念更机制化的描述，也是对其更充分、更动态、更自治化的表达。但是，无论如何，葛兰西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地断言存在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着非阶级的政治主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一些学者将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理解”称之为“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ism）。

拉克劳与莫菲这一看似深奥的“接合理论”显然是受到了70年代中期兴起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的深刻影响——作为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左翼思潮，“欧洲共产主义”淡化严格的阶级冲突，主张无产阶级把新小资产阶级争取到社会主义一边，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而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当然，拉克劳与莫菲对阶级性的稀释比“欧洲共产主义”更加明显，因为他们的接合理论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非阶级区域，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关键就在于对中立的非阶级意识

形态的成功“召询”（interpellation）。由于承认中立的非阶级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意识形态接合就打破了线性的决定关系和表象式的再现结构，从而消解了直接的先验规制和严格的阶级还原论束缚，但是，直至70年代末，拉克劳与莫菲仍然坚守葛兰西的一道“底线”：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可以成为霸权意识形态，只有在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才可能成功接合其他意识形态因素。这样一来，意识形态霸权实际上就是一种阶级霸权，接合实践不过是“基本阶级”争夺中立性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斗争。这意味着接合并不是完全脱离了生产方式和阶级规定的制约的自主性话语建构，而是部分地受到间接“决定”的相对自主活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在拉克劳与莫菲精心阐述他们的接合概念之际，英国的左派理论家赫斯特和辛德斯已经从后现代话语理论的视角得出完全脱离经济结构和阶级规定的彻底自治的意识形态概念，故而有学者将赫斯特和辛德斯称为“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①。但此时，拉克劳与莫菲根本无法接受赫斯特和辛德斯的结论并将之视为一种异端：“尽管他们提出了事实上消除经济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样的解决是以牺牲历史唯物主义为代价的，实际上，通过把经济主义等同于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论点，通过把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作为解决方式，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提出了质疑。”^② 这表明拉克劳与莫菲虽然部分拆解了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但还没有将意识形态视作完全脱离了经济决定的非阶级层面的话语实践，经济不直接决定政治意识形态，但毕竟是经济决定“基本阶级”，而只有“基本阶级”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霸权阶级，可见经济仍然是政治意识形态这只看似自由飞翔的“风筝”背后的长长的牵线，而意识形态接合不过是在经济最终决定（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by economy）与意识形态尽可能最大自主化之间的一种“妥协”或“兼容”方案。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欧洲

^① 黄瑞琪主编：《马学新论》，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8年，第43页。

^②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p. 200.

国家的左翼知识界被浓重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氛围所笼罩。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拉克劳与莫菲思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1年他们在合撰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认为，葛兰西在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与经济的最终决定之间的相容论损害了接合概念应有的解释潜势，这使得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之中，因此，他们明确宣告要“超越葛兰西”，“走向一种新的霸权概念”，并将社会主义建立在“激进民主”观念的基础之上。^① 尽管在这篇论文中拉克劳与莫菲还没有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论，它俨然是拉克劳与莫菲告别新葛兰西主义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一篇宣言，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不过是对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更详细的阐述和进一步的发挥。

三、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建构

拉克劳与莫菲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工作是为意识形态部分地“松绑”，也就是拓展“接合”的空间，从而使“霸权”能在非阶级意识形态领域运作，但是，意识形态毕竟还没有“独立”，妨碍意识形态成为“崇高客体”的“孽障”就是“经济的最终决定”，所以解构“经济”这个“本质主义的最后城堡”就成了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务”。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它成了赋予所有历史过程一种有倾向意义的最后理性基础。其具体表现有三：一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必然优越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一个中立性的先验的生产力概念；二是社会代理人的统一性必然是在经济层面上建构的，比如，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是由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决定的；三是社会代理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必然赋予他们以历史意义，即是说，社会代理人在其他层面的活动及其意义必须最终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比如，工人阶级必然追求社会主义，即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必然在其经济关系上得到说明。在

^① Laclau and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ies: Where Next?* In *Marxism Today*, No. 1, 1981, pp. 21 - 22.

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三个命题所断定的“必然性”根本没有严格的论证，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代理人的统一性，都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自足空间，而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动态建构过程。在相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之下，生产关系完全可能出现不同的效应，比如，英国有强大的工会，所以工人抵抗的组织与动员就比美国容易得多，不能把工人对资本的对抗都归结到生产力的决定。社会主体经济处境与地位的相同并不能绝对保证他们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追求之间也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关系。拉克劳与莫菲并非一定要把经济排除在政治建构进程之外，也不是一定要否认物质利益可以对政治层面产生影响，而是拒绝承认经济关系对政治目标和政治认同的必然的线性的“主宰”。既然经济不能必然确保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统一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也就丧失了其合理性。纵使仍然要使用“阶级”这一概念，它也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由经济单一决定的“阶级”；意识形态不是围绕“阶级”构成的，相反“阶级”是围绕意识形态构成的，拉克劳与莫菲把他们的这一理论翻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①。

面对如此的结论，拉克劳与莫菲指出，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一直把政治紧紧锚定在经济之中，卢卡奇和柯尔施尽管极力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但他们仍然是在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还原论观点的范围内思考问题，在这些情况下，接合意义上的霸权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葛兰西把政治理解为一种接合实践，从而使脱出严格阶级规定的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成为可能，所以葛兰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分水岭”；然而，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中的两个本质主义因素却最终为霸权逻辑设定了限制：“一是，他坚决主张，霸权主体必然构成于基本阶级这一层面；二是，他假定，除有机的危机形成的间歇期外，每一社会形态都围绕一个单一的霸权中心建构其自身。”^② 第一点意味着霸权主体的同一性（或身份）是在接合领域之外构成的，即霸权不是由接合实践造

^① Laclau and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ies: Where Next?* In *Marxism Today*, No. 1, 1981, p. 22.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7.

就的，它有一个先验的本体论基础，也就是说，接合之外的东西决定着接合；第二点表明霸权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固定的中心，这使再接合或重新接合成为多余，即接合的开放性和活动性受到损害。显然，对葛兰西的这两点“超越”导致了两方面的突破：其一，外在于接合实践的霸权主体的合法性彻底被取消，主体的主导权不来自于其在生产关系中的确定位置或者其固定的阶级属性，不仅主导权取决于接合，就是其政治身份本身也是接合的产物；其二，霸权结构体中存在着主导力量，但它再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作为“天然”的中心，它处于随机性的建构之中，也处于随机性的解构之中，换言之，互相取代的多元化的“中心”消解了固定中心的存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拉克劳与莫菲所谓“超越葛兰西”就是从后现代的视角把“霸权接合”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成分全部清除掉，从而使接合实践在偶然性逻辑的空间无所羁绊地自主运作。

拉克劳与莫菲的努力在于使霸权接合充分自主化，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建立意识形态统一性和政治认同的可能性。“接合”虽有“接”的随机性、“合”的偶然性，但毕竟还是要“接”、还要是“合”；“霸权”虽没有固定的中心，但毕竟还需要暂时的“流动”的中心，无论如何，只要谈及“霸权”，就不可规避一个主导力量将各种差异性因素组织成一个“统一体”，尽管这个“统一体”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松散的结构体。看不到这一层，就无法抓住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宏旨要义——拉克劳与莫菲并非像鲍德里亚、利奥塔那样的极端后现代主义者将一切都化为不可连接的“碎片”，相反，他们在承认断裂和非连续性的同时，仍然相信在祛除了必然性逻辑的“专制”之后，完全可能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地平线上重建非本质主义的政治认同。正缘乎此，解构本质主义的霸权概念并不意味着拉克劳与莫菲思想规划的终结，建构一个“新的霸权概念”才是他们的理论着眼点和落脚点。为此，拉克劳与莫菲阐述了一种新的话语理论（New theory of discourse）以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理论支撑。

拉克劳与莫菲的新话语理论整合了诸多不同的思想资源而又有独出机杼的创新与突破。在话语的维度和范围方面，他们主要借取了阿尔都塞关于“一切实践都在意识形态之中并通过意识形态进行”的观点、后维特根

斯坦分析哲学关于“语言和行动构成了一个完全的语义整体”的观点以及德里达关于“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他们认为话语构成了霸权接合的全部领域，并不存在福柯所说的话语与非话语（between the discursive and the non-discursive）的区别，一切都是话语，超话语（extra-discourse）或外在于话语（ex-discourse）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拉克劳与莫菲拒绝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是为了彻底颠覆隐含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中的表象主义症结，从而根除“本质”的“病灶”，使霸权接合完全在“话语平面”上运作。在话语的一致性方面，他们借用了福柯的“离散中的规则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认为话语的统一性不取决于各种要素内在的逻辑连贯性，也不取决于主体的先验同一性，也不在于经验的类同性，恰恰是不同的话语成分的差异性位点构成的不规则性本身成为具体话语的统一原则。拉克劳与莫菲所以坚持“分散”本身建构了话语统一性，意在瓦解本质主义的同一性逻辑，使霸权接合在多元、异质、平等的状态下进行。在话语的开放性方面，他们吸纳了德里达的“延异”观念和拉康的“缝合”概念，认为话语的意义不可能完全凝聚和固定，从“因素”（element）到“环节”（moment）的转换永远不会完全实现，意义处在永久的绵延和推迟完成之中，最后的“缝合”永远不会到来。拉克劳与莫菲否定终极意义是为了粉碎所指（the signified）的先验性和固定性，从而为能指（the signifier）漂浮不定的意义“外溢”提供可能性。在一具体的话语体系内，不断从能指意义链条中“外溢”的部分就是“意义剩余”，它“决定了每一话语对象的必要的话语特征以及任何特定话语实现最后缝合的不可能性”^①。“意义剩余”彰显了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但同时造成了意义的局部固定；也就是说，在一个纽结点（nodal point）上意义的滑动暂时被阻止，某种意义姑且被“缝制”出来。意义剩余构成的话语开放性是拉克劳与莫菲新话语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它构成了新霸权概念的拱心石。因为，在一个差异体系中，如果每一因素的意义都是绝对确定的、封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1.

闭的，那么接合就丧失了活动空间；而如果每一因素的意义都是绝对不确定的、非缝合的，那么接合根本就无从谈起。

既然一切都是话语，那么，霸权接合就不限于意识形态层面，它获得了普通性维度。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和非决定论的领域，那么，社会也是一种“接合”。拉克劳与莫菲反对把社会看作是由单一原则所决定的固定结构，他们将实证性的社会称之为“Society”，而把接合意义上的社会称为“the social”，他们的著名命题是：“社会（Society）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对象。”如果政治不被局限于一种制度，不被看成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特定阶级的“利益场”，而被视为内在于人类社会并决定人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真正维度，那么，政治也是一种“接合”。拉克劳与莫菲拒绝把政治简化为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认为政治根源于“对抗”（antagonism），对抗不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对抗则是不可根除的，对抗是社会成为可能的条件，不可能设想一个消除了对抗的完全透明的和谐社会，他们的著名提法是：“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既然如此，作为控制对抗、调整对抗的“政治”也不会随阶级的消失而终结，拉克劳与莫菲把这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永不消失的”政治称之为“the political”，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politics”。基于这种新的社会观和政治视野，拉克劳与莫菲提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抗形式已多元化，对抗点以分散的状态高度增殖，各种“新社会运动”（诸如生态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反种族歧视的、争取少数民族权力的、性征的、同性恋的运动以及绿色运动、和平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等）、各种服务性行业、各种社会关系领域、各种边缘化群体都可以成为反抗不平等、抵制压迫性权力关系和要求新权利的斗争场所。在一个身份变化迅速、认同过程困难、主体位置多样化、利益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状况下，“坚持本来就成问题的阶级斗争观念已毫无意义”^①，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特定阶级来解放全社会或全人类已不再是预期中的革命模型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59.

了。为此，拉克劳与莫菲为社会主义设计了新的方案和不同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社会主义不是同资本主义来一个千禧年式的大决裂，而是一方面吸收资本主义在自由、民主建设方面可资借鉴的积极成果，一方面深入批判、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反民主的“攻势”，将各种反资本主义压制的不同抵制和斗争形式在追求“激进民主”的想象中“接合”起来，从而彻底铲除带来压迫和奴役的种种不公平的政治关系，使民主真正推广到所有的政治领域、所有的社会群体、所有的生活空间。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激进民主”的承诺与建构，所谓激进民主，就是承认社会主义主体的零碎化、分散性及多样性；没有哪一种政治主体拥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特权并成为固定不变的永久中心，在民主话语中，它们都是“等同链条”（a chain of equivalence）中的一个环节；异质性的政治认同各自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因而相互之间存在着“边界”（frontiers），哪一种主体能够将差异性的多元身份“接合”成一个松散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哪一种主体就获得了临时的“霸权”（hegemony），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就是通过接合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来建构平等的多重主体之间的政治认同的主导权的过程。

拉克劳与莫菲抛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核心范畴，并拒绝了它的总体理论逻辑和分析模式，力图在当代文化氛围下运用后现代主义最新近的理论成果来重新阐发激进政治图景，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他们观点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价值”^①。而西姆的评论似乎更高：“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目前业已确立的理论立场，像在诸如欧内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莫菲这样的重要理论家们的著作中那样，它试图在20世纪晚期从作为全球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中挽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方面，并对之重新调整定位，以使它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新的意义。”^②拉克劳与莫菲坚信，具有强烈启蒙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规划仍然拥有解

^①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58页。

^②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1.

放性的一面，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价值的追求在当代的知识境遇下并没完全丧失意义，只要借助于一种后现代的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积极方面将会在解构中幸存下来并在新的建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上，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霸权接合实践。因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西姆正是按照他们的这一启示区分出两种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这两方面不仅紧紧纠葛绞合在一起，而且其理论建构的努力要远远强于解构的冲动，甚至可以说，其理论重塑的意向在逻辑上“先于”并成功地规导了其拆解企图。这恰恰切合了利奥塔对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诠释：“后”（post）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把一个非斜体的“后”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乃表征一种在时间上后发的东西在逻辑上的预先莅临，正是在此意义上，巴丽特指出，拉克劳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①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悖论就在于它以最大程度“脱出”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弘扬马克思的激进批判精神，重申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继承马克思的解放事业。正是由于这一悖论状态，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回应和反响，激发了一波又一波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广泛争鸣，谩骂者有之，颂扬者有之，左派说它右者不乏其人，右派说它左者亦不乏其人。记得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谈到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时说：“那些把自己的学说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

^① Slavoj Zizek: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 p. 246.

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以及最终的极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①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真正继承人，也许德里达的话可以看作是对拉克劳与莫菲的一种绝好辩护，但接下来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以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代价，才能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吗？

^① Jaques Derrida: *Spectres of Marx*, Routledge, 1994, p. 88.

第二章 接合理论

拉克劳与莫菲二人都有拉丁美洲的生活、政治斗争和思想经历。青年时代的拉克劳（Ernesto Laclau, 1935—）是阿根廷激进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之一，由于参加反对阿根廷翁加尼亚军人政府的独裁统治的学潮而受到官方通缉，于1969年流亡英国并进入牛津大学深造。莫菲（Chantal Mouffe, 1943—）是比利时人，在卢汶大学求学期间即是社会主义党的左派成员，作为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她将自己的革命热情释放于当时第三世界的反帝斗争中，她积极加入了几个拉丁美洲解放组织，并抱着极大的革命热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远赴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1967年至1973年，她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任教。在拉丁美洲，拉克劳与莫菲都参加了当地的左派激进政治运动。在思想上，他们都接受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试图运用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当时拉丁美洲的左派政治实践。由于莫菲越来越感到她多年信奉的阿尔都塞主义无法有效解释哥伦比亚的激进运动的现实，于是她重返欧洲，来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正是在这里，她结识了在该校政治系任教的拉克劳并开始了两人长期的共同智识探索和理论合作。拉克劳与莫菲二人的拉丁美洲经历并不是外在于他们思想发展的单纯的生活阅历，它作为一个深远的背景始终镶嵌在他们的理论图式之中。国外有些研究拉克劳与莫菲的学者对他们的拉丁美洲阅历与他们后来所阐发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

关联作出了颇有启发性的暗示，奇尔科特（Ronald Chilcote）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拉丁美洲产生了危机，左派话语已从暴力革命“向政治文化、多元化民主及改良主义方向转移。传统的极端激进的革命观，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在外围的不可能性，以及群众动员和民主的作用，都处在危急时期”^①。在此情状之下，拉丁美洲的左翼理论家试图寻找一种超越二元权力结构并将阶级分析模糊化的替代方案。应该说，承认拉克劳与莫菲的拉丁美洲经历与他们的思想发展存在联系是合理的，将之作为一个构成性的语境来反观拉克劳与莫菲思想演变的轨迹也是必要的，因为当时拉丁美洲高涨的群众性民族民主运动及其“人民同盟”的左翼政治活动（特别著名的是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和智利的阿连德主义）给包括拉克劳与莫菲在内的拉美左翼知识分子“稀释”、“冲淡”阶级斗争的正统观点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拉克劳与莫菲才偏爱比阿尔都塞更加疏离于“经济主义”并积极为“人民同盟”策略提供理论支撑的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如果过高地估价拉克劳与莫菲的拉丁美洲背景对他们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则未免陷入误识。我们不能说拉克劳与莫菲在1985年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时才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绝对不能说，早在拉丁美洲时期他们都已经进入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域。拉克劳流亡英国后发表的论文《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②在批驳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的“依附理论”过度强调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和商品流通而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的强调时，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执著坚持，而且，他也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可以断定，在整个70年代，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还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地平线。

拉克劳与莫菲二人的学术合作在拉克劳的第一部理论著作《马克思主

^① Ronald H. Chilcote: *The Retreat from Class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17, No. 2, 1990, p. 11.

^② 拉克劳这篇论文最初发表于 *New Left Review*, No. 67, 1971, 后来此文收入拉克劳的第一部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1977）。

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①中已经开始,在该书的导论中,拉克劳写道:“我必须向尚塔尔·莫菲致以深深的谢意,我和她详细地讨论了这些论文的主要部分,她对于一些核心论点的阐发所作出的贡献具有如此的决定意义,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它们必须被看作是合作的产物。”^②那么,拉克劳所说的“核心论点”又是什么呢?在该书第三篇文章即《法西斯主义和意识形态》末尾的一个较长的注脚中,拉克劳提到了他已读过莫菲的“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③,此文就是后来收入莫菲主编的论文集《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中的《葛兰西的霸权与意识形态概念》一文。将莫菲的这篇论文与拉克劳的这部著作进行比较阅读,就很容易看出:拉克劳与莫菲二人论述的对象不同,一个对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一个则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给予新的阐发,但是两人却殊途同归,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而这一“共享”的结论也就是拉克劳所说的“核心论点”,即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不能还原为种先验的阶级规定,它来自于一种建构性的“接合原则”。

任何理论作为一种由概念构成的阐释体系,它的理论功能的获得都离不开将某些普通的词语专门化、术语化的过程。通过这些被赋予特定涵义的术语的运用,理论展示出它独有的风格和力量。概念的个性化效果和理论本身的内在特性是紧密相联的,没有原创性的概论,也就没有原创性的理论。在拉克劳的早期思想中,接合是一个核心的理论概念,依托这一概念,拉克劳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阐发了非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与霸权意识形态的连接方式。这一早期的理论工程对后来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对意识形态阶级还原论的批判为后来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作了一定的铺垫,更为重要的是,拉克劳早期对接合概念的理

① 拉克劳的这部著作由四篇论文构成:《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初发表于 *New Left Review*, No. 67, 1971)、《政治的特性》(最初发表于 *Economy and Society*, No. 1, 1975)、《法西斯主义和意识形态》、《走向民粹主义理论》,最后两篇是专为本书而写。

②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3.

③ *Ibid.*, p. 141.

论提升也为日后对接合概念的进一步激进化作了准备。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拉克劳通过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着力阐述了一种意识形态“接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正是这一接合理论为拉克劳带来了最初的学术名声并确立了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作为欧洲新左派理论家的地位。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领袖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就是援用拉克劳的接合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原则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5年，当拉克劳与莫菲的新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刚面世不久，在一次访谈中斯图亚特·霍尔坦言：“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的喜爱依然超过《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因为在那个时候，拉克劳艰难地从还原论中挣脱出来并开始以话语模式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重新加以概念化，对于这一点我尤其喜爱。不过，在他们的新作中，对事物之间为什么可以接合或者为什么不可以接合的理由再没有详加说明。对还原论的批判明显地导致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话语场域的概念。”^①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某一历史性意识形态包含着异质的多种原素（elements），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原素并不一定都必然地具有阶级属性，其中有些原素根本是非阶级性的、中立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不是由主体在生产关系中的结构性地位所预先规定的，它取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原素之间的连接方式，这种赋予意识形态以统一性的连接方式就是拉克劳所指称的“接合”（articulation）。意识形态自身的组成成分的接合“打造”了自己的统一性，这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自治”。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分析上，就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原素在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某种中性的意识形态因素最终被接合进何种阶级话语之中完全取决于“霸权斗争”。显然，这一接合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完成了一次“逆转”：社会力量或团体并非由客观的经

^①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 10 (2), p. 53.

济条件建构其统一性，然后才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只有它开始拥有了某种可以解释一个共享的集体处境的可理解的概念形式（forms of intelligibility）时，才会成为一个阶级或一种一致的社会力量。即便是到了那种地步，决定其地位及统一性的东西也不能还原为我们过去通常用来解释经济阶级的那些术语”。^①

第一节 接合的一般界定及理论提升

一、接合的含义

现在，“接合”这个词被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炒得沸沸扬扬，好像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阐释的范式危机和理论参照体系的崩溃必须要由接合这一概念来挽救似的。在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文本中，他们把接合概念抬到很高的地位上，接合在他们那里成了文化转向的理论标志，被理解为文化解释中的一种新方法，他们甚至从认识论层面、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策略层面对接合的理论功用进行一般性定位和估价。尽管接合概念在文化研究领域不仅十分抢眼时髦，而且被装点得神奇玄奥，但是，接合概念最先并不是由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引入学术语境中的，它的独特的理论效果最初也不是在文化诠释学中发生的。真正将接合这一语词概念化、理论化并进行方法论提升的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欧尼斯托·拉克劳。

那么，什么是接合呢？作为一个概念，它的准确界定是什么？作为一种理论，它的内容和原则是什么？作为一种方法，它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为了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我们必须先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既然文化研究学派对接合一直津津乐道，我们不妨借他们之口来捕捉一下接合的词义、内涵及其被赋予的意蕴。伯明翰文化学派的领袖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一次访谈中对接合一词的意义作了清晰而详细的描述，他

^①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 10 (2), p. 56.

说：“在英国，这个词具有微妙的双重意义。因为 articulate 的意思是发声 (to utter)、说出来 (to speak forth)、发音清晰 (to be articulate)，它带有用语言表达 (languageing)、表述 (expressing) 等方面的含义。但是，我们也说‘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和车后体可以连接，但并不是一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相互连接，但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动装置将构件拆开。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想必你要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产生或锻造出一种关联？一种话语的所谓同一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的接合，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因为它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①

从霍尔的解说中我们看到，接合一词的两个义项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把彼此外在的东西接合起来固然是一种联系、联结，而发音说话又何尝不是音素、音节、词句间的组合与搭配呢？因此，接合的最基本含义是通过一种中介或活动将不同的要素或构件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实践活动。

但是，不论是在拉克劳的原创性使用中，抑或是在文化研究学派的拓展中，接合的意涵已有些微妙的寄寓，拉克劳所以取用“articulation”一词对其进行概念化的处理，正是看中了这个词微妙的双重内涵，它既和言语有关，又表示一种连接的实践，如果将两方面的意义融在一起，就是通过话语方式所达成的关联或统一性，而这正契合了拉克劳与莫非寻求话语政治的偶然性联结的理论建构意向和企图。所以，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接合是连接和表述的统一，它在表述中连接，在连接中表述，也就是说接合并不是一般的联系、结合，它是一个遇合式的建构过程，在动态的连接活动中一种话语得以呈现和溢出，但是话语意义本身既不是先验既定的，也不是一旦浮现就完全固着下来。所以，接合概念既包含“接”的偶然性、随机性、中介性，又包含“合”的暂时性、非完成性和非稳定性。也就是说，接合是非闭合的话语实践场所，话语的所谓同一性是一种磨合的动态

^①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ed. L. Grossberg),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Verso, 1996, p. 141.

效应和建构活动的展现。

二、接合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接合概念是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一书中首次加以理论提升和充分阐述的。在该书的导论中,拉克劳为了给他的接合概念奠立一个厚实的认识论基础,也为了赋予接合概念以哲学色彩,而把接合概念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联系起来。他认为“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在历史上第一次包含了接合理论”^①:洞穴中的囚禁者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不能看到洞外的世界,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一束阳光照进来,洞外人的影子映在洞穴的后壁上,洞外人的声音传进洞内,于是囚禁者断定,这声音是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而如此的断定也就是声音和阴影之间的一种“接合”。拉克劳指出,在这个著名的哲学隐喻中,接合是在常识话语(即意见)体系的误导下完成的,在这种接合中,概念并不是由内在的逻辑关系所连接,而是由意涵性(connotative)或激发性(evocative)的关联维系在一起,这些关联是由习俗和意见建立起来的。柏拉图正是要竭力打破这种接合总体的规则性,切断误导性的接合,重新建立真正的接合,所以,摆脱意见走向知识的过程也就是拆除原有的接合重建真正接合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辩证法可以看成是建立真实的接合的推动力量,通过辩证的批判的进程,概念间的想象性、习惯性的关联被拆掉,而本质的范型性的内在关联呈现出来,所以柏拉图对理念的追求无非是建构一种理性主义范式的接合形态。

在拉克劳看来,柏拉图所确立的“拆解”(拆卸原有的接合:disarticulation)到“接合”的双重运动构成了欧洲思想的风格和经久不变的特征。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康德的先验分析到黑格尔的纯粹概念推演,“这些打破意识形态的话语接合的连续不断的尝试毫无疑问导致了日益增生的概念的纯粹化。就像建基于契约观念的政治理论的产生一样,古典政治经济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7.

学也从这一抽象进程中产生出来”。^①但是，这种在概念的抽象性与意识形态意涵领域之间循序累进的分离造成了一种极端：即试图超越常识话语，把概念与意涵性或转义性关系断裂化，通过揭示概念之间的固有的逻辑性来重构作为整体的实在。拉克劳认为，这种通过概念的纯化而构造所谓必然的、本质的、真正的接合的理性主义抱负支配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柏拉图的有重要的不同：在柏拉图那里，意见与纯知识间是不可归化的，也就是说“拆解”与“接合”是绝对排斥性的、非相容的；而在黑格尔那里，现象是本质的一个环节。

依拉克劳之见，理性主义的接合范式虽然极力贬抑或远离常识性话语的接合形态，但是，意涵性的话语接合是不可根除的，它甚至形成了本质主义范型性接合成为可能的条件。一个基本的认定是：在“意见”层面上，也就是在意识形态话语场所内，接合能够构造出一个具有可能意义的延伸性结构，而“哲学”不过是对已有接合形式的继发性审理和拷问，它要通过理性的联结，诉诸本真的秩序来重建意义结构的总体性，在最低限度上，意涵性的话语接合毕竟构成了内在本质性接合的对抗性的参照体系。另一方面，在“意见”层面上概念可以由外在于它们的逻辑本性的形式原则所连系，这充分表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灵活性和宽泛性。而“哲学”层面上概念的本质性关联试图将概念的逻辑性确立为唯一的接合原则，也就是说，这种理性主义的接合范式发生了潜妄和超越，它把只具部分意义的适用原则不适当地扩大为整体的体系性秩序。拉克劳指出，这种基于概念的逻辑内聚性和一致性的概念接合过程在哲学史上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获得普遍性的阐释权，尾随它出现的往往是相对主义和对以此种方式建立的“知识体系”本身更深的怀疑。

拉克劳的结论是，消除任何意涵性的话语接合既是武断的又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从概念的纯粹化幻觉中摆脱出来，如果我们给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接合以恰当的地位，我们就会从观念的转变中惊喜地获得三方面重要的识见：“其一，并不是每一个概念都与其他概念有必然性关联，仅仅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9.

从一种关系出发构建一个体系的总体性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系统化的整体依赖于在逻辑上并没有相互关联的概念的接合。其二，在不同的概念结构间不可能建立必然的关系，而只能构造出接合的可能性条件。其三，因此，任何对具体的接近都以更复杂的概念接合为其前提条件，而不仅仅是对简单的概念全体逻辑特性的揭示。因此，分析越具体，卷入的理论规定就越多，由于理论规定在本质的自我展现中并非是其必然环节，而是分立的概念形态，因而对具体所进行的理论接近的先决条件包含了累进的抽象过程，这一抽象过程就是把概念从意涵性接合中解放出来。”^①

我们看到，在这里，拉克劳虽然对本质主义的接合范式多有诟病，但他还没有完全否定这种接合的存在价值。他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不仅表明了接合的多样性、复杂性，更重要的在于，他强调不同接合形态的不同理论功能和作用，而且这些不同的接合不能任意混同和置换。这与他后来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接合的论述是有很大差别的，在那里，拉克劳与莫菲基本上否定了必然接合本身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已经将接合限定在一个特殊性的领域之内，即是说他们在专门言说一种政治话语的接合实践——霸权接合，在这一范围内，接合以差异和地位的等同为条件，如果一切都是固定的、完全缝合的、绝对一体化的，那么既不存在接合的必要也不存在接合的可能，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接合实践本身的存在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拉克劳力图将接合概念置于整个西方哲学及欧洲文化发展中来加以考察。从哲学方面，他为接合概念追溯到一个古老的渊源，并把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诠释为一种成问题的接合形态，从一定意义上他为接合设置了一个哲学背景、为接合提供了一个认识论基础，他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认识：接合理论由来已久，它就深嵌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但是，拉克劳在这方面的阐述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并不是要对接合进行纯哲学的探究，他所以要提出接合这一概念并对之进行理论化，是与讨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紧密相关的，因此，对拉克劳接合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0.

概念的完整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简单的语义澄清和其意义的大致勾描。

第二节 接合与意识形态

一、接合的理论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导论中，为说明接合概念在欧洲政治、文化思想中的存在与作用，拉克劳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作为欧洲霸权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的没落，一个是组织化的经济社会的兴起，最后是民主概念的变化。第一个表明了“拆解”过程：“对现存社会秩序、私人财产以及被资产阶级认同为社会存在的其他原则的辩护越来越少地显现出与君主制度有什么关联：这两者间的同一性（它一度构成专制主义政治话语的核心）开始消解了，就像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阴影与声音间的关系一样。”^①第二个表明了“新接合”的过程：“组织化的经济社会的观念在主导性意识形态范围内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接合在一起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②最后一个是“再接合”的例子：民主这一概念在古代社会具有一种否定性的意味（它表示“暴民统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它成了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它与自由政治话语接合在一起，这一接合进程贯穿了19世纪。十分清楚，这三个例子所涉及的组合因素都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虽然拉克劳没有对这几个例子进行详尽细致的分析，但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他要传达的无非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一个接合实践的场域，在其中接合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性的、本质的和内在的，接合的条件是复杂的、差异性的，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其完成的方式和进程也没有必然的规定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接合是一个政治的建构过程，这一建构是意涵性的、激发性的。

可以说，如果离开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谈论接合，并没有多大的价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8.

^② Ibid.

值，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用联系、关联、结合等表述方式来替代它。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接合概念的独特意义就立即凸现出来：接合排除了线性的决定关系和单一的对应，它与话语实践密不可分，它排除任何先验性规定和还原论倾向，接合没有既定的普通主体，它本身是一种暂时的固定状态。这样一来，通过接合这一概念，我们能够对意识形态的构成及运行机制有一个更清楚的哲学透视，就如斯图亚特·霍尔所刻画的那样：“一种接合理论既是一种理解方式，即理解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种话语聚合在一起；同时也是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变成或不变成某些政治主体。换言之，接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何以思考属于主体的、必然的想法；接合理论使我们能够去思索：一种意识形态何以赋予人民以权力，使人民开始去理解或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境遇，而不是把这些理解形式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他们的社会位置。”^①

诚然，拉克劳对接合概念进行理论阐发，其最初用意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拉克劳并非先确立了一套完全定型的、成熟的接合理论，然后照此理论对意识形态进行审究。实际的情形是，接合理论本身也有一个渐次的演进过程，把接合用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只是第一步而非最后举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接合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说有一种互馈性的双赢效应：通过引入接合的观念，可以对意识形态性质及构成的理解产生新的透视；而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接合概念的特性和理论功能更清晰地展示出来。对意识形态而言，接合是清洗剂和解毒素；而对接合概念而言，意识形态是其获取具体化的空间和确证的方式。

这意味着，接合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本身也是一个“接合实践”，那么，这一“接合”的冲动又是何以产生的呢？诱发灵感的源泉又在哪里呢？此一“接合”欲达致何种效果呢？只要通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

^①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ed. L. Grossberg),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Verso, 1996, p. 141.

识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答案。而在该书的导论中，拉克劳在谈及写作目的时对这些问题已经有所概括，他认为，有两大障碍极大地妨害了理论实践，这便是概念在常识话语层面上的意涵性接合以及成为本质范式的理性主义接合，它们“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令人不满意的状态”。^①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历史性地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范围之内，政治话语的意涵性接合趋于自动地变成理论规定。就像拉克劳指出的，对具体事物或现象的分析诚然离不开概念式的理论规定，但是，不能将意涵性接合作为理论规定的必然性总体，否则就会导致具体政治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是一个范型性关系的公设：所有的矛盾都被还原成阶级矛盾，即是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任何因素和矛盾都必然有一个阶级归属。拉克劳认为，单就第一方面的障碍来说，只要将理论规定的整体不当成是概念规定性的逻辑性固有展现，这一障碍还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一旦第二方面介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就成了致命性的痼疾。“悖论性的结果是：理论实践无需去矫正政治话语的意涵性接合，因为如果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规定都有必然的阶级归属，它们因此也就是对主体的阶级本质的表达。”^②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方面主要针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方面主要针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重心显然落在第二方面，因为阶级还原论这个“毒瘤”不除，政治话语层面的意涵性接合的本质主义也无法根本彻底清理。颇有兴味的是，后来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前半部分的思路与叙述顺序恰恰就是从对第一方面的批判过渡到对第二方面的批判。

二、接合与意识形态要素

当然，这只是梗概式的描述，况且，对意涵性接合的本质主义的界定，拉克劳早期与后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拉克劳的早期文本中，所谓意涵性接合的本质主义主要是针对意识形态中的阶级还原论来说的。如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0.

^② Ibid., p. 11.

果要论拉克劳思想发展的具体轨迹，要论他思入此一问题的特殊理路，我们必须作更加缜密细致的微观说明。

我们知道，拉克劳与莫菲早期都曾受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很深的影响，但这两人在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莫菲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主要受阿尔都塞的影响，而拉克劳则对普兰查斯更着迷，《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四篇论文除第一篇《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外，其他三篇均涉及普兰查斯，其中两篇——《政治的特性》、《法西斯主义和意识形态》专门讨论普兰查斯的思想。普兰查斯所以对拉克劳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普兰查斯不是像阿尔都塞那样着重在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上下功夫，而是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问题，诸如政治权力、国家机器、阶级结构、专政与独裁、意识形态危机是普兰查斯常思虑的重要主题，正如艾伦·伍德所说：“普兰查斯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不仅是因为他或许是后阿尔都塞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他做了许多工作，将这一传统运用于关于当代社会主义政治问题的基础的哲学分析当中，而且是因为他在指导马克思主义者去关注长期被忽视的理论问题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的影响的程度将足以使得他可作为一个范例而被挑选出来。”^① 通过拉克劳对普兰查斯作品的分析，我们知道，普兰查斯对拉克劳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比如普兰查斯对人民同盟策略的赞同，对阶级性质的新阐发，对国家机器的非工具主义的理解以及他著名的新小资产阶级理论，等等。但是，拉克劳对普兰查斯思想的接受有一个关键区域、核心部位，这就是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拉克劳为何对普兰查斯分析法西斯主义的作品《法西斯主义与专政》特别青睐呢？原因就在于，普兰查斯在对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中突破了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惯常的单一矛盾决定模式，而将意识形态危机视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在普兰查斯看来，法西斯主义的浮出既是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25.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的产物，在意识形态霸权出现空场的情景下，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将种种意识形态碎片“缩合”在一起，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它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收编并“熔合”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正如拉克劳所正确指出的，普兰查斯这一分析的有效性依赖于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小资产阶级概念。但由于普兰查斯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而不是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同一地位，所以，意识形态概念就成为这一分析中最为基础性的理论支撑因素。

普兰查斯对意识形态的阐发就如同他对阶级的新定义一样，竭力把结构主义的范畴和解释框架投射进来。他将意识形态描述为包括多方面表达向度的、与信仰相对协调的结构性总体，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并不是处于由经济单一决定的像“水泥”一般地封闭而固定的状态。拉克劳认为，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三个特征：其一是普兰查斯对意识形态的要素分析，比如，他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分解为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等要素构成因素，他说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共谋关系，因为它们共享一些要素：诸如，中央集权主义，民族主义，排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反教权主义，等等；其二是，普兰查斯坚持，具体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是由异质因素构成的复合体，他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其三，普兰查斯认为意识形态有一个改变过程，譬如，他反复提及“变形的”封建意识形态，他也谈到在意大利，自由的民族主义如何向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持续地变形”。尽管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三方面特征仍旧包含许多问题没有阐释清楚，他的意识形态概念有很大的歧义性和模糊性，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结构化阐述给拉克劳带来重大的启迪和激发，从这一分析势必会诱导出这样的洞识：意识形态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脱出了经济决定论的建构过程。而实际上，拉克劳在这一识见的基础上将普兰查斯的理论逻辑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要进一步给意识形态“松绑”，他要把意识形态领域变成一个自治程度更大的区间，就如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拉克劳批判普兰查斯关于法西斯主义

的作品，是其意识形态独立化的首要一步。”^①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拉克劳在这首要的一步中，有一个附带的收获：从普兰查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特性时所不时地使用的“缩合”、“收编”、“复合”、“整合”等折射出流动性、构成性和联结性意味的语词中，拉克劳捕捉到“接合”所可能具有的理论解释潜势。

在对拉克劳的《法西斯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的仔细解读中，我们发现，拉克劳引入“接合”概念是作了扎实的铺垫和稳妥的准备的，具体语境的设置是：先枚举了普兰查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的七方面基本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就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三个特征进行评论，最后，拉克劳小心翼翼地、几乎是试用性地引出了“接合”这一语词：“意识形态因素的阶级决定，具体的意识形态作为诸因素的复合，通过意识形态的阶级因素的收编（incorporation）或接合（articulation）而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变形——这一探讨方法有哪些值得批判之处呢？”^② 在这里，“接合”与“收编”并置出现，而在这个并列链中，“接合”又尾随“收编”之后，这是无比珍贵的意义闪现的一瞬，这是一个书写的症候结点，这是延异的绝好例证，拉克劳在捕捉漂浮不定的能指，从“收编”滑向“接合”，也许有霎时的迟疑，但最终拉克劳停住了！于是，在这以后的下文，接合开始独立出现。所以，从拉克劳的叙述过程来看，“接合”源于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分析所涌现的理论激发力，“接合”诞生于拉克劳对普兰查斯意识形态概念所包含的困难的揭示与批判。应该说，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不太惹人眼目，雅索普（Bob Jessop）甚至将之喻为普兰查斯整体理论构架中的“阿基里斯之踵”。^③ 然而，拉克劳却出人意料地在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发现了引人入胜之处。普兰查斯运用结构总体的观念重新思考意识形态，认为同一意识形态不仅在不同的社会构形层面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而且它本身也是由不同的结构性原素（ele-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p. 47-48.

②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97.

③ Bob Jessop: *Nicos Poulantzas: 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 St. Martin Press, 1985, p. 191.

ments) 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一种历史性意识形态可以由不同的结构性原素构成, 而同一意识形态原素也可能被相同的意识形态总体所吸纳。这种结构主义的阐释打开了意识形态在构成上的纯粹的单一性、在活动上的严格的封闭性,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意识形态在政治斗争中的自主地位。

三、接合与非阶级意识形态

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抓住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在消除意识形态分析的经济基础决定方面无疑迈出了一大步, 在探究意识形态形成与变化的机制上也作出了极富启发性的尝试与努力, 这些积极成果都被拉克劳充分肯定并吸纳过来。但是, 拉克劳敏锐地洞察到, 在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结构总体中, 虽然突显了意识形态组成因素的个别性、差异性, 但在意识形态统一性何以生成这一问题上, 普兰查斯的理论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根本问题是, 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虽极力脱出经济决定论, 但仍然固守着阶级还原论, 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描述性层面上。三个基本断定构成了普兰查斯无法超出的还原论局限: 其一是, 所有的主体都是阶级主体; 其二是, 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 其三是, 所有的阶级都有必然性的、纯粹的、范型性的阶级意识形态。普兰查斯虽然将意识形态分解成结构性构件, 但每一构件本身却又被牢牢焊接在其阶级属性上, 即便某一具体意识形态有所谓的改变或变形, 也只是总体结构上成分的增减或组合方式的调整, 而每一构件本身的阶级归属保持恒定不变。用拉克劳的表述方式说, 普兰查斯是在意识形态因素与它的阶级规定之间建立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接合。

实际上, 在拉克劳的眼光中, 普兰查斯在意识形态因素与它的阶级归属间所建立的固定对应关系使意识形态本身的能动性和建构力量大大地受到削弱和限制, 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作用陷入瘫痪, 所以他不仅要指出普兰查斯理论的不足, 更重要的在于, 他要在批判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入创造性的新阐释。他的这一抱负在《法西斯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的结尾中以庄严的言辞作了肃穆的承诺: “如今, 适逢欧洲工人阶级之影响日增, 并且在他们注定要将其斗争越来越

越构想为对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及政治霸权的争夺之际，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发展出一种消除了阶级还原论的最后残迹的意识形态实践的严格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性了。”^① 着眼于打破意识形态与其阶级归属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着眼于为意识形态的“转换生成”提供有力的观念支援，拉克劳开始淡化普兰查斯的经常用语（诸如缩合、收编、复合等），有意地铸就自己的表述方式、打造具有一定理论容量的诠释性概念，所以，拉克劳对“接合”的启用从症候阅读的视角，既表征着对普兰查斯还原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道别或断裂，同时又展示出推陈出新的强劲建构意向。

拉克劳迈出的关键一步是将意识形态要素中性化，即是说将附着于其上的魔符摘除，从而增加其亲和性。他的论证一点也不复杂，因为在他看来，普兰查斯的分析根本就是建立在武断的教条之上，所以只需简单的归谬法就足以戳穿它的虚假性。比如，普兰查斯将自由主义视为处于资本主义竞争阶段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拉克劳说，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却是封建地主的特色性意识形态；至于军国主义就更复杂了，“它并不必然是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19世纪的西班牙，黩武精神的宣告是早期资产者阶层典型的表达，而在二战后，遍及第三世界的军国主义通常是反帝和反封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② 再如，反犹太主义，它在19世纪的东欧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在中世纪却间或是大众层面的意识形态要素。由此，拉克劳得出如下颠覆性的结论：“意识形态要素独立地看并没有必然的阶级内涵，这一内涵仅仅是这些要素在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接合的结果。”^③ 请注意，这是拉克劳在该文中第二次使用“接合”，这一次是闪亮登场！既大胆又果敢，没有流露出丝毫推敲与斟酌的痕迹来。接合在这里开始被郑重地赋予了一种理论担负：不是先验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特定意识形态诸要素的统一性，而是接合活动本身构造了它。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42.

② Ibid., p. 98.

③ Ibid., p. 97.

拉克劳对意识形态先验阶级性进行了爆破，阶级归属的一统天下和绝对宰制崩塌了，意识形态的碎片由于脱出了阶级关系的缚系，从而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层游移穿梭。当然，拉克劳此时并没有告别阶级，也没有彻底摒弃阶级意识形态，他还在阶级霸权的框架内思量意识形态要素。正是在阶级意识形态对非阶级意识形态的争夺上，接合实践才显得异常重要，一如艾伦·伍德所描绘的：“这种非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与阶级意识形态一同出现；但是由于它们在原则上是独立的、中性的、没有阶级特性的，它们能够从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中分化出去并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同化。比如，统治阶级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通过把人民—民主意识形态适用于其自身，从而调和对立的能力。”^① 既然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涵义并无必然的阶级归属，因此我们才迫切需要思考在特定意识形态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以及构成社会运动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接合”的建构意义，意识形态固定阶级纽带的断裂把接合实践推向了前台，推向了政治话语的中心场。

截止到目前，我一直在“接合”的发生学意义上力图展示出接合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通过这样的透视，我们能清楚地领悟到接合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上所可能含纳的解构与建构的双重理论担负，从消极的意义上，它排斥了洞穴式的意涵规定的专制，从积极的意义上，它把自决定机制引入了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从认识论的视角看，拉克劳真正废弃了作为静态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学说，因为，如果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接合实践，那么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过程，就是政治话语的结构运作，这一运作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性的、流动的和部分性的，因而，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在“物质性”中存在的观点才能在新的意义上得以阐发，也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拉克劳接合概念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带来的重大改造。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1.

第三节 接合与阶级霸权

意识形态现在被拉克劳支解成了一个一个碎片，这些碎片又被割断了阶级支配的牵线，于是我们便可能产生这样的想象：意识形态的这些碎片像断线的风筝在空中飘曳，或者像凌乱的花絮四处飞舞，但这绝不是拉克劳希望达到的状态，在后来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也一直在竭力抵御这一倾向，因为在政治实践中，具体的意识形态总是以整体的姿态产生效力。拉克劳并不像欧克肖特那样对政治意识形态持有深深的偏见，他基本上还是把政治理解为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这样一来，拉克劳就面临一个难题：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要素在脱离了阶级性的完全决定之后是如何达到统一的？更进一步，意识形态是如何变化（变形）的？

一、召询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拉克劳借助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询（interpellation）学说。对于在意识形态上尽力摆脱经济主义影响并且基本上在其师阿尔都塞的问题框架内运思的普兰查斯，竟然不启用他老师关于意识形态中最为重要的召询理论，拉克劳感到十分惊异，在拉克劳看来，普兰查斯之所以在意识形态何以变化这一问题上一筹莫展、裹足不前，原因就在于普氏没有运用这一独特的理论资源。我们姑且先看看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召询理论的主要内容。概要地说，阿尔都塞认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将个人召唤为主体。“主体范畴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但同时我立即要补充的是，只是在一切意识形态具有把具体个人构成为主体的这一功能的限度内，主体范畴才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一切意识形态的作用都存在于这种双重构成的相互作用中，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物质的

形式存在着它的功能而已。”^① 人天生就是意识形态动物，就像黑格尔说人不能脱出自己的皮肤一样，阿尔都塞说人无法走出意识形态。人总是生活在对他真实生存状态的想象关系中，正是这种想象关系将个人塑造为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主体，阿尔都塞将这种塑造机制称作召询。为了使召询更容易理解，阿尔都塞解释道：“意识形态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或产生功能：它在个人中征召主体（它征召所有的主体），或者说，它把个人改造为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人），我恰恰是把这种征召的方式称之为召询或招呼（hailing），这种情形就好像在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警察（或其他人）在打招呼：‘喂！喂！叫你呢！’”^②

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询理论，我们在这里姑且不作深入考察，我们关注的是，拉克劳从阿尔都塞的召询理论中到底借鉴了什么东西呢？其实，拉克劳自己说得相当明白：“意识形态体系不同方面的统一被特定的召询所赋予，这一特定的召询形成了所有意识形态的轴心和组织原则。”^③ 很明显，拉克劳侧重的既不是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也不是意识形态对单个主体的作用，而是意识形态的召询功能对意识形态本身的作用，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与主体之间的双重构成作用被拉克劳集中到、投射到意识形态本身之上了。可以说，拉克劳是在类比的意义上使用阿尔都塞的召询理论。尽管拉克劳煞有介事地说，谁是被召询的主体乃是意识形态分析的关键问题，但我们要搞清楚，他所说的这个“主体”已不是阿尔都塞所意谓的具体的个人，他把作为主体的具体的人悄悄置换成了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既然每一个意识形态要素都表示召询，那么意识形态也就是由不同的召询构成，意识形态不同要素的统一于是转化成不同召询的统一，换言之，也就是不同召询之间的召询问题。实际上，拉克劳仍然在普兰查斯的问题框架之内运思，他只不过把意识形态要素作了动态化的处理，他使这些一度沉滞、呆板、僵死的因子化作活动性的“单子”。

赋予意识形态以统一性的究竟是什么？在引入阿尔都塞的召询学说并

①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NLB, 1971, p. 160.

② Ibid., p. 163.

③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01.

对之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后，拉克劳顺理成章地得出了结论：“构成意识形态话语之一致性原则的是通过话语被召询因而被构成的‘主体（subject）’。”^① 一个带引号的 Subject，我们不要以为这是阿尔都塞双重构成说的无聊重复——意识形态构成主体，主体又构成意识形态，我们也不要以欧克肖特的意识形态观念来理解这句话，认为意识形态总是跟在政治活动的后面。话语的统一性通过话语的活动而实现，这是要害所在！主体被召喚，被质询，被构成，但同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达成了！意识形态既不是政治活动之前的预先策划，即欧克肖特所说的“半神圣的父亲”，也不是尾随而至的活动效果，即欧克肖特所说的“尘世的继生子”。^② 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存在于构建主体的活动中，离开了活动本身而在它之外寻求意识形态的组织原则，如果只限于对意识形态进行抽象的理论反思，尚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其确立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则，则无异于扭曲了、扼杀了意识形态的活动机制。

无论如何，拉克劳重构了召询结构，就如米歇尔·巴丽特所说：“拉克劳拉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完全独创的方法。”^③ 何种意识形态主题在某一具体历史情境下能获得暂时的优先地位，即确立自己的霸权，这是意识形态斗争至关重要的问题。按拉克劳的观点，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召询，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美学的，性征的，生态的，等等。各种不同的召询何以趋于统一？此时，接合概念再度出现——不是要素的接合，而是召询的接合。这种“接合”的转换，表明拉克劳把普兰查斯的要素分析与阿尔都塞的召询融会在了一起了。召询的接合构成了具体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但接合何以能完成如此严峻的任务？也许是拉克劳感受到了这个沉重的压力，抑或是他自己也觉得这个统一性还不甚明了，所以他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一定不要必然地将此种统一性理解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相反，话语的意识形态统一性完全相容于大幅度的逻辑非贯通性——而是理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01.

② 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③ Slavoj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 p. 241.

解为每一召询要素实施缩合（这一缩合考虑了其他要素）作用的能力。”^①首先，意识形态要素的接合是非内聚性的、松散的、激起性的，它无需严格的逻辑关联性，更没有先验性的内在决定；其次，一种召询引发了其他召询，它们好像串联在一起，每一个都成为其余的象征，这个激发性的召询构成了支配性话语，在它取得这样的效果后，相对的统一性常常以显明的方式被理性化，但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相对统一性的基础总是后天的尝试和发动。这种统一性的维系、保持取决于这一支配性话语吸收其他矛盾及要素的能力，在社会形态比较稳定的时期，这种统一性甚至可以表现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但是，在社会形态面临支离的关头，统一性的外在性突显出来，它的理性伪装会暴露，它的合法性受到挑战。

二、意识形态的变化机制

意识形态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统一性既然是通过召询的接合而达成，那么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就取决于召询的接合能力与效果。召询接合的成败受什么影响？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当然，拉克劳提到了具体历史条件会对特定的召询产生作用，但只是为了说明某一召询的随机可变性，由于他对基础决定有一种敏感的警惕和防范，所以他尽量规避从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来解释意识形态变化的根据。在一定程度上，拉克劳一直在为意识形态的自决定、独立化而努力，按照他对意识形态要素阶级归属的尖锐批判以及对意识形态非阶级召询的积极认定，他给我们造成的印象似乎是他正渐渐远离阶级的概念，他的接合概念的酸性腐蚀力也越来越强。拉克劳对接合的非逻辑性的强调也暗示接合的理论化可以有更大的期望值。但是，我们不要产生这样的错觉：在我们跟着拉克劳走了一段解构阶级还原论的路程之后，拉克劳终于就要抛出最后解决方案了，我们大可长长出一口气，轻松自如地等待着拉克劳与阶级概念彻底决裂，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话题毫不留情地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其实这正是米歇尔·巴丽特的想法，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02.

她曾不无讽刺地说：“拉克劳用另一只手拿走了他刚刚给我们的东西。”^①

拉克劳刚刚给了我们什么？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阶级全无瓜葛的接合概念了吗？巴丽特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她把此时的接合概念放在了80年代它所能达至的位置上去了。拉克劳确实解构了阶级还原论上跨出了关键的一步，而且在增大意识形态活动的建构性方面富有新创意，但是要看到，欧洲共产主义正处于方兴未艾的上升阶段，拉克劳基本承认它的斗争策略，他此时根本没有离开阶级立场，也没有告别阶级政治，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构形的动力，工人阶级在拉克劳对社会主义战略的构思中依然保持着显要的地位。只有在这个基本判定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接合概念的恰当性质和地位——此时的接合是在阶级霸权的框架内产生效力，而不像后来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那样，接合完全在非阶级的霸权层面上运作。

当然，从后往前看，我们也可以说拉克劳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努力不在根本上背离被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智慧”^②，从而影响了他的接合概念解构维度的激进化，也可以说，拉克劳的接合概念的话语化程度受了他阶级立场的阻滞。这种带有事后判断性质的描述不应过分遮蔽拉克劳接合概念已达至的成效，虽然拉克劳没有以召询接合的非逻辑性关联吞没掉阶级，但阶级概念在接合的理论威势的涤荡之下毕竟有所“收敛”，因为拉克劳有一个基本看法：并不是所有对抗都是阶级对抗，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阶级矛盾，并不是所有意识形态都是阶级意识形态。拉克劳甚至说，在一些对抗中，阶级性并非总是内在于冲突本身，他只将基于生产方式层面的冲突看成是内在于其阶级性的对抗。一如艾伦伍德指出的：“在他的分析中，阶级保留了其理论的纯洁性，但却失去了其历史性意义。”^③

正是基于对阶级概念的限制，拉克劳提出有两种召询：阶级召询与人

① Slavoj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 p. 242.

② Ibid.

③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0.

民—民主召询。这两种召询具有何种关系呢？“人民—民主召询没有明确的阶级内容，但它是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绝好场所。每一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同时作为阶级与人民而进行斗争，更确切地说，每一阶级通过把它的阶级目标描述为民众的目标而试图赋予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一致性”。^①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克劳与普兰查斯有何不同，普兰查斯用双重标准划出一个庞大的新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争夺新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拉克劳在意识形态层面划出一个“人民—民主召询”的宽阔地域，留出一个非阶级的、中立的空间，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就是在这个区域进行意识形态召询的激烈竞赛，就像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人民中为拉选票而进行的你争我夺一样。普兰查斯断言，阶级存在于阶级斗争之中，而拉克劳则宣称，在非阶级的人民身份的栖居地，阶级之战正紧张地展开。回到意识形态何以变化或改造这一问题上，拉克劳十二分肯定地断言，意识形态的变化是“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斗争通过主体的生产以及话语的接合或拆解而实现”。^② 所谓主体的生产，也就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将“人民”召询为其阶级队伍中的一个分子，所谓阶级斗争也就是意识形态的殖民与征服，意识形态变化的动力是斗争，但这一斗争的格局与意义已不是一方消灭一方的暴力取代和政权摧毁，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熏染与陶铸，是阶级霸权的营造与建构。

在漫长的非阶级意识形态的战线上，在广阔的人民—民主召询的竞技场上，阶级召询为了扩大自己的魅力与亲和性，不得不运用种种策略和手段，不得不采取更加灵活的姿态。这使我们真切地领悟到，拉克劳如何秉承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高度重视的传统，又在何种意义上将这一宝贵的遗产以富有独创性的阐发推向新的境界。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第一次获得了清晰的本体论维度，人无可逃避地生活在意识形态中，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双向建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状态，阿尔都塞描绘了一张疏而不漏的意识形态之网，他的侧重点是凸显人存在的意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09.

② Ibid., p. 108.

意识形态性。而拉克劳则把一张大网改造成许多结实而精致的小网，它们在一个共同的浩淼的水面上纷纷然各自张开网眼，各自在水下悄悄搜索、捕捉、挟裹、潜行。我的意思是说，拉克劳将意识形态的召询活动进一步特殊化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顿时变得既紧张又充满高度的伸缩性，意识形态召询的内在张力被拉克劳通过一种竞争性氛围戏剧性地展现出来。相对于普兰查斯而言，拉克劳更注重的不是分解而是综合，不是意识形态在阶级划分中作为一个因素的作用，而意识形态冲突在阶级斗争中的枢纽地位。

我们再一次看到接合概念理论承载的增加，最初，它是在消解意识形态要素的必然的阶级归属的消极意义上被提出，继而在意识形态要素何以成就其一致性的层面上，它成为一种积极性的整合手段。现在，它达到了这样的理论化程度：在政治话语层面上，它内在于阶级霸权斗争的实践操作之中。虽然拉克劳把所有意识形态要素都动态化了，每一意识形态要素都履行召询的功能，但是，拉克劳此时还很少论及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对阶级意识形态的召询作用，也没有提到边缘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渗透，他着重分析的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获取霸权、维持霸权的过程。在拉克劳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方式层面上形成的两极对抗仍然是言说霸权的基本预设，因此消解阶级还原主义的本质性接合，并不意味着全部废黜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正如他自己表白的：“我们希望表明的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不仅仅是支配性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也是它的条件的再生产，而意识形态是其条件之一；那些并不直接参与支配性生产关系的部分在社会构形中的作用越重要，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再生产而言，意识形态过程的相对自治与价值便越大。”^① 这就是说，拉克劳努力的还不是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而只是相对独立，在这个限度内，他还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底线，这也是米歇尔·巴丽特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论点远远要比后来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35.

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更能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接受”的原因之所在。^①

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让我们更详细地探讨拉克劳对阶级霸权接合的阐述。我们已指出过，拉克劳并不否认作为生产方式结构关系承担者的阶级的存在，但是，它仅仅作为固定的背景放在那里，拉克劳从未质疑这一阶级的“阶级本性”；对于非阶级的意识形态部分，他也没有细问深究，只是断言它确实存在。这两个“存在”像两个 X 构成了拉克劳论述的两个终极端子，但问题并不在每一端子本身，而是集中于这两个端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两个 X 间的区域构成了拉克劳的理论地平线。这两个 X 间的区域就是拉克劳所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层面上的阶级”。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意识形态与政治层面上的阶级？

拉克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所以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上陷入误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意识形态的阶级决定与这一层面上的阶级存在形式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断定上层建筑的阶级决定并不意味着确立这一决定在其中运作的形式。如果每一意识形态要素都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阶级也就必然通过如此的要素而获得表达，阶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存在形式作为必然的环节被还原为阶级本质的展开，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的阶级决定与意识形态层面上阶级的存在形式就完全重叠了，也就谈不上阶级“决定”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了，因为意识形态已成为阶级的本质环节，和阶级本身浑然一体了。在拉克劳看来，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当作生产关系的反映以及卢卡奇和柯尔施的上层建筑主义将阶级意识当作阶级本身的构成性环节，都是这种还原主义的表现形态。

如果我们不再以还原论的方式思考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存在，那么意识形态的内容与该层面上阶级存在的形式区分就不会混淆。拉克劳区分了

^① Slavoj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 p. 241.

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认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是由意识形态的形式所赋予的，而意识形态的形式取决于它的召询接合的原则。所以结论是：“意识形态话语的阶级性在我们称之为具体的接合原则中被揭示并展现出来。”^① 拉克劳拿出一个他经常使用的例子——民族主义，他说，如果孤立地看，民族主义的话语具有何种阶级性？它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抑或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取决于它的具体接合原则：它可以与一种旨在维护传统的极权主义等级秩序的封建主义纲领相连接，或者与为发展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向封建的特权主义宣战并将缓和阶级冲突作为呼吁民族统一的方式的资产阶级纲领相连接，它也可以与谴责资本家背叛了民族主义事业的共产主义话语相连接。这三种具体的民族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的意义内核，但不同的接合使它们表现出存在形式上的差异。就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来说，这一具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阶级就是这种具体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阶级，这一层面的阶级和生产方式层面的阶级是不同的，后者是阶级“本身”，而前者是这一阶级本身的“现象”。

十分明显，拉克劳在这里玩弄起康德哲学来了，在康德那里，物自身与现象有严格的区分，物自身与现象不是一回事；而在拉克劳这里，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阶级是纯粹阶级本身，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阶级则是阶级本身之“现象”。既然现象不是由物自身决定，那么阶级本身也就决定不了阶级的“现象”，现象是通过直观和范畴进行建构的产物，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阶级也是召询接合的结果。拉克劳对康德哲学的这种挪用，手法一点也不高超，客观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拉克劳的主观意愿何在？我认为，拉克劳将阶级本身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存在区分开来，核心意向是为了突出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可以说，这是拉克劳在不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决定的前提下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最大程度的提升所作出的最大努力，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他所达到的最远点。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60.

不可否认，通过这一区分，拉克劳多多少少达到了这样的效果：阶级与阶级存在形式不完全重叠，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其形式不完全重叠。就像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改革在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间所作的重大区分给我们现实的体制结构的调整带来策略上的灵活性一样，拉克劳这一区分为无产阶级霸权的有效运作、为左派的政治规划提供了一个策略转换的理论辩护。这一理论图景清楚地昭显了拉克劳的政治立场：一边要在理论上维护阶级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一边要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实践上尽可能将阶级目标隐蔽起来，以便使阶级意识“润物细无声”似地悄悄潜入民众之中。正像拉克劳自己宣称的，他的这一论证以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召询为前提，“接合要求非阶级内容的存在，因为它构成了阶级意识形态实践赖以操作的原材料”。^① 在拉克劳看来，意识形态实践不仅由内在于既定阶级的生产过程的世界观所决定，也被这一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实际水平所决定。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② 拉克劳并不怀疑这一判断，他只是补充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所以占统治地位，不仅在于它能够召询本阶级的成员，而且也能召询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长治久安的关键就在于统治阶级能够部分地吸收或中立化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内容。由此，拉克劳在接合概念与阶级霸权之间引进了新阐述：“一个阶级行使霸权，与其说在于它能够将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念强加于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不如说它能够将各种不同的世界展望如此地接合起来，以至于它们之间潜在的对抗被中立化。”^③

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学说对拉克劳的影响。在阿尔都塞看来，ISAs 的本质就在于将控制与支配不着痕迹地掩饰起来，使正遭受统治的被统治者感到他根本没有受到外在强加的宰制，ISAs 是抚慰的灵剂，是自愿臣服的良好诱导。阿尔都塞不仅揭示出意识形态作用的隐密机制和“乔装”手法，而且已经把 ISAs 的功能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联系起来，他断言：“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同时在意识形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6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3页。

③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61.

态国家机器中并对之行使其霸权，它就不能长时期地掌握国家权力。”^① 这些思想均被拉克劳摄取过来蕴积在自己的接合概念中。其唯一的改动在于，ISAs 始终在阶级层面运作，而拉克劳的接合可以在非阶级层面上—展雄风，正缘乎此，拉克劳说，统治阶级行使霸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加以吸收或同化，一种是将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接合进来。相比之下，接合远远比 ISAs 更平易、更灵活，也更淡出阶级意味。也就是说，在拉克劳那里，霸权接合并不表现在阶级决定论的扩张或潜妄上，而是取决于它对本身游离于阶级之外的中立性的意识形态的争夺和同化，在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的意识形态一同出现的历史际遇之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关键点乃在于将非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资产阶级的霸权整合中剥离出来并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这些因素以适合于自身的特定要求。阶级霸权的建构不可或缺的统一的外在表征不可能由阶级决定的意识形态单独完成和取得，在此处，霸权性的效应归属于阶级，但霸权的建构过程似乎越发淡出阶级意味，霸权的悖论状态反映了拉克劳与莫菲理论的困难，也折射出了他们当时社会主义战略的摇摆不定。

拉克劳论断的最核心之处是确立了非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并将其设定为阶级意识形态处心积虑要蚕食的目标。像拉克劳自己总结的那样，在这一视域之下，“尽管阶级决定的范围缩小了，但阶级斗争的场域却大大地被拓宽了，因为它开辟了把多种多样的要素与召询（它直到现在还显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成分）整合成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可能性”。^② 尽管在拉克劳的论述中，他一点也不否认生产方式层面的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之存在，他也申言他丝毫不去怀疑生产关系在历史过程中最终决定的优先地位，然而，他所谈到的阶级斗争已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称的阶级斗争意味殊然。艾伦·伍德在评论这种多少有点走味的阶级斗争时说过很精彩的话：“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担负置于自主的意识形态‘召询’的‘接合’和‘拆解’之上，他使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像

①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NLB, 1971, p. 139.

②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10.

一种‘自主的’智识训练，在这种训练中，每一阶级‘自主的’学术精英为争夺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最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这些意识形态要素，使之适合于自身的特定利益，那么这一阶级就会赢得胜利。”^①

这是霸权的游戏，其中确定的阶级身份与可变性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人好像是坚定的老牌阶级分子，他们在行使召询的职责，一些人在倾听，在等待召唤，在选择哪些召询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哪些召询他们乐于接受。拉克劳没有解释清楚，老牌阶级分子与新召募来的分子在阶级身份的生成机制上有何不同，更深一层的考虑是，阶级中立性的“人民”在接受某一召询的斟酌与选择过程中，主观的因素、随机的成分会有多大？拉克劳同样没有说明的还有，一种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召询在何种程度上对阶级召询产生反冲效应，一种中性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取得霸权地位？如果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了霸权地位，它是否在霸权接合取得成功的同时会朝着阶级意识形态的方向演化？这些都是拉克劳关于阶级霸权接合理论的内在困难所必然衍生出来的问题，拉克劳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霸权接合在阶级与非阶级之间无止境地纠缠；要么干脆抛开阶级性的幽灵，让偶然性逻辑完全成为接合的原则，使阶级霸权接合变形为非阶级霸权的接合。而后一条道路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轨迹。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1.

第三章 霸权的磁性

拉克劳从普兰查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中得到重要启发，继而在对普兰查斯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中引入了接合的观念。接合以意识形态的复合性为前提，因为如果具体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德谟克利特式的绝对不可分的封闭原子，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意识形态的接合。接合在意识形态的不同要素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展开，它涉及部分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所以对接合的深入阐述必然要导向霸权的概念，霸权既是意识形态生命力的征兆，又是意识形态建构自己统一性的机制。雅可布·托费因曾将拉克劳与莫菲的思想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受葛兰西思想的激发而导致的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二阶段为新葛兰西主义的话语理论，第三阶段为新型的后现代的理论探索，前两个阶段都涉及拉克劳与莫菲和葛兰西，可见葛兰西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确实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并没有进入对霸权概念的深入考察，这主要是由于受他的论证线路的限制，另外一个原因是，关于霸权概念，莫菲已在一篇当时尚未发表的文章中作了初步探讨，而莫菲的观点不仅基本上为拉克劳所接受，而且对拉克劳关于意识形态接合的论述产生了很大影响。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的解读主要集中于他的霸权理论，实际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也就在于他们在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基础上阐发了一种完全基于话语接合的

祛除了阶级痕迹的新霸权观念。为了清晰地展现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生成过程及其确切的含义，我们必须深入到莫菲早期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解读中，看看她在何种意义上重述葛兰西，而为了完成这一步骤，我们又得先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作一粗略的勾勒。

第一节 “egemonia” 的起源及其基本意义

说“egemonia”是葛兰西思想的核心概念，这恐怕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是，这个术语的汉译却会有不尽相同的处理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分歧。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陆学者所译的葛兰西文本中，不论是俄文的 гегемония (gegemoniya) 还是英文的 hegemony，均被译为“领导权”。2000年《狱中札记》又出了一个汉译本，该译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将 hegemony 译成“霸权”（这个本子对该词的译名并不完全统一，有时还是被译成了“领导权”），而中国台湾学者则一般将 hegemony 译作“文化霸权”。如果单从语义学的角度，这三种译法都有词义根据，因而都是允许的。不论是意大利文的 egemonia，还是俄文的 гегемония，抑或是英文的 hegemony，均来源于古希腊文 ΗΓΕΜΟΝΙΑ (hēgemonia)，牛津大学所出的著名的《古希腊语英语词典》(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对 ΗΓΕΜΟΝΙΑ (hēgemonia) 的释义为：(1) a leading the way, going first; (2) chief command, sovereignty: the supremacy of one state over a number of subordinates; (3) the supremacy of Greece;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4) 在对该词的形态词形式 ΗΓΕΜΟΝΙΟΣ (hēgemonios) 的解释是：of or belonging to a guide，而这种形容词形式的名词化运用 (“the hēgemonios”) 指的是：“name of Hermes, as the guide of departed souls”。我们知道，Hermes (赫耳墨斯) 在古希腊神话中是掌管辩论和阐释的信使，所谓的诠释学 (Hermeneutik) 即由其名衍化而来；美国学者丰塔纳 (Benedetto Fontana) 新近的研究也表明这一义项存在是无可辩驳的。据丰塔纳考证，古希腊早期智者派的著名人物高尔吉亚 (Gorgias) 的弟子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曾有这

样的论断：*logos hēgemōn pantōn*，将其译成英文就是：“Speech and language are the leader and guide of all things”。这种论调与智者派重视言语和修辞的作用显然是十分吻合的。丰塔纳据此作出的结论是：“the relation between *logos* and *hēgemonia* describes a power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sent”（即：话语与言说者的关系描述了以同意的产生与传播为基础的权力关系）。^①

显然，第（1）义项支持“领导权”这一译名，毕竟古希腊语的 *ΗΓΕΜΩΝ* (*hēgemōn*) 即是 *leader*（引导，领导）之意；第（2）、（3）义项支持“霸权”这一译名，并且这一涵义逐渐成为这个词的“专有”含义；第（4）义项支持“文化霸权”这一译名，这可以看作是对该词之古义的一种复归。同一个“*egemonia*”对应着三个汉语词，而这三个词明显存在着意义差别，单从外延而论，“霸权”是一种“领导权”，而“领导权”不一定都可以称为“霸权”，“文化霸权”是一种“霸权”，而“霸权”不一定是“文化霸权”。而从内涵上，尽管“领导权”和“霸权”这两种译法都包含了“主导权”这一基本内涵，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难以言喻的差别：譬如，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一位校长在实施他的“领导权”职能，却不能说他在实施“霸权”；我们可以说美国在搞“霸权主义”，而说其在推行“领导权主义”总不是那个“味道”。问题当然出在这个“霸”字上，“霸”比“领导”的意思要重得多，并且“霸”在汉语中多有贬义的色彩，比如，“称霸”、“霸道”、“恶霸”、“霸占”，而“领导”则似乎中性化一些。更为重要的是，“霸权”多少带有超出应有权力界线、向外部延展势力、扩展控制范围之意，并且它多用于指称“在一个联盟体系中的领导权”，而一般不用于指个人对组织或团体的“领导权”。“领导权”的意涵要宽泛得多，各种类型的领导关系，不管是民主型的、极权型的、专制型的或独裁式的，都可以用“领导权”来描述。

当然，语义学的描述仅仅划定了一个可能的界线，但问题不在于

^① Benedetto Fontana; *Logos and kratos: Gramsci and the Ancients on Hegemo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00, p. 308.

“egemonia”的语义学范围，而在于其语用学的定位，确切地说，在葛兰西对该词的具体运用中，它的主要意蕴与这个词的原初含义中的哪一项最为切近？或者说，葛兰西赋予这个词的独特内涵是什么？如果把历史性语境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势必就要掂量这些不同译法在同一语境下所可能显现的语义“误差”。其实，早在1993年，国内一位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两种译法的“问题性”，并颇有见地地指出，“《狱中札记》有中文译本，这个译本是从俄文版的《葛兰西选集》转译而来。该版本最大的缺点，是把‘霸权’一词都译成了‘领导权’”，这种译法“淹没了”葛兰西的“重要思想”，“在葛兰西的著作中，无论是意大利文的 egemonia，俄文的 гегемония，还是英文的 hegemony，都应译作‘霸权’，因为葛兰西确实赋予了该词独特的涵义。在西方学者中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一个得到公认的概念”。^① 颇为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egemonia”译名问题所可能造成的思想理解的偏差并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目前的状况是，用“领导权”者有之，用“霸权”者有之，用“文化霸权”者亦有之，也有学者两种译名兼而用之，有的还特意指明：“霸权也可译为领导权”。

那么葛兰西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 egemonia 这一术语的呢？尽管葛兰西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尽管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葛兰西本人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前后存在着某些矛盾，但是就总体而言，葛兰西用 egemonia 描述的主要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力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在葛兰西的这一用法中涉及三个要点：（1）葛兰西的“egemonia”描述的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组织或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一个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权力关系；（2）葛兰西的“egemonia”描述不是“向内的”权力关系，即个人对所属的组织或集团的权力关系，而是向外的、超越边界的权力扩展；（3）葛兰西的“egemonia”描述不是强制的屈从，而是使异己的力量产生“自发性”的同意，即用智识的、思想的、道德的、教育的方式来“说服”其归化，从而获得对本集团统治的赞同与支持。就第一

^① 李少军：《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载《兰州学刊》1993年第5期，第32—33页。

点和第二点而论，显然用“霸权”比用“领导权”更为适当、更为贴切，葛兰西正是借用“霸权”的这种“特有”的内涵来表达一个社会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控制。当然，就第三点而论，用“霸权”似乎有违其“文治”之意，而略带“武功”之嫌，因为，人们可能会把“霸权”与国际政治中所说的某一国家以实力操控其他国家的强权政治联系起来，这当然不是葛兰西的用意所在，葛兰西的“egemonia”的侧重点恰在于以非武力的方式达致对权力的服从。为什么台湾学者要把“egemonia”译成“文化霸权”呢？其用心即在于想以“文化”二字冲淡这个负面意义，所以要在“霸权”前加上“文化”二字以作限制，其意不是在文化上强制推行“霸权主义”，而是特指一个国家中的某一社会集团以文化的方式和手段来达致权力的维护、巩固与扩张。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葛兰西讨论的“egemonia”根本不涉及国际关系，它的理论主题域与所谓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也是不同的，不论是萨义德的“东方学”还是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都是在“挪用”葛兰西的概念。

在葛兰西使用“egemonia”的多数场合下，这个词都是被加了引号的。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凡是从别人那里借用过来的概念，一般都要加上引号（比如“卡塔尔希斯”）；凡是在比附或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葛兰西也加上引号（比如“运动战”、“阵地战”）；凡是被赋予了特别意义的词，葛兰西通常也加上引号（比如“市民社会”）。对于“egemonia”来说，这三种情况可谓兼而有之：首先，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最初是从列宁那里“移植”过来的，后来又受到克罗齐的“霸权”概念的影响。其次，葛兰西不是在这个词的实际意义上使用它，而是以隐喻的方式取其特有的某一“意义”加以发挥。最后，葛兰西使用“霸权”不是沿用其通常特有的含义“the supremacy of one state over a number of subordinates”，而是用其大体的“框架”——对异己力量的一种权威性的影响，即是说，它保存了“egemonia”两方的基本要素：一是存在着不同的成分，不论是何种联盟，何种团体的组合，它都是不同成分（特别是要有外部成分）的混合体，没有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egemonia”；二是要有一个统

领性的、主导性的力量存在，它成为各种力量汇聚的轴心、枢纽，或者说它是协商的场所、贯穿的线索、规范的引导，没有这一点，也谈不上“egemonia”。但是，葛兰西又着意“解除”它的“武装”，尽量不让它以“粗暴”的方式来行控制之实，而以文明教化的面目使“控制”隐于无形、寓于不觉，甚至内化为习俗与“常识”。似乎可以说，葛兰西是“阉割”了这个词，去其“势”而用之矣！

即便单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这三个方面也可以得到说明：葛兰西借用了HEGEMONIA的古义，即通过语言和话语、通过教育和引导来产生同意，从而使权威性影响得以产生与扩散；葛兰西以“一个国家在联盟体系中的霸主地位”隐喻一个社会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优势；葛兰西把具有一定紧张关系的两个方面“有机地”揉合在一起，赋予这个词以独特的政治内涵，一如巴丽特所说：“‘霸权’概念是葛兰西关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思想的有机焦点，而且他与众不同（distinct）的用法使之成了葛兰西式的一般方法的里程碑。霸权最好理解为组织赞同——各种形式的从属意识不求助于暴力或强制便得到构造的过程。”^①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葛兰西“与众不同的用法”：如果泛泛以“领导权”名之，实“混然众人矣”，又谈何“独特”？“egemonia”主要表示的不是对“自己人”的当然的“领导”，而是让“外人”自愿接受“领导”过程，正如拉克劳与莫菲所说，“霸权形态意味着边界现象”（the hegemonic formation implies a phenomenon of frontiers）^②，而“领导权”恰恰模糊了权力的界线。从表面上，用“领导权”这一译名似乎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但它却“遮蔽”了葛兰西赋予“egemonia”的特有内蕴。用“霸权”似有些不妥与别扭，然而深究起来，却有深厚的学理根据，就像我国一位学者所言：“对于受过儒家文化濡染，知道‘王’与‘霸’的区别的国人，似乎有点难于接受。然而，仔

① Michèle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Polity Press, 1991, p. 54.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6.

细想想，西方的理解自有其道理。”^①

第二节 霸权的葛兰西式阐释

“名不正言不顺”，在“正名”之后，我们将转入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具体分析。回应上文的论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从别人那里“借用”过来的；这一点对于把握葛兰西成熟时期的霸权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为理解此一概念预置了必要的学术源流背景，而且为展现葛氏的霸权概念的“生成”与“演变”轨迹提供了谱系学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它向一种比较学的意义探究敞开了可能的理论空间。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并不是葛兰西最早提出霸权概念。据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考证，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Plekhanov, 1856—1918）与阿克西尔罗德（Axelrod, 1868—1946）在1883至1884年的时候就提出了霸权这一概念。在普列汉诺夫与阿克西尔罗德的著作中，他们用霸权概念表达这样的意思：在沙皇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已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封建主义因素作为政治力量仍然盘踞着，由于封建贵族的强大，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单薄，资产阶级无法单独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时，新兴的无产阶级介入进来，参加到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中并起着主导作用。按拉克劳与莫菲的说法，在俄国社会民主党这里，霸权概念描述的是一种“错位”（dislocation）关系：资产阶级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使得无产阶级介入到本应由资产阶级履行的“职责”中，这项任务的阶级性质（资本主义民主）与执行这一任务的历史当事人（无产阶级）之间有一种分裂，“无产阶级与它必须在一定环节中承担的外在任务之间的新型关系”

^① 参见郭湛为孙晶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页）一书所写的序言。

就是“霸权”。^①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德使用的基础上，对霸权概念进行了一定的翻新与改造。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旨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阶级联盟，并在这一阶级联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霸权描述了一种错位关系，或者说是非规则关系——执行霸权的阶级同它正在履行的任务的性质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而在列宁这里，执行霸权的阶级与它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的性质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脱节。正如拉克劳与莫菲评价的那样：“对于列宁主义来说，霸权包括在阶级联盟内部的政治领导，霸权联系的政治性质是基本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把联系建立起来的那个领域不同于社会代理人被构成的领域。由于生产关系领域是阶级构成的特定场所，阶级在政治领域的存在仅仅被理解为利益的表现，通过代表这种利益的党，它们在一个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一个对抗共同敌人的联盟中统一起来。”^②

霸权概念在葛兰西那里首次出现于《南方问题笔记》（1926）中：“都灵的共产主义者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霸权’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在无产阶级能够成功地创造一个阶级联盟体系——这一联盟允许无产阶级动员劳工人口中的大多数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它能够成为领导的和统治的阶级。在意大利，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真正阶级关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成功地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赞同。”^③“意共”（PCI）只有成功地“创造一个联盟体系”，它才能成为“统治阶级”，但事实上，它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召询”与“收编”之下，意大利许多工人宁可相信法西斯也不信任共产党，而“意共”又不屑于与社会党合作，党的第一书记博尔迪加一直拒绝承认那些曾支持过旧的自由主义制度的政党与法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50.

^② Ibid., p. 55.

^③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 - 1926)*,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443.

西斯有什么区别，在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上，他反对党与工人打成一片，认为党只能是一个杰出人物构成的小集团，否则就不能保证它的纯洁性。在这种情形之下，本来就弱小的“意共”更加显得孤立无助。在党的斗争策略上，葛兰西与博尔迪加存在明显的分歧，葛兰西始终认为，一个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孤立的“先锋党”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约尔（James Joll）说：“1922年后，由于法西斯主义者巩固了他们的权力，而共产党却显然没有吸引群众的支持，因而他（指葛兰西）又回到了这一思想，即党应奠定更宽广的基础。有两种赢得群众支持的方法：第一种是争取仍然追随社会主义者的工人阶级成员；第二种方法，也是葛兰西有时认为更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争取农民，葛兰西自青年时期起在撒丁就特别注意这个阶级。”^① 作为一名革命家，葛兰西在1926年前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同盟的重要性，甚至在同一文本中他也提到了缔造这一同盟的政治、思想及道德条件，但是，此时他的霸权概念的意义颇为狭窄，在性质上仍处于列宁主义的霸权观的层面上——霸权被视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政治领导权构成了这种霸权的本质要素，霸权只在阶级联盟的意义上被构想。虽然从葛兰西关于“霸权”的最初表述中，我们看到这一概念的一些重要构件：“联盟体系”、“领导”、“赞同”。但是，以何种方式争取到农民的支持，以何种方式赢得他们的“赞同”并进而“领导”之，葛兰西并没有论述，所以此时的“霸权”概念还是一个不完备、不成熟的雏型。然而，即便从这一雏型中我们也能看出，“霸权”一开始就是危机的征兆，是“向外”寻求“力量”的企图，与其说是实施“领导权”，还不如说是寻求“结盟”。或许拉克劳与莫菲颇为经典的表述也适用于葛兰西最初的“霸权”概念：“‘霸权’会间接涉及一个不在场的总体，而且会间接涉及重新组合和重新接合的多种多样的打算……‘霸权’不会是对同一性的崇高揭示，而是一种危机的反应。”^②

把意大利南方的农民“拉”到革命的同盟中来，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

^① 詹姆斯·约尔：《葛兰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第62—63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7.

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南方的农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义并把罗马的天主教组织和传教士视为他们的“权威”或“领导”，“如果共产党企图成功地取代天主教运用其教义在农民中产生的影响，它就必须去竞争，不仅要创造具有同样历史重要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要使自己成为等同于教士阶层的知识分子阶级，以便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他们两者之间是紧密关联的，拥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愿望”。^① 争取南方农民的支持必然涉及知识分子的作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性和复杂性、在农民中确立威信并成为“领导”的方式，这些问题的实质也就是霸权问题。正当葛兰西趋向于瞄准这些问题的核心并展开理论探讨的时候，他被捕了。当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中遭受国家机器“强制”之苦的时候，他却顽强地、持续不断地思考着关于“非强制”的政治权力。也许这是他自己牢狱之苦的一种理论“反拨”和精神上的“缓冲”！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葛兰西对“霸权”进行了“间断”然而持久的、反复的探索与论述。可以十二分肯定地说，没有狱中的思考与写作，也就没有作为霸权理论之最卓越的阐述者的葛兰西，他在《南方问题笔记》中关于“霸权”所写下的话之所以没有被智识的历史所淹没，也是因为狱中作品所散发的奇异的思想光辉的强烈反照与投射。

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方问题笔记》与“狱中作品”这两个叙述体系存在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实践霸权的主体上，体现在霸权意义的维度上，也体现在霸权观的理论来源上。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葛兰西把他当初用来分析无产阶级霸权的概念延用到分析“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机制”上，用于分析“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上，“这是全新的、决定性的一步”。^② 这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到一般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逻辑的转变。葛兰西将霸权理解为一般性的政治过程。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不再从工人阶级与农民结盟的视角论及霸权，而是从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一般历史条件出发看待霸权实践。他分

^① 詹姆斯·约尔：《葛兰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71页。

^②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Antonio Gramsci: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edited by James Martin, Vol. 2, Routledge, 2002, p. 353.

析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在赢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对第三等级及一般大众的吸收与争取，“实际上他们不仅代表着构成法国资产阶级具体个人的直接需要和愿望，而且也代表着作为历史发展组成部分的整个革命运动。因为他们同时代表着未来的需求，不仅是那些特定个体的需求，而且还是所有要被吸纳入现存主要集团的民族集团的需求”。^① 雅各宾派所以能成为领导阶级，就在于它能超出狭窄的社团利益而把各种不同社会集团成功地接合在一起。同样，葛兰西还分析了英国旧土地阶级、德国容克贵族、意大利的温和派在维持各自霸权方面表现出的努力，他甚至将中世纪教会组织的活动也理解为文化霸权的操作。这一切都说明，葛兰西已将霸权当作一切历史时代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维持自己统治以及从属集团发展为统治阶级的有效手段。在这个意义上，霸权就是社会集团使自己的支配正当化、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政治活动。如此一来，霸权的适用范围在历时性上被高度地宽泛化了。

其次，从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演化上，表现出了从政治领导向智识与道德领导的转移。虽然葛兰西偶尔也在政治领导权、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的统一上指称霸权，但他重点强调的是后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下，葛兰西所使用的霸权就是文化霸权（即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诸如，某一社会集团“借助或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主导权”^②，“通过同意即凭借文化的引导而不是通过法律和警察而施加的武力、强制、国家干预”的控制^③，“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④，“‘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组织总和……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⑤ 在狱中作品里，葛兰西在绝大多数的场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 translat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78.

② Antonio Gramsci: *Gramsci's Prison Letters*, tran. by Hamish Henderson, Zwan Publications, 1988, p. 161.

③ Ibid., pp. 213 - 214.

④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 translat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57.

⑤ Ibid., p. 12.

合都是把“霸权”与“统治”、“霸权”与“武力”、“霸权”与“强制”相对立的，显然，葛兰西将其论述的重心放在文化霸权上，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这一方面被极大地忽视了。与列宁对霸权概念的使用相比，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确实发生了意义重心的转移。一如科拉柯夫斯基所说：“葛兰西把通过单纯的意识形态方式所获得的文化霸权看作是达致政治权力的优先条件，而对于列宁来说，取得政权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只要形势许可，就能够夺取也一定要夺取政权。”^①当然，我们不能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解为与政治无关的完全中立的东西，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在本质上恰恰就是政治实践，即通过思想、精神、道德、教育、文化的途径所达成的非强制性的政治效果。确切地说，葛兰西不是把霸权从政治转向文化，而是把霸权的形态从直接的形式转向间接形式。但无论如何，葛兰西超出了列宁主义的霸权概念，使它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得到真正拓展。

第三，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这些变化，从理论的源流上可以诠释为从列宁的单一影响扩展到列宁、马基雅维利、克罗齐的综合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看不到意大利本土的政治文化对葛兰西霸权理论形成的影响，也就根本不理解葛氏的霸权概念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在《狱中札记》的一个标题为“伦理—政治的历史与霸权”的片断中，葛兰西这样写道：“荣誉应该归于克罗齐的思想，在这方面，可以说，他的思想引起人们对历史发展中文化与智识因素的重要性、对国家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对霸权要素以及作为具体历史集团的必要形式的赞同的极大关注。”^②在题为“伦理与政治”的一节中，葛兰西说：“把伦理的 (*ethical*) 和政治的 (*political*) 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可以解释克罗齐的历史思想的轮廓，伦理的指的是市民社会的活动，指的是霸权活动；政治的指的是国家—政府的主动行为和强制”。^③ 克罗齐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是：

①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44.

② 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 translated.) D. Bootham,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5, p. 357.

③ *Ibidl.*, p. 372.

精神作为唯一的实在是至高无上的，而政治的、国家的、政府的活动只是精神的一种低级表现，不过是一种功利性的过程。克罗齐把伦理的、文化的因素置于现实政治之上的观点直接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产生了构成性效果，不过，葛兰西对克罗齐将政治与伦理、国家与道德、权力与文化精神断然二分的做法很是不满，认为这是克罗齐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误解所致。克罗齐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是一种纯粹的“权术”，它既可用于道德的目的，也可以用于不道德的目的，因此，它本身没有什么道德性可言。在“现代君主”一节中，针对克罗齐认为马基雅维利主张政治学是“自主的”、“普遍的”“科学”而完全不受伦理原则支配的观点，葛兰西展开了批评，说这是一种“夸大和歪曲”。^① 因为，“马基雅维利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党徒，一个具有强烈热情的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他希望创造新的力量平衡，因此他不得不使自己考虑什么‘是应该’的”^②。在政治活动中，人何以可能持一种道德的中立？何以能进行“无道德立场”的纯粹言说？“应注意到马基雅维利提出政治问题的方式，即，他的著作中隐含着这样的命题：政治是自主的活动，有着自己特有的、与道德、宗教不同的原则与规律——这一命题具有深远的哲学影响，因为它暗中引入了新的道德和宗教观，引入了新的世界观。”^③ 葛兰西并不是为违反道德的行为开脱罪责，而是坚持一种“绝对历史主义”的政治道德视野：远离了具体历史环境的抽象道德是不现实的，政治道德的评判只能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加以考察，“政治道德”比之于那种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似乎更加复杂，因为它不仅面向个体的品性，而且还要面向民族与国家的整体利益，面向历史的进步。无论如何，在认可政治活动中贯穿着更高的道德精神与文化要素方面，葛兰西更多受惠于马基雅维利而不是克罗齐。马基雅维利一直不遗余力地论证权力与智识的二元平衡：狮子与狐狸、暴力与法律、野兽与人（半人半马的 Centaur）、强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 translat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140.

^② Ibid., p. 172.

^③ Ibid., p. 134.

制与认可、武力与说服。如此看来，葛兰西所说的“国家是披上强制甲冑的霸权”完全可以归之于马基雅维利的智慧。丰塔纳对葛兰西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思想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比较研究，他的结论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可以看作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预示’与‘原型’。”^①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不仅具有深厚的学理渊源，而且它在葛兰西本人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理论化。霸权概念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它是葛兰西学说的实质内容，它准确地表现了葛兰西思想的“特殊性”，在一封狱中书信中，葛兰西写道：“就在克罗齐炮制他自己自诩的武器的同时，实践哲学的当代大理论家也在构造一种更为有效的工具，系统地对‘霸权’和文化指导要素进行重新评估，以消灭机械论的和宿命论的经济主义观点，其实，最新的实践哲学的根本要素就是关于‘霸权’的历史—政治观。”^②霸权也是一个“轴心”概念，因为从体系的“建筑术”上，它是贯穿葛兰西全部理论论述的“中心线索”，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纽结点”和逻辑辐射圆心。霸权概念的理论场域蕴含了一系列重要的“亚概念”：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完整国家，历史集团，意识形态，运动战/阵地战，积极革命/消极革命，等等。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在霸权理论的大框架之下获得它独特的意涵的，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方面来表现“霸权”观念的。在这些“分殊”性的解析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完整国家、意识形态，从葛兰西对这三个概念的翻转与改造中，我们可以深刻体悟到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理论内核。

葛兰西将市民社会视为霸权的真正场所，这展现了二者的密切关系。从根本上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建立在他独特的市民社会理论之上。葛兰西认为，国家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而市民社会是各种“民间”、“私人”组织的总和，即工会、商会、教会、学校、文化实体、民间组织、自治团体、学术机构、非官方组织等，葛兰西的开创性见解在于，

^① Benedetto Fontana: *Hegemony and Powe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chiavell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1.

^② Antonio Gramsci: *Gramsci's Prison Letters*, tran. by Hamish Henderson, Zwan Publications, 1988, p. 214.

他明确地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归之于上层建筑领域。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形成了巨大反差。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显然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①

显然，马克思把工业及商业活动、自由竞争、财产关系、个人利益圈划在市民社会之内，认为它们是国家制度和观念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即是说，马克思从经济关系的维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复杂的物质关系的总和，理解为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一理解是基于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而提出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自在自为的实体，是永恒理性的图像，是人们必须加以崇敬的地上的神物，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的前面。”^② 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颠倒，消解了黑格尔赋予国家的神秘性和自在自为性，着力揭示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依赖性，把市民社会视为全部历史的真正舞台和发源地。在把市民社会视为一种更积极的决定性要素上，葛兰西与马克思是一致的，这构成了他们与黑格尔的区别，黑格尔更注重国家的能动性与普遍性。一如拉克劳总结的那样：“葛兰西与马克思一致而反对黑格尔，他把社会分析的重心从国家移到市民社会之上——任何‘普遍阶级’都从后者诞生，而不是从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独立领域中产生。”^③ 但是，葛兰西与马克思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7页。

③ 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托·拉克劳、斯拉夫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童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差别显得更为昭目：虽然二者都强调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但在如何理解这一重要性上二者的分歧点出现了，一个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一个认为应该把市民社会放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来加以考量；一个把市民社会置于根基处来突显它未被看到的本性，一个把市民社会提升到国家的高度来展示它被忽略的政治意义。

应该说，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意义的思索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黑格尔的启发。我们知道，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它包含三个环节：需要的体系、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以及“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述两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关怀”。^①可见，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不仅包括了需要及其满足方式、财富、劳动形式等经济关系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包括了保证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组织形式、法律保护体系、实现的外部措施（警察与同业公会）等方面，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比较宽泛，那些直接与私人利益相关的管理、调节组织及司法协调体系、自治团体、同业公会均属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所说的这三个环节中，马克思注意的焦点是第一个环节，而葛兰西则注重第二、第三环节。在市民社会具有超出纯粹经济关系的意义上，葛兰西明显吸收了黑格尔的见解。葛兰西与黑格尔一样，都将国家中的一些社团组织当作市民社会，这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生产关系层面是不同的。相比而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受黑格尔的影响更大，因为，黑格尔尽管反对把国家与市民社会混淆起来从而损坏国家的普遍性，但是，他毕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设置一个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格区分，黑格尔一直坚持市民社会是一个中介基地，是国家的一个环节，在谈到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时，他说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②他甚至还提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因特殊领域的合法性而产生的公会精神，本身潜在地转变为国家精神……国家在政治情绪方面深入人心和强而有力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3页。

② 同上书，第253页。

的根源就在公会精神，因为在这里特殊物是直接包含在普遍物之内的”。^①正是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辩证关系的这些论述，给了葛兰西以极大启迪，但他没有停留在黑格尔那里，而是比黑格尔走得更远，因为他明确地把市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边界之中来进行思考。

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新阐发，葛兰西拓展了国家的界线——国家不仅仅作为暴力机器，它也以“文治”的方式弥散于市民社会之中，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完整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并没有否认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性质，他只是根据对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观察，揭示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性以及它在实现有效统治时的功能结构。如果国家只不过是外围的壕沟，在它的背后是强大的作为堡垒和工事的市民社会，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要最终获胜，势必要彻底攻克并牢牢控制市民社会的无数碉堡与据点；如果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参与并延展了国家的功能，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理应从“运动战”转向“阵地战”。在谈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关系时，特瑞·伊格尔顿评论道：“霸权的概念属于这个问题：一个主导权力巧妙而普遍深入地渗透到日常惯例的社会形态中，如果这些惯例亲密地与‘文化’本身交织在一起，书写在我们从生到死的经历中，那么工人阶级是如何夺取权力的呢？我们如何与一个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秩序之‘常识’而不是被广泛地认为是异己的、压迫的权力进行斗争呢？”^②这就是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他的市民社会概念、完整国家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这种上层建筑定位导致了扩大的国家概念，而国家概念的扩大一方面使构成国家的社会基础及各社会集团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的功能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些都使霸权问题突出地浮现出来，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思考更使此一问题显得急迫而紧要。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9页。

^② 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第三节 莫菲对葛兰西霸权的解读

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提到的莫菲当时(1977年)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后来收入莫菲编辑的关于葛兰西的论文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中的长篇论文:《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这篇论文(四个部分)的许多内容后来被纳入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从形式上看,《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前两章就是这篇文章的扩展,这两章的思路与叙述方式也与这篇早期论文完全一致。区别在于:在《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中,莫菲着力凸显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的非决定论与超出阶级还论的因素;而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侧重于批判葛兰西的本质主义成分。

《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将霸权概念看成是葛兰西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因此全文以霸权概念为主线而展开论述。这一行文方式后来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以更宏观的规模再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该文可看作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雏型。虽然文法结构上的比较对于文本学解读不无助益,但我们关心的重点是论文的实质内容——莫菲对葛兰西霸权概念作了怎样的解读。

一、“力量关系”与霸权

我们知道,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以散乱的状态遍布在整个《狱中札记》中,在不同的地方,它出现的语境、相关联的问题域的差异与变化造成其意义本身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含混性,这给不同的诠释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西方研究葛兰西的学者对典型意义上的葛兰西霸权概念的语境性区域定位也意见不一、莫衷一是。莫菲坚持认为,葛兰西在“力量关系”这个片断中对霸权的论述具有范型性意义,遗憾的是,它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了。

在这个地方，葛兰西区分了三种力量关系，其一是，与经济基础密切联系的社会力量关系，这些关系依赖于客观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而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是，政治力量关系，即不同社会阶级达到的同质性、觉悟高低和组织程度；其三是，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不时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

葛兰西着重分析了政治力量关系，在这一层次又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和最基本的阶段是经济社团，“行业集团意识到自身的团结和同质性，意识到组织集团的必要性”^①，但它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第二个阶段是产生了一致性的阶级利益，全体成员觉悟到了阶级意识，但这种意识还停留于纯粹经济领域；第三个阶段，“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社团利益在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中将超越纯粹经济阶级的社团制约，能够而且必须成为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② 葛兰西认为，这一阶段是最纯粹的政治阶段，因为它标志着从经济基础到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关键性过渡，正是在对这一“关键性过渡”的描述中，葛兰西导出了他崭新意义上的霸权概念：“从前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不同的‘政党’，互相对峙和冲突，直到其中一个或至少一种联合开始盛行、占上风、并在社会中传播——不仅带来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产生各种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风行的斗争不是建立在团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基础上，从而造成某个基本社会集团对一系列从属社会集团的领导权。”^③

莫非指出，这里出现的霸权已不同于《南方问题笔记》中的霸权概念，因为此时霸权已超出了简单的阶级联盟的观念，它扩大为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目标的完全熔合，它由一个基本集团和其他集团通过意识形态的中介而达成。这一霸权概念的丰富的蕴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霸权的特殊性被刺穿（即不再锚定于无产阶级），它的主体空间增大，基本社会集团构成了其主体值域；其次，霸权增加了一个新的、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基本的维度，即智识的、道德的维度；其三，意识形态是霸权达成的中介，这也就是葛兰西在另一个地方用“卡塔尔西斯”（Catharsis）这一术语所表达的意思，没有从纯粹经济要素到伦理—道德要素的过渡，没有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更高层次的过渡，也就谈不上真正的霸权；其四，霸权的“普遍性”并不是特定社团主义的膨胀，而是接合的产物。“统治集团根据从属集团的整体利益进行具体的调整，国家生活被看做基本集团和从属集团的利益之间的不稳定平衡持续形成和取代的过程——在这一平衡中，统治集团的集团占上风，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说仅止于狭隘的社团经济利益。”^①用拉克劳的话来说，在葛兰西这里，霸权的普遍性是“一种被特殊性污染了的普遍性”。^②

莫非认为，按照葛兰西此处的阐述，完全可以得出一个霸权阶级的界定，所谓霸权阶级就是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将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接合到自己利益之中的基本社会集团。为了实施霸权，霸权阶级必须放弃狭隘的社团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其他集团的利益。“很明显，霸权的事实在如此的预设为前提：它要考虑霸权得以在其中运作的其他集团的利益和意向，它也预设了某种平衡，即是说，霸权集团将要牺牲一些社团性。”^③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霸权阶级，就意味着国家被看作是这一特殊集团的统治机构，但这一集团的统治只有体现为代表了普遍利益和全民族的力量，它的霸权才能真正实现，从这个角度上，霸权必然要求一个扩大的国家概念。

既然基本社会集团要通过接合其他集团的利益成就其霸权，那么研究接合的方式也就十分重要。莫非指出，葛兰西区分了两种霸权接合方式，一种是“进化论”（transformism），即通过把对立阶级的利益中立化或同化而减轻它与霸权阶级的冲突，通过这一方式达成的共识仅仅是“消极的同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② 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托·拉克劳，斯拉夫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童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③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p. 181.

意”；一种是“扩张性霸权”（expansive hegemony），即通过真正采纳大众阶级的利益而创造一种积极的、直接的赞同而达成自己的主导权，创造这种赞同也说是创造一种“民族—大众意志”的过程。莫非认为：“霸权的两种方式的这一区分使进一步详细说明业已提出的霸权的尝试性定义成为可能。事实上，如果霸权被界定为一个阶级将其他集团的利益接合到自己集团的利益中来的能力，那么，现在就有可能看到这一接合能力的实现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进行。要么这些集团利益被接合到如此状态，以至于它们被中立化了，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特定要求的发展；要么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接合，接合促进它们充分发展，而这一发展导致这些集团所表达的各种矛盾最终解决。”^① 通过莫非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阐述，我们看到，莫非反复申明、着力渲染的是霸权要以政治要素的多元化为前提，如果霸权阶级试图完全消除其他集团的利益，那么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霸权。

二、“基本阶级”与霸权

霸权运作要通过接合，是否每一社会集团都能通过接合而取得霸权？葛兰西十分强调霸权操作的政治性，是否意味着他完全将经济因素的作用排斥在外？莫非之所以选取“力量关系”这个语境来透察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正是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辩明此一问题。葛兰西将霸权置于一个复杂的力量关系总体之中，也充分估量了“接合”运动的历史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忽视“有机”运动的重要性，他说：“历史政治分析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找不到有机和接合之间的正确关系，这就导致把实际上只是间接作用的起因表现为直接作用的起因，或者断言直接起因是唯一有效的起因。”^② 葛兰西把第一种情形称为过量的“经济主义”（对机械起因估计过高），而第二种情形则夸大了自愿主义和个人的因素，这表明葛兰西根本没有忽视经济因素，而是主张把它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单独提到经济霸权的次数很少，经常出现的则是政治霸权、文化霸权，联系起

^①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83.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来看来，葛兰西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经济在霸权运作中起作用，但这一作用只能以间接的方式来发挥。正因为经济因素在霸权运作中起作用，所以葛兰西断言，只有基本社会集团才可能成为霸权阶级，所谓基本集团也就是在生产关系的两极中占据其中一个的阶级。“尽管霸权属于伦理—政治的范畴，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霸权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① 这种条件限制就将霸权阶级的候选数量收敛到最小范围，同时也将霸权接合的形式设定了一条清楚的底线：霸权集团为了成功地接合，必须向其他集团作出一定让步，但是，“这些牺牲和折衷的做法都不能触动根本”^②，如果霸权接合竟然将自己的经济利益都“接合”掉了，那么霸权也就荡然无存了。

我们看到，莫非在论及葛兰西的这一观点时，基本上保持赞同的态度，也就是说，她与葛兰西一样，认为霸权只能在基本阶级的层面上运作，这与后来《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的立场殊然不同，从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展现出莫非思想演进的轨迹。十分有趣的是，对于葛兰西关于经济因素在霸权接合中的作用的论述，莫非非但没有苛评厚非，反而饶有兴致地发挥了葛兰西的论述，她说，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毫无疑问会在霸权接合的形式上碰到局限，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剥削阶级，在接合其他集团的利益方面，无法接合到将剥削的经济特征抹得一干二净，所以它只能通过“消极同意”达成霸权，而工人阶级，由于其阶级利益与大众阶级并不根本冲突，所以它完全可以达到“扩张性霸权”。虽然对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集团究竟如何接合，莫非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向，但她对工人阶级霸权的倡导与维护的立场是鲜明的。

在对霸权接合的形式、条件及其局限性一一剖析之后，莫非强调，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智识和道德的领导权。如果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局限于政治领导权，那么它与列宁的霸权概念的区别就仅在于：葛兰西没有把霸权概念仅用于分析无产阶级的策略，他也用它来分析资产阶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② 同上。

级霸权。而实际上，葛兰西通过把智识—道德领导权这一新维度增加进来，使霸权的运作空间大大地拓宽了，这恰恰是葛兰西霸权概念最具原创性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一新的维度，霸权就不能普遍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分析方法，它也不可能通过与市民社会的特殊关系而获得微观化、精致化。假设没有这一步的迈进，那么，拉克劳与莫菲对霸权的进一步激进化的理论努力也就缺失了必要的基础和促发灵感的资源。

三、霸权与意识形态

新维度的增加直接带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列宁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意义之上，这一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因为无产阶级与农民建立阶级联盟主要是在夺取政权、正面进攻国家的范围内的策略考虑，霸权只与“政治社会”相关。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就是在这一范围内展开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①在此意义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不涉及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有关，所以，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的分析得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②领导权的分析也就是阶级分析，而阶级分析又被完全限定于经济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领导权虽然是革命的关键，但它同政治国家一样是经济直接决定的产物。

如果霸权主要在“纯粹的政治”层面运作，而政治的范围又不仅仅限于强制性国家机器，它在广泛的、强大的市民社会中栖居着、存在着，而市民社会又属于非强制性的上层建筑，那么，霸权就自然而然地与意识形态勾联起来。正是霸权概念的拓展，使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显现出来。莫菲《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一文的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霸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权与意识形态”，“霸权”总是出现在“意识形态”之前，这一方面反映了莫非对葛兰西的解读是按照从霸权到意识形态这么一个进路——在这一点上她与拉克劳不同，拉克劳是从意识形态分析过渡到霸权概念；另一方面，这一顺序也恰切地反映了葛兰西本人的思考线索和理论侧重，一如伊格尔顿所说：“葛兰西著述中的关键范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霸权。”^①但这并不是说，在葛兰西的作品中，霸权出现的次数多、频率高，而是说葛兰西是在霸权问题的框架之内来思考意识形态的，即意识形态概念是在“葛兰西的霸权问题域中运作的”，并且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在“新的霸权之构形过程”中充分展示出来的。^②

四、反对“虚假意识”及“副现象”

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霸权操作的真正场所，而市民社会又属于上层建筑，这一上层建筑又不是国家机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按照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它只能属于意识形态，这样，霸权与意识形态就在市民社会这里叠交在一起了。把市民社会归之于上层建筑，主要着眼于确定霸权斗争的地点，但如果我们倒过来想，意识形态存在于市民社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存在于学校、教会、行会、工会、民间组织、非官方社团、学术机构、各种协会、大众传媒等等这些“实体”之中。在论及霸权的理论—实践原则的认识论意义时，葛兰西曾说：“领导权机构的实现，规定了意识和认知方式的变革。”^③我以为，这句话也完全适合于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霸权机构的实现改变了人们理解意识形态的方式。

长期以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人们一直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观念的体系，将之当作“副现象”，甚至说它是“虚假意识”，对此，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代表了一种明显的进步，而且在历史上，它恰恰和观念论

^① 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6页。

^②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85.

^③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相互对立。”^① 依葛兰西之见，所有意识形态研究的出发点都不能离开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获得他们的任务意识。”^② 这表明，意识形态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随意的“观念”，它也并不一定具有否定性意义，如果马克思有时把意识形态称作幻觉，这也只是在论辩的意义上为了说明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过渡性。在这种肯定性设定之下，葛兰西推出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阐述：“在意识形态是历史所必需的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③ 请注意，“心理学的”是葛兰西的借代性用法，它与“生理学的”相对，是强调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是有机体的、活动性的、属于纯粹政治层面的东西，而不是低级的、感觉性的意识。葛兰西认为，将意识形态当作观念体系，是把意识形态贬低到了“生理学”的水平上，“观念论”就是“感觉论”，它的逻辑是把高级的东西还原为低级的东西，把观念归结为感觉要素。葛兰西不无讽刺地说，“弗洛伊德是最后一位观念论者”^④，因为他把许多活动化约为潜意识、无意识。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之心经由这一表述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意识形态是人们活动、斗争的场所，人们通过意识形态而得到所处的地位的意识。莫非认为，人们可以从葛兰西的这一论断中得出一个重要的见识，即：主体并不是原先给定的，而总是被意识形态生产出来，这样主体性就总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静态的机械性的观念体系，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构成主体的实践活动，这包含着，意识形态有物质性存在，“正是由于葛兰西，才实现了从作为‘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经历的、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性转变”^⑤，葛兰西的这些原创性洞见后来被阿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②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85.

③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④ 同上书，第291页。

⑤ 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尔都塞继承下来并作了更详尽的发挥与延伸。

莫菲指出，葛兰西在论述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组织功能的时候，明显受到了宗教对人的塑造作用的启发。宗教不仅仅是一种虚无飘渺的观念，它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宗教存在于最初的洗礼、虔诚的跪拜、喃喃的祈祷、神圣的弥撒、肃穆的唱诗之中，“人的生活中与个人幸福攸关的一切大事和行动，如诞生，结婚、死亡和葬礼都夹杂着某些宗教的东西”^①。宗教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与人们的情感、意志、习俗紧紧联系在一起，更要紧的是它贯穿在、内嵌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在葛兰西的视线中，意识形态也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它在人们的具体的活动中“有机”地、有力地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而不是什么“副现象”或者“无用而愚蠢”。葛兰西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定结构所必需的历史性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一种是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强加意愿”的意识形态，但后一种意识形态在葛兰西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以至于他激愤地说：“这个词语的糟糕的意义已经传播开来，结果是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论分析改变了、变质了。”^②

为了给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提供理由，葛兰西引证了马克思的一个命题：“一个大众的信念往往具有物质性力量或某种那样的东西所具有的能量。”^③“某种那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葛兰西没有点明，紧接着他又说了一段有名的话：“我认为，对于这些命题的分析，倾向于加强历史集团的概念，在这一概念里，物质的力量是内容，而意识形态是形式——虽然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这种区分只有纯粹的训导价值，因为如果没有形式，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就会是不可设想的，而如果没有物质力量，意识形态就只会是个人的幻想。”^④巴丽特曾指出，在这一段落中包含着复杂的、但却是明显的立场的转移，这造成了准确理解这些相关命题的困难，

① 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页。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是作为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操作性、活动性本身具有的呢？还是说它依赖于经济的力量？葛兰西表述的模糊性为不同的诠释留下了余地，就像巴丽特所说：“最后一个句子也许足以独立地将葛兰西指定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主义者’，但是，当这出现在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这已成为经典‘葛兰西式’的思想得以提出）的最后时就很难对其作出评估。”^① 莫非与拉克劳倾向于把这个段落理解为是对意识形态能动性的表达，但二者又有些不同。莫非在她的阐释中暗示，葛兰西的意思在于，意识形态可以像经济本身那样真实并起作用。而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内容之间的区分，其灵感源泉显然也来自这个地方，但拉克劳对这一区分做了康德式的处理，着力强化的是形式本身的独立性，而莫非则一般地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对于葛兰西意识形态概念在反对“副现象”方面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莫非作了一个概要式的总结：一是意识形态以实践形态存在，即其本身的操作性、活动性；二是通过意识形态主体得以产生、构成；三是意识形态物质性和机构化（institutional）。但是，莫非的重点不在于此，因为这些方面已被阿尔都塞以更清晰、更系统的形式理论化了。莫非想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中发现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连她的老师阿尔都塞也没有勘探出来。“葛兰西不仅仅满足于批判“副现象”的观念，他继续深入前行，对那种将意识形态当成是主体的阶级地位的功能的观点发出了质问，毫无疑问，正是在这里，葛兰西贡献的最重要、最新颖之处被发现了。”^② 莫非认为，正是反还原论问题提供了葛兰西霸权的可理解性的现实条件。

五、反对还原主义

葛兰西在意识形态上的反还原主义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在葛兰西那里，政治行动的主体和社会阶级并不等同，存在于经济层面的社会

^① Slavoj Zizek (ed.):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 p. 237.

^②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88.

阶级并不一定在政治层面上重现，在集体意志的锻造过程中，新的政治主体可能被创造出来。莫非认为，由于葛兰西消解了所有主体都是阶级主体这一还原论命题，他才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他能够思考超越简单阶级联盟意义上的霸权，这种霸权创造了一个高级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各种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因素熔合进来。

不同社会集团间的意识形态因素如何能达到真正的统一呢？有两种可能的解决途径。第一种是，将意识形态的统一视作主要社会集团的阶级意识形态向联盟集团的强加。在这种情形下，霸权阶级就是依靠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致性的阶级，这导致把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还原为意识形态的灌输。莫非指出，普兰查斯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解读就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种是，通过智识与道德的改革建立新霸权，这正是葛兰西采取的线路。智识与道德改革的重要性表现在：基本阶级的霸权在于创造一个“集体意志”，在这个“集体意志”中，这一阶级与其同盟的意志熔合起来形成“集体人”。“人们可以由此推论，‘文化的方面’对于实践（集体）的活动的的重要性。历史的行为只能由‘集体人’来完成，要达成一种‘文化—社会的’统一，必须以此为前提：具有异质的目的的、多种多样的分散的意志，在平等的共同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怀着同一个目的而焊接在一起。”^①新霸权的创造意味着先前意识形态范围的某些改变，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观以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的统一原则。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改变、整形，就谈不上智识与道德的改革。

对葛兰西而言，智识与道德的改革不在于清除现存的世界观或者以全新的、已经程式化的世界观来取代它，而在于一个艰辛的改变过程，在于对现存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再接合，意识形态斗争不是要拒绝一个体系的所有要素，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新的接合。在谈到集体意志形成的漫长与艰辛时，葛兰西曾说：“重要的是，新的历史阶段的早期代表容易对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1页。

这些复杂的意识形态提出批评，批评造成区别和变化，其意义相当于旧的意识形态要素。从前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甚至具有偶发性的东西，如今具有首要的意义——变成新的复杂认识和理论的核心。由于次要因素的社会发展，旧的集体意志转化为自相矛盾的要素等等。”^① 这表明，葛兰西充分考虑了新旧意识形态之间、意识形态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的达成是各种因素反复较量、斗争的结果。

莫非认为，葛兰西的这一解决方式使还原论的另外两个原则趋于瓦解，这两个原则是：社会阶级有一个范型性意识形态；所有意识形态要素都有必然的阶级归属。因为，如果接受这两个原则作为前提，那么智识与道德的改革就蜕变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全面拒绝和彻底根除，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综合爆发”，“综合爆发确实也会发生，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破坏性超过重建性”。^② 在葛兰西的论域中，智识与道德的改革完全不是在“综合爆发”的意义上提出的，而是在“有机继承”的意义上呈现其特有内涵的，“这种有机继承要求一座良好的档案馆，其中储备丰富，使用简便，可以对过去的一切活动进行游览和‘批评’”。^③ 可以说，要保持葛兰西赋予智识与道德改革的典范意义，就必须与这两个阶级还原论的原则告别。

在莫非看来，正是由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介入”，意识形态统一性问题才得以深化并达到一种非还原论的解决。雷蒙德·威廉斯在讨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时，反复强调霸权的动力学特征，他认为，霸权就意味着斗争，意味着“不断地被更新、再造、保卫与修正”^④，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霸权的问题性之内，葛兰西能够将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发挥到那样的地步。其实，莫非在阐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的关系时，考虑到的也就是霸权的内在张力给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统合动势。巴丽特说，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② 同上书，第156页。

③ 同上书，第158页。

④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12页。

霸权与意识形态是一对姊妹术语，“霸权概念是葛兰西关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思想的有生机的焦点”^①，这一断言无疑是中肯的、机智的，但遗憾的是，巴丽特夫人并没有对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出深入分析。

既然霸权在于基本阶级在不同社会集团构成的体系之内对政治、智识、道德所实行的领导权，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又不是意识形态强加的，那么意识形态体系的统一就只能来自于接合原则——葛兰西称之为“霸权原则”。莫非承认，葛兰西本人并没有特意对“霸权原则”进行精确的界定，但通过“症候式阅读”可以看出：“它包含一个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的实现依赖于处于生产关系层面的基本阶级所起的中心作用。”^② 智识与道德的领导的实质就是提供一个接合原则，通过这一原则，来自不同集团的意识形态因素被接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即“有机意识形态”。之所以说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源自于接合，无非是为强调统一性不是先验决定，而是特定历史际遇下各种力量关系为争夺霸权而斗争的结果。既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是接合所赋予的，那么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同样是接合造成的，因为某一集团的意识形态也可能被另外的霸权原则所接合。

但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问题尚有许多令人困惑的方面，莫非急于得出结论，在论证上不细致，论据也不够充分。比如，接合如何造成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莫非那里还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她没有说明，基本阶级本身的阶级性（即由它在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决定的阶级性）与它作为霸权阶级在建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时所提供的霸权原则的阶级性是否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那么“接合”岂不成了实现阶级性移植的工具？如果二者之间不完全重叠，它的原因在哪里？被接合到“有机意识形态”中的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要素的阶级性处于何种状态？从莫非对智识与道德改革及集体意志的阐释与发挥来看，莫非极力想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探照出超越阶级还原论的“症候”，因此，她肯定倾向于霸权原则的阶级性不

① Slavoj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 p. 238.

②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93.

完全受生产关系层面的决定。她说：“意识形态斗争事实上由特定意识形态要素的拆解—再接合的过程构成，两个霸权原则为挪用这些要素而进行斗争，但这一斗争不是由两个完全定型的、封闭的世界观的冲突构成，因而，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意识形态总体是竞争的霸权原则之间各种力量关系的结果，它们经历着一个永久的变化过程。”^① 既然霸权原则要“挪用”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要素，并且这一原则是各种力量关系斗争的结果，那么这一接合原则的阶级性就是经过“改造”了的阶级性。但是，莫非没有像拉克劳那样大胆地在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分，说霸权原则的阶级性是“现象”，而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性是“物本身”。

六、葛兰西的重要性

从总体上看，莫非此时对葛兰西的解读还是比较保守的，她力图在基本忠实于葛兰西原意的前提下作出有限的引伸。比如，她承认，葛兰西本人并没有明确断言每一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性，“葛兰西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发现解决问题的一些富有意义的明确的暗示性线索（pointers）”^②。莫非说的“pointers”是指葛兰西提到的“民族—大众”，因为葛兰西表述过这样的看法：在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利害攸关的是把民族—大众的意识形态要素接合到霸权阶级的话语中来，由此莫非作了这样的发挥：“这就假定了这些要素本身并不表达阶级利益，它们的阶级性是由话语（它们被接合到如此的话语中）和被这样创造出来的主题类型所赋予。”^③ 莫非的意思很明显，她是说，一些意识形态要素本身无所谓阶级性，它只是在被接合之后，方显现出“阶级性”，质言之，它们的阶级性是接合原则造成的，但是，莫非自

^①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p. 193 - 194.

^② Ibid., p. 194.

^③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p. 193 - 194, p. 195.

始至终没有使用拉克劳式的表达方式——意识形态要素的中立化或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她尽量使自己的理解表现为是对葛兰西原意的进一步展开，即便有所发挥，她也小心谨慎地使之不太离谱。

莫非在《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一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的三个方面：“（1）葛兰西第一个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强调它作为所有社会形态的一个必要层次的存在，强调它铭刻在实践中，强调它具体化在各种机构中。（2）他与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了，这种意识形态是现实的歪曲表现，因为它被主体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地位所决定，葛兰西提前使用了作为建构主体的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3）最后，他也对还原论的一般原则提出了怀疑，这种还原论把必然的阶级归属归之于所有的意识形态要素。”^①

莫非认为，葛兰西在意识形态理论上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是由于他研究意识形态的新方式：从霸权的角度来透察意识形态问题。由于霸权就是不停地斗争，由于霸权斗争体现于可见的运动中，由于霸权是一种政治过程，所以意识形态就从歪歪斜斜躺着的“观念体系”中一下子站立起来，它不仅恢复了自己的正面形象，而且还解掉了一些不必要的束缚，变得更加从容自由。反过来，正是意识形态的这些关键性转换构成了葛兰西霸权概念可理解性的条件和全新意义。那么，葛兰西关于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创造性思考有哪些重要意义呢？或者说莫非从葛兰西那里获得了哪些富有启发价值的思想酵母呢？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葛兰西为解决意识形态的自主性问题付出了最大的尝试性努力。就像莫非指出的：“问题在于超越经济主义，而同时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性。”^②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确立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一方面又不放弃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这是所有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解决意识形态自主性问题的理论家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境。莫非的老师阿尔都塞也不例外，阿尔都塞一方面断定意识形态是永存

^①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99.

^② Ibid., pp. 199 - 200.

的想象之镜，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体仍要通过意识形态并在意识形态中产生，但是，他同时又宣称，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而共产主义恰恰是阶级消亡了的社会，这样一来，阿尔都塞陷入了矛盾之中。依莫非之见，由于葛兰西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阶级还原论，所以他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得比阿尔都塞成功。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非此时还没有把经济的最终决定当作“经济主义的最后堡垒”来加以批判。一个雄辩的事实是，莫非对保罗·赫斯特与巴里·辛德斯对阿尔都塞的批判提出了批评：“尽管他的批评者提出了事实上消除了经济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样的解决是以牺牲历史唯物主义为代价的。实际上，通过把经济主义等同于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论点，通过主张把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作为解决方式，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质疑。”^①莫非此时对赫斯特与辛德斯完全抛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寻求意识形态的自主性的做法大为不满，这充分表明，莫非在这个时候无意于追求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她要的是不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界线而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作最大的提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才离开阿尔都塞去重新解读葛兰西。

正像拉克劳强调的：“葛兰西所界定的‘霸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中是一个关键概念，它需要从其全部意涵上充分展开……民主召唤的自主性观念已蕴含在‘霸权’概念中、蕴含在作为阶级斗争领域的民主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它允许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服阶级还原论。葛兰西的最重要的原创性与其说在于他对上层建筑重要性的坚持（其他的理论家，如卢卡奇也达到了这一点），倒不如说在于他既克服了经济主义同时又克服了阶级还原论。”^②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是在列宁的作为阶级联盟领导权的意义上被使用，而是将其置于市民社会领域，作为一种智识上的、道德上的主导权建构来加以界定，它侧重表达的是通过共识的达成而熔铸集体意志的过程，因此也就是组织赞同的政治实践。为了形

^①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200.

^②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41.

成一种能够为不同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新世界观”，势必要牺牲某些狭隘的社团性利益，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其他集团的意向和要求，势必要中立化霸权集团与其他对立阶级的冲突。正如贝茨（Thomas R. Bates）正确指出的，葛兰西把维护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力量归之于观念，“倒不是因为观念的力量足以消除阶级斗争，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将阶级斗争缓和到使阶级社会继续运转下去”。^①诉诸于知识与道德的改造与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直接简化为纯粹的阶级意识显然代表一种策略性的转变。在最保守的评价上，这种转变在寻求一种平衡与综合的温和努力中表现出阶级属性的模糊、缓冲与弱化；当然，如果对这种转变做出一种激进的阐释，就可能得出更大胆的结论：在葛兰西那里，政治主体并不一定都以阶级的面目呈现，原本就存在着一些不能用经济阶级的概念加指认的社会集团，由于这样的集团的存在，集体意志的锻造才能达至“积极赞同”的境地。后一种理解路线恰恰就是拉克劳与莫菲在1970年代中后期对葛兰西的解读中所采取的理论姿态，实际上，它构成了拉克劳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批判的一种预置性观念支撑。当然，从葛兰西那里这样汲取灵感，不免会遭到老式左派的指责，奈杰尔·格里维斯（Nigel M. Greaves）就说。拉克劳与莫菲如此这般的做法乃是对葛兰西的语境性误读，“葛兰西在九泉之下也会难以安眠”。^②不过，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武断地把自己的“想法”硬塞给葛兰西，在《葛兰西的霸权与意识形态概念》一文中，当莫菲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原则趋于瓦解的时候，她并没有忘记做出谨慎的补充：“葛兰西本人从来没有以明确的形式提出过反还原论问题，尽管此一问题实际地存在于他构想霸权概念的方式之中。”^③这就是说，葛兰西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地谈到中立的意识形态原素和非阶级的政治主体，这一切都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

^① Thomas R.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6, No. 2, (Apr.-Jun. 1975), p. 351.

^② Nigel M. Greaves: *Why Gramsci Rolls in His Grave: An Attempt at a Rescue from Laclau and Mouffe*, Paper delivered to PS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Lincoln, April 2004, p. 1.

^③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p. 188.

“解读”出来的——这种解读被西方左翼学者恰当地命名为“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ism)。

阿尔都塞的解决方案是一点也不放弃阶级决定,赫斯特与辛德斯则完全抛弃了阶级因素,葛兰西是部分放弃阶级决定,“霸权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在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与经济的最终决定之间的可能接合的轮廓”。^①从纯粹政治层面上,由于意识形态要素并不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所以意识形态要素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层面的阶级利益,故而,葛兰西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真正自主性。而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同经济的最终决定并不是不相容的,因为用于接合这些要素的霸权原则总是由基本阶级所提供的”^②,对于莫非来说,葛兰西为解决意识形态的还原论问题提示了一种正确的方向,下一步要做的是使这一路线进一步理论化。

拉克劳与莫非的新葛兰西主义论点明显表现出一种兼容论的解决趋向,他们在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原素的存在的同时,并不否认生产关系在历史过程中的最终决定,在当时,他们认定,如果抛开了“经济的最终决定”就等于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们一方面让自己不逾越这道马克思主义的“底线”,一方面尽最大努力把生产方式的结构性作用远远推到“幕后”,而让诸多异质的意识形态原素(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无阶级内涵的中立意识形态成分)在“前台”尽情地自主活动。拉克劳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中这一“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相当艰辛的努力,他援用葛兰西关于经济层面的阶级在伦理—政治层面复现必定经过了“净化”(Catharsis)作用的观点,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基本阶级”当然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表现自身”,但这种“表现”与该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自在存在”并不完全等同,一个阶级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存在形式”赋予了意识形态以统一性。显而易见,拉克劳这一阐释的用意在于弱化生产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规定的阶级性的作用,而着力凸显在意识形态实践中阶级的“实现形式”。

①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p. 200.

② Ibid.

无论拉克劳与莫菲怎样把生产方式所规定的阶级化为一种模糊的远景，他们毕竟还没有把它抹掉；无论拉克劳与莫菲怎样把阶级性淡化，中立的意识形态原素还是在阶级性的圈子内活动，因为，他们仅仅把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理解为阶级性。他们“否定了敷粉的发辮”，但“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辮打交道”。^①正缘乎此，巴丽特说：“拉克用另一只手拿走了他刚刚送给我们的东西……他不是让我们品尝他如此雄辩地解释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非阶级原素的完全独立，而是要我们将‘阶级目标’作为大众民主现象的议事日程（即使以隐蔽的形式）所要争取的东西来加以实施。”^②巴雷特的话暗含着这样的意思：拉克劳本来可以不受不必要的拖累，从而轻松自如地得出一个与阶级概念全无瓜葛的意识形态接合概念。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在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把霸权清楚地描述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为争夺中立意识形态原素而展开的零和博弈。莫菲更是在《葛兰西的霸权与意识形态概念》一文中对赫斯特和辛德斯以牺牲“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为代价而换取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给予了最激烈的批判。

但是，巴丽特所想之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这原本可以预料，但来得这样快却让人有点匪夷所思，或许莫菲自己也没想到，她不久前对别人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指责竟戏剧化地变成了她与拉克劳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烟幕弹！1981年1月拉克劳与莫菲发表了他们合写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首次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完成一次的“哥白尼式革命”：

现在我们已抵达此前提及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之处了。这在于艰难地得出与经济主义决裂的结论——它最先由列宁所开创，继而经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得以发展；在于坚决地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也在于同一种宣称自己为历史过程的“绝对真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② Michèle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Polity Press, 1991, p. 59.

宣称自己能够预测历史的必然进程的科学形式决裂。如果我们还想有朝一日进入到一种真正解放的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场域，在其中，大量的不同主体必须被承认和接受。^①

“哥白尼式革命”涉及对既定关系的颠覆：在康德那里，认识主体并不是客体的反映，相反，认识的客体倒是主体建构的结果，因为，知识可能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可能的条件；而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不是“经济的最终决定”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抑或是什么“历史规律的担保”决定了此一主体的霸权，相反，是霸权接合实践活动本身建构了主体的霸权身份，因为，霸权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历史性的政治主体可能的条件。其实，拉克劳与莫菲的“哥白尼式革命”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就已潜伏了它的逻辑内核——既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的形成也就是政治主体的“生产”过程，而意识形态统一性是接合实践所造就，那么，政治主体当然也就不是由什么必然性逻辑所决定，而是由偶然性的霸权逻辑所塑造。但是，这个逻辑内核一直为阶级性所困扰而没有充分地“伸展开来”，当拉克劳与莫菲确立了无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原素的存在之后，阶级霸权似乎拓展了极大的自主空间，但“阶级”对“霸权”的先验规定仍然限制着接合的完全自主，如今，“经济的最终决定”一旦化为乌有，霸权接合的一切“形而上学”束缚也就被彻底剪除。现在，即使仍然谈论“阶级”——事实上，拉克劳与莫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并没有像赫斯特和辛德斯那样快刀斩乱麻似地完全扔掉阶级概念——也不是“阶级”决定“霸权”，而是“霸权”决定“阶级”，一如莫菲所言：“霸权概念比阶级更具基础性，因为，阶级的位置性在政治主体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存在于社会既定历史时刻的霸权类型。”^②

① Laclau and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y, Where Next?* In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1, p. 22.

②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Recasting Marxism: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Movements*, *Socialist Review*, 66 (1982): 91-113, Antonio Gramsci: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edited by James Martin, Vol. 4, Routledge, 2002, p. 149.

对霸权的这种阐述当然“超越了葛兰西”，正因为这一“超越”，葛兰西一下子从一个反还原论的斗士变成了还原论的残余分子。其实，葛兰西并没有变，他始终是那个葛兰西，真正改变的倒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在1981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有人问拉克劳与莫菲：“既然你们认为霸权过程优先于阶级的形成，那就表明你们不仅完全脱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而且根本上背离了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st）的努力，在你们如此的理论规划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是怎样的呢？……人们又如何从理论上概念化这一解决目标？”^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的反应远远不同于他们当初对赫斯特和辛德斯的指控式的描述，尽管其变化的实质都是一样的。拉克劳与莫菲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完全拒绝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似乎有着浓重的“怀旧”情结，这导致他们在学理上背弃它，却在情感上依偎它！拉克劳振振有词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并不在于把它确立为一种“历史规律”，而是既要看到它的局限、矛盾和误识，同时又要洞察到它的伟大之处，洞察到它开辟新的历史道路的能力，“我们认同于这样一种传统而又不坚守任何正统，这允许我们现在仍将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②而莫菲则用一种近乎福音书式的语调为自己辩护：“如果没有根本性的重塑（recasting），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有助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斗争，而且它可能成为一种桎梏。”^③拉克劳与莫菲的言辞似乎隐藏着大智大慧：放弃是为了守护，背离是为了忠诚，超越是为了拯救，然而，能有多少人信服却不得而知！至少诺曼·杰拉斯不会相信，丹尼尔·麦基（Daniel T. McGee）也不会相信。^④身份政治的阐发者颇为尴尬地遭遇到了自己身份确认的困惑！

①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Recasting Marxism: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Movements*, *Socialist Review*, 66 (1982): 91-113, Antonio Gramsci: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edited by James Martin, Vol. 4, Routledge, 2002, p. 151.

② *Ibid.*, p. 152.

③ *Ibid.*

④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pp. 40-82; *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 Being A Real Reply to Laclau and Mouffe*,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9, (May/June) 1988, pp. 34-61. Daniel T. McGee: *Post-Marxism: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58: 2, June 1997, pp. 201-225.

不过，即使拉克劳与莫菲超越葛兰西从而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告别了葛兰西，因为葛兰西不仅仅是他们走入后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桥梁，同时也是重新思考激进政治的重要参照者与对话者，毕竟，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开辟了重新理解激进政治的真正性质的新思路，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在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那里，政治被狭隘地限定在强制性国家层面上，国家等同于暴力统治的工具，而政治变成了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葛兰西通过霸权概念的扩展对这种把政治缩减为一个专门化的特定区域的做法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将“政治斗争化为一系列私人事务，一方面是那些灯里有神明的人，他们无所不知；另一方面是那些被自己的领袖愚弄的人，但是他们愚蠢到不可救治，完全不肯相信实情”。^① 在葛兰西看来，政治斗争并不是经济主义的简单反映或表现，必须充分考虑政治斗争条件的社会复杂性，必须从霸权原则斗争的角度将政治活动看成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新的力量平衡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活动。葛兰西从霸权的视角论述了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性质，提出了完整国家的概念，阐明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作用，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狭隘疆域。

莫菲说葛兰西对政治学的贡献在于，他“恢复了政治被人遗忘的维度……政治由此不再被构想为分立的专门的活动，它变成存在于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一个维度”。^② 这种对政治性质的定位，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到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人是政治动物”的真正含义——政治内在于人活动中，它构成了人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由霸权理论引发的对政治性质、范围、作用等的一系列思考构成了拉克劳与莫菲激进民主政治规划的问题域，虽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业已把阶级从政治中置换出去，但是，政治与权力、政治与对抗、政治与民主关系的后现代性阐释仍然围绕着政治作为主体构成之场所这一基本设定展开，从这个视角看，葛兰西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②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p. 201.

第四章 霸权的谱系学分析

想真正了解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又想侥幸地掠过拉克劳与莫菲，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的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是一个给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与最终结论”的“完美的全景勾画”。^① 读《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却无所谓地绕开“霸权概念的谱系学”，这同样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正是在对霸权的谱系学探察中，拉克劳与莫菲展现了“拉克劳与莫菲版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面向——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像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那样歇斯底里地抵毁马克思主义并断然采取一种完全决裂的姿态，而是小心翼翼地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生成的“敏锐洞察与话语形式”发掘出来^②，然后将其嫁接到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枝条上使之获得一种转换性的重生。就此而言，指摘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彻底清除乃是有违本文根据的信口之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大多数“老左派”攻击拉克劳与莫菲离经叛道截然不同，兰德利（Donna Landry）和麦克莱恩（Gerald MacLean）从相反的方向发出了尖锐的叫喊，她们认为，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中不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而是有太

① A. M.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47.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4.

多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用于详述来自第二国际的争论在篇幅上远远多于对‘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要求所作的理论阐明……这使得整个著作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作为一个主要关切保留了下来。”^① 在《重读拉克劳与莫菲》一文中,兰德利和麦克莱恩多次表达了她们对拉克劳与莫菲引入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不满,她们甚至担心《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开篇“对第二国际问题域的恢复”与该书后半部分的解构风格“不相协调”。^② 如果说,她们关于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中残存着浓重的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指证已失偏颇,那么所谓拉克劳与莫菲对第二国际话语的植入与解构精神相忤逆的说法则纯属误读。因为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导论”中,拉克劳与莫菲在说明他们处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时已清楚地指出,他们是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以解构的方式运作”(operating deconstructively)——这种解构运作的直接目的是探讨霸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内滋生时的原相,而其深层的意蕴则是为了揭示“普遍话语时代的终结”。^③ 这充分表明,拉克劳与莫菲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援用本身就是一种解构实践,照此说来,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评价——“它以一种‘解构’的风格对霸权概念进行了新颖的发挥”^④——是十分精当的。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对霸权概念的新颖的发挥乃源于他们解构风格的新颖。其一,如果从通常意义的谱系学追溯来讲,似乎应该从俄国社会党对霸权概念的最初启用开始,然后到列宁的霸权概念,再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最后进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但是,拉克劳与莫菲恰恰舍弃了此一线性的历史考察方式,他们有意抵制“回到源头的

① Do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Rereading Laclau and Mouffe,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4, No. 4 (Winter 1991), pp. 41 - 42.

② Ibid., p. 45.

③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3.

④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80, note 31.

诱惑”，多少有点任意性地“刺入”（pierce）了第二国际这一时段。^①其二，由此带出一个更深的疑问：在拉克劳与莫菲所述列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中，竟没有一个人使用过霸权概念！所谓的“霸权概念的谱系”却是一个没有霸权的谱系！没有霸权，何以会有霸权的谱系？这分明是一个困局、一个悖论，而这恰恰是拉克劳与莫菲所需要的事态：解构必须面对困局并走进困局，因为没有困局就没有霸权，霸权始于困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克劳与莫菲引入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即是为了描述霸权出场的形态：霸权的出场是一种匿名的出场，“隐身”是它“在”的方式，它“在”，然而却没有获得命名！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名之曰福柯式的“隐匿的考古学”（archaeology of a silence）^②。这里，“silence”具有双重意味：隐匿与压制——它隐而不显，处于失声状态，因而被人遗忘。而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一种外在性的压制阻止了它的正常显现。一种本该出现的东西却隐于无形，一种将要出场的东西却被延迟，何种力量如此强大甚至如此恐怖，以至于使霸权如幽灵般隐身遁迹？霸权的运作又具有何种怪异逻辑，以至于在它如昙花般一现之际即遭受到无情的扼杀？解答这些谜团，恰恰是解构的任务。

正如索尔·纽曼正确指出的那样：“尽管‘解构’这个术语被极大地误解了，不过，它还是可以用来描述对分歧、断裂和对抗的揭示——这一揭示必然支持对社会领域的合理说明，但是这种说明还是被遮蔽着、被压抑着。拉克劳与莫菲以类似的方式把各种妥协、替代、沉默、逻辑断裂、偏离以及隐藏的声音统统展示出来，以使我们领悟到它们可能通达的地点并进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原创性的综合旨在显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要素中有一种超越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本质主义的狭隘限制的潜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原创性的综合明确承认政治有它自身的逻辑和动力。这就是霸权要素。”^③依拉克劳与莫菲之见，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

② Ibid., p. 7.

③ Saul Newman: *On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http://www.infoshop.org/forum>, p. 2.

内部，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了断裂，但这些理论家一个个施展历史编纂学的本领，竭力将这些断裂掩盖起来，饰之以连续的、统一的外观。“霸权概念出现的环境将是关于一种断层的那些环境（就形态学的意义来说），将是关于必须填补的裂缝的那些环境，也将是关于必须克服的一种偶然性的环境。霸权不会是对同一性的崇高揭示，而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① 霸权概念的介入，即是偶然性的介入，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却试图用必然性遮掩这一偶然性，因此才需要一种独特的“谱系学”分析。就像尼采以谱系分析还原出理性主义道德史的非道德性一样，拉克劳与莫菲想借助此一方法披露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内的“抑制史”，就如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来使人们联想到各种不连续性一样，拉克劳与莫菲欲以此种途径达到解构虚假统一性的目标。因此，霸权的“谱系学”不仅仅是历史情景性的预设，也不仅仅是思想背景的追溯，它本身就是解构的过程。

第一节 卢森堡：自发性与双重空场

必然性逻辑的断裂以及一种作为补充性逻辑的偶然性的倏忽闪现与旋即退隐，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既然霸权被构想为一个掩饰裂隙的支援性概念，那么先从卢森堡这里展现霸权的“异化状态”是再合适不过了。难怪拉克劳与莫菲对首先以卢森堡为解构对象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解释：“很少有文本能像罗莎·卢森堡的文本这样，确认偶然性的特殊机制并认识到它的实际作用。”^② 卢森堡在思考工人阶级的联合与欧洲革命道路的时候，引入了一个为多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诋毁的概念——自发性。自发性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斗争场景：俄国沙皇极端的专制激起了多种多样的反抗，而这些反抗并不符合预定的革命规划，没有一项仅有部分要求的运动能够严格限制在本身的领域之内，它完全有可能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7.

^② *Ibid.*, p. 11.

被改造为反抗的典型或象征，从而激起、引发其他的运动，它超出了任何政治或工联主义领导人的控制和组织能力的范围。

这种自发性概念深深吸引了拉克劳与莫菲，对他们来说，这种自发性概念蕴含的是偶然性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必然分裂的，只有通过革命过程才能把它的统一体重新建构出来，可是，革命重新组织的这种形式，是由特殊的机制构成的，它与机械主义的说明没有丝毫关系。^①在此，拉克劳与莫菲关注的不仅是斗争形式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多样化形式的统一机制是如何达成的。他们的解释是：每一孤立的斗争的真正意义是漂浮不定的能指，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它常常超出它表面的意义，不同主体的各种斗争，作为一个个意义不完全固定的能指，滑动着、飘摆着、游弋着、绵延着，在一个偶然的遇合之际，它们受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而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统一体。实际上，它就是拉克劳与莫菲在该书的后半部分用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接合”这一措辞所表达的东西！他们不仅调用了“多元决定”，还运用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果——“所指溢出能指”（the overflowing of the signifier by the signified）。他们分明在远远超出葛兰西的霸权的意义上以新的理论姿态解读一位英勇不屈的女革命家。

卢森堡达到了拉克劳与莫菲所阐发的这种状态了吗？当然没有！因为卢森堡既然不是20世纪初的修正主义者（她曾激烈地批判伯恩斯坦），她就更不是一位20世纪初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卢森堡敏锐地感受到了自发性所可能具有的建构统一的独特意义，但是，她只把这种统一理解为阶级统一，因为在她的视野中，每一主体都是阶级主体，既然一切笼罩于阶级性之下，而阶级又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所以真正的阶级统一性是由“历史必然性”担保的。卢森堡不仅求助于必然性将俄国工人与德国工人的差别最小化，而且也用这种必然性将自发性所暗含的偶然性限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0.

制住，“自发性逻辑的这一革新作用看起来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①

按拉克劳与莫菲的看法，在卢森堡这里，必然性逻辑与偶然性逻辑彼此是完全外在的、僵硬对峙的，偶然性不能融进必然性，必然性也走入不了偶然性，它们分别站在对方的外面起纯粹的限制作用。“自发性逻辑是象征性逻辑，它恰恰是以瓦解字面的意义的方式起作用；必然性逻辑是字面上的逻辑，它通过固定的意义产生作用，这些固定的意义由于其必然性而建立起一种消除了任何偶然性变化的意义。”^② 基于这种分析，拉克劳与莫菲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论断：在卢森堡这里，存在着“双重空场”（a double void），偶然性逻辑本来是要填补因必然性退场而形成的空场，然而，必然性逻辑的退场是不退场的退场，它以“不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政治斗争的统一性根本不是由它造就的，但却武断地、丝毫没有商量余地的将一切归在它的名下，即便它没有像期待的那样起作用，但它的那一作用仍不受到质疑；如此一来，偶然性逻辑的作用受到不正当的挤压，又形成了一个空场，这就是说，该退场的东西还顽固地占据着形式的专断；本应该堂堂正正出场的东西却没有真正的合法地位，这双重空场的效果是：每一种都晦暗不明，好像根本没有空场。使空场不可明见，并不等于没有空场，更不意味着消除了空场，这是一种危险的状态！

虽然卢森堡那里依然存在着“僵化的教条”，但是，她毕竟发出了关于偶然性逻辑的第一声惊呼，无意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处的一个断裂显示出来。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比大多数与她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严峻地对待这个问题。自发性概念暗含的丰富意义被必然规律遮蔽了、限制了，但是拉克劳与莫菲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对此，斯图亚特·西姆评价道：“这一概念形成了他们的‘激进民主政治’的某种模型；区别在于：拉克劳与莫菲看到没有必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加工它，或者一种设想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为这种自发性所必需。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倾向性在如下意义上是明显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

^② *Ibid.*, p. 12.

的连接被割断，而使霸权以一种自由无羁的方式运作为目标，在此一方式下，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之其上的那种强制。然而，漂浮不定的能指不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想要的，因为他们再一次使那丧失控制力的幽灵复活。”^①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拉克劳与莫菲打破时间顺序把卢森堡单挑出来放在最前面，并非像他们说的是一个随意的开端。他们这样安排有三种考虑：其一，卢森堡通过自发性概念天才地触碰到了霸权逻辑，尽管这一逻辑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但它毕竟是卢森堡思想天空中闪电般骤亮的一瞬；其二，自发性的确认及其人为限制，形成了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它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以鲜明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三，在卢森堡那里，必然性的限制作用还在另一个方向发挥作用：即理论功能的“异化”，它不是合理解释破碎与分散的显著倾向，而是极力确证这一现象的暂时性。在第一、第二个方面，她与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有明显的区别；而第三个方面，则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共同的趋向。

第二节 考茨基：三重简单性与零度

偶然性的介入，意味着必然性链条的脱裂。可是，历史必然性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起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沿着同质化方向变成二元对抗的格局，偶然性逻辑在“客观”地起作用，它正在啃蚀着基础观念的推理外表，但是偶然性在理论中却没有正当的位置，这是一个矛盾。拉克劳在一次访谈中说：“自马克思主义的前史，也就是从黑格尔思想以来，这一矛盾一直存在着。一方面，黑格尔主义将否定性作为所有同一性的构成因素——任何同一性都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其自身；另一方面，这一否定性的运动并不包括任何偶然性，因为它在理性体系中找到了最终的同一性。这一双重的特征传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伴随着自身所有的矛盾及其内在可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p. 14 - 15.

能性。”^①拉克劳与莫菲所以不厌其烦地深入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是为了揭示偶然性的“在”的历史，偶然性的“在”的方式，“在”一直存在着，然而它被遮蔽了，甚至被遗忘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娜·史密斯把拉克劳与莫菲的谱系学称之为后现代的“在”的谱系学。

必须强调的是，拉克劳与莫菲的谱系学分析并不仅仅在于为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出场提供历史的情景性，它本身是一个后现性的解构策略，它在寻找断点、裂缝，它在捕捉一个个症候、一种种掩饰的“最体面的方式”。他们从卢森堡那里发现了双重空场，但这还不够，他们试图把偶然性起作用的各种“怪相”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公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便摧毁以普通理性主义重构主体的统一性的虚假观念。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破碎的镜子的多种多样复杂的折射”的含义。^②

必然性之镜已经破碎，可是，考茨基却一本正经、郑重其事地向人们抛撒着完整镜子的宣传画！为了达到一种修辞学效果，拉克劳与莫菲耍了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法，他们让人们先看看考茨基的典型文本《阶级斗争》（1892）提供了一个怎样统一完好的外观。但是，拉克劳与莫菲的手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和认可的，就像兰德利和麦克莱恩对拉克劳与莫菲深入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满一样，米歇尔·巴丽特作为一名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对拉克劳与莫菲选取考茨基感到大惑不解：“有人会问，如果你希望以一种五彩组合理论作为终结，为什么挑选考茨基作为起点呢？”^③不过，对于拉克劳与莫菲的解构策略，乔纳森·迪斯金和布莱尔·桑德勒倒是体悟到个中三昧：“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构描绘了一系列愈来愈复杂的话语策略，这些话语策略把内在空间（在其中经济运动规律按必然性逻辑运作）与外在的偶然性领域连接起来，以构造出社会空间和社会总体的统一性。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制造出对出乎意料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New York, p. 205, p. 13.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

③ Slavoj Zizek (ed.):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 p. 246.

的、复杂的、偶然的政治与经济事态的种种解释，它们之中很多与‘经典的’历史阶段有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并且在经济规律、政治和身份之间有假定的对应关系。而如此策略的第一种便是考茨基的简单性，它假定理论与历史之间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也就根除了任何外在因素的空间。”^①

按拉克劳与莫菲的剖析，考茨基的这一“幼稚的”文本有三重的简单性：第一，考茨基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对抗的日益简单化的理论，即它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关结构性差异最大程度地简单化了；第二，它通过归之于一个单一意义——将它理解为总体内部一个确定的位置——而把各种不同的结构固定化，这使得考茨基陷入完全的经济主义和还原论，从而把每一社会对抗和构成因素的意义按照固定的结构程式加以浓缩简化；其三，这一理论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介入，以澄清历史的基本意义，而是把自身表现为摆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见的透明经验的系统化和普遍化。三重简单性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必然性逻辑没有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工人阶级已构成了自身的统一性，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不曾动摇、也不可动摇，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危机！因此，《阶级斗争》是一部“前危机”（pre-crisis）作品，即是说，在其中危机处于零度（degree zero）。

拉克劳与莫菲指出，考茨基 1892 年的文本局限于一个短暂时期德国工人的局部经验，1873 年至 1896 年大萧条过后，即便在德国，这一典型也失去了典范意义，比考茨基的描述更加普遍的情形倒是：工人阶级的离心倾向，工会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复杂性，社会不透明性的增强，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各种主体立场的分裂，等等。这样，考茨基对社会结构所作的过于简单的系统化与日益复杂的分裂的经验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特别突出地呈现出来，也使政治危机伴随理论危机而加倍扩大。分析到这个地方，拉克劳与莫菲说：“1896 年，托马斯·马萨利科（Thomas Masaryk）制造了一个很快就流传

^① Essentialism and the Economy in the Post-Marxist Imaginary: Reopening the Sutures,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6, No. 3 (Fall 1993), p. 31.

开来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危机’。”^①

从危机的“零度”突然跌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就是拉克劳与莫菲想要的反讽式修辞效果！也是他们最想表达的意思——在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其实已陷入严重的危机：表面的零度正是深度危机的最危险的征候！饶有兴味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在论述卢森堡的两难困境时，霸权概念出现了两次，而在论述考茨基的零度危机时，霸权概念一次也没出现，这分明是暗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不存在任何裂隙的情形之下，不会有霸权存在的空间。在《阶级斗争》之中霸权是零度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的早期作品中，他们致力于批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自己限定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而如今，他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问题，这清楚地反映出他们思想的变化和立场的转移。拉克劳在80年代后期的一篇论文《霸权与政治》中甚至说：“保罗·赫斯特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开始于1848年，这个观点，我大体上是赞成的。”^②即是说，他们由解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最后发展到直接批判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其实，这也正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上半部分的解构路线。

第三节 对“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19世纪末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不是一个暂时的危机，“在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最终失去了它的清白”。^③对于这一危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派别都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论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危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8.

^② Ernesto Laclau: *Hegemony and Politics*, in *Post-Marxism and the Middle East*, Saqi Books, 1997, p. 200.

^③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8.

机的三种不同反应，这些反应都是对偶然性介入所作出的理论姿态。

第一种反应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正统派理论家看到了工人的分裂倾向和工人阶级不同主体立场的现实存在，也看到了工人阶级不追随社会主义方向的例子，但是他们把这些现象当作是暂时的、表面的、甚至是虚幻的，它们最终会被经济基础运动的铁的规律所克服。虽然理论与实践出现了分离，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体系最终担保了无产阶级未来革命的重建和社会主义的到来。面对大量分裂的经验控制，面对当前政治实践的阻滞，正统派固守经典理论的纯洁性，他们基于这样的认识策略：“由于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知道根本上被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对实际事件的理解只能意味着把它当成已经先验地被决定了的现实演化过程的一个因素。”^① 既然一切都由必然规律决定，那么工人阶级的消极无为也就不足为忧；既然有科学的理论作担保，工人阶级的孤立也构成不了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因为历史的发展将证明，资产阶级的一切伎俩和诡计最终都是无能为力的。

拉克劳与莫菲断言，在正统派的话语中，存在着如此的吊诡：一方面，由于阶级的“当前意识”与“历史任务”之间的裂缝的加深只能通过政治介入来外在地弥补，它的作用增大；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支撑政治介入的理论被视为是一种必然的、机械决定的意识，它的分析就变得越发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历史力量的构成就依赖于理论媒介，而这一媒介反过来却抹去了偶然性的作用，这样政治介入的作用又被最小化了。拉克劳与莫菲的这一分析具有很强的讽刺意义：一种声称表达了历史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它在最大程度抬高自己表达社会意义的准确度的同时又把自己降到了最低点，因为，既然一切都由必然性规定了，那么，作为这一必然性的传声筒的理论对现实的政治实践也就是外在性的了。但是，如果“理论”根本没有表达必然性，或者说就没有那样的必然性，那么，声称表达了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反而起一种偶然性的作用，这恰恰是危险所在！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21.

我们人类需要真理，需要信仰，但是，我们在倾听“真理”的时候，在接受“信仰”的时候，又面临着高度的危险！

正统派处于一种悖论状态，它把必然性作为支配一切的原则，从而把偶然性几乎降到了零度，但他们本身作为知识分子，又最急迫地希望介入和干预，正如拉克劳与莫菲指出的，正统派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一方面是‘必然性逻辑’，在政治实践中根本没有作用；一方面是‘偶然性逻辑’，由于不能确定其特性而不能使之理论化。”^①

第二种反应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中，正统派以维护理论的纯洁性牺牲了政治实践的主动性，修正主义则采取了相反的线路：它把偶然性的政治介入放在比坚持必然规律的机械决定更优先的地位上。在伯恩斯坦那里，偶然的政治行动不再被认为是附属的因素，而被看作是构成了克服碎片化的力量。“从经济基础那里脱离出来政治自主性，是伯恩斯坦论证的新颖之处，事实上，在伯恩斯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批判的背后，都存在着想要在特定领域恢复政治主动精神的企图，修正主义在它处于最好状态的时候，代表了要同工人阶级在组织上的孤立这一点决裂的真正努力。”^② 在正统派的方案中，经济基础只担保分裂倾向的最终统一，而放任其现实的零散与破碎，而在修正主义这里，却让与经济基础的决定相对立的政治自主性扮演重新组织与统一的角色。

伯恩斯坦认为党（社会民主党）是政治统一的主要根源，但是，党不仅仅是工人的党，而必须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党，党通过阶级斗争的组织而将工人统一在一起，显然，在这里，政治联合成为必要，政治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但是，伯恩斯坦论证的模糊之处也存在着：如果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越发分化，而其统一却在政治层面达成，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统一是阶级统一呢？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在伯恩斯坦那里，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政治的统一只有通过克服不同派系工人的阶级限制方能建立起来，因此这应该是经济的主体性与政治的主体性之间永远的结构性的裂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25.

^② *Ibid.*, p. 30.

痕，然而，这是伯恩施坦从来没有在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① 他们认为，伯恩施坦之所以没有达到这一结论，是由于他把这种政治统一构想为各个组成部分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各个组成部分接受工人的观点并把工人阶级认作领导阶级，即这种统一仍带有严格的阶级性。

在此，拉克劳与莫菲又一次引入了他们自己的霸权观念作为分析的比照。在他们看来，虽然伯恩施坦注重政治介入的力量，主张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社会主义斗争，但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怀疑，它的阶级性也严格地保持着。由于伯恩施坦反对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论，这使他不可能遵循考茨基的论证线路，但是，工人阶级的优点又是“不可取消的成就”，这一成就来自何处？论证的线索好像迷失了，因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统一的阶级性质既不是在政治领域也不是在经济领域中产生的，因此，论证仍悬浮在空中”^②。按照拉克劳与莫菲的看法，如果伯恩施坦因为找不到这个东西，而干脆把它放弃、把它取消，并因此把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化解掉，那么伯恩施坦就可以达到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理论视点上了，但是，这个伯恩施坦偏偏没有这样做！

恰恰是在这个关捩点上，伯恩施坦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论证形式：他诉诸康德的伦理学，将普遍的善的观念作为历史前进的潜在动力。工人阶级的优越性因它的伦理理想而获得解释，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因构成两者共同基础的进化规律而获得保证。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尽管进化规律与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规律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两者的情况中，它们都被当成是把每一事件的意义先验地固定下来的总体化环境，因而，虽然事实上是把它们从正统派的观念的本质主义关联中解放出来了，不过后来，它们还是在与任何机械论的决定没有任何联系的一般进步理论中被重新统一起来”^③。伯恩施坦与那种把阶级看作是先验主体的机械的客观主义告别了，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32.

② Ibid., p. 33.

③ Ibid., p. 34.

但这一告别是以先验伦理主体的替换作用完成的，他以一种先验主体代替另一种先验主体，伯恩施坦并没有走出决定论的怪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才说，“从这里不可能走向接合与霸权理论”。^①

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澄清了拉克劳与莫菲两人的后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界线。我们知道，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他的许多著述中反复表达这样的看法：爱德华·伯恩施坦是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说：“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中所相信的东西正好也是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所相信的东西。”^② 如果从他们都拒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来看，詹姆逊的结论无疑是有根据的。但是，詹姆逊的论断既笼统又缺乏严密性，因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所相信的东西中，也有拉克劳与莫菲不相信的；而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所相信的东西中，也有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涉及的东西。我们不能把所有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结论与原则的人都认定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在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一种当代思潮，它有特定的理论逻辑和独具的思想风格，决不能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巨大的招牌，不管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不作区分地挂靠在它的名下，这不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

拉克劳与莫菲对于伯恩施坦有两个基本认定：一是，在伯恩施坦那里，偶然性逻辑得到较大的活动空间，这使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某种变化的条件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前提及其策略问题，这一点构成了他与正统派的显著区别；二是，伯恩施坦并没有走出决定论的逻辑阴影，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主义的机械决定，但是，康德式的伦理理想的历史目的论与渐进主义的观念重新把他带到先验决定论的沼泽地中。拉克劳与莫菲甚至说，伯恩施坦“没有批评正统所提出的典型的历史因果关系，而只是企图去创造一个主体在历史中可能自由活动的空间。由于接受了正统的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34.

^② 宁跃：《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第12页。

客观同一性和机械因果关系，他只是尝试限制它的作用”^①，这样一来，打破阶级限制的不稳定接合，穿越不同主体立场的偶然性霸权统一，在伯恩施坦那里就是不可能达到的结论。这表明，伯恩施坦离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还十分遥远。

第三种反应是索列尔的革命辛迪加主义。索列尔与伯恩施坦一样，不相信必然的经济规律能建构阶级的统一性，但是，他没有像伯恩施坦那样诉之于伦理进化，即试图以伦理主体性置换机械的客观主义。索列尔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代理人的形成的理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它也是统一无产阶级并给它的斗争一个方向感的意识形态。在索列尔看来，一个阶级的形构塑造了社会形态，但阶级凝聚力并不发源于基础结构之中，它是阶级本身活动的产物，是冲突与斗争的结果。索列尔深受尼采唯意志主义与伯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他把阶级的统一性建立在斗争意志上，建立在与对立集团的根本分裂与激烈冲突之中。“对索列尔来说，‘战斗’变成工人阶级一致性的条件，与资产阶级寻求共同的领域只能导致工人阶级的软弱。”^②毋庸置疑，索列尔将统一性的达成移向了政治层面，而且政治在它的直接实现中失去了静态与和谐，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力场。在这样的视野下，必然性链条不仅是开裂了，而根本就是完全破碎的。在一个没有基础支撑的破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必须由总罢工来激发并造就出来。索列尔认为，总罢工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它的历史作用在于作为一种神话给工人阶级的统一提供控制原则和凝聚点。索列尔对总罢工神话的迷恋，甚至使他达到这样的程度：无论以什么为代价，哪怕牺牲民主，只要能通过总罢工锻造工人阶级的统一，都是值得付诸一行的。

在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中，再没有哪一个能像索列尔那样有如此深沉的破碎感，他把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沿着建构主义的方向进一步发挥了。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33.

^② Ibid., p. 39.

“索列尔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非但没有朝向马克思所预见的方向行进，而是相反地产生了一个不断增加的社会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会容纳任何‘普遍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出现。按索列尔之见，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必须通过人为手段来维持的原因：总罢工的神话，作为它的主要功能，保护了工人阶级的独立身份。”^① 拉克劳的这一评论，既揭示了索列尔思想中偶然性逻辑张显的动因，同时也道出了索列尔的局限性——通过罢工神话而建构的主体仍然是阶级主体。但这并不是说，主体的阶级性是决定论的和还原主义的——这一点索列尔已通过一种激进主义的建构活动将其消除了，而是说，在索列尔这里，当意志的干预倾向于巩固无产阶级身份的孤立性时，偶然的接合作为一个原则被排除了。在索列尔那里，无产阶级作为行动者与反资产阶级颓废的这一任务之间的联系是非确定性的，并没有什么“基础”来先天决定无产阶级必然要履行这一任务，正因如此，才需总罢工神话的建构作用，问题是，这一非确定的关联却只有工人阶级作为候选对象被考虑进去，也许别的行动者、其他阶级、另外的规划，也能够抵制资产阶级的颓废、社会的衰退与文明的堕落。工人阶级并不必然反对资产阶级，但必然是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反对资产阶级，这就是索列尔的思想逻辑，他只在一个限定的主体上、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铸造该主体的统一性，他达到了片面的深刻，而在这一“片面”外部，偶然性接合的维度丧失了。

尽管索列尔宣扬暴力，轻视民主，但是，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他的评价相当之高，说他是第二国际最丰富的和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为什么呢？重要的原因在于，索列尔的“神话理论”以一种张扬总体性的表面形式潜伏着对基础主义的极端削弱，一如拉克劳所言：“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索列尔是确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并没有沿马克思所预示的方向行进；工人阶级参与到民主政治秩序中会导致它在这一秩序内的整合。第一个过程削弱了作为大写历史之基础的资本逻辑；通过显示工人阶

^①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52.

级的社会身份对于新关系体系（它由于这一阶级的政治参与所引发）的脆弱性，第二个过程也导致了相同的弱化作用。索列尔对这种弱化作用的回应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他提出一种暗含着彻底关系主义的神话理论，因为，只有暴力以及无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完全断裂才使这一阶级获得无产阶级的身份；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只有通过神话式的构造才呈现出结构一致性而言，索列尔完全拒绝大写历史的潜在合理性。”^①如果就与霸权逻辑的关系而论，应该看到，索列尔的总罢工神话内含了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社会现实本身是不确定的，它的任何统一性均以“集团”重组实践为转移；二是，每一社会代理人的认同是非决定的，每一主体的认同的固定依赖于具体的斗争。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第四节 在遮蔽与解蔽之间：“迂回表达”

从对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中，拉克劳与莫菲刻意向我们展示出偶然性逻辑如何在有意无意的抑制和挤压之下露出它弯弯曲曲的萌芽。三种不同的反应表现了偶然性的逐渐扩张，但是偶然性逻辑仍然受到程度不同的外在限制，因此，它仅仅以必然性逻辑之增补的形式出现。三种反应的共同困境是：“经济基础现在不能保证阶级的统一，而政治可以作为构成统一的唯一领域，但这一领域却不能令人满意地保证统一主体的阶级性质。”^②不管阶级的统一是由理论的科学性来担保，还是诉之于伦理决定，抑或是求助于意志的干预，基础结构的软弱无力总是尴尬地表现出来。

探察这三种反应，就是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谱系学”分析，整个过程让人感到沉闷、压抑，因为拉克劳与莫菲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断层、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al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in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edited by Andrew Ros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5.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36.

褶皱、裂缝、脱落，而阶级统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本来就是对破碎化经验控制与分散的立场的消极回应。必然性的链条脱裂了，偶然性的作用得不到理论化，即使阶级统一达成了，阶级性也得不到合理说明，这一切使人感到“危机”已经陷得很深。这确实像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概念的谱系学“不会一开始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暗示一个不在场的总体，并暗示重新组合及重新接合的种种不同尝试，这些重新组合与重新接合在克服原本的不在场当中，有可能赋予斗争一种意义，并使历史力量有可能具有充分的肯定性”。^① 一个不在场的总体，人们或者以为它还在场，或者以别的总体代替它出场，因此，“不在”的是这一总体，“在”的是这一总体的逻辑，只要这一逻辑的幽灵不散，界定新型关系的霸权概念就不会出现，所以，偶然性逻辑在这种情景下只能以受损害的面目出现，它去填补空场，然而它得不到合理的命名，或者它辛苦取得成绩却不能记在自己的名下。

但是，这一“沉默的考古”并不是真正没有“言说”，它在无声地讲述，无声地诉说。正如拉克劳与莫菲指出的：“正是在历史必然性这一破碎的镜子的多种多样的复杂折射中，社会的新逻辑开始迂回地表达自己 (insinuate itself)，这一新逻辑将设法通过质疑与其相连接的那一术语的真实性思考它自身。”^② 新的逻辑，即偶然性逻辑，它在种种抑制下面迂回曲折地表现自己！其实，只要我们明白，拉克劳与莫菲此时是站在超出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立场上，反过来测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偶然性的“渐进史”，从而为自己的新霸权概念的出场确定根本的逻辑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体悟到，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在“迂回表达”他们对新霸权概念的理解。

在“考古”勘探中，拉克劳与莫菲一次次“迂回” (insinuate) 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卢森堡不用历史的必然规律去限制自发性，让自发性的意义充分展示，从而多元主体在斗争中建构起一种超出了阶级限制的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7.

^② *Ibid.*, p. 8.

统一体，那么，“新型的、彻底穿透社会与经济结构范畴的政治主体性就会出现”；^① 在伯恩施坦那里，“假如工人不再只是无产者，而且也是公民、消费者、国家文化和制度机构内部多元立场的分享者，再假如，所有这些立场不再被‘进步规律’统一起来，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成为一种开放的接合，这种接合不提供既定形式的先验担保。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矛盾的和相互中立的主体立场将会形成”^②。而在索列尔的理论设计中，如果不是用总罢工的神话来巩固无产阶级的孤立身份，如果他不拒绝民主，而是引入政治中介，使超阶级的“混合体”在各种政治活动之中动态地达成统一性，那么，索列尔就最有条件达到霸权接合的境地。

这些“如果”、“假如”所描绘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拉克劳与莫菲新霸权概念的理论蕴含所在。通过谱系学的分析，拉克劳与莫菲进一步确证：新霸权概念不能建立在任何形式的“在场形而上学”之上，它不仅要同一切形式的经济主义、一切形式的还原论告别，而且它必须同本质主义彻底划清界线。这充分表明，拉克劳与莫菲开篇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并不是单单为了下文引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提供一种思想背景，它更多地是一种独特的“解构运作”——此一运作的效果就是为了展示霸权逻辑的“潜在”方式。理解这一点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将《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关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与莫菲早期论文《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对第二国际的论述作一比较阅读。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写于1977年）一文中^③，莫菲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用墨不多（仅仅作为一小节，且整个篇幅尚不及《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其中一个人物的论述），因此，单从数量的角度，把《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第一章看作是对该文这一节的扩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仔细比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

② Ibid., p. 36.

③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Chantal Mouffe (ed.),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pp. 168 - 204.

较两者的内容，就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一文对第二国际的论述纯粹是作为论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思想背景而设置的——即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和还原论构成了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问题性，仅此而已！在此，我们既看不到第二国际话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看不到许多言说的“异质性和矛盾性”^①，更遑论所谓偶然性逻辑与必然性逻辑的纠葛。当然，这并不是说《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完全没有背景预设的意义，毕竟，《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在文理脉络上是按霸权的“潜伏”——霸权的“浮出”——霸权的新“超越”——霸权的“政治”这样一个路数布展开来的。但是，不容疏忽是，之所以第二国际被作为霸权的“潜伏期”，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举证，其本身是解构运作的结果。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导论的末尾，拉克劳与莫菲严厉指责斯大林时代以及后斯大林时期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同质化理解和贫乏的大一统印象属于“斯大林主义的幻觉”（Stalinist imaginary），这种表面的“马列主义”形象无非是“反马克思主义”（anti-Marxism）形式的当代重现。^②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教条式“维护”已经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最大亵渎，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从蒙难状态解脱出来，必须诉诸解构实践。就此看来，拉克劳与莫菲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多样性的重新发现根本关涉到他们所秉持的基本立场：如果捍卫“光荣的、同质的、无懈可击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无异于“反马克思主义”，而如果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加以解构式处理（有些要保留，有些要改变，有些则要废弃）^③，并把它们融入当代种种新式解放话语之中，使之与适合于新的激进政治诉求与文化氛围，它能够成为新左派政治分析的参照点。所以，《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开篇对第二国际马克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4.

② Ibid., p. 4.

③ Ibid., p. 5.

思主义的“处置”方式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在长期以来被斯大林主义版本的“马列主义”和现代反马克思主义专家极尽贬损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序列中，那些通常被宣判为偏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且通常也被它的发现者有意无意加以掩饰、修补或涂抹的东西，竟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原初冲动与萌芽！于是，解构就担当起让不可见的“霸权”从隐形到现身的重任。但是，这俨然是一种沉重的担负和奇异的现身，毕竟，那原初的萌动早已被历史的厚土所深埋，并且在它当初将要萌生之际就由于不幸变故而被抑制，因此，解构不仅是“考古”发掘，也是一种复元、拯救和激活。质言之，拉克劳与莫菲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同时蕴含着建构维度，或者说它一开始就有由建构所统率的有限解构策略。一如斯图亚特·西姆所言：“拉克劳与莫菲深入分析了霸权概念的谱系，使它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飘忽不定，然后为了他们自己激进的目的对之进行再阐发，从霸权已被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调动并利用的方式上，这两方面颇具共谋意味。”^①

霸权并没有真正“出场”，但其运作逻辑业已若隐若显；霸权尚处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平线之外，然而它已把自己的光束折射成微微晨曦。也许是出于太过急切的期望，也许是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哀惋，在一开篇沉郁消极的解构之中，拉克劳与莫菲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理论资源，将他们新发现的各种招术倾而用之，似乎只有这样，解构才有望招回迷失已久的批判良心，才有可能重新释放激进解放的潜能，才能在麻木甚至僵硬的左翼政治肌体上找到重生的希望！因此，霸权的隐形出场竟演变成了解构主义操作的前置性的展示和密集爆发。就此而言，对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最好的阅读策略是一种颠倒式阅读：从后往前读。因为拉克劳与莫菲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霸权逻辑的虚拟式刻划，是带着后马克思主义眼光的“事后”的回望，是他们超越葛兰西之后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的角度评定霸权概念“浮出”的历史际遇和语境条件，是借用第二国际的理论话语空间来迂回表达他们自己对超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p. 14 - 15.

出葛兰西意义上的新霸权概念的设计的初步构想，是他们在该书后半部分对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全面建构的强劲势量的回流倒旋。对于拉克劳与莫菲的“迂回表达”，我们最好的对策就是“颠倒阅读”，也许这种“逆读”能够使人们不至于像兰德利和麦克莱恩那样一开始就产生严重的误解，也不至于使人一经进入就满腹孤疑，或者一头雾水，甚至因此打消了读下去的念头！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想读懂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谛的人来说，拉克劳与莫菲本人馈赠的“入场券”又不能不收，这个难入之“门”又不能不进。在这个入口处，暗藏了一些机巧，拉克劳与莫菲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精要预先“撒播”在了这里。

第五章 自发性及其后马克思主义诠释

第一节 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及其政治意义

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领袖，她因最猛烈地抨击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而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典范。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把罗莎·卢森堡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杰出的激进派斗士。她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仰，她激扬飞越的革命热情，她坚贞不渝的斗争意志，她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献身精神，使她无愧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愧于“革命之鹰”的光荣称号。然而，令人寒心的是，罗莎·卢森堡被右派残酷地杀害，却遭到左派最无情的批判。20世纪20年代，德国共产党的激进分子费舍尔（Ruth Fischer）把“卢森堡主义”比作“梅毒病菌”。1931年，斯大林为了从理论上彻底肃清托洛茨基的余毒，竟宣称罗莎·卢森堡要为“不断革命论”负责。好像在理论上，不谈论罗莎·卢森堡的错误就算高抬贵手了，她哪里还有什么理论上的原创性！就像科拉柯夫斯基所说：“罗莎·卢森堡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卓越点并没有引起重视，它如同一纸空文，人们口头上颂扬她，人们记起她，只是

因为她是为革命献身的烈士。”^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罗莎·卢森堡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在理论上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卢卡奇受到罗莎·卢森堡很大的影响，他把罗莎·卢森堡的论著作为他阐发阶级意识及总体性观念的蓝本。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左派在寻求苏联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模式时，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发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②而罗莎·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更是受到晚近以来西方左翼学者们的青睐，他们认为罗莎·卢森堡不仅首创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更令人惊奇的是，连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与莫菲也从罗莎·卢森堡那里借取理论资源，他们的成名之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就以解读卢森堡为开端。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仍然没有摆脱苏联官方评价的模式，仍然局限在列宁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的视域之内，这是导致我们对罗莎·卢森堡的学术探讨没有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

罗莎·卢森堡受到苏联官方的批判，原因在于她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列宁不一致，在于她在一些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与列宁意见相左，其中最要害的问题是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诚如卢卡奇所言：“在纯粹理论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潮可以和平相处，它们的对立只是采取讨论的形式，讨论可以在同一个组织中进行，而不必把这个组织炸毁。但是只要这些同样的问题被赋以组织的形式，它们立刻就会变得尖锐对立起来，甚至彼此完全不能相容。”^③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就组织问题产生分歧，所以他们难免“尖锐对立”，甚至“完全不能相容”。不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对立”却不能仅仅局限在组织的层面上被思考。组织问题既不是抽象孤立的，更不是枝节性的、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它涉及

^①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II: The Golden 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7.

^② *Ibid.*, p. 82.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90页。

革命的最重要的实质问题，“如何组织革命党的问题只能从革命理论本身中有机地发展出来”。^① 所以，对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的合理解释必须到他们的革命理论本身中去寻找，必须到他们的革命理论的独特性中去寻找。

提到罗莎·卢森堡革命理论的独特向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她的自发性概念。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诺曼·杰拉斯说：“罗莎·卢森堡极其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大凡对她略有所知的人至少对此大抵都是了解的。”^② 科拉柯夫斯基则断言：“与党组织相对照的自发性问题是罗莎·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发生最激烈冲突的症结所在，罗莎·卢森堡发现同样的危险存在于所有国家的民主党分支中。在她看来，列宁、考茨基、饶勒斯和屠拉梯全都错误地低估了群众的自发性并想以‘领导’的教义去压制它，就此而言，在整个社会民主运动中，她是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③ 而戴维·麦克莱伦甚至认为：“罗莎·卢森堡革命观的核心是‘自发性’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在正统的共产党人使用中成了一个被滥用的术语。”^④ 我们且不论自发性概念是否构成罗莎·卢森堡的整个理论体系的轴心，只是多少有点保守地断定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自发性观念确实是卢森堡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的方面。故意将这一方面加以遮掩，或者出于好意竭诚将之淡化，或者虽承认它的存在却否认它与列宁思想有任何的差异，都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都无助于我们全面透视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观念的整体理论图景。

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反复阐述过自发性概念。即便是拒不承认罗莎·卢森堡有自发性理论的人也绝不能否认这一点。1893年，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5页。

② 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NLB, 1976, p. 111.

③ Les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II: The Golden 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82.

④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当时还在苏黎世大学求学的年仅22岁的罗莎·卢森堡已是波兰有较高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年8月，她为出席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而以《工人事业》编辑部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报告，由于这个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波兰社会党的革命策略，罗莎·卢森堡被取消了大会代表的资格。在报告中，罗莎·卢森堡批判波兰社会党的实际行动和策略表现出空想的、密谋的布朗基主义倾向，她指出，虽然这个党确信只要有一批坚决的、机警的和目标明确的密谋家，就能进行革命，但是它“曾经不得不多次支持群众中自发出现的、争取经济或政治目标的骚动，尽管这些是与它的整个活动的性质相矛盾”。^①虽说在这里罗莎·卢森堡只是附带地说到群众自发性而没有展开论述，但作为罗莎·卢森堡第一次提及群众自发运动的早期文献，它所包含的两个要点值得特别记取：第一，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最初就是作为对布朗基主义的抵制而提出的，它植根于罗莎·卢森堡的这样一个信念：无产阶级革命不会按照个别人物的意愿或一小部分人的策划或密谋而成功，它只能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所完成；第二，在这个报告中，罗莎·卢森堡并没有把自发性与建立党的组织相“对立”，相反，她强调，社会民主党人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要为斗争“制定统一的计划，提供一个组织，并努力使这一斗争具有明确的目标”，为了斗争的顺利进行和取得积极成果，“社会民主党必须创立相应的组织”。^②

10年之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7月）中，罗莎·卢森堡在批评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所确立的“极端集中主义”原则时，明确阐述了一种“行为在先”的自发性观念：“一般来说，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③弗雷德·厄斯纳断定，在这篇文章

① 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同上书，第507页。

中，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①这篇文章由于直接而尖锐地指摘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②而遭到列宁和斯大林最为严厉的批评。列宁反驳说，罗莎·卢森堡不仅歪曲了他的意思，也真正歪曲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她无疑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卑劣化了”，而斯大林更为强烈地谴责罗莎·卢森堡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卑污的市俗的诬蔑”。^③这篇文章首开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思想差异之先河，同时也引发了此后几十年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自发性理论众口一词的垢骂。

罗莎·卢森堡关于自发性概念的最集中、最全面、最深入的论述当推1906年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弗雷德·厄斯纳尽管对自发性概念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可他不得不承认，罗莎·卢森堡在这本小册里“用非常细致的笔调来形容个别罢工运动的自发性质”。^④从罗莎·卢森堡为该书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可以径直地了解到，这本不厚的小册子实际上承载着宏大的理论抱负，“总罢工的问题渐渐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思想生活与兴趣的中心……这个问题像一个焦点集中了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所有争论的问题”^⑤，而这个焦点问题之焦点，所有争论问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莫过于自发性问题。在该书中，罗莎·卢森堡系统地阐述了群众革命运动的自发性的多层关系：它与客观历史规律的关系，它与群众革命意识的关系，它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它与工会组织的关系，它与人为的计划之间的关系，它与偶发性的事件之间关系，等等。可以说，《群众罢工、党和工会》是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概念的理论内涵与特征作出总体勾画的典范之作。

值得玩味的是，在这本最集中论述自发性观念的著作中，罗莎·卢森

① 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20页。

② 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4页。

③ 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22页。

④ 同上书，第33页。

⑤ 叶夫罗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汪秋珊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堡没有批评列宁，而列宁也从未批判过罗莎·卢森堡的这本书，不仅如此，列宁还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说它是罗莎·卢森堡用德文撰写的结合西欧运动发展的特点阐释群众性罢工的一篇最优秀的著作。^① 诺曼·杰拉斯正是以这一点为基础，进一步得出一个更为大胆的推论，他说，列宁从来就没有明确地批判过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他还指证说，列宁在1922年所写的《政论札记》中列举了卢森堡的一系列错误：“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② 但是，列宁唯独没有提到卢森堡1906年在自发论上存在什么“系统性的错误”。^③

这当然是诺曼·杰拉斯出于可以理解的善意，诚心为了维护罗莎·卢森堡而作出的一项可贵的学术努力，然而，他要真正令人信服地证实在自发性问题上列宁完全同意罗莎·卢森堡，仅仅说没有见到列宁对自发性概念的直接批评肯定不够，他还应当进一步举出列宁明确赞成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实例。这一点，诺曼·杰拉斯恐怕无能为力。更棘手的问题是，诺曼·杰拉斯又如何解释列宁当年交给《新时代》杂志的那篇激烈批判罗莎·卢森堡的文章？^④ 如果他辩驳说，列宁的批评只限于组织问题而与自发性概念全无干系，那么，他必须证明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观念的阐发与社会民党的组织问题根本没有一点瓜葛，而这一点，诺曼·杰拉斯更是做不到。

二

同样是为罗莎·卢森堡辩护，保罗·弗勒利希表现得与诺曼·杰拉斯

① 叶夫罗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汪秋珊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3页。

③ 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NLB, 1976, pp. 130 - 131.

④ 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21页。

大不一样，他不是想方设法抹去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差异，而是径直否认罗莎·卢森堡曾经有过自发性理论。他愤怒地指出，“宣称罗莎·卢森堡创造了自发性理论并使她成为神秘主义甚至是自发性方法论的牺牲品”^①，乃是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有意歪曲，他考证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任主席季诺维也夫是第一个作出这种宣称的人，季氏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提高苏共在第三国际中的地位，其他人不断重复季氏的论点以至于它竟成为政治的、历史的原则。然而，十分有趣的是，保罗·弗勒利希在证明罗莎·卢森堡没有自发性理论时引用罗莎·卢森堡的短短的一段话中，“自发的”（spontaneous）一词就出现了两次。^② 尽管保罗·弗勒利希声称自发性理论是一些小人“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构制的一个神话”^③，但是，他不得不承认罗莎·卢森堡论述过自发性概念！他自己也说：“按照罗莎·卢森堡的界定，运动的自发性并不排除有意识的领导，相反，它需要领导。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被她的批评者归之于她并且被定为宿命论的自发性根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④ 为什么保罗·弗勒利希承认罗莎·卢森堡“界定”并阐述过自发性概念却矢口否认她有自发性理论呢？是因为自发性在罗莎·卢森堡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属性概念？还是因为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阐述十分单薄，其概念化程度尚未达至一定的宽度和深度？都不是。

为了说明罗莎·卢森堡不可能会有自发性理论，保罗·弗勒利希在其所写的评传中，特意援引了1900年7月13日罗莎·卢森堡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的一个著名片段，在这个极为精彩的文段中，罗莎·卢森堡描写了她观看大海和莱茵瀑布时的强烈感受。她说，面对永恒的大海，最撼人心魄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复存在。而在瑞士观看莱茵瀑布的时候，她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那一秒也不停、夜以继日、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咆哮，给了她一种灵与肉均遭毁灭的恐怖感：

① Paul Frélich: *Rosa Luxemburg: Ideas in Action*, Pluto Press, 1972, p. 140.

② Ibid., p. 142.

③ Ibid., p. 144.

④ Ibid., p. 143.

甚至现在，每当我路过那里，每当我从车窗里看到那可怕的景象，那飞迸四溅的水珠，那翻卷滚动的白色水帘，每当我听到那震耳欲聋的咆哮，我的心脏就像是窒息了那样。我的心里就发出一个声音：那就是敌人。你感到惊奇吗？那肯定是敌人——人类的虚荣心，正是这种虚荣心把人类自己想象得非同一般，可是突然之间，它就分崩瓦解，变得什么也不是了。顺便说一句，哲学中也有类似的效果。对于世间发生的万事万物，本·阿巴奇说过，“此万古皆然矣”，“船到桥头自然直”，等等，在这种观念之下，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似乎都是多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类哲学，并且坚持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随波逐流，也不愿意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看着瀑布奔流而下的缘故。瀑布的奔涌，自我们远古的祖先那里就开始了，在我们死后还会继续下去。^①

保罗·弗勒利希说，罗莎·卢森堡宁肯跳到莱茵瀑布中去，也不愿意放弃对历史进程的干预，这表明这位女革命家不会赞同那种认为历史有其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命定的”自然进程的哲学学说，这也就证明了罗莎·卢森堡不可能有所谓的自发性理论。从保罗·弗勒利希的这一论证过程可以领会出，他所说的自发性理论无非是一种否认任何意志的介入行为而只承认客观历史进程的宿命论。自发性理论之所以是“理论”，不仅在于它以一种客观主义的历史哲学为根基，而且它被“发现”具有极为丰富的政治蕴含：“否认或者至少降低了党对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对群众的无批判的盲目崇拜，过高估计了非人格的、客观的发展因素，不承认或者说低估了有意识的、有组织的行动的重要性。”^② 既然在保罗·弗勒利希心目中罗莎·卢森堡是一位激进的政治行动主义者，是一位具有理论天才的革命家，他当然不会同意将如此机械的、宿命论的客观主义归在罗莎·卢森堡名下，更不能接受把如此严重的政治罪责强加在罗莎·卢森堡身

^① Paul Frölich: *Rosa Luxemburg: Ideas in Action*, Pluto Press, 1972, p. 141.

^② Ibid.

上。可见，保罗·弗勒利希之所以矢口否认罗莎·卢森堡会有自发性理论，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如此糟糕的“理论”完全是别人恶意“附加”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上的。

然而，保罗·弗勒利希一杆子推完了事的做法未免过于简单。他只想到“自发性理论”这么糟糕，罗莎·卢森堡根本不会有，却没想到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根本没有这么糟糕！就此而言，保罗·弗勒利希对罗莎·卢森堡的辩护仍然是消极的。从表面上，他与诺曼·杰拉斯似乎背道而驰：一个想确立自发性理论，一个要拒斥自发性理论。但是，在一定意义，他们却具有潜在的相通之处：苏联官方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观念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他们具有潜在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一个不敢承认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差异；一个丧失了构想罗莎·卢森堡本人的自发性理论的能力。

不过，只要想到保罗·弗勒利希的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我们也就不会苛求于他了。毕竟，在那个时代，有太多的人认定自发性理论只能这样来描述。造成这一状况并非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一些理论家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与她的主要经济著作《资本积累》所主张的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联系起来，把自发性概念与罗莎·卢森堡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强调与坚信联系起来，从而把自发性中本来蕴含的客观性特征强化到一种无以复加的极端地步。“宿命论的客观主义”解读模式的问题性在于它将自发性与必然性直接等同起来，而且这种必然性被界定为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绝缘的坚硬必然性（hard necessity），即是说，它先行将历史主体的全部有意识活动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过滤掉，得出一个干瘪的、先验的、严格主义的必然性概念，然后反过来用这种在自家手里“脱水”的怪物严实蒙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上。

不可否认，罗莎·卢森堡在阐述自发性概念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必然性概念，并且也确实将自发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联系起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她之所提出自发性概念，就是为了抵制那种“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可以一劳永逸地预先加以规定”的主观主义

组织原则^①，就是为了防止作为革命领导人的“高贵主体”在历史过程中有时的“疯狂跳跃”。她指出：“‘客体’表明自己更强些，鞭子很快就获得了胜利，因为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阶段的‘合法’表现。”^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罗莎·卢森堡再次强调，既然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那么，就不能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工作“主观的判断”，而是要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拒斥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所做的“宿命论的客观主义”解读，因而连自发性概念本来蕴含的必然性因素（或客观性维度）也一同否认。对于必然性，不能过度诠释，但也不能不加诠释。如果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理解为不受任何客观历史因素制约的“主观任意主义”，这岂不是与“宿命论的客观主义”殊途同归了吗？因为这两种“主义”都与“组织”的观念完全不相容，只不过，一个是不要组织，一个是无需组织。如果这样的话，自发性概念的“政治罪责”仍然无法推卸。

在处理自发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上，诺曼·杰拉斯的好心肠再一次表现出来。在被戴维·麦克莱伦盛誉为“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的最佳评论”^④的《罗莎·卢森堡的遗产》一书中，诺曼·杰拉斯想通过“虚化”必然性概念来为罗莎·卢森堡开脱严格决定论的指责。他的见解是，罗莎·卢森堡虽然频频使用必然性概念，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必然性未必起到那么大的、那么实在的、那么严格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必然性这个术语是“第二国际”时代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从考茨基到列宁）通用的政治词汇，但这绝不排除他们的革命政治学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其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种表述具有一种心理学的意义，“它反映的可能是罗莎·卢森堡对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取得

① 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6页。

② 同上书，第517页。

③ 同上书，第40页。

④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0页。

成功结果的能力的信任、她的革命乐观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胜利的信仰”，这种心理品格固然对于每一真正的革命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理论上的必然性概念——按照此一概念，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的结果，它超越于人的干预力量之外”。^① 在诺曼·杰拉斯的如此“开脱”之下，罗莎·卢森堡的必然性概念几乎飘飘欲飞了，好像罗莎·卢森堡使用必然性概念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装点和心理自励的需要，这样一来，他也就间接揭示了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非宿命论特征。尽管诺曼·杰拉斯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颇为正当的目的，但是，他把必然性几乎化作一具名不副实的空壳的做法也未必尽合罗莎·卢森堡的本意。在消解必然性之重的同时，必然性的“漂浮”也会使人产生失重之感。

三

诺曼·杰拉斯之所以“虚化”必然性的作用，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所理解的必然性的含义同样是那种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绝缘的坚硬必然性（hard necessity）。可以说，只要如此来界定历史必然性概念，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就得不到真正积极的诠释。如果历史必然性本身即包含着主体干预历史进程的有意识活动，而作为这种必然性的“表现”的自发性又如何能与必然性格格不入呢？如果自发性与必然性并不是僵硬对立的关系，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害怕这种必然性呢？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去“虚化”必然性，而是去“软化”必然性。“软化”的关键在于达至对历史领域中的必然性的非形而上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就是既要承认历史必然性本身具有客观性特征，同时又具有主体性维度，它是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其要旨在于，不仅要看到历史领域中的必然性不能与主体的有意识活动相剥离，而且还要体认到历史的客观进程恰恰由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所构成。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的那样：“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

^① 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NLB, 1976, p. 36.

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历史的一个部分。”^① 既然历史主体的有意识活动是客观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也就包含着主体性维度。历史的客观性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物质性，更不能理解为与人无关的纯粹自然存在。就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概念的客观性特征的强调而言，这种强调也不能武断地理解为是一种绝对的“客观主义”。

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发性概念的客观性维度是不太合乎文本事实的，罗莎·卢森堡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就是要批驳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理论所蕴含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即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方法”，这种方法“以为群众罢工仅仅是技术上的斗争手段，可以随心所欲地、诚心诚意地‘决定’或‘禁止’它，就像一把刀子，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放在衣袋里‘以防万一’，也可以根据决定把它打开来使用”。^②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无论是那些一厢情愿地想给群众罢工规定确切日期的人，还是想以禁止宣传使群众罢工化为乌有的人；不论是那些由于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弱小和资产阶级的强大这一事实而激烈反对群众罢工的人，还是那些不顾严酷的现实及其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而执意煽动危险行为的“革命浪漫主义者”，都共享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方式和抽象逻辑，建立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观点绝“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③，因为资产阶级的警察也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整个现代工人运动不过是由一小撮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

大规模的群众罢工不会仅仅因点火似的革命宣传而随人心愿式地突然爆发，也不因某些秘密的协议或公开的决议而秩序井然地进行或停止，它的产生受制于诸多客观存在的因素，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即《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中所总结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群众行动能否真正地发生，“取决于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因素，

① 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8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③ 同上书，第39页。

取决于当时的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群众觉悟的程度、群众的斗争情绪的成熟情况，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是任何政党都不能人为地制造的。这就是巨大的历史危机同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在和平时期能够依靠领导‘机关’的指挥棒，井井有条地进行的那种小规模示威行动之间的差别。历史性的时刻总是要求有相应的人民运动形式，甚至不顾党的一切规章制度，创造新的形式，临时想出以前不知道的斗争手段，整理和充实人民的军械库”。^① 既然革命时期的大罢工的产生有不依赖于领导者意志和组织性策划的制约的现实的、客观的因素，那么自发性概念当然也就承载着脱出恣意人为的主观意愿之外的客观诉求。就革命罢工之产生是诸多客观条件作用的自然结果而言，自发性描述的就是结果对于其原因的依赖关系，或者说是由某些既定的根源引发出一一定的效果的自然“趋势”。

然而，仅仅这样规定还大成问题。因为，我们得知道什么才算是客观存在的条件？难道罢工前的宣传鼓动、组织策划、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以及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都不是客观存在？难道这些因素绝对不可能成为导致罢工发生的原因？我们看到，罗莎·卢森堡从来没有否认这些人为因素的可能作用与价值，也从来没有将所有人为了的因素无一例外地视为“纯粹主观”的东西加以排斥。她完全承认“纯政治的、有计划有目的的”人为策划既可以发动群众罢工也可以结束群众罢工，并且这类罢工“所表现出的党的纪律性、有意识的领导和政治思想都是最高程度的”。^② 可见，有意识的人为筹划与构想并不是完全不能转化为积极的现实效应的“抽象冥思”，领导人的意志与精神力量也可能成为物质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类型的罢工的产生相对于它产生的原因也是“自发的”，如果照此把自发性的“客观主义”内涵规定为由于受某些原因的决定而必然发生的性质，那么，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称为自发性活动，这样一来，自发性本身也就丧失了意义。

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罗莎·卢森堡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区分：示威性

^① 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2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的罢工和斗争性的罢工——前者总是有一个先在的理论图式从而表现为一个有序展开的“示范性”：群众的行动或多或少地是在图示或例证事先运筹的东西，在这里，群众似乎作为“客体”而存在，或者说在运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高贵的主体”^①；而后者却是在斗争中形成某种“相应的人民运动形式”或者说创造出“新形式”，因而群众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更加合法的孩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②，成为斗争的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主体”。^③ 尽管罗莎·卢森堡不排除示威性罢工中也存在某些自发性因素，但她主要是把斗争性罢工作为自发性的典范形态。那么，在斗争性罢工中，罗莎·卢森堡是否将有意识的鼓动之类的人为活动排除在外呢？是否根本否定党对运动的领导作用呢？显然没有！在分析1896年彼得堡总罢工时，罗莎·卢森堡写道：“这次运动的实现却表明了社会民主党多年鼓动的成果。在总罢工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分子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领导这次运动，并利用运动本身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鼓动。”^④ 问题不在于有意识的干预本身，而在于这种干预是否“适应局势和尽量密切地同群众的情绪保持联系”。^⑤ 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领导，而在于这种领导以何种性质、何种形式履行与表现自己的职能。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罗莎·卢森堡精辟地阐述了自发性罢工中党的领导所应该发挥的作用：“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进发的、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⑥ 这充分表明，自发性的产生可以是符合局势并已深入人心的鼓动

① 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7页。

② 同上书，第517页。

③ 同上书，第66页。

④ 同上书，第44页。

⑤ 同上书，第71页。

⑥ 同上书，第73页。

宣传的“结果”，而正确的领导也可以并应当成为自发性持存、光大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由此看来，罗莎·卢森堡不是一概地否定有意识干预的作用，而是对那些外在于群众革命实践或者脱离群众运动的无生气的、没有现实性的、抽象的人为筹划加以清算和剔除。

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确实蕴含着客观性维度，那么这种客观性并不是一种机械的、纯自然的客观主义（即一种绝对的客观主义）——它把革命主体的所有人为因素统统排除在外。我们知道，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位在反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左派领袖，非常重视群众革命意识的具体生成这一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而她本人就是一位以激发群众革命意识的宣传鼓动而闻名的天才演说家和理论家。在第二国际革命家当中，再没有谁能比她更深刻体会到坚定的意志、炽热的激情、执著的追求、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以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对于一个革命者的珍贵，因为她曾七次被捕，六次入狱，最后将生命也献给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再没有谁比她更深知正确的理论对于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所能起到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因为正是这个矮小瘦弱的女子最先站出来给修正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正是因为她是这样一位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她才能最深刻地体验到、最敏锐地洞察到主观的愿望、理论的构想如果脱离了群众、如果不符合时宜、如果不切合实际、如果不能真正融进实践、如果违背了历史的客观规律，就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危害、甚至失败！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所蕴含的客观维度在其最本质的意义上就是为了限制纯粹主观主义的潜妄，就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异化并使之显示它的真实形态，一如卢卡奇所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主体’的过程的真理本身，远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按机械‘规律’向前运动的。它是辩证过程本身意识；它也同样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因为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

的真实形态。”^①而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自发性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真实形态的真实展现，这一展现对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而言是必然的。罗莎·卢森堡自发性的客观性内涵必须放在作为真正革命主体的群众之阶级意识生成的角度，必须放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从潜在状态上升到总体性的实现状态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也只有这种理解，才能避免把罗莎·卢森堡对客观因素的作用强调理解为完全排除了一切人为干预的“宿命论的客观主义”——它无异于把罗莎·卢森堡等同于无为主义和等待主义，在历史的必然规律面前放弃主动的介入，从而等待历史的列车把革命者自动地带到目的地——而这恰恰是罗莎·卢森堡竭尽全力加以反对的观点。

四

看到历史必然性中的主体性维度，是通达对自发性概念的辩证理解的重要一步，但仅仅就此止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软化”必然性概念，这种“软化”就是在融入主体性的基础上大胆地向偶然性敞开空间。只要不是把自发性直接等同于“坚硬的必然性”，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软的必然性”的表现，那么它就不能不容纳偶然性。首先，自发性所以是“自发的”，它本来就含有脱出“他者”预先规定的涵义，如果要发生的事，其发生与否、其如何发生都已完全被“他者”所决定，那么它就不能说是“自发的”。再者，如果自发性直接等同于必然性，在其严格的意义上也谈不上“自发”，而只能说是“自在”；只要把自发性理解为必然性的“表现”，那么这种表现活动究竟如何“表现”自身则总有某种未定之数。

从罗莎·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运动的生动描述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她的自发性观念所蕴含的三重“偶然性”：第一重偶然性是自发性运动起因的偶然性。罗莎·卢森堡指出，自发性群众大罢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引起它的因素虽然完全不同”，但往往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正是这些具有特殊性的、表面上是次要的、十分偶然的事件，突然促发了或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3页。

汇成气势磅礴的大规模革命运动。哪些形势之下会立即引发群众大罢工，“这确实是很难有把握预言的”。^① 即便是在革命时期，“要预见并估计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够引起爆发，哪些却不能够，这对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是极为困难的”。^② 第二重偶然性是自发性运动发展过程的不可完全预测性。在自发性群众大罢工中，局部性的斗争如何演变成普通的斗争风暴，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如何相互转换，新的组织方式如何从斗争中诞生出来，这些都是事先难以控制和预定的。第三重偶然性是自发性运动发展趋势与结局的偶然性。自发性群众大罢工有时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有时“似乎毫无结果地退了潮”，有时整个运动“朝着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有时它“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时突然开辟新的、广阔的革命前景；当人们满有把握地指望它时，它却遭到了普通的失败。它有时像宽阔的海洋一样汹涌澎湃地荡及全国，有时又分成无数涓涓细流，形成一片广阔的水网，它时而像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时而又完全渗入地下”。^③

可见，在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概念的阐述中，自发性与偶然性的联系非常频繁、密切，自发性概念的偶然性内涵也十分突出、明显。可是，长期以来，人们竟对这一关联与意涵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言，从而导致把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中的必然性因素绝对化为一种完全脱离必然性、与必然性毫无联系的“纯粹必然性”。将自发性中的偶然性因素故意抹掉，无疑是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形而上学歪曲。马克思曾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套用马克思的这句话，完全可以说，由于一些人看不到自发性中的偶然性意义，所以他们把自发性弄成了一个神秘的怪物。

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是一个有很大理论容量的辩证概念，它涉及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许多新颖独到的政治思想。这一概念既有客观性内容，又有主体性向度；既有必然性特征，又有

① 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71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偶然性成分；既有“决定”的要素，又有自主与自由的空间。只要不将某一方面肆意片面化或极端化，而是把这些不同的方面以一定的张力维系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异常丰满的辩证的自发性概念。实际上，卢卡奇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1921年1月）一文中，已经肯定了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总体性和辩证性本质。他说，“罗莎·卢森堡比其他许多人更早而且更清楚地把握了革命群众行动的自发性”，也正是同一个罗莎·卢森堡“强调了那个更早提出的论题的另一方面：即这些行动是经济过程的必然产物”。^①自发性不仅具有革命主体的自我认识的方面，而且也具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方面，它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和辩证统一，质言之，真正的革命主体的自我意识同时也就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总体把握，而作为革命主体的阶级意识的自然爆发的自发性运动，它所展现的无非是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生动而具体的统一。

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同一个卢卡奇在一年之后所写的《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判意见》（1922年1月）一文中，却一反原来的立场，一反言犹在耳的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成为真正革命积极性的源泉”^②的信誓，异常粗暴地指责罗莎·卢森堡“夸大革命进程的有机性质”，说她“陷入了最惊人的自我矛盾之中”。^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卢卡奇完全附和了列宁主义对罗莎·卢森堡的批评论调，认为罗莎·卢森堡过高估计了革命的自发力量，“由此导致了她的错误概念中的最关键性的一点：过低估计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过低估计与自发力量的经济发展必然性对立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④卢卡奇之所以如此指摘罗莎·卢森堡，是由于他洞察到了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思想之间的差异并认识到“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对立有相当深远的根子”。^⑤卢卡奇指出，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对立主要在于如何解决发生在党内的意见分歧，是诉诸革命政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王伟光、张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4页。

③ 同上书，第381页。

④ 同上书，第363页。

⑤ 同上书，第373页。

党内部的思想斗争，还是在组织领域内解决。列宁选择后者，卢森堡选择前者。而卢森堡之所以选择前者，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组织问题不能看作是革命精神的保证，组织形式本身也是发展着的东西，“真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众的自然的自发性中才能找到”^①。这表明，自发性问题乃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对立的思想根源。

越是仔细地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和《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判意见》加以比较阅读，越是强烈地感受到卢卡奇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评价不仅仅是前后不一致，而且相互矛盾。导致这一变化的客观原因是，保尔·莱维在1922年将罗莎·卢森堡1917年在布累斯劳监狱所写的论俄国革命的手稿公开发表。由于罗莎·卢森堡在手稿中对俄国革命后列宁的许多政策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从而激起苏联官方对罗莎·卢森堡的新一轮的批判热潮。在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影响之下，卢卡奇主动地站到列宁一边，试图在列宁主义的框架之内深入“揭批”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从主观方面来说，卢卡奇在匈牙利革命的高潮期及革命的失败和流亡时期，其思想观念并不是完全稳定一致的。日本学者初见基通过对《什么是正统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的原稿与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修改稿的精细对比，指出卢卡奇从1919年到1922年的思想变化表现为对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适应过程”，“即他想把更加‘正统’的思想框架导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②如果初见基的论断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对初见基的观点加以强化的延伸性结论：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的写作到《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判意见》写作，卢卡奇对列宁主义的“适应”或者说向列宁主义的“靠拢”更加自觉、也更加明显。正是这种自觉的“适应”过程使卢卡奇渐渐放弃了对自发性概念的辩证阐释，走向了对自发性的政治责难。初见基甚至认为，卢卡奇在写作《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时已经对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4页。

^② 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范景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8—260页。

“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彻底绝望”，于是他“开始思考‘前卫党’的作用，即他以一种超前意识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现实中作为虚伪意识的意识导向具有‘客观可能性’的阶级意识”，但是，卢卡奇没有警觉到，前卫党本身“并非是一个经常寻求变革的社会组织，而是陷入站在超越的位置上掌握绝对真理这种自以为是的怪圈的社会力量……卢卡奇的这一思维逻辑也有强词夺理之嫌，而且，由此引发的弊端则数不胜数”。^①

尽管卢卡奇在对自发性概念的政治批判上与列宁保持同一口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发性观念在政治上并非毫无积极作用。在《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判意见》一文中，卢卡奇说，罗莎·卢森堡“看到了传统组织观念的缺点在于它对群众的错误关系……她自己的结论一方面导致她反对这种对组织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导致她规定党的任务”，而罗莎·卢森堡对党的政治领导的规定是“在理解组织问题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②但是，必须看到，卢卡奇在如此评价的时候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制条款：“传统组织”只能是“西欧组织形式”。这是因为西欧（尤其是德国）组织形式“在群众自发运动面前软弱无力”，“这种组织总是一瘸一拐地落在群众的实际行动的后面，不是促进而是阻碍这种运动，根本谈不上领导”。^③在卢卡奇看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克服了西欧组织形式的局限性，因此，罗莎·卢森堡基于西欧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指向西欧社民党，无疑是正确的，而如果指向布尔什维克，则肯定是十足的错误。

实际上，这是既要站在苏联官方立场上对罗莎·卢森堡采取断然的批判态度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有保留地承认自发性观念的正面价值的所有学者的惯常做法。苏联两位学者在他们所写的《罗莎·卢森堡传》中，在评价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时，采用的也是卢卡奇式的策略，他们认为，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批评不是根据对俄国社民党现状的分析，而是基于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政治经验：

① 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范景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7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8页。

③ 同上。

她所看到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它忽视了运动发展趋势和基层主动性，只着眼于取得议会斗争的成功，把党变为保守的、阻碍群众运动的东西。通过这个党的例子，她看到了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在增长。同样，她也很了解波兰社会党的实践，这个党的右翼领导执行的路线是违背普通党员和左翼活动家的意见和目标的。因此，她强调“党—群众”问题的意义，目的是要极力防止“极端集中的党”她认为有可能引起的后果：遏制革命运动规模的扩展和在革命斗争进程中不断参加进去的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的提高。^①

不难发现，这种评判或多或少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仅就罗莎·卢森堡对极端主义的组织原则的批判内容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将这种批判应用于德国或波兰，它是对的；而如果将之用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它则是错的，这就是说，罗莎·卢森堡之错并不错在“内容”上，而是错在“对象”上，她批错了对象！人们或许可以推想，如果罗莎·卢森堡用同样的言辞去批孟什维克，她不仅不会错，而且还一定会受到特别的表扬。

然而，罗莎·卢森堡确实批判过列宁，而且，她之所以阐发自发性观念主要针对的就是列宁。1904年，当列宁还没有获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完全控制时，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的组织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当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罗莎·卢森堡仍然“不识时务”地批评已经取得了国家权力的作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列宁。卢卡奇深谙斯大林式的信条——胜利者是不应受到指责的，而罗莎·卢森堡则无此顾忌，她之所有如此的勇气和气魄，是因为她的理论的彻底性，是因为她持有真正的革命立场，是因为她比其他人更早、也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党脱离了群众，如果党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党把人民

^① 叶夫罗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汪秋珊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0—111页。

赋予的权力用于“统治”人民，如果党不是不断扩大群众基础，而是蜕变成一个由少数人构成的特权集团，那么就必然导致政治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就必然导致公共政治空间的萎缩，就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的丧失，就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民主事业之根基的毁坏。

罗莎·卢森堡首创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概念，在《论俄国革命》中，她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与性质作出了至今无人超越的精辟论述，她说，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后，就应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去代替资本主义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不是少数领导人以阶级名义进行的事业”，“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它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的、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① 罗莎·卢森堡所以能够得出如此的政治民主观念，其理论根源即在于她的自发性概念，据此，完全可以说，罗莎·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自发性概念，却是阐发自发性概念的政治意义的最好文本。

第二节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

在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把他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命名为“霸权概念的谱系学”，而这一谱系学探索以“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为起点。如此一来，他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实际也就成了人们进入“拉克劳与莫菲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一道“门坎”。跨不进这道门坎或者经过时略有磕绊，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后马克思主义”堂奥之义的把握与会意。这不禁让人想起黑格尔关于哲学开端的论述：

^①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33页。

“要找出哲学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①然而，找出开端毕竟是哲学家的事，对于读者来说，理解哲学家何以会选取某一开端似乎比设置开端要困难得多。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不仅在于他们出人意料地以“革命之鹰”作为解构的首选对象，并从她这里寻求后马克思主义根源是否会招致各种非议与排斥，也不仅仅在于他们是否有意以此方式暗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切关联，而是主要在于他们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concept of spontaneism）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理解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独特阐释，也就无以领会到此一开端设置的依据，更无法理解拉克劳与莫菲所谓谱系学考古的意义所在。下面拟就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解读的路径、特征、方法作出具体的描述，并对这一解读的合法性及其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作出相应的评价。

—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是必须加以剪除的原罪式的概念，因为，罗莎·卢森堡的许多错误——在关于组织问题上的错误、在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问题上的错误、在《论俄国革命》一书中所犯的 error，等等——如果从理论根源上深究的话，无不与自发性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正是出于这个缘由，长期以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一直是不依不饶，严加诛伐，对其定性也格外严重，其一曰低估革命理论的作用，其二曰否定党的领导。而罗莎·卢森堡论述自发性概念的所有文本——《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6）、《论俄国革命》（1918）——也都无一幸免地遭到批判。就连十分强调主体原则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基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页。

本上是沿用同一罪名展开对罗莎·卢森堡的批判。

这种清剿式的“大批判”是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作出宿命论解释的自然的政治结果。所谓自发性概念的宿命论解释，就是把自发性理解为不受任何人为的自觉干预之影响的自然而然发生的必然性状态。从罗莎·卢森堡的文本中找出支持这一解释路线的论据似乎并不特别困难。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罗莎·卢森堡这样写道：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因此，不是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思，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工作主观的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①

由于罗莎·卢森堡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对群众罢工的根源作“客观”的考察，而且在此前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她毫不含糊地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斥责为“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②，所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不无根据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归之于一种“宿命论的客观主义”。

当然，如果自发性的客观主义内涵仅仅表现为群众罢工相对于导致其爆发的一定“社会状况”所表现出来的必然要发生的趋势，那么这种客观主义还不能说是“宿命论的客观主义”，因为人为的因素并非一定不可以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作用。苏联官方的正统理论家之所以能把宿命论的罪名稳稳当当地扣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上面，是因为他们把罗

^①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40页。

^②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7页。

莎·卢森堡对客观历史规律的信奉以及对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论证与自发性概念高度贯通在一起。弗雷德·厄斯纳甚至认为，“在为资本主义必然破产理论辩护而反对伯恩斯坦的过程中，她发展了一种宿命论的客观主义，据此，经济发展能够自发地、不可抗拒地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这一点上，她的革命发展的自发性以及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错误理论，都冒了出来”。^① 为了证实卢森堡不自觉地陷入了可悲的宿命论，弗雷德·厄斯纳特意援引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例子——1917年罗莎·卢森堡写给玛塔罗森堡姆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当事态看来无可挽回的时候，历史往往懂得拿出最好的主意。我不是在维护随遇而安的宿命论！完全相反！人们的意志一定要高度激发起来，并要有意识地用尽一切的力量作斗争。我是说，现在当一切看来绝望的时候，对群众有意识的作用的效果，是决定于那基本的、深深隐藏着的历史的动力，我从历史的经验知道，从我亲身在俄国的经验知道：正是在从外表看去一切无出路、悲惨的时候，一个完全的突变已经准备就绪，绝望得愈甚，突变也就来得愈猛烈。您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紧紧地束缚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上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永不会停止发生作用，虽然它有时不恰恰按着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老一套计划走。^②

按弗雷德·厄斯纳的说法，这个例证之所以“特别有趣味”，是因为在罗莎·卢森堡自己提防不要落到宿命论中去的同时，宿命论已隐寓在她自己的自发论之中。既然“我们是紧紧地束缚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上”，既然有意识的斗争的效果“决定于那基本的、深深隐藏着的历史的动力”，既然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时恰恰不按“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老一套计划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尽一切力量作斗争”？我们只需像印度江湖魔

^① 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114页。

术师那样将双手一合放在胸前，听天由命地坐等将来。弗雷德·厄斯纳认为，罗莎·卢森堡之所以陷入这个两难困境，不仅仅源于她在绝望的时候的一种心理需要，不仅仅是她在监狱的寂寞生活中的一种安慰，根本上是由于她对自发性的错误崇拜。“从自发论得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低估革命理论的意义和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①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人们不无惊奇地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以异乎寻常的果断把自发性概念从历史性的“罪恶渊薮”中打捞出来，试图在一种新的理论光亮的映照之下使之重新闪烁出熠熠神采。他们不仅丝毫没有落入这个几乎成为定式的官方批判的“俗套”，而且根本不打算对这一批判线路的学理依据作出起码的检视与反驳。毕竟，支撑这种无限上纲式的“大批判”的意识形态力量或政治压力已经灰飞烟灭，而在一堆瓦砾和废墟之上寻觅某些幸存的可资“回收”的碎片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对于长期以来苏联官方理论界关于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千篇一律的指控，拉克劳与莫菲视若罔闻，似乎睥睨一瞥也纯属多余，其孤傲蔑视之态历历可见！这不妨可以看作是拉克劳与莫菲对长期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学界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一味贬抑与不公的一种无声抵制。拉克劳与莫菲的心迹昭然可喻：再不要用陈腐的论调来编织欺骗之网，再不要用牵强的文字遮蔽睿智之光！当然，也不要矫枉过正式地把自发性概念过度诠释为完全游离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一贯维护的历史必然性之外的自主话语；而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另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加以重估。

二

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破天荒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罗莎·卢森堡在描述她的自发

^① 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145页。

性概念的时候，“偶然”一词确实时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冒了出来，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后来群众罢工的全部基本特点。那次运动的近因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是次要的，它的爆发也是自发的”^①，“局部的经济斗争和小规模‘偶然’事件的多股细流，很快就汇成了汪洋大海”^②，“当然，爆发这次群众罢工的第一个原因，仍然是一个次要而又似乎偶然的原因”^③，“这种罢工大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各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偶然原因；它们无计划地、无意地以磅礴的气势发展成伟大的运动”^④。显而易见，罗莎·卢森堡反复使用的“偶然”一词，概指群众罢工起因的“偶然性”，它表达着如此的意谓：在通常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德国），这些小事件多半不会引发什么大的运动，它终究成为“起因”乃是出乎意料的，或者说与事先的预测是不太一致的。

这种意义上的“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人为的预期而言的：由于它超出了人为的预测，所以表现得似乎很偶然；但是，如果相对于某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偶然性”仍然可以理解为必然性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借以表现自己的特有方式。可以说，这两个维度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是同时存在的——从一方面看，群众罢工的爆发经常打破了政党或工会领导人事先的组织策划，它有时好像故意与人过不去，有时你越想它爆发，越是为它的爆发积极地创造条件，它却偏偏不爆发，就像罗莎·卢森堡所描述的那样，“在德国，工人同厂主之间最激烈的、最残酷的冲突每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但斗争并未超出有关的个别行业或个别城市甚至个别工厂的范围。……没有一次发展成共同的阶级行动。即使它们独自发展成显然具有政治色彩的个别的群众罢工，也还是没有酿成普遍的斗争风暴”；^⑤而当你觉得它不可爆发、或者不指望它爆发、或者不希望它爆发的时候，它却偏偏爆发了！比如1905年发生在俄国彼得堡的群众罢工——它

①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48页。

③ 同上书，第62页。

④ 同上书，第65页。

⑤ 同上书，第69页。

是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借以分析自发性概念的范例。一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即便是在革命时期，“要预见并估计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够引起爆发，哪些却不能够，这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是极为困难的”。^①另一方面，这种相对于政党或工会组织的估计而言的偶然性并非是不遵循任何规制的胡乱的任意，或者说自发性罢工并不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混乱，“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在旷野上举行的演习，而是当各种社会基础不停地断裂、破碎和变化时发生的斗争”。^②罗莎·卢森堡坚信，自发的群众罢工之发生必然是由于客观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与那种只从街头闹事和暴动的角度，即只从‘混乱’的角度去看待革命的警察式观点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首先是社会阶级关系中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变化”。^③

可以说，罗莎·卢森堡之所不厌其烦地强调必然性的自发作用，一方面是为了弱化来自于革命一方（特别是党与工会）自以为对“历史规律”的绝对认知与把握，从而使在领导人主观层面上呈现的应然的“规律”与本然的客观规律从完全的重叠状态中摆脱出来，这种“错开”的举措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规律神秘化，但它至少可以取消“那些喜欢按计划和框框搞‘秩序井然，纪律严正’的斗争的人”，“那些站在远远的总是自以为是，认为‘本来应该如何进行’的人”的刚愎和谰妄^④，以使他们谦虚谨慎地明白革命不能随意制造；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反复宣扬自发性，其意图也在于反击来自反革命一方所谓罢工是无规律的人为混乱的诬蔑与诅咒。因为，在资产阶级的警察看来，“整个现代工人运动似乎只是一小撮没有良心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⑤张扬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的历史逻辑，或许在一定意义上与政治行动主义相抵牾，但是，它至少能够嘲笑敌人的无知和愚蠢，挫败敌人的疯

①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③ 同上书，第69页。

④ 同上书，第61页。

⑤ 同上书，第39页。

狂与叫嚣，以使他们坐卧不安地知道，广大群众所发动的革命运动不是用威胁和恫吓就能驱散的，不是用监狱和刺刀就足以制止的。对自发性的这种宣告，在其最好的意图上，显然可以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

这是出于最大善意和最好心肠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所能作出的最好的辩证式解释。然而，列宁居然没有做到这一步，或许是由于罗莎·卢森堡尖锐地指责他在《退一步，进两步》中所阐述的组织原则是“极端集中主义”而难以接受，或者是耿耿于怀或者心生怨恨，从而导致列宁把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针对敌人的一面理解为针对革命领袖，而把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针对革命领导人的一面理解为针对反动的敌人，这种错乱无论对于列宁还是对于罗莎·卢森堡都是悲剧，都是大不幸！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她的自发性理论没有威慑住凶恶的敌人，却反而“吓着”了革命领袖，没有起到激发革命斗志的作用，却被认为是在倡导政治无为主义；而对于列宁来说，他错过了一次有效限制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的权力越位的始源性契机，同时他也丧失了一次对激烈批判自己的同志施以宽容的良好机会，而这两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事业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也没能做到这一步！他们虽然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论中竭诚寻找偶然性的踪迹，但是，他们既不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论证这种出于激进革命之目的偶然性，也不再具有经典意义上的革命激情来促使他们维护这种兼容论的辩证立场。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在其原初的语境下是为了限制党和工会组织的潜妄，是为了挫抑、震慑敌人的猖狂，那么我们在拉克劳与莫菲对自发性的恢复中看不出一丁点如此的意味与旨趣。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再相信有所谓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也就不可能再去为这种作为客观必然性之表现的偶然性辩护，更不可能为了暴力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而努力调节必然规律与革命主体的有意识干预之间的矛盾。正如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注脚中所附释的那样：

最近，有许多研究讨论了罗莎·卢森堡自发论的宿命论或非宿命论特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讨论过分强调了相对次要的问题，例如，在机械式的崩溃与阶级的有意识的介入之间的抉择问题。就我们所知，关于资本主义将要机械式地崩溃的断言是那样的荒谬，以至于再没有人去赞同它。相反，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主体是否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构建完全的统一性；而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出于这个原因，罗莎·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的必然要到来的宣称并不像诺曼·杰拉斯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是对那个时期的主流政治辞令的一种让步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心理需要的结果，毋宁说，这种宣称乃是赋予她全部理论的和策略性的结构以意义的关节点。因为，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才能得到完全的说明，革命的主体也只能是工人阶级。^①

显然，对于拉克劳与莫菲来说，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逻辑而必然崩溃的观点是荒诞不经的，而努力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则俨然如古代神话一般地遥远。当代西方激进左派斗争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迁，依靠同质主体来完成反资本主义的任务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根本就是无法兑现的幻想。罗莎·卢森堡当初深信不移的东西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已成为失去了时效性的昔日的真理和古典的分析形式。因此，必须从晚近以来新左派的新的理论着眼点和问题域出发，重新审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遗产，重新探测她的自发性概念蕴含的激发性要素。诚然，拉克劳与莫菲是在寻求偶然性，但是，拉克劳与莫菲所要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的偶然性，不是作为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另外意义上的偶然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主体在建构统一性时的偶然性。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p. 42 - 43.

三

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要理论关切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分散主体如何建构政治统一性（即政治认同）的问题，正是这种前理解定向支配着他们把对罗莎·卢森堡解读锁定于《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一文本，也正是这种前理解定向驱使他们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拉克劳与莫菲是如何描述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涵义的：

在沙皇俄国的压制性环境之下，没有一项仅仅为了满足部分需要的运动能够限制在它自身的范围之内：它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为反抗的范例和象征，从而激发并催生出其他运动。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在意料之外的，而且以不可预期的方式扩展并普及开来，以至于它们超出了任何政治或工会领导的调控与组织能力之外。这就是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意义。^①

这种对自发性的意义的捕捉与厘定不知不觉已发生了重心的转移，虽然表面上还是强调不可预见性，但此一不可预见性的内容已殊然不同：并不是局部冲突和小规模的斗争之起因的不可预见性，而是它们超出自身的范围、溢出起初的边界从而突然转变为普遍性的共同政治行动的不可预见性。质言之，这里隐含的关键问题是：各种分散的、零星的、各自独立的、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目的而进行的局部性罢工如何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普遍风暴？其统一性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即同一的政治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在关于阶级统一性的形成机制问题上，“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必然是分裂的，只有通过革命这一过程才能重构它们的统一性。不过，此一革命重构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8.

的形式是由特殊的机制所构成——它与任何机械论的说明毫无关系，正是在这里，自发性发挥着它的作用”^①。显而易见，拉克劳与莫菲之所以对自发性概念“情有独钟”，或者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之所以深深吸引着拉克劳与莫菲，其原因就在于拉克劳与莫菲从自发性概念读出了一种特别的东西：建构政治统一性的特殊机制。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解读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对自发性概念阐释的最原创性的要点。

为了彰显自发性在构建革命主体之统一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拉克劳与莫菲提醒人们既不要把自发性与臭名昭著的机械论的自动崩溃论相联系，又不要仅仅把自发性理解为对革命过程（由于其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方向加以预测的不可能性；因为前者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自发性的价值，而后者则可能使自发性的意义肤浅化与庸俗化。“生死攸关的东西不只是分散的斗争所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有建立在复杂性与多样性基础上的革命主体的统一性的构成问题。单单这一点就足向我们表明：在试图确定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集中于斗争形式的多样性，而且也必须集中于它们在其自身中建立的关系以及由之而来的统一效应上。”^② 斗争形式的参差不齐与复杂多样，在其超出既定构想的意义上，当然包括在自发性的意涵之中，不过，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如果自发性的意义仅限于此，还远远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东西。自发性的首要意义不仅在于斗争的形式超出了组织者的事先筹划，也不在于内容的环节冲破了人为的设计，而在于每一独立的要素在一个总体性的过程中、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自然而然”地超出它本身的意义空间，而正是这一自我“超出”成为“自组织”的关节点，成为建构主体统一性的胶合剂。由此，拉克劳与莫菲推出了自己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精辟概括：“在此，统一的机制是清楚的，在革命的形势中，是不可能确定每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0.

^② Ibid.

一个孤立斗争的本意，因为每一个斗争都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真实性质。”^①

应该说，拉克劳与莫菲对自发性概念的这种解读并不是毫无根据地把自己的想法硬塞给罗莎·卢森堡。我们看到，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一个著名段落中，罗莎·卢森堡在论述自发性的作用时这样写道：

自发性因素——不管是作为促进因素还是作为妨碍因素——在俄国所有群众罢工中都无例外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或弱小，而是因为在斗争的每个个别行动中，总有许多无法预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普遍的和局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没有一个行动能像算术题那样判定和解答。……简言之，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②

在每一个个别行动中，总会有无法判定的因素！正是在这种无法判定的“神秘”中隐藏着意义转变的契机。这种描述与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自发性的“统一机制”阐发的何其相似！不可否认，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行文中确实表现出一种强劲的过程主义或者说是行为建构主义倾向。她不止一次地宣称，只能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因为许多东西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而是在革命进程中即时生成出来的。正是在革命过程中，原本处于分裂和僵硬对立的因素突然融合在一起；正是在革命过程中，“理论性的”和“潜在的”阶级意识才能变成“实践的”、“积极的”阶级意识；正是在革命过程中，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也可以直接转变成经济斗争；正在革命过程中，“原因和结果随时都在交换它们的位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p. 10 - 11.

^②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页。

置”。^①正是从这种行为建构主义倾向中，拉克劳与莫菲抽绎出一种作为政治身份塑造和主体统一性整合的意义建构主义。当然，革命过程中无法确定的因素以及革命过程的意义生成和转换效应并非一定要理解为主体统一性和身份建构的机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有表现形态，也可以将之理解为阶级意识的辩证发展，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罗莎·卢森堡对充满生机的革命风暴的火热渴望与激情颂扬。可是，拉克劳与莫菲偏偏从罗莎·卢森堡对革命过程的自发性状态的史诗般的描绘中分明感受到一种抽象的、中立性的建构逻辑在悄然运作——这种建构逻辑由于不能从既定的情景中有规律地推演出来，由于完全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即时性的应景式的“生成”，所以它是一种偶然性的逻辑。

毋庸置疑，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左派，拉克劳与莫菲绝不会把这种建构性用于强化暴力革命的魔力，肯定也不会拿这种偶然性来烘托对历史必然性的确信，退而言之，他们甚至也不会像卢卡奇那样，把这种偶然性建构视为阶级意识的真实形态的呈现方式。拉克劳与莫菲迫切需要的仅仅就是一个单纯的意义“超出”，一种多元决定之中的意义“剩余”。“在革命情景中，每一增生的意义，可以说，看起来都好像是在远离它特定的原本要求，每一增生都表征着整个革命过程；而且，在某些斗争被另外一些斗争多元决定之中，这些总体化效果是明显可见的。而这恰恰就是此一象征的明确特征：所指超出了能指（the overflowing of the signifier by the signified）。”^②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拉克劳与莫菲感兴趣的仅仅是意义的增生和可流动性，以至于这种对意义增长本身的关注远离了罗莎·卢森堡原本的革命诉求。他们告别了革命，却无怨无悔地拥抱意义的增生！他们由于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发现了他们所喜爱的东西而赞扬罗莎·卢森堡，却全然不顾罗莎·卢森堡要用这个东西干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这个东西。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罗莎·卢森堡无论如何已经发现了偶然性逻辑

^①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8页。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

辑，并且在她关于俄国群众罢工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偶然性逻辑在发挥它的构建阶级统一性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给予罗莎·卢森堡的评价也格外地高：“阶级的统一因而是一种象征的统一。这无疑是在罗莎·卢森堡分析的最高极致，它最大程度地拉开了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对于他们来说，阶级的统一性完全是由经济基础的规律造成的）的距离。……很少有文本像罗莎·卢森堡的作品这样，肯定偶然性的特殊机制并承认它的实际作用的范围。”^①然而，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究竟是罗莎·卢森堡本人分析的最高极致，还是拉克劳与莫菲分析的最高极致，并不是一点也没有疑问。诺曼·杰拉斯就明确表示不敢苟同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如此这般的认定，他指出，把群众罢工中的总体化效果归结为所指超出了能指，进而把阶级的统一归结为象征的统一，这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的发明，与罗莎·卢森堡没有关系，“罗莎·卢森堡不可能这样认为，实际上也没有这样认为”。^②

四

但有一点可以十二分地肯定，罗莎·卢森堡确实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阶级的真正统一不是静态的、理论性地“事先”决定好的，而是在革命风暴的具体过程中形成的，这一观念是她阐发激进政治行动主义或行动优先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拉克劳与莫菲也正是“猎取”了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念并以此作为他们发挥所谓偶然性的建构逻辑的张本。不能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根本没有建构主义的因素，也不能说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表述中没有给偶然性一点空间，关键在于，在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构架中、在一个什么样的分析范式中处置它们？特别是，要将这种建构性引向何方？要将这种偶然性看得有多大？从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观意愿出发，他们当然希望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偶然性逻辑起的作用越大越好。但是，事实并不总是随人心愿，更何况人为肆意地“篡改”事实也与“自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

^②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p. 61.

发性”的本意不相符，因此，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拉克劳与莫菲的行文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大起大落”：他们先是振振有词地确证罗莎·卢森堡触到偶然性逻辑，并且这种逻辑俨然已生发了它特有的功效，这似乎让人依稀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期待：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接合的逻辑宛如发育完好的胎儿就要临产而出。然而就在令人激动的时刻即将来临的一刹那，拉克劳与莫菲突然吹起了充满无限哀伤的号角：本来要发出第一声啼叫的婴儿由于某种原因而胎死腹中！

对于拉克劳与莫菲这种“跌宕起伏”的手法，诺曼·杰拉斯无比愤慨，在他看来，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表扬”不仅不地道，而且原本就是一个歹毒的阴谋，这岂不是先把罗莎·卢森堡抬升到最高点，然后又突然丢开手吗？“这个表扬，罗莎·卢森堡不要也罢，因为它不过是指责罗莎·卢森堡犯了二元论错误的序幕。”^①拉克劳与莫菲当然不会承认他们在“暗算”罗莎·卢森堡，更不会承认是他们自己故意悬设了一场虚惊：按照拉克劳与莫菲的解读，问题分明出在罗莎·卢森堡本人身上，她使出浑身力气拉满了大弓，然而最终却没有将箭射出去！既然已经把象征的多元决定看成是统一种种斗争的具体机制，那么“自发性的那种逻辑看来似乎意味着作为其结果而出现的统一主体类型（由于不是在多元决定过程之外被决定了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不确定的”。^②质言之，如果断定政治主体的统一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之中生成的而不是在斗争之前就严格地决定了的，那么在理论上这种统一是何种统一应该是未确定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因为，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多元决定的这一过程却构成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统一：阶级统一。”^③即是说，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主体统一的性质或类型已经没有变化的余地，已经别无选择，已经不言而喻，它是铁定的，它一定是阶级统一。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问题正出在

①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p. 61.

②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

③ Ibid.

这里：为什么就“一定”呢？为什么偏偏不是“不一定”呢？“为什么就不能超越阶级的局限从而导致部分一致的主体统一类型（它的基本规定是大众或民主）的建构呢？”^①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恰恰在这个地方，罗莎·卢森堡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在革命的多元决定过程之外业已铸就的基本事实，那么无论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都不外乎是这种已形成的统一性的对等表达（或者说是既定图式的一种演示），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无需谈论革命主体的阶级特性问题，它本身根本就不成问题，因而也就根本没有所谓建构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政治主体的统一是在多元决定过程中具体构成的，那么这种统一自然不能脱离自己得以型构的过程，可是，它为什么在构成之前就已经完全成形了呢？显然，过程本身的始源性的生成能力与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形成了一种难解的紧张对峙关系，而罗莎·卢森堡又不愿意有所偏废，不肯随便舍弃任何一方。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罗莎·卢森堡宁肯自己一再阐发的自发性逻辑受到阻滞而断然不肯放弃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呢？换言之，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尽管罗莎·卢森堡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思考过）多元决定过程所构造的主体一致性与主体的阶级立场之间何以必然“重叠”这一问题，但是，从她的思想背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所深信的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质“保证”了革命主体的主体性与其阶级性的天然一致和完全重合。即是说，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蕴涵的必然性逻辑为自发性逻辑提供了一条必须接受的“路线图”——自发性逻辑无论怎样自主“跳跃”，它终究跳不出必然性逻辑的“掌心”。正缘乎此，拉克劳与莫菲不无感慨地说道：“结果，自发性逻辑的创新作用看起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②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拉克劳与莫菲的解读中，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不再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悖论，不是铁的必然性与主体干预之间的矛盾，而是政治主体统一性构成中的建构

^①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

^② *Ibid.*, p. 12.

性与先验规制之间的两难困境。

从满怀兴致地“发现”自发性的意义“超出”到略带败兴地叨唠自发性的“受限”，表面上，拉克劳与莫菲似乎生出无穷的遗憾，平添了浓浓的忧愁，因为，那个女革命家竟然在最丰收的地方造成了严重的饥馑！还有比这更让钟情于“所指超出能指”的后马克思主义骑士惆怅的吗？还有比这更让心系自主建构的“霸权接合实践”的后马克思主义旗手郁闷的吗？然而，这终究是拉克劳与莫菲的一种高超的书写策略：就在这艰涩难行之处，将要峰回路转，将要柳暗花明，将要妙笔生花，将要奏响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解读中最为“华彩”的乐章——即著名的“双重空场”（a double void）说。如果仅有意义的“超出”而没有意义的“限制”，就不可能有“双重空场”，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进行的是“双重解读”——既解读出意义的“剩余”，又要解读出意义的“贫困”。

五

“双重空场”源于“限制”作用。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自发性逻辑所受的限制，首先表现在它起作用的范围被紧紧地“圈定”了——它只用于说明一种特权式的主体统一性，即阶级统一性，似乎不可能会有其他类型的主体统一！然而，之所以说自发性逻辑受到了限制，不仅仅因为它的运作领域的封闭性，在其更重要的意涵上，是由于它起作用的方式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才是一种最根本的限制，正是这种根本限制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自发性逻辑和必然性逻辑并没有作为两个具有各自独特性并且互有积极助益的原则而汇合起来说明某种历史情景，相反，它们作为两个对立的逻辑，通过互相限制对方的作用而发挥各自的作用。”^①偶然性逻辑与必然性逻辑终于汇合了，然而这却是一次尴尬的汇合，一次别扭的汇合，一次“不欢而合”，它汇合了，却没有

^①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

融入对方，宛若交汇的两股溪水，它虽然共流在同一河道，却依然泾渭分明！而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情况似乎更糟，它们不光是不融合，而且还互相敌视，互相排斥，互相损害，由于向对方表现出对方向自己所表现的同样的作用，它们各自的独特性被这种消极的同一限制作用所吞噬。“自发性逻辑是一种象征逻辑，因为它恰恰是通过瓦解每一种原本的意义而发挥作用。必然性逻辑是一种原本意义上的逻辑，它通过固定所确立的意义而起作用——恰恰因为它们是必然的，所以这种由固定所确立的意义消除了任何偶然变异的可能。”^①

必然性逻辑和自发性逻辑作为两个对立的原则不能融合在一起，只能“通过互相限制对方的作用而发挥各自的作用”，即每一方都是在完全取消对方之后才在这一已“绥靖”的区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表明，这两种逻辑互相“蚕食”的方式决定了两种逻辑的区域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换言之，两种逻辑之间的边界经常处于来回的移动之中，这就好比夏至时太阳直射点向北移到北回归线，冬至时太阳直射点移到南回归线。这就是拉克劳与莫菲所谓“两种逻辑的关系是一种边界关系”（a relation of frontiers）的含义。

正是这种“边界关系”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从必然性逻辑一方看，逻辑的双重性与可决定/不可决定的二元对立是一回事，必然性逻辑君临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不可决定”之事，要么可决定，要么不可决定。而自发性逻辑所以冒了出来，就是因为必然性逻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起到作用，一俟必然性逻辑产生预期的功效，自发性必当了无踪影。这是“可决定”之缺席，是必然性逻辑的空场——“一重空场”。

从自发性逻辑一方看，“历史必然性”所以要呈现，是要通过建立固定的意义来限制自发性逻辑的象征作用，它无视自发性的真正效果，强硬地把固定的意义加之于自发性逻辑，这种强加也就是彻底否定任何偶然性。换言之，必然性逻辑之所以要起作用是因为自发性逻辑起不到“名副

^①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

其实”的统一作用。必然性逻辑是在自发性起不到“必要的”作用的地方起作用。必然性逻辑是在自发性逻辑的“零作用区”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俨然是自发性逻辑的“缺陷”。“此一限制，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局限性（缺陷）”^①，因为，在自发性所在之处，某种主体性一致似乎是建立起来的，但这还不能保证它一定就是阶级的统一性，因此，为了确保主体性与阶级性的重叠，必然性逻辑就要在自发性逻辑这里“现身”，以便使“不可决定”之事变成相反的规定——“可决定”之事。这是“不可决定”的隐身，是自发性逻辑的空场——“二重空场”。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两种逻辑互相限制的独特性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并不是明显可见的，“它之所以不是直接明显可见，是因为这两个明确且不同的解释原则被认为是汇合起来了”^②，确实，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既有自发性逻辑，同时又有必然性逻辑，表面上这两种逻辑好像是汇聚了，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融通与合和。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性”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同时，也正是这种“二元性”表面的交汇使“双重空场”变得不是清晰可见，“然而，使这种空场不可见，并不等于填补了这一空场”。^③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第一重空场”是一种真正的空场，它实质上是必然性链条的开裂，是必然性逻辑的退场，但是，第二国际的正统派理论家们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不相信必然性会面临崩溃，因此，他们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发性，或者不愿谈论自发性，或者认为自发性顶多表明必然性还没有发挥它一定要发挥的必然作用，质言之，即便承认自发性的存在，它也只能视作是必然性缺位的一种症候。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罢！就让我们抱着虔诚的心去等待罢！然而，这不是罗莎·卢森堡的性格，她不回避自发性，不否认自发性，她率真地发出了关于自发性到场的第一惊呼。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无疑是大胆的、无畏的、睿智的和严肃的。只有

^①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

^② Ibid.

^③ Ibid.

承认这一空白，才能为一种替代逻辑的确立廓清地基。

比较而言，“第二重空场”是一种伪空场。它是由篡夺或者说涂改而形成的，事实上，自发性已经建构了主体的统一性，但自发性辛苦取得的成果最后还是被归结在必然性的名下，自发性虽然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没有得到正当的定位；必然性其实并没有起到建构统一机制的作用，但是它却堂而皇之地盗用了自发性的成果，这实质上是一种潜越和篡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把本来没有阶级特征的斗争或运动形式也赋予一种严格的阶级性质，从而错失了把自发性逻辑加以合法化和理论化的可能性。自发性的逻辑作用被抹杀，因而这种空场是自发性在场情况下的“隐身”，它象征性地“在”，但这种“在”最终被遮蔽，被隐匿，故而，这种空场是在场的“非在场”，是一种更加晦暗不明的空场。只有标示出这一空场，才能恢复自发性的本来面目，才能使自发性从“蒙难”中解脱出来，才能名正言顺地光大自发性逻辑的积极成果。

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第二国际所有正统理论家都着力于遮掩空场，以使人们睁大眼睛也看不见有什么“空白”、有什么“破绽”，从而继续维持必然性的神话，从而确证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不过，只是将空场隐藏起来、遮盖起来并不等于空场已被填补，并不意味着空场的真正消失。掩饰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无能，是对暴露空场的回避，是可占据空场之物的缺乏，是制造“填料”的失败！如果没有空场，就不会有对空场的掩盖，而且，如果没有空场，也就不会有对空场的填补，这恰恰是拉克劳与莫菲探察空场的全部用意所在：空场的掩蔽之揭秘就是解构，空场的填补之完成就是建构。就此而论，空场对于拉克劳与莫菲来说，也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他们既需要解构的空场，同时也需要建构的空场。

六

罗莎·卢森堡天才地触碰到了自发性逻辑，旋即又束缚了自发性的“手脚”，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是令人叹惋的可惜之处。但无论如何，作为第二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最英勇的斗士，作为第二国际最激进的左派，作为坚守暴力革命立场始终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恐

怕也只能如此。而拉克劳与莫菲却不肯仅仅如此！他们不愿像罗莎·卢森堡这样“保守”，这样“功亏一篑”，他们要尝试着移动必然性逻辑与自发性逻辑之间不稳定的边界，这就是为诺曼·杰拉斯所诟病的“边界实验”（experiment of frontiers）。

既然两种逻辑的关系是一种“边界关系”，既然两种逻辑的“边界”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来回移动，并且实际上“双重空场”就是边界稍稍移动的效应，那么，如果将这种移动扩大化，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必然性逻辑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以至于两种逻辑不再表现出一种表面的交叉关系，而是必然性逻辑性的全面覆盖，那么，“明摆着的抉择就在于：不是资本主义通过它的必然规律走向无产阶级化和危机，就是这些必然规律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产生作用”。^① 这种最大程度地扩大必然性逻辑的作用范围，其实等于完全取消了自发性逻辑的作用，这是低于罗莎·卢森堡水平的一种视界。因为正是由于罗莎·卢森堡承认自发性的作用，她才能够把在资本主义社会平静的、“正常”的议会时期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分离，特别是各种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看成是资本主义国家“人为的产物”。反过来说，在自发性起作用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故意制造的分裂就会顷刻瓦解，各种“分开的、完全独立的形式之间的人为界限也被一扫而光”。^② 可见，自发性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起着一种证伪主体立场必然分裂的重要作用。可是，如果一点也不承认自发性的作用，那么主体立场的破碎与分散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呢？果真如此的话，岂不是不能有效地证伪主体立场分裂的虚而不实吗？岂不等于要承认主体立场分裂的永恒性吗？宁可守望着主体立场的分裂，也不肯承认在必然性逻辑之外能成就政治斗争的一致性的可能性，唯一的选择就是眼巴巴地等着终于有一天必然性逻辑会奇迹般地突然起作用。要么是严格的统一性，要么就是一盘散沙式的支离破碎，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无非是

^①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

^②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所有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观念所固有的零和博弈 (the zero-sum game)”。^① 边界向着增大必然性领域的方向扩展所带来的这种“零和博弈”显然是十分糟糕的结局，既然如此，移动还不如不移动！

顺便一提的是，诺曼·杰拉斯在讨伐拉克劳与莫菲的著名论文《后马克思主义？》中，曾指摘拉克劳与莫菲错误地“炮制”出了这个僵硬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拉克劳与莫菲在反批评中申辩说，他们并没有证明也绝对不打算承认这个“非此即彼”，相反，他们是用“归谬法”来揭露这种“非此即彼”的荒谬性。“我们的本意在于指出，除非马克思主义话语完全是决定论的（即是说，仅仅在我们实验的假想情况之下），否则杰拉斯所提及的那种刻板的选择就不会出现。与杰拉斯的指责正好相反，我们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描述为逃避这种‘非此即彼’的决定论逻辑的持续努力。”^② 从文本上看，拉克劳与莫菲的自我辩护无疑是成立的，因为，拉克劳与莫菲所以要玩边界游戏，不是要证实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存有这种意义上的“非此即彼”，而在于说明，由于她引入了自发性逻辑，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非此即彼”！拉克劳与莫菲断定诺曼·杰拉斯何止是断章取义，简直就是“错误引证”。他们冷嘲热讽地写道，这个诺曼·杰拉斯的做法印证了一个特别的“非此即彼”：他“要么是不诚实，要么就是不负责任”。^③

拉克劳与莫菲利用诺曼·杰拉斯在“细节”上的疏忽，狠狠地反抽了诺曼·杰拉斯一记耳光。但不管怎么说，诺曼·杰拉斯还是值得同情的，他在细节上犯了错误，并不等于他奋起反击拉克劳与莫菲全然没有道理，因为拉克劳与莫菲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歪曲了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原初意义。这一点在拉克劳与莫菲朝相反方向的移界游戏中清晰地表现了出来。如果自发性逻辑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以至于使必然性逻辑退出社会的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6 (Nov./Dec.), 1987, p. 95.

③ Ibid.

地平线，那么情形又会如何呢？拉克劳与莫菲在此欣然写道：

如果我们把边界推向相反的方向，推到政治主体的阶级性质失去其必然特征的地方，那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就完全不是虚幻的了：它是第三世界社会斗争所具有的多元决定的原创性形式。它构建出了与严格的阶级界线毫无关系的政治同一性；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无情地驱散了某种阶级接合的必然性质这一幻象；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崭新的斗争形式，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新的政治主体性形式超出社会和经济范畴的界线不断地出现。霸权概念正好出现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受到分裂的经验以及不同斗争和主体立场之间接合的不确定性所支配。它将在见证了必然性范畴退出社会地平线的政治话语中提供一种社会主义答案。^①

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发性逻辑的作用范围，其实等于彻底取消对自发性逻辑的不必要限制，等于给了自发性这个“无名之师”一个正规的编制并且任由它占领它能够占领的地盘。拉克劳与莫菲自认为这种扩展完全符合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所蕴含的建构主义“本性”，是对这一本性的释放与张扬，理应是高于罗莎·卢森堡水平的一种视界。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自发性虽然被承认，并且被肯定，然而，它不仅空间狭小，而且如螟蛉一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最终却被误以为是“螟蛉”的义子！罗莎·卢森堡一边大声疾呼“行动在先”，为自发性的出场鸣道，一边又不容置疑地引入必然性逻辑来“支撑门面”，把自发性的所作所为看成是必然性的“表达”，从而导致她陷入了“两难困境”。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不扩展边界就要陷入“两难困境”，而扩展必然性逻辑的范围又只能更糟，所以，唯一正确可行的方式就是扩展自发性的边界，将它推到极限，推到必然性逻辑完全消失的地方。唯有如此，自发性逻辑的独自の构成性作用才不至于被遮蔽，才可能充分展示它特有的风采，才可能在必然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

性崩溃的情形之下重树左派政治斗争的信心。如果说上一次的边界移动实验是通过把必然性的作用推到极端以揭露它的荒谬性，那么这一次则是将自发性逻辑复归至实然状态，从而展示它原本可能达到的功效；如果说上次实验导致的“非此即彼”的僵硬对立是一种虚幻，那么这一次的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则是已被目睹的不断出现的“原创性形式”；如果说上一次的移界游戏是令人沮丧的零和博弈，那么这一次则是硕果累累的喜人丰收。从拉克劳与莫非轻快的笔调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对于眼前出现的“景象”的欢欣与畅意，不难感受到他们对于偶然性的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动局面的嘉许与赞誉，不难感受到他们对政治主体统一性的崭新建构的“激进想象”与殷殷寄托。

我们看到，正是在对这一实验结果的鉴赏性描述中，拉克劳与莫非自然而然地引入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这一概念出现的领域只能是偶然性充分起作用的领域，即是说，偶然逻辑的边界向外极端扩展是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呈现的必要条件。拉克劳与莫非假设：如果罗莎·卢森堡如此扩展，那么她就会得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然而，事实上，罗莎·卢森堡根本没有如此“扩展”，因为她原本就没有想到要做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是拉克劳与莫非自己执意要如此“扩展”！因为，他们自己乐于把自己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和拉克劳与莫非的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显然有很大的悬殊，一如斯图亚特·西姆所评价的那样：拉克劳与莫非“明显被自发性概念所吸引，这一概念形成了他们的‘激进民主政治’的某种模型；区别是：拉克劳与莫非看到没有必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加工它，或者一种设想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为这种自发性所必需。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倾向性在如下意义上是明显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连接被割断，而使霸权以一种自由无羁的方式运作为目标，在此一方式下，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之其上的那种强制”^①。

罗莎·卢森堡无疑是第二国际的激进左派，不过，在拉克劳与莫非看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p. 14 - 15.

来，她还远远不够“激进”——因为她没有将自发性逻辑的范围加以“激进的”扩展。从所谓的“边界实验”中，我们可以幡然悟出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激进民主”中的“激进”并不意味着革命立场的“激进”，而只是表示对偶然性的“激进”态度：“要接受根本的偶然性”。^①拉克劳与莫菲疯狂地把自发性逻辑的边界无限制地扩展，这诚然是一种极端，诚然是一种过激，诚然是一种激进主义，然而，这种激进主义在最大程度地消解罗莎·卢森堡的“教条式的僵化”（the dogmatic rigidity）的同时^②，也最大程度地远离了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激进主义诉求。套用齐泽克的说法，这俨然是一种反激进的激进主义！

七

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阐释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之上：一是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热切关注与积极肯定；二是罗莎·卢森堡承认，在自发性这里最终可以达成主体的统一性。从这两方面看，拉克劳与莫菲与罗莎·卢森堡无疑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两方面构成了拉克劳与莫菲与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共同“底面”——没有这种重叠共识，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就丧失了起码的学理依据，就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顺嘴胡诌”。如果说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尚有某种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性恰恰就是基于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正当性和历史担负的确证。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努力并不在于真正要回到罗莎·卢森堡那里去，他们不会满足于复元自发性概念的历史本真性，严格说来，他们也无意于从事这种复元。因为在对解构立场的坚守之下，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绝对固定不变的意义，根本就不相信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稳定与对称的关系。既然他们倡导“所指超出能指”，那么自发性这一能指被打破、被超出也就是题中之义了；既然他们倾心于意义的增

^① 斯拉沃热·齐泽克、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

生与流动，那么自发性概念的意义溢出罗莎·卢森堡所设定的边界也正符合于他们的支撑性观念——“任何既有的话语都不可能完成最后的缝合”。^①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他们的这种观念与那些激烈消解在场形而上学的当代思潮——分析哲学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现象学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的批判——是完全契合的，正缘乎此，他们尤其推崇德里达对意义核心和先验性所指的颠覆与解构：“先验性所指的不在场无限扩展了意义的领域与作用。”^②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先验性体现在两个节点上：其一，自发性源起于旨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之中，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取得政权始终是革命的灵魂；其二，自发性的作用在于达成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革命主体的统一只能是阶级统一。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点，罗莎·卢森堡才是罗莎·卢森堡。消除这两种意义的先验性所达至的结果自然就是：后革命的自发性概念和非阶级的主体统一性。就前者而言，是实现了自发性的领域置换；就后者而言，是实现了自发性的功能替代。抛弃了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最为重要的东西，当然也就谈不上忠于罗莎·卢森堡。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书中对康德认识论所做的存在论分析视为是对康德的背离，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拉克劳与莫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本意。从革命的自发性到后革命的自发性，从严格的阶级统一到超出阶级限制的非阶级统一，这是罗莎·卢森堡根本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也根本不是罗莎·卢森堡想要的东西。拉克劳与莫菲视为罗莎·卢森堡的缺陷的东西，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罗莎·卢森堡给自发性设定的严格限制，恰恰就是罗莎·卢森堡不愿丢开的、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丢开的东西！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对拉克劳与莫菲来说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教条；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是必须坚守的原则，对拉克劳与莫菲来说只不过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1.

^② Ibid., p. 112.

是要予以抛弃的局限性。罗莎·卢森堡宁愿牺牲性命也“咬定不放”的东西，拉克劳与莫菲竟轻松地、毫不痛惜地放弃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曼·杰拉斯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气头上的诺曼·杰拉斯也说了一些错话，有时甚至发错了脾气。他认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是有意栽赃陷害，旨在显示“罗莎·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真正观念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不一致的”^①，其“罪恶意图”在于由此暗示：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这里潜伏着后马克思主义的强烈萌动，或者说，从罗莎·卢森堡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实际上，诺曼·杰拉斯的这种忧虑完全是多余的。拉克劳与莫菲将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置于全书的开端处，并不是径直把罗莎·卢森堡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按拉克劳与莫菲的看法，“在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还原论的视域之内，接合意义上的霸权完全是不可思议的”^②，而罗莎·卢森堡并没有脱出这个视域。可以断定的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的心目中，罗莎·卢森堡并不是一个在某些地方越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界线的人，她不像葛兰西那样能被看成是一个“分水岭”，她的自发性概念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雏形。

但是，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和霸权概念又存在着相关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可贯通性。否则，拉克劳与莫菲绝对不会以解读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为起始。然而，这种相关性和贯通性却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它晦暗不明、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只有借助“解构式地运作”，只有通过拉克劳与莫菲如此这般地“解读”，才能一显尊容，才能现出“庐山真面目”。这颇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从不言之中、从有意无意的掩饰之中、从一个个的闪避之中诊断出深藏的原痛与创伤。事实上，拉克劳与莫菲原本就没有想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这里侥幸地挖出一个“大金矿”，他们十分清楚，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拱心石依然是“历史必然性”。他们

^①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p. 61.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68.

只是想探测“必然性之石”的裂缝和断层、褶皱与罅隙，他们只想通过“历史必然性”这面已经破碎的镜子“折射出”新的社会逻辑。新的社会逻辑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还没有正式出现，它只是拉克劳与莫菲眼中的镜像。此时，不仅霸权没有真正出场，就连霸权的逻辑也只是以异化的形式显现。

拉克劳与莫菲以罗莎·卢森堡为开端，不是因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罗莎·卢森堡最早使用霸权概念，而是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必然性逻辑与偶然性逻辑以戏剧化的方式遭遇了。这两种逻辑突然的碰撞，并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唯一吸引拉克劳与莫菲的东西，就是碰撞后留下的一道裂痕。这一破裂之处，既是必然性的创口，也是偶然性发声流淌的通道。从创口流出的不仅仅是痛苦的呻吟！这是拉克劳与莫菲确信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上，斯图亚特·西姆的态度全然不像诺曼·杰拉斯那样激烈拒斥、怒不可遏，而是表现出一种十分平和、宽容的姿态。西姆倒不在意拉克劳与莫菲是否歪曲了罗莎·卢森堡的本意，而是看重他们的阐发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否与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某些方面契合，是否在理论视界的转换之中实现了“旧义”在改变了的背景之下的诠释学重塑。西姆也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自发性概念所蕴含的偶然性逻辑暗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卢森堡是为数不多的直面偶然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的一个，并且我们发现她以一种比其他人更严峻的姿态在思考这种不连续性。一般讲来，偶然性作为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因素被古典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允许偶然性进入社会均衡因素之中就是暗示：马克思主义小于（达不到）一个思想总体，并且它的运作逻辑在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下是有缺陷的。偶然性甚至使问题进一步变得晦暗不明，因为它暗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机器所施加的控制的缺乏，或者，更令人忧虑重重的是这种控制的无能。^①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14.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拉克劳与莫菲以罗莎·卢森堡为开端的原因所在：其一，罗莎·卢森堡通过自发性概念天才地触碰到了霸权逻辑，尽管这一逻辑没有得到如拉克劳与莫菲所想象的那种展开，但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它毕竟是卢森堡思想天空中闪电般骤亮的一瞬。其二，自发性的确认及其人为限制，形成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而“双重空场”更是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以鲜明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对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典范性意义。按拉克劳与莫菲之见，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几乎所有理论家都遭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以罗莎·卢森堡尤为突出。其三，在罗莎·卢森堡这里，霸权逻辑并没有填补由于必然性链条的断裂而形成的空场，此时还谈不上霸权概念的真正出场，因此，所谓的概念谱系学只能是一种“隐匿的考古学”：它的任务只是揭示霸权逻辑被遮蔽、被抑制的苦难历程。而在罗莎·卢森堡这里发生的，也以不同的变化形式出现在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那里，因此，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分析，有一种统领性作用。

可以说，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置于开端处，既不是为了表明罗莎·卢森堡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不是为了表明他们要步罗莎·卢森堡之后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与莫菲非常明白，由于罗莎·卢森堡拒不放弃某些东西，所以她还不够资格能被叫作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由于拉克劳与莫菲抛弃了太多的东西，所以他们担心自己是否还有资格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与莫菲将罗莎·卢森堡置于开端处，或多或少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愿景：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那里发现一点后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而让坚定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与莫菲那里保留些许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如此一来，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但总归还惦念着马克思主义，或许就像西姆所说的，像拉克劳与莫菲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还存着一种割舍不掉的怀旧之情。

第六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之维

拉克劳与莫菲对霸权的谱系学分析作出了一个总结，他们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一过程：第一，通过“考古”，发现了裂缝，发现了空场；第二，偶然性逻辑表现出了逐渐扩张的趋势。通过第一个角度，他们断定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危机；通过第二个角度，他们暗示，空场应该由霸权概念来填补，但是一直没有“填”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偶然性逻辑的扩张受到了限制，受到了阻碍。这个障碍物耸立在那里，如此难以逾越，不要说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像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卢森堡过不去，就连列宁、甚至葛兰西也同样过不去。只要过不了这个阻挡，完全意义上的霸权接合就不会出场，正因这个障碍非同一般，拉克劳与莫菲给它起了个名号：“最后的棱堡”（the last redoubt）。拉克劳与莫菲从葛兰西那里走出来，又到第二国际那里跑了一圈，感到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根本谈不上完全意义上的霸权接合。既然执意要拥抱后马克思主义，既然坚持一个不受任何先验约束、自由无羁的霸权接合，那么就非得过这道关口不行。这道关口就是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最后的、赋予所有历史过程一种有倾向的意义的理性基础，在关于社会的地形学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① 在早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76.

期文本中，拉克劳与莫菲满以为这一“特殊位置”还不那么碍事，而现在他们终于发现，这个特殊位置乃是本质主义的恶性毒瘤，它不但自己本身有毒，而且还向其他区域扩散，比如说，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伯恩斯坦本来就脱出了经济的最终决定，可是他却偏偏又陷入了另一种“最终决定”，这大半是受这种决定论逻辑模式影响的缘故。所以，拉克劳与莫菲这一次的反经济主义与早期的反经济主义是大不相同的，早期“反”的是经济的直接的、机械主义的决定，以使意识形态获得自主性空间；而现在，他们“反”的是作为本质主义的经济主义，以根本解除霸权接合的外在限制。

第一节 拆除最后的棱堡：解构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

一、经济层面建构霸权主体的“三个条件”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空间在建构霸权实践的主体上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经济运动的规律严格说来必须是内生性的，即是说，它排除了一切来自政治的或其他的外在介入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掺入了其他因素，就不能严格地说这一建构作用专门归属于经济；其二，在经济层面上建构的社会代理人的统一和同质性，一定得从该层面的那些运动规律中产生出来，这意味着，任何需要在经济之外对那些分裂、分散的立场进行重新组合的情况被排除了，换言之，阶级主体的统一性只来自于经济决定；其三，社会代理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必定赋予他们以历史性利益，以至于这些社会代理人在社会的其他层面的存在必须最终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获得解释，即是说，经济利益并不限于在经济范围内起作用，关于社会的整个思考都锚定于经济。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作了他们自己的特定“理解”，通过这三条，他们描述了一个纯而又纯、“自力更生”、封闭孤立、界线严格的“经济”概念——经济就是经济，它里面丝毫没有政治要素，它只能影响社会的其他层面，而社会的其他层面却不能

介入它的“王国”，它威力无穷，全部的社会思考都围绕着它进行，它是解释的根据，它是锻造阶级统一的唯一元素。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概括在何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的本真意义，尚有许多疑问。比如说，马克思对经济的研究从来就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看经济，即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的关系，他把商品不是看作一个简单的“物”，而是看成多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他的经济学叫作政治经济学。再比如，马克思从来没有断言经济关系一定会导致统一的主体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工人阶级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①，生存的困窘使工人在相互竞争中处于分散状态，而相同的处境和条件又使他们的团结成为可能，马克思并没有断定工人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会自然而然地造就工人阶级的统一，否则就无需“通过联合”了。

拉克劳与莫菲的这三条概括本身表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原本就是严格的决定论的、地地道道的本质主义的。这样一来，他们下一步的“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从本质主义的范畴必然得出本质主义的结论。对于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手法”，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诺尔曼·杰拉斯说：“拉克劳与莫菲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笨拙的、歪曲化的、也是最贫乏的解释。”^② 艾伦·伍德说：“这种理论方案的第一步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它以对马克思主义过分的误解为开端，以致我们对他们的整个论断产生了质疑。”^③

无论如何，拉克劳与莫菲就是这样认定的，他们早年一直把“经济的最终决定”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底线，如果越出了这个底线，也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或许与他们自己所走过的“漫长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有关，当初他们追随阿尔都塞，发现阿尔都塞尽管一直反对所谓的“副现象”，可他却不假思索地保留着这个“经济的最终决定”；后来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页。

② *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p. 48.

③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4.

们返回到葛兰西那里，发现葛兰西尽管反对阶级还原论，可他也果断地坚持“经济的最后决定”；就连卢卡奇这样的“上层建筑主义者”也毫不含糊地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纯粹的阶级……其他阶级行动的动摇或者不可能取得有利于发展的成果的根本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完全是以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为基础。”^①至于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们，就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何止是“最终的”！拉克劳与莫菲这样前后一想，就更加肯定了这样的结论：经济基础的如此的“基础”地位，经济空间的最终决定作用，原本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既然现在他们已经从这个底线走了出来，也就用不着再去指责葛兰西了，根子在马克思那里，那就把矛头径直指向马克思吧，这大致就是拉克劳与莫菲的思路，所以，接下来他们开始去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命题”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三个关于由经济层面最终建构霸权主体的条件，对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论点：经济规律的内生性这个条件相应于生产力的中立性质这一论题；经济层面上社会代理人的统一性相对应的是工人阶级的逐渐同质化与贫困化这一论点；生产关系应该是超越经济范围的“历史利益”的场所，它对应于这一论题：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这三个命题涉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讨论，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且不说他们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能令人信服，但他们确实是在通过这一分析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动全面的、正面的“进攻”，在他们超越葛兰西之后，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反对经济主义到反对“经济的最终决定”，现在，他们开始反对“生产力的一般发展规律”。他们好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经济主义的本质主义残余原来发轫于“中性的生产力”！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5页。

很显然，这三个命题如此排列，反映了拉克劳与莫菲的思路与推理进程：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优先的政治主力军这一论点，其前提是假定了在生产关系层面形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工人阶级；而这又依赖于作为一个自然过程的中性的生产力的发展，即是说，无产阶级将会对于技术要求的机制性回应中自然地出现。如果要否定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必然联系，势必先要对“中性的生产力”进行解构，只要把此一“魔障”去除了，下面的两个论点就丧失了根基。

三、“中性生产力”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一个“中性生产力”的概念。什么是“中性生产力”呢？拉克劳与莫菲的界定是：“介入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要素都受生产力的决定。”^①即是说，生产力这一自然的、客观的力量控制了全部生产过程，它自然地、单线性（unilinear）地发展着、扩张着，它的速度和节奏由它本身决定，而生产过程中其他的因素却不能决定生产力。很显然，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作了最大程度的机械主义的、严格决定论的“加工”：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可以决定其他要素，而其他要素不能丝毫影响生产力，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都可以在生产力那里获得合理解释，而其他这些东西却根本撼动不了生产力，生产力是自我规定的、自我决定的。生产力简直像一个“自在之物”，几乎获得了完全的先验性，把这样的—个生产力概念归之于马克思，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马克思固然是坚持生产力作为物质力量的客观性，但并没有把这一客观性视为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中立的”东西，马克思诚然坚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优先地位，但也没有否认生产关系可以对生产力起一定作用。拉克劳与莫菲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作了绝对化的理解，然后把这种绝对化硬塞给马克思，正因如此，他们招来了诺尔曼·杰拉斯愤怒的指责，说他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马克思主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78.

义的拙劣漫画!

让我们更详细地检视一下拉克劳与莫菲对“中性生产力”的种种指摘与批驳。他们认为,马克思为了保证生产力的“中立性”,诉诸于虚构,把劳动力想象成一种商品,这样做就忽视了劳动力作为生产过程中一种要素的一系列的完整特征。“劳动力不同于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因为资本家必须做比简单购买它还要更多的事情,他还必须使它从事劳动。”^①这就是说,劳动力并不像其他商品一样,一买进来就自动发挥作用,资本家还要对劳动进行组织、管理、控制,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它的“生产能力”并不是它本身的自然规定。资方一旦购进劳动力,就最大限度地从劳动力那里“抽取”劳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就是一项“抽取”劳动的技术,这种技术本身也是劳动力的“生产能力”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有控制,就有对强加控制的反对与抵抗,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平衡与冲突也影响劳动力的“生产能力”。拉克劳与莫菲的意思是说,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独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它本身不是自我规定的,而是一种建构过程,它的生产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许多变量,“并不是纯粹资本的逻辑控制着劳动过程的演进,劳动过程不仅是资本发挥控制作用的场所,它也是斗争的基地”^②。既然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各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那么它就不是商品;既然生产力是斗争的结果,那么它当然就不再是中性的。

拉克劳与莫菲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还援引了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关于劳动过程控制技术的研究成果,从中发挥出以下几点识见:(1)控制的多种尝试与变化,表明了“生产的政治学”的存在,从而向那种把资本主义单单看作竞争的规律及积累的要求之产物的观念提出了挑战;(2)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能仅仅用资本逻辑的扩张来加以解释,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导致控制形式与组织方式的变化,生产本身是一种政治机制;(3)既然资本逻辑与反抗逻辑的分裂与制约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78.

^② Ibid., p. 79.

那么它也必定影响生产力扩张的特性与节律。通过这样的分析，拉克劳与莫菲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因此，生产力是中性的以及把它的发展看成是自然和单线性的这种论点，就完全没有根据了。”^①

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这些，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根本没看到生产过程中组织与控制对生产力的影响吗？在这方面只需听一听艾伦·伍德对他们的反驳就够了：

这些对于马克思的无知指控实在使人惊讶，实际上，马克思对以下一些方面已有足够的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对抗性；商品拜物教；劳动力这种包含在活生生的、斗争着的人之中的“特殊”商品的特性；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性”——在这种生产中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密不可分；这种“双重性”是如何歪曲了生产组织，使其同时作为对于对抗性的剥削关系的组织而存在；出于资本控制阶级对抗及工人反抗的状况的需要而形成生产组织的种种方式；工人阶级的斗争史以及他们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劳动工具和现代“科学与技术”本身并非“中性的”，而是渗透着阶级剥削、统治和斗争的关系，等等。^②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同艾伦·伍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尽量突出生产过程中的剥削、阶级敌对，而前者则极力淡化劳资冲突，强调斗争不完全由资本逻辑所导致；后者把控制形式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前者则把组织方式当作政治机制；后者把资本主义下的管理形式看作一种歪曲的组织，而前者则把资本主义的控制技术当作不可避免的存在；后者把劳资矛盾看作是内在于生产过程、是尖锐对立的，而前者则认为劳资之间对抗的形成并不完全局限于生产过程，并且这种对抗并非完全是消极性的。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生产力不是中性的，伍德也认为生产力不是中性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0.

^②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8.

的，并断定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但是他们对生产力的“非中性”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伍德强调“非中性”，是突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特征，而拉克劳与莫菲坚持“非中性”，是为了突出生产力本身的开放性、非固定性。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方不对，而要具体分析造成双方分歧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我认为马克思当然注意到了生产力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伍德的意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这些对生产力造成影响的因素，其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比如说，由于资本家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来进行剥削，从而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假设这一斗争的结果是资本家转而采用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剥削工人，但是，这里面必须有一个前提：技术的进步使资本家有条件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形式改变的空间就不大，而技术进步当然是生产力发展所致。斗争带来了控制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取得仍然有生产力物质性决定因素的作用。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确实有“自我规定”的意味。

而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生产力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这个“斗争”与马克思的不一样之处在于：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一斗争不完全是由资本逻辑引起的，它可能完全处在资本逻辑的“外围”，它可能是组织形式本身的原因，或者是文化的、政治的、民族习惯方面的原因，比如像拉克劳与莫菲所举的英国工会的例子，英国的工会强大，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促成工人抵抗运动，从而造成组织的变化。拉克劳与莫菲有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剥削固然会引起抵抗，但它并不是产生对立的必要条件，工资高、受剥削程度低的工人的反抗意识并不一定比工资低、受剥削程度高的工人的反抗意识低。甚至一些个人原因也会引起大规模的抵制的动员，比方说，由于资本家的处事方式或者说说话不当都会引发工人的抵抗，而这一抵抗却造成了资本家管理方式的革新。处于生产空间外的一些公共社会问题也会引起工人阶级的斗争，比如，由于生态问题、种族问题或同性恋问题也会引发工人阶级的斗争，而斗争很可能给生产组织形式带来某种意外的变化，等等。

这样看来，拉克劳与莫菲是将生产力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它是多种变量复合作用的体系。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逻辑问题：拉克劳与莫菲坚

持劳动过程必须处于控制关系之中，那么各种不同的控制技术本身是生产力吗？如果是，那么生产力仍是“自我规定的”，如果不是，那么意味着存在控制关系之外的“中性生产力”，它像一个“自在之物”一样存在，而控制关系则给它提供了一个“表象”形式。从拉克劳与莫菲论证的倾向性来看，他们既想避免一个完全自我规定的中立性生产力的“形象”，又想把控制形式纳入生产力之中，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两难困境。从资本逻辑之外政治、文化、伦理、生活方式的介入来看，这些影响因素当然不完全处于劳动过程中，而从它们确实参与了生产力建构来看，它们又是其中的要素，所以一个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控制形式及其机制既在生产力之中又在生产力之外。当然，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达到这样明确的结论。

从总体上看，拉克劳与莫菲的论证并不是很有力，在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时，他们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多是借用别人的结论，给人以经验例证的零碎感，缺乏足够细密的理论分析，在逻辑上也存有一些含混之处。有这些薄弱之处，再加上观点的激进、样式的时髦，所以他们招致各种激烈的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他们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对生产力概念的独特理解，毕竟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的一种理论探索。在整体倾向上，他们的工作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阿伦特关于劳动、工作、行动三者区分的理论，具有共同的理论旨趣，即是说，这些理论家都觉得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或生产概念过于工具主义，而试图以种种方式来超越这一局限。哈贝马斯引入交往范式取代马克思的劳动范式，阿伦特通过划分的方式避免把一切解释都建立于劳动概念之上，而拉克劳与莫菲则通过重塑生产力空间而把劳动过程政治化，正如他们自己表白的那样：“我们打算证明，经济的空间本身是被建构为一个政治空间的，而且在这种空间里，像在任何其他社会层面一样，我们描绘成为霸权的那些实践，是充分地产生作用的。”^①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77.

拉克劳与莫菲通过对所谓“中性生产力”的批判,对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新阐释,这种阐释的目标就是为了瓦解一个封闭性的、自我规定的、对社会关系具有先验决定力量的生产力,从而说明经济领域并不是服从内生规律的自我调整的空间,这就为下一步解构在经济层面达成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

在论及何谓后马克思主义时,R. 奇尔科特和 E. 奇尔科特在 1989 年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指的是从强调资产阶级秩序的矛盾、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困境转而强调日益分散意识形态影响和缩小斗争的一种新兴理论秩序”。尽管这一界定的精确性和全面性尚可存疑,但它毕竟抓住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降低,使许多新左派产生了理论困惑和政治失重,他们认识到:“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阶级来解放全社会不再是理解或预期社会变革的模型了。”^①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观点滋生孕育的契机。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解构,从他们理论演进的理路看,当然可以像艾伦·伍德评论的那样,把它视作他们早期反阶级还原论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批判阶级还原论并不等同于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葛兰西和阿尔都塞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阶级还原论,但他们并没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产生质疑。拉克劳与莫菲在 1981 年宣布超越葛兰西,这一立场的转移、变化也是在吸纳、借鉴了别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因此,在审理拉克劳与莫菲对阶级概念的解构方案之前,有必要先对他们置身其中的思想背景作一番大致的考察。

^① 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一、从阶级意识的衰退到普遍主体的消失

在论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浮出”历史表面的社会根源时，斯图亚特·西姆说道：“这并不仅仅是我们学术性知识探索和政治氛围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而是一系列激进的文化变化业已发生，它使左派马克思主义茫茫然不知如何前去有效地应对。这一世界的一个最醒目的特征便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重要性的衰微……众多的评论家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意义。”^①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哪里去了？工人阶级怎么了？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甚至卢卡奇在总结匈牙利革命失败时，也没有怀疑过工人阶级不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说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淡漠了，所以卢卡奇诉诸总体性的辩证法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物化”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发育和生长的巨大阻挠。而卢卡奇对总体性的渴望不仅带有强烈的救世乌托邦主义色彩，而且难免泛化出一种极权主义的趋向，因此之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阿多诺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一直穷追猛打。而1968年“五月风暴”又历史性地印证了总体性逻辑的坍塌。“五月风暴”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其后，一些左派思想家开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变化重新考量，在这方面，尼柯斯·普兰查斯和安德烈·高兹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普兰查斯阶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引进了“新小资产阶级”理论以“消解”盛极一时的“新中产阶级”理论。他抵制阶级界定的纯粹经济标准，而坚持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到阶级划分中来，并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与阶级划分的基础纠缠在一起，这样一来，他就有了两个“杀手锏”或者说“双重标准”：他利用后一标准将非生产性“白领”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同时借助前一原则把生产领域中的“白领”分离出工人阶级。他这样双层“过滤”的结果便是“发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5.

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就从大多数被减少到一个残余的群体”。^① 普兰查斯捍卫工人阶级的纯洁性和革命霸权的努力造成了一个令传统左派不安的结果：工人阶级少数化、边缘化了，正如艾伦·伍德恰如其分地评论的那样：“普兰查斯在总体上关于阶级的定义与其特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把社会主义策略的聚焦点从形成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转移到构筑以阶级差异和划分为基础的‘人民同盟’上去了。”^② 而这一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定位。难怪有位评论家说，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在普兰查斯这里都以萌芽的形式出现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会循其理论逻辑与政治路径而达至诸多他的后阿尔都塞主义的同事们今日的情形。”^③

如果说普兰查斯的思想在“五月风暴”前后有一个从《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68）所表达的“极左偏向”到《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的“欧洲共产主义”色调的明显变化，那么安德烈·高兹的情形则更为突出，也更具范型性意义。在《工人阶级的战略和新资本主义》（英文译名为《劳工战略》）（1964）中，高兹几乎将整个“白领”阶层都划进工人阶级的圈子并追随马勒将其称为“新工人阶级”。在高兹看来，技术人员、工程师、学生、学者及研究人员虽然在生活上与一般工人群众有着明显的差距，但这并不构成将之归入“新中产阶级”的理由，因为专业人员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同样受资本规律的压制，同样遭受被异化的命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时高兹的思想是萨特存在主义和卢卡奇总体性逻辑的奇妙结合，它成了几年后学生运动的理论先导和实际的催生剂。

但是，“五月风暴”之后，高兹完全抛弃了他的“新工人阶级”理论，在《劳动分工批判》（1973）中，他虽然仍不遗余力地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开刀并把劳动分工指认为一切异化的根源，但他此时已不再将专业人员队伍当作工人阶级看待了，“即使把产业中的科技劳动者视为被剥削、被异化的生产性劳动者似乎是正确的，那么认为他们纯粹是工人阶级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42.

② Ibid.

③ Ibid., p. 25.

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错误的”。^①在此，高兹看到了一个悖论性现象：科技在“被异化”的同时却又制造着“异化”。技术成了资本逻辑的“作者”，或者说它本身就像哈贝马斯所言，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科技的这一偏激态度导致了其阶级理论的退却和左派立场的保守化。虽然高兹没有运用“阶级规定”和“阶级立场”的普兰查斯式的区分，但他几乎达到了与普兰查斯相同的结论：即便“白领”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仍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既不是作为无产阶级，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是防止自己无产阶级化才反对资本主义的。

但高兹的“退却”并没有停止，他思想中的萨特存在主义“根底”使他“一退千里”。在1980年出版的《告别工人阶级》中，他提出了“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概念。“那种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不过是具有特权的少数，而今大部分人口属于并无职业安定感或者说没有确定的阶级身份的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他们遍布在见习的、合同的、不定期的、临时的和业余的工作领域。在不太久的将来，像这样的工作大体上要被自动化所消除。”^②在高兹看来，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疏离于稳定而连续的工作场所，劳动的片断化和随机性、间断性使他们对任何阶级意识或团结感的诉求都无动于衷。如果继续向后工业社会前进，它必将衍化为“非工人的非阶级”（a non-class of non-workers）：既算不上“工人”，也不构成“阶级”。

尽管高兹的“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概念尚有诸多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高兹意欲彻底“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一“神秘的概念”或者说“幻象”（西姆语）。可以说，高兹的这一激进方案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和逻辑延展，或者说是对其二者的“整合”。在高兹这里，“工人”这一概念被“祛魅”了，它褪掉加于其上的许许多多的政治寄寓和理论负载——工人，不过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字眼。在工作场所日益分散化、对抗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里，作为普遍主体

^①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86页。

^②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6.

的大写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在场”了。如果说工人还将存在，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它在社会建构中作为单一的普遍主体的本体论式的中心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罗纳尔多·蒙克给了这种“工人”一个特别的称谓：“后马克思主义工人。”^①

无论如何，在拉克劳与莫菲开始启动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规划之前，已经有人对这一概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在前文中业已指出，英国的赫斯特和辛德斯在1977年就已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进行了批判，只不过那时，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而到了80年代初，欧洲共产主义已悄然衰退，全球范围内左派运动普遍受挫，而在这个当口，高兹叫出“告别工人阶级”的口号，拉克劳与莫菲听起来就特别入耳、特别易于接受。台湾学者陈宜中先生把赫斯特和辛德斯称为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但是，要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于阶级概念的解构并不是直接得之于赫斯特和辛德斯的启发，而是受高兹的影响较大。当然，他们对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又有自己独特的理路和途径，下面，我们就转入对他们解构方案的具体分析。

二、解构工人阶级的统一性

在上一章里，我已指出，拉克劳与莫菲在1981年的论文《社会主义策略，下一步在哪儿？》中已对工人阶级的霸权地位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不能被视为是由经济结构先验保证的具有本体论地位的特权，但那时，他们还没有对“经济结构”进行解构，所以还没有正式提出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概念。而现在，既然为工人阶级的统一性提供担保的经济空间已经被他们“拆散”，那么，接下来的任务自然就是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

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建立在工人的经济关系上，这样就赋予了“经济”以特权地位。但是，拉克劳与莫菲证明，经济的如此“特权”是虚假的，它本身无法建构一个单一的、内生的逻辑规律，劳动

^① Ronaldo Munck: *Marx @ 2000: 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 Macmillan Press, 2000, p. 72.

过程要维系下去，需要各种其他关系的介入，工人的抵抗也是劳动过程组织形式的构成要素，这样一来，经济空间就既不稳定也不固定，它自身尚无明确的一致性，也根本不“纯粹”，又如何能保证在它上面建构其他的统一性，因此，从逻辑上讲，经济层面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性，这就是拉克劳与莫菲论证的第一步。

但是，这样得出结论，似乎太简单也太容易了，而且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因为即便经济规律不是内生性的，工人也可能由于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而达成阶级统一。但是，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并没有把“生产的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与“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区分开来。“生产的关系”与“生产中的关系”的区分是迈克·布拉瓦伊（Michael Burawoy）提出的。所谓“生产的关系”表示工人通过契约关系而进入生产过程，或者说，因为“生产”，工人进入了一个由工资形式体现其价值的控制方式之中，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形式；所谓“生产中的关系”指的是工人作为劳动力在多元决定之下“创造”出来的关系，它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已蕴含了这两种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包含着跟它们自己的运动规律相关的两种独特的关系：通过劳动力的出卖建立的工资关系——这种关系把工人转变成无产阶级；从工人在劳动中的地位产生出来的工资关系——这使它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①但是，这两种关系的差别，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明晰地显现出来，这不仅是由于这两种关系在马克思当下的历史经验中趋于一致，更是因为马克思把劳动力仅仅看作是简单的商品，并倾向于从在劳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中抹去其蕴含的所有自主性和适宜性。拉克劳与莫菲与马克思的分歧再一次显露出来：马克思总体上把资本主义的劳动看作是处于异化状态之下的，所以他强调的是劳动的附属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1.

性、破碎性，强调劳动处在不合理的控制关系与组织形式下；而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完全将控制关系看作是歪曲的组织形式，处于契约关系中的工人并不完全外在于控制关系，这就是说，在通过劳动过程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工人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资本主义早期，这两种“关系”的分界是模糊不清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今后工业时代的境遇之下，这两种关系的界线越来越明晰。拉克劳与莫菲对这两种关系区分的强调让我们想起了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重要成员雅克·比岱所提出的“元结构”理论。比岱认为，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是唯一的元结构成分，现代社会的元结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综合的形式，它不是一元性的而是三元性的，它是市场、计划和直接合作的三元辩证关系。比岱对“元结构”进行拓展，其用意在于说明资本逻辑同计划的关系并不是历时性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取代关系，市场与社会主义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控制与组织形式中有一些因素可以被社会主义吸纳，社会主义不是与资本主义的所有“关系”完全“决裂”。拉克劳与莫菲说“生产中的关系”有自主性与适当性，当然也隐含着劳动控制形式的“和平”过渡而不是根本断裂。

既然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维度，而且这两个维度的不对称性日益增大，那么就不能仅仅因为工人同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员，而断言他们一定会具有相同的阶级立场，所以，拉克劳与莫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两种关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从而使得把工人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这一共同标签成了问题。”^①那么具体而言，工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中会产生出怎样的不同主体位置呢？拉克劳与莫菲列举了种种类型，比如，就技术层次而言，掌握高新技术的工人、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半技术的工人、无技术的工人、结构性失业工人等等。不同的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1.

技术等级使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即便技术水平处于同一等级，工人也可能由于其他因素创造出不同的“关系”。再比如，在工人这一群体中，生产因素之外的一些社会特征，如人种的、性别的、性偏好的、民族的、宗教的、生态立场的、文化的等等，也会影响工人的一致性的形成。这是拉克劳与莫菲的第二层论证。

我们知道，把经济空间构想为政治的领域，把劳动过程视为斗争的场所，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对工人阶级统一性的质疑与反驳中，他们同样考察了政治因素的介入给工人团结带来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资产阶级会根据工人群体的不同抵抗能力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分化、瓦解工人；另一方面，工人群体以及工会本身的政治实践水平及反抗能力的差别也会加剧工人的离散倾向。“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分化，比之于那些希望其分化来说，有更加深刻的根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自己实践的结果，它们是政治的分化，而不完全是经济的分化。”^① 这种与经济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呢？这当然不是指传统理性主义的宏观政治，而是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它也许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抵制，也许是一种抗拒权威主义的激进渲泻，也许是对认同牢笼的反冲，也许是对某种政治风格的刻意追求……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政治本身的差异造成了一条条不可完全缝合的裂口，它使工人阶级的统一成为一种虚构和幻想，“今天，我们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更不必说把它追溯到资本积累规律所描述的那种机制上去”^②，直接引入后现代政治观来冲蚀工人阶级统一的主张，这是拉克劳与莫菲最后的“举措”。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2.

^② Ibid.

三、解构“历史利益”——拆解工人阶级 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

我们知道，普兰查斯通过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人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然后又通过意识形态标准将一部分地位较高的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也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这样无产阶级的数量就少了，但无产阶级的“纯粹性”却得到保证。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样一种“受到限制”的无产阶级概念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普兰查斯假定：工人阶级的分裂是不同的社会代理人中间的立场分裂。而实际的情况则是，“在社会代理人本身之内存在着立场的分裂，这些社会代理人的立场缺乏最终的合理的一致性”^①，这就是说，普兰查斯所界定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也没有阶级立场的一致性。

普兰查斯为什么致力于寻找“真正的”无产阶级呢？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一目标是“政治性的”：工人的经济利益把工人与社会主义的前景直接联系起来，他们因此注定要去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恰恰是在这个地方，问题出现了：工人的经济利益被“过度诠释”了，其一是，工人未必有一个统一的“客观利益”，把一个整齐划一的“客观利益”归之于“工人阶级”是武断的；其二是，即便工人有所谓一致性的“客观利益”，这一“客观利益”也不能等同于“历史利益”，而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存在着一个未加证明的设定：工人的利益就是客观的历史利益，这一利益依附于合理性的、必然的历史运动。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种末世论的历史观与“客观利益”是互相加强的，因为有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所以必然有一个与之相契合的“客观利益”，换言之，“客观利益”只有在这种末世论的历史观念中才具有意义。

“客观利益”涉及的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观，因此抛弃“客观利益”的概念也就是祛除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念，“或者持有这样的历史理论，按照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4.

这一理论，在无产阶级千禧国来临的时候，主体立场的矛盾多元性将被消除，绝对统一的工人阶级变得清晰可见——在此一情形下，‘客观利益’一开始就被决定了；要不然，就是抛弃这一历史理论，并随之抛弃将某一主体立场特权化的任何基础（这种基础决定了社会代理人作为整体的‘客观利益’）——这此一情形下，客观利益的观念变得毫无意义了”。^① 拉克劳与莫菲的立场是鲜明的：在后工业社会中，工人的主体立场越发难以整合并日益分散破碎，主体立场的复杂化及多样性使单一中心决定的先验统一性成为不可能，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的“工人阶级概念”不再具有任何理论和政治意义。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客观利益”概念的质疑，主要是为了消解掉其中蕴含的“必然性”，在这一点上，艾伦·伍德对拉克劳与莫菲的指责显得有些过分。艾伦·伍德说：“总之，拉克劳与莫菲的论断是，不存在像物质利益这样的东西，只存在随意建构起来的关于物质利益的观念和想法。”^② 伍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拉克劳与莫菲的原意，因为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一般地否定物质利益的存在，他们否定的是某一物质利益先验性地、必然性地转化为政治目标，物质利益当然与政治斗争有关联，但这一关联不是机械决定论的、绝对的、线性的，物质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还要受到其他多元因素的影响，正如拉克劳与莫菲所表白的，他们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利益是不能够在逻辑上从经济过程中的一定立场中推导出来的。”^③ 一句话，工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主义追求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拉克劳与莫菲的核心观念清楚地显现出来：政治斗争是多元建构的过程，没有一个基础潜伏在那里起决定一切的作用，主体位置与政治目标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它处在一种不断的接合与拆解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可能不趋向于社会主义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是不相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4.

^②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61.

^③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4.

容的”^①，因为在某种政治情景下，工人阶级也完全有可能将其物质利益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只不过，这种联系不能被视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固有的、固有的联系，它是一种偶然的接合。

在论及拉克劳与莫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时，艾伦·伍德说道：“作为统一的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如果并不完全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需要‘外在的介入’，比如说，以政治教育和组织形式，那么，它必然就失去了作为革命代理人的优先性，或许甚至失去了其作为一个阶级的角色认同。”^②在艾伦·伍德看来，这一结果既不可思议，也无法接受，因为他们把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弄得轻飘飘的，没有了一点庄严与崇高，也缺失了历史的厚重与深沉的正义承载。其实，这种在伍德眼中充满了贬损意味的“消极效果”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却正好是“积极的效果”，他们的解构规划就是要祛除长期以来依附于工人阶级身上的“圣光灵晕”，使工人阶级显现它本来的模样，或者这就好像是，工人阶级被化了很厚的“妆”，拉克劳与莫菲使用了酸性洗涤剂来清除一层层的脂粉铅华，对伍德、杰拉斯、雷诺兹等人而言，这些洗涤剂已灼伤了肌肤，甚至毁坏了面容，歪曲了形象；而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除非如此强力侵蚀，否则“工人阶级”就显现不出“本真”面目来。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拉克劳与莫菲指责普兰查斯寻找“真正的”无产阶级是一个错误，其实，他们自己也在寻找——寻找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工人阶级。要始终记住这一点：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完全取消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他们取消的是工人阶级概念中的本质主义因素。就如拉克劳在1987年的一篇论文《阶级战及其之后》表述的那样，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并不导致否认动员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特定情境中的有效性，而是导向一个毋宁是相当不同的断定：工人阶级——像所有其他成分一样——是一种社会作用力，但此一作用局限于它自己的目标及可能性之内，它并非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4.

^②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60.

‘普遍阶级’，并非是世界人类解放的必然代理人”^①。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点：前者竭力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往高处提——如果工人阶级的意识达不到普遍历史利益的高度，那么这一意识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它还没有克服物化状态；后者竭力将工人阶级的意识限制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它表现为与其他因素的遇合、连接，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绝对的总体性。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工人阶级的局限性问题一直就存在。即使在正统派的考茨基那里，也要求知识分子的偶然介入。卢卡奇主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被赋予的”，而列宁更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既然工人阶级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既然工人阶级是历史必然规律的表达，那么它本身为什么还不能产生出先进的意识，还需要外在的“赋予”与“灌输”？在何种程度上，从外面灌进去的意识是工人阶级的内在意识？拉克劳与莫菲要质疑的恰恰就是：什么保证了赋予者的意识与接受者的意识完全重叠一致？难道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赋予意识的赋予者自己意识到他不过是在“利用”工人阶级的意识？即是说，工人阶级的意识只是赋予者意识的“接合”对象，它们原本是不完全同质的、不完全契合的、不完全绝对一体的。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待工人阶级局限性的另一种方式是将那种无限制的历史活动力量这一观念保留下来，这种历史活动力量能够完成人类解放的“普遍”任务，这种方式只不过是将来人类解放的普遍任务从工人那里“转移”到历史舞台上的其他代理人身上罢了。20世纪60年代左派的许多部分（尤其在美国，但不仅仅是）特别地倾向于为这一角色提出新的候选人——学生运动、第三世界各民族、妇女、边缘人等等。但是，这些候选人都没能达到期望值。

正是在这一时刻，如此的想法“浮现”出来：也许错误的东西与无产阶级及其实际的斗争并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倒恰恰是“历史变化的基本社会代理人”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有一个全球性解放的规划并且它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30.

得由一个恰当的社会代理人去执行。越来越受到拷问的是作为统一进程的整个历史的概念——过去、现在、未来——在这种历史概念之内，角色被理智性地归诸假想的活动力量，这种活动力量后来被认同为具体的社会代理人：工人、群众等等。当代理人并没有以被期待的方式行动的时候，这就被解释为“虚假意识”的结果，“虚假意识”这一概念无非是说人们没有按照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依照的方式进行思考。因为左派长期以来生活在普遍主体（阶级、政党）及科学（即真理的宝藏）的社会主义世界中，所以，就连这样朴素的认识——历史是实用的和有限性结构的过程而不是普遍命运的实现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增长的幻灭感。

是否承认工人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如何定位这一局限性，成为当今左派政治斗争策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参照点。拉克劳与莫菲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无非就是对无产阶级局限性的“新认识”与“新的回应方式”。他们的基本态度是：“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这就是说，基于种种社会运动的自治性的多元主义乃是政治的准则……我们建议的是，要通过那些完全接受了那种零碎化的组织化形式对当今社会斗争的弥散化和零碎化作出回应。工人、妇女、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他们的斗争必须在没有对任何统一方向的附属的状态下得以实现。”^①

第三节 解构实证性的社会概念

拉克劳与莫菲对本质主义经济空间的解构、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实质上也就是对本质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解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空间是每一社会形态的基础结构，而阶级关系则是阶级社会中政治层面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对自我调节的、具有内生性的经济空间的“摧毁”、对先验阶级统一性的消解、对所谓历史利益的拒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32.

认,无不关涉到社会的秩序与规律,即社会的同一性问题:社会有没有一个必然的构形模式?社会同一性有没有一套固定的、稳定的决定原则?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是与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要彻底根除本质主义,必须从总体上否定实证性的社会概念,必须消解掉社会的先验一致性,必须废黜作为建构其部分过程之绝对总体的“社会”观念。

一、多元决定与结构性总体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曾明确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①也就是说,马克思向来是从总体性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把社会看作是各种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但是,对马克思的总体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在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那里,总体被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是历史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阿尔都塞则从结构主义的立场把总体理解为一种结构性复杂整体。因此,理解社会概念也就是如何把握总体概念的问题。

拉克劳与莫菲对总体概念的剖析是从阿尔都塞开始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早年一度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是说,他们对阿尔都塞的文本特别熟悉),更是因为,阿尔都塞在对总体这一概念阐发的过程中引入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思想对拉克劳与莫菲产生了很大的激发力,它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本质主义的消解上,而且表现在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建构中,多元决定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点。

马克思的总体概念来源于黑格尔,这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总体概念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黑格尔的总体概念?一如阿尔都塞指出的:“‘总体’这个概念今天应用得十分广泛,人们用这个词,几乎可以毫无阻拦地从黑格尔谈到马克思,又从形态心理学谈到萨特尔。词还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页。

个，但概念却因不同的作家而变了，有时甚至彻底地变了。”^① 阿尔都塞与卢卡奇不同：卢卡奇更侧重于马克思总体概念与黑格尔总体概念的共同点，而阿尔都塞则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总体概念是简单的统一体和简单本原的异化发展，即是说，总体是“绝对理念”这一本原的“外化”与自我表现，虽然本原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展示了一种貌似复杂的外观，但由于单一本原在异化及异化之扬弃的过程中始终持续存在，因而实质的真正的东西仍然是单一性的，“出现在黑格尔的总体中的所有具体差异，包括这一总体中的可见‘领域’（市民社会、国家、宗教、哲学等）在内，刚刚被肯定便立即遭到否定；这些差异无非是总体的简单内在本原的异化‘阶段’，而异化则是在否定简单本原提出的异化差异的同时，才得以完成。甚至，作为简单本原的异化和现象，这些差异一概是‘无差异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本原的面前实际上是平等的、相同的”。^② 这就是说，黑格尔的总体是“表现的总体”，这一总体的统一性不在于它的复杂性，也不在于它的复杂的结构，这些都是表面的；根本上，总体之统一性在于本原的纯粹单一性。这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社会的统一性并不由社会内部任一领域所决定，既然各个领域都不能决定总体的统一性，所以它们在总体中也就没有主次之别，它们都是同一本原的表现环节。基于这种分析，阿尔都塞断定：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的缺陷在于，它没有一个主导结构。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总体概念否定了单一精神本原的意识形态神话，承认总体中的结构性要素决定了总体自身的性质与发展。在马克思那里，总体不再是简单的统一体，而是结构性的复杂统一体。在总体中，各种矛盾具有真正的差异性，它们的性质与地位并不完全均等，并且它们不能还原为一个单一的本原，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总体中有一个主导结构，“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③ 在这样一个多环节的具有主导结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4页。

② 同上书，第175页。

③ 同上书，第181页。

构的复杂统一体中，矛盾不再具有单一的含义，矛盾本身和矛盾的本质反映着同复杂整体的不平衡的结构性关系，阿尔都塞把矛盾的这种复杂的、结构性的和不平衡的规定性称作矛盾的“多元决定”。

阿尔都塞指出，多元决定的基本品格在于：“它是矛盾的存在条件在矛盾中的反映，也就是说，是矛盾在复杂整体主导结构中的地位在矛盾中的反映。”^① 在总体之中，各个结构因素互为条件、互相作用，矛盾与矛盾存在的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结构的各个基本环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如此“多元决定”的视域之下，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结构总体，它的某些领域就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另外的领域，一些次要的矛盾也不能看作是主要矛盾的单纯现象。“在社会中，生产关系并不是生产力的单纯现象，而且也是生产力的存在条件；上层建筑并不纯粹是社会结构的现象，而且也是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② 这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结构总体，它的各个构成成分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作用”，并且各个环节的作用不是完全固定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地保持下去的，而是处在交替、转移、压缩之中。

毫无疑问，这种多元决定的理论视域在反对机械的经济主义决定论方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意义，而且它也对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起到了一定的消蚀作用。毕竟，总体中的每一结构要素不再仅仅是某一共同本原的“表现”，它们也不再永久性地固持在某一节点上，或者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历时性位置。总体作为一个复杂的主导性结构，多少显现了一些开放性和流动性。正缘乎此，拉克劳与莫菲对阿尔都塞引入多元决定这一观念从而给社会概念的理解可能带来的潜在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阿尔都塞声明，一切存在于社会中的因素都是多元决定的，他的这一说法最深刻的潜在意义在于断言：社会把自身建构为一种象征秩序。因此，社会关系的象征性质也就意味着：它们缺乏把它们还原为内在规律的必然环节的那种本原性质。并不存在两个平面：一个本质的平面，一个现象的平面，因为固定最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0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终的本原意义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这样的本原意义，那么象征就会是从属性的、衍生性的意义。”^①

所谓象征，就是符号，符号本来没有固定的意义，更没有先验的意义，符号的意义是赋予性的、给予性的、建构性的。总体中的每一要素不具有单一含义，它的含义依赖于与其他要素的关系，依赖于与整个结构的关系，因此，这些结构性要素就好像是一个个符号，一个个象征体，那么社会也就成了符号的体系、象征的秩序。当然，这只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发挥，阿尔都塞本人从来没有明确断言社会是一个象征体系，也没有说过总体中的每一矛盾像漂浮不定的“符号”。在《保卫马克思》“矛盾与多元决定”一节中，阿尔都塞倒是明明白白地写道：“必须补充的是，矛盾虽然不再具有单一含义，它并不因此而变得‘模棱两可’，从而成为任何经验多元论的产物，就像诗人的灵感那样随风飘荡，听从环境和‘偶然’的支配，相反，矛盾在不再具有单一含义以后，它的定义、作用和本质就得到了严格的规定。”^②这就是说，阿尔都塞固然把结构当作一个“活动性”结构，但结构的活动性并没有打破整体的规定，即阿尔都塞所说的主导结构的“不变性”。

按拉克劳与莫菲的见解，“多元决定”本来可以取得这样的“成果”：社会和社会动因都没有任何本质，它们的规则性本身由不稳定的形式构成，这样一来，就打开了从社会关系的多元决定阐明一种新的接合概念的可能性。但是，这一“成果”在阿尔都塞那里并没有出现，“多元决定这一概念趋于从阿尔都塞的话语中消失，而逐渐增生的封闭性导致了本质主义的新变种”。^③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之所以没有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产生它应有的解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从一开始，阿尔都塞就试图使这一概念和“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中心环节兼容起来。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97.

^②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1页。

^③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98.

本来，“经济的最终决定”与这一决定得以实现的条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偶然的史接合发展起来的，可是，由于阿尔都塞将“经济的最终决定”当作是对每一社会形态都有效的真理，这样，它就独立于任何具体的社会类型而被定义，这一决定存在的条件也就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这等于说，它的条件存在于它本身之内，于是，“经济的最终决定”完全获得了先验地位。“阿尔都塞陷入了他所批判的错误之中，存在着抽象的普遍客体：‘经济’——它此时此地发挥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而且同样存在另一个抽象客体：存在的条件——它的形式历史性地变化着，然而，预先建立起来的本质作用（这一作用确保经济的再生产）却把它们统一起来。”^① 拉克劳与莫菲的意思是说，阿尔都塞批判黑格尔以单一的本原吞噬了过程的差异性，而他自己却不自觉地重蹈了黑格尔的旧辙，因为“经济的最终决定”俨然成了一个先验性的单一本原，它本身不能被定，而且它展开的环节也由其本身的逻辑所预先决定了。

基于这样的分析，拉克劳与莫菲指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被“最后决定”限制住了，不是“最终决定”服从于多元决定，而是多元决定服从于“最终决定”。如果社会有一个最后因素决定它的运动规律，那么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决定，根本上，我们面对的不过是单一决定而已！“假若社会确实有最终的和根本的决定，差别就无法构成，社会就会被统一在典型的理性主义的被缝合的空间之中。”^② 这就是说，在阿尔都塞那里，由于多元决定没有产生应有的解构功效，所以社会这一结构性总体仍然是本质主义的，结构性因果关系仍然没有脱出本质主义的巢臼。

二、实证性的社会概念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阿尔都塞的社会总体概念仍然有一个“中心”在场，固定的中心使结构失去了意义生成的偶然性空间。这种理性主义的整体论方法把社会过程或每一要素的意义固定在它自身之外，从而使结构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99.

^② Ibid.

总体变成了一种实证性的客体，在此意义上，结构总体是可以描述的、可以精确界定的，这一总体在一个基础性原则之下运作，这一原则是：社会秩序是完全透明的、可理解的，这意味着，位于社会生活表面的经验性变量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可理解的、可认识的抽象本质。拉克劳与莫非认为，这样一个整体确定、意义固定、结构稳定的实证性社会概念是一种“不可能性”。

1983年拉克劳在加拿大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此文的标题就是“社会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在这篇论文中，拉克劳宣称：“如今，我们倾向于接受社会（the social）的无穷性，即承认这样的事实——每一结构体系都是有限的，并且它总是被它不能控制的意义剩余所围绕，因此，那种构成了它的部分过程之基础的作为单一的、可理解的客体的‘社会’（society）是一种不可能性。”^①要特别注意的是，拉克劳在“society”与“the social”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society”是一个封闭的结构总体，它是一个由客观知识支撑的本质存在，而“the social”是敞开性的、非闭合的，它永远没有终极意义，它是一个永不中止的意义绵延过程。因此，所谓社会的不可能性是对本质主义的社会总体而言的，即“批判被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作为总体的社会概念”。^②

拉克劳对本质主义的社会（society）概念的认识论批判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作为一个结构总体具有一个实在的中心——它使结构体陷入了难以摆脱的“中心困境”，中心作为结构的结构化力量本身却在结构化运作之外，这显然破坏了结构主义的关系性原则。在这种具有实在中心的社会观念下，上层建筑作为社会这一总体的结构原素的关系特征被中心削弱了，甚至被消蚀了，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能对作为中心的“基础”施以根本的结构化作用。基于此，拉克劳不无风趣地说，在黑格尔那里，意识形态为了随后在马克思那里将要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提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New York, p. 90.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96.

前进行了“复仇”。其二，社会总体“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确定性的对象而呈现，即是说，对这一对象进行描述与规定是可能的，在此意义上，这一总体是作为社会秩序的可理解性的潜在原则在起作用”^①。质言之，这种社会总体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的本质所在，它成为隐藏于具体的结构原素“背后”的先验所指。其三，社会总体被当作一个具有自足性、一贯性、完整性的封闭整体，它不仅具有理想的决定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一经确定就恒久不变。

这三方面的批判贯穿着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任何结构体系都是处在生成过程中的无限差异游戏，它既没有固定的中心，也没有先验的支配原则，更不可能固定为一个可以通过概念完全把握的透明客体。在这种后结构主义视域之下，为其自身的构成部分和建构进程提供优先的理性基础的社会概念也就只能是一种“不可能性”了。既然社会是一个开放的不稳定的动态生成系统，并且它总被一些“意义剩余”所包围从而逃避理性的完全掌控，那么，我们怎能武断地把它作为一个透明的认识对象来加以把握呢？对于一个未成形、最终也不可能完全定形的结构，我们又怎能擅自将它分出上下层呢？“由此观之，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难以成立，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每一社会形态的必然层次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土崩瓦解了。”^②

拉克劳对社会概念的认识论清理不仅仅是一种剥离框架的前提性批判，而且也是结构发生学方法向历史主义的进逼与限制，其显著功效在于将历史主义的社会历时的先在性统合为一种与意识形态同构的共时性聚合体。在更深的意涵上，这可以视为在后结构主义架构中意识形态的“哥白尼式革命”的继续推进——不是社会总体“决定”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建构”社会总体，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又一次根本性颠覆。“意识形态 (the ideological) 由这样的一些话语形式构成——通过这些话语，社会试图将自身确立在闭合、意义固定以及对无限的差异游戏的无知之基础

^① Ernesto Laclau: *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 in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90.

^② *Ibid.*, p. 91.

上。意识形态是通达总体化话语的‘总体性’的意志。既然没有某些意义的固定，没有闭合的话语，那么社会（the social）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意识形态必须被看作是社会（the social）的构成因素。而社会（the social）仅仅作为创设那种不可能的客体——社会（society）——的徒劳努力而存在。”^① 意识形态作为总体性的“意志”塑造着整个社会的面貌，这让人想起叔本华作为意志的客体化观念，不过，在拉克劳这里，这个另类的社会意志似乎不再具有丝毫的在场性和实体意义。意识形态的革命要深入下去并取得更大的成果，必须冲破自己的外壳，伸向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意识形态不仅要摆脱束缚、走向独立自主，而且还要用自己的力量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家园。这个新家园不仅变换了新的场所、使用了新的材料，而且贯穿了新的建筑理念。尽管仍然可以把这座家园称之为“社会”，但它已经是意识形态自己营造的“社会”，在此情形之下，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的一个层面，而是与社会拥有了完全相同的边界。从形式上看，拉克劳对意识形态与社会的重新整合与卡尔·曼海姆的论证方式颇为相像，后者通过阐述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将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为一般的知识社会学，前者则将意识形态诠释为施加“总体性”的未竟的努力，从而使意识形态祛魅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力量。但是，在其精神实质上，它无非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嫁接，这种嫁接虽然降解了意识形态的不适当的认识论含义，却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和至深渗透，这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泛意识形态主义可以理解为阿尔都塞关于主体的意识形态召询理论在社会概念上的扩展性挪用。

总的看来，拉克劳对社会的不可能性作出了两方面的阐释：第一个方面是，社会的同一性不能完全建构起来。毋庸置疑，同一性也就是关系性，结构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性总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特性，质言之，结构主义者力图从结构内部的关系来理解结构本身，而不是把结构要

^① Ernesto Laclau: *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 in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92.

素还原为结构之外的先验规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结构主义者的一大局限是，他们总是把这些关系转变为一个总体稳定的体系，转变成一个可理解性的客体。拉克劳认为，要坚持的不仅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文本之内的“有”不是一种定在，也不是一种常在，而是差异的无限作用，这就意味着，社会（the social）没有透明的、完全的在场的同一性，它的同一性的客观性不断地遭到颠覆。拉克劳把这种差异的作用称之为“话语”，这当然是一种隐喻，“我们把话语这一概念从它作为说和写的限制性意义中解放出来”。^①从话语的角度，社会的不可能性就是固定意义的不可能性，意义不停地变动、滑动、漂移，使得社会同一性和关系丧失掉必然性特征。

第二方面，通过设立纽结点（nodal point），社会（the social）的相对固定可以达成。拉克劳指出，一种话语，如果它的意义绝对不可能固定，没有丝毫的稳定性，那么它只不过是精神病患者的话语。社会不仅是差异的无限作用，而且它也是限制这一无限作用的尝试，它要把无限的差异归化在、包容在一个暂时的秩序中，但这一秩序并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本质，它本身是多元决定的结果。一方面是最后固定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努力实现部分的固定；意义从来没有完全固定，但也完全没有停住固定的企图。在此意义上，总体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变了性质，改变了出现的方式：总体不再担负本质主义的重载，它也不再是一种宏大的元叙事，它在每一次霸权接合中出现，又在拆除既有接合的瞬间隐退。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关于社会的不可能性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详细论证，这主要表现在，拉克劳与莫非对这一论证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作了更为细致的梳理与系统化阐发。拉克劳与莫非解构实证性社会概念所运用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一是拉康的主体学说。前一方面主要借取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和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概念；后一方面主要借取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New York, p. 90.

拉康的“缝合”概念和“纽结点”概念。在这里，拉克劳与莫菲主要阐述了后现代话语理论，而对拉康的概念则是直接挪用，并没有加以说明。

关于话语理论，拉克劳与莫菲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一致性。他们强调，话语形态的统一性既不在于它的构成要素的逻辑连贯性，也不在于先验主体的先验性，亦不在于胡塞尔式的赋予意义的先验主体中，更不在于经验的统一性。在话语的统一性的形态上，他们同意福柯的“离散规则”：分散本身成为规则。福柯拒斥达成话语统一的四个假定：如果分散在时间中的不同形式的陈述只参照同一对象，那么这些陈述便形成一个统一体；叙述的形式和连贯类型；持久的和一致的概念系统；主题的同性和持久性。否认了这四个假定，也就表明了：“话语的关系并不内在于话语中：这些关系并不在自身中把概念或词句联系起来，不在句子或命题之间建立演绎或修辞的结构。但是，也不是外在于话语的关系，限定着话语或者强加给它某些形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强迫它陈述某些事情。”^①拉克劳与莫菲从福柯这里进一步引出的结论是：话语的统一性完全是接合实践造成的，接合本身使不同立场显现出一种“规则性”。

其二，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拉克劳与莫菲拒绝在话语与非话语之间作出区分，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福柯明显不同。我们知道，福柯坚持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认为中介性话语总是与非话语条件相关，但是，话语与非话语的关系既不是决定关系也不是表达关系。非话语事态只是改变话语存在的方式、话语出现的条件，而话语本身的一致性并不受外在力量的影响，它有自己的自主性。即便如此，拉克劳与莫菲还是不能忍受这样一个非话语的存在，他们宣称，一切都是话语。一切都是话语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意味着话语之外没有客观的对象存在？拉克劳与莫菲认为，每一个对象被构成为话语的对象这一事实，同是否存在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或者现实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没有关系。客观对象的存在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客观对象要呈现出实际的意义，就必须进入话语空

^①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57页。

间,就像大卫·霍华斯所说:“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概念抓住了这一观念:所有的对象和行为都是处于意义之中的,并且它们的意义是由表示差异的具体系统所赋予的。”^①比如说,在规划中的高速公路线上,有一片原始森林,或许代表着快速建造公路的一种障碍,它或许代表一种特定的利益(生态上的或博物学上的),它也可能是国家自然遗产受到威胁的象征,那么,它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下被思考、被言说,这取决于话语体系本身,即一个对象以何种方式进入话语空间,并不完全由对象本身所决定,它依赖于话语领域的结构化。

其三,关于话语形态所显示的开放性或封闭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不存在非话语与话语的区别,只存在不同话语总体之间的区别。一个构成要件可能没有被接合到一个特定的话语之中,但它并不是非话语,而是另一话语总体中的成分,拉克劳与莫菲将之称为“要素”,而那些被接合到特定话语中的成分则是“环节”。所以,一个话语形态总是表现为“要素”向“环节”的转化与过渡,但这一转化与过渡从来没有完全实现。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话语理论的阐发有一个明显的倾向:进一步强调话语统一的偶然性,进一步增大话语作用的范围,进一步揭示话语的开放性、流动性。他们的这一理论努力当然不是为了研究话语而作纯学理的探究,其根本的用意是,为解构社会的实证性而提供一个强大的、厚实的理论支援和佐证。所以,在作出这三方面的分析之后,拉克劳与莫菲立即引出了决定性的要点(decisive point):“每一个总体的未完成性作为一种分析的领域,必然导致我们放弃这样的一个前提:社会是一个已被缝合的、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Society)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并不存在一个用于固定(因此也是建构)整个差异领域的单一的基本原则。”^②“社会”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成为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有名的命题。但是,这一命题并不比“社会的不可能性”表达得更多,实际上,它是社会不可能性的另一种表述,尽管如此,这一表

^① David Howarth: *Discourse*, Verso, 2000, p. 101.

^②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1.

述还是具有它特有的优点：它把它借以论证的理论根据和依托清晰地凸显出来，它让人知道，通过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社会的确定性已经退出理论的地平线，坚持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已变得荒唐可笑，因为不固定性已成为每一个社会同一性的条件。“社会的同一性是纯粹的关系性，由于这一关系本身的不固定、不稳定——这种不固定、不稳定使霸权实践成为可能，每一社会的同一性的意义不断地延迟，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不会来到。”^①

在上文中，我已指出，拉克劳在1983年的那篇短文《社会的不可能性》中从“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和“意义的局部固定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论述了对“the social”的理解。《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仍然沿袭了这一分析模式，并且论点也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这两个维度的阐述更加精致、更加凝炼，也更加深入。

在阐述意义的不固定性这一维度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引入了话语（discourse）与话语性（discursivity）的区分。话语是一个差异的体系，一个指意系列的关系总体，但是，如果某一关系、某一特异性的逻辑完全奏效而没有任何局限与断裂，那么话语体系本身就会趋于瓦解，因为，所有的一致性将作为同一话语的必然环节而被固定下来，不同的话语要素之间的冲突被耗尽了。但是，在一个去中心的话语体系中，某一特定的差别逻辑总会受到“阻碍”，即是说，总有某种东西会逃出具体的话语内的无限的意义作用过程，这种从意义同化中逃逸出来的部分就是“意义剩余”（surplus of meaning），这种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剩余内在于每一话语之中，构成了社会实践的不可或缺的领域，这一领域就是话语性（discursivity）领域。话语性这一术语“指明了它同每一具体的话语发生关系的方式：它既确定任一对象必要的话语性质，同时又表明任一既定的话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6.

语不能实现最后的缝合”。^① 如此看来，话语性就是所指不断溢出能指的过程，也是不断的替代活动。正如拉克劳与莫菲所说，他们对话语性的描述与德里达对超越性所指的缺席的阐述是一致的，在《写作与差异》中，德里达这样写道：

这是语言侵扰普遍性问题的时刻，在这种时刻，由于中心或起源的缺席，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只要我们就这个词达成一致——这就是说，在一个体系中，中心具有重要性，起源或超越性具有重要性，这样的体系从来不是绝对地在差异体系之外在场，超越性所指的缺席无限扩充了意义的作用和领域。^②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意义最终固定的解构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在场形而上学的颠覆是一致的，他们强调意义由其位置决定，而位置又处于变动之中，所以意义也就失去了一劳永逸的固定性。但另一方面，拉克劳与莫菲与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又有明显的不同，拉克劳与莫菲尽管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持一种激进的解构姿态，然而，他们毕竟一直在努力达成一种祛除了外在必然性限制的统一性，他们一直被统一性所纠缠，在解构掉本质主义的统一性后，他们渴望另一种统一性——松散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局部的统一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斯图亚特·西姆说，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乡愁”，是一种独特的“怀旧”。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不完全放弃同一性，不完全排斥固定性，这不仅是承认一种积极的建构性，而且也是解构规划所必须的前提。在论及“意义的局部固定的可能性”时，他们说：“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必须存在局部的固定，否则，差异的流动将是不可能的，甚至为了产生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1.

^② *Ibid.*, p. 112.

差异，为了颠覆意义，也必须存在意义。”^①正是在这里，他们与拉康的立场交汇在一起，在拉康那里，主体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在想象界众多小他者的纷扰中，主体几乎是一种虚构性想象，而在象征界，大他者的介入又使主体在符号的涌挤冲荡下成为一种悬空的异在，但是这一残缺的主体一直地渴望着认同，渴望着固定的身份。所以，当拉克劳与莫菲谈到局部固定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拉康，想到了拉康的“缝合”，想到了拉康的“纽结点”。缝合是永久性的劳作，纽结点是暂时的固定，就像西西弗的神话一样，西西弗吃力地搬起巨石，而在接近顶点的时候，巨石又滚落下去，他又重新搬起，然后又滚落，再搬起，再滚落……最终的完成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一次次的托举，这种不可能性也会是不可能的！可能性造就着不可能性，而不可能性又使可能性成为可能！也许米歇尔·巴丽特的描述更让人难忘：“拉克劳与莫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策略性人体，其皮肤是永久在开裂的，这使外科手术室中不停的值班成为必需，好让外科医生实施霸权，其使命是试图暂时地、艰难地缝合上那些伤口。”^②

无论如何，实证性的、由单一的规律控制的社会概念是彻底瓦解了、崩溃了，社会没有本质，社会也从没有形成完全的自身同一性，所谓的“社会秩序”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基本原则，在社会的“背后”没有先验的认识论基础。任何以单一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教条主义，而且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携着极权主义的重负。拉克劳与莫菲的结论是：“在社会（society）是不可能的范围内，社会（the social）是接合。”^③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2.

② Slavoj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 p. 249.

③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4.

第七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

《社会的不可能性》是拉克劳与莫菲进行后现代“实验”的第一个驿站。虽然它一举把“社会地形”夷平，把主体概念的硬核碾碎，从而表现出强劲锐利的解构锋芒，但它同时也迸发着创造的兴奋与活跃，涌动着建构的期待与渴望。一如贝斯特和科尔纳所言，后现代转向“已经在挑战和根除已确立的各种规范、实践、理论和观看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它“既产生碎片化、不稳定性、不确定和不定性，也产生发展出新的思考与行为方式的新兴奋与可能性”。^① 毕竟，拉克劳与莫菲解构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和主体概念并不是为解构而解构，其本身是为了建构一种新型话语理论和激进政治模式。可以说，在进行后现代转向之初，他们就确立了“双向援用”的理论策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仅迎合并支持了拉克劳与莫菲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的不满，亦使拉克劳与莫菲意外找到了力挽残局、重整河山的起死回生之策：不仅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解毒之药，也把它拿来作为酵素、作为添加剂、作为配料、

^① 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甚至作为“补品”加以运用。

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解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建构，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所要成就的事业。在解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莫菲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一消解，悉数抛进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垃圾箱。而在建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莫菲引入了独特的话语理论，阐发了一种新颖的对抗观念，论述了霸权性的政治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至此，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命题弃置一边而仍坚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称己意又难以自圆，那么，就干脆取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后”（post）字之意，以此一“后”（post）置于“马克思主义”（Marxism）之前，成就一种奇特的叫做“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东西。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外乎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称和缩写，质言之，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带“后”字头的马克思主义，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施以“后化”（Posting）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新的理论视界终于获得命名——这一奇妙无比的命名不仅抚慰了拉克劳与莫菲浓重的怀旧情结，而且也满足了他们重铸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同时又表征了“空的能指”（signifier of emptiness）的后结构主义观念。所以，我们终于看到，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言中，拉克劳与莫菲郑重地宣布他们已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之内。从表面上看，拉克劳与莫菲的这一宣称似乎拖延了几年，因为，早在《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1981）的末尾，拉克劳与莫菲决意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的立场已十分鲜明。然而，就拉克劳与莫菲的实质性意图而言，它并不是一个迟到的、追补式的告白，而毋宁是正当其时的充满创意的新宣言。因为，拉克劳与莫菲清楚，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后马克思主义”一词在西方理论界已颇为流通，不仅很多学者和理论家早就使用过“后马克思

主义”这一概念，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多被用来确认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背弃之意的不良称谓。如果拉克劳与莫菲仅仅在“走出”的意义上使用“后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们最终不过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长长队列中姗姗来迟的两位平庸新人而已。

拉克劳与莫菲显然不想停留在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水平上。他们想要给“后马克思主义”这个不太令人满意的术语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断裂的喧响和临别的寄语，它还应该是一种激进的召唤和解放的宣言！虽然“已经不可能再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①，但是，由于看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过时、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而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之路，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也一条死胡同，是一条比沿着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线路矢志前行的道路更不值得选取的一条道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式以及它的革命策略、斗争方式和变革途经可能已经不再适合当代激进政治斗争的现实，不过，拉克劳与莫菲仍然主张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宰制、不平等、压迫、剥削、非正义、非人道的现象作斗争，也仍然追求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精神不能丢，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诉求更应坚守。更何况，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还有一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所以，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废其法而承其意，以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路子来彰显内蕴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情怀和斗争气质。正如西姆指出的，这种做法，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也就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②就此而论，拉克劳与莫菲是在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构型方式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形象，这一塑像与原先的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4.

^②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

“偶象”不求形似而只求神合。即是说，拉克劳与莫菲不是“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是“重新规划”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理论构想既包含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富有热情的放弃”（齐泽克语），同时又蕴寓着对马克思主义激进精神的创生性延续。为了表达这种表面上充满悖论性的理论立场，拉克劳与莫菲别出心裁地“造出”斜体与正体交错搭配的两种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①这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发展史上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创制，它的意义不在于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制作了别有兴味的书写体式，而在于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指出了全新的理论路向，赋予了积极的思想内涵。如果说拉克劳与莫菲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什么理论贡献的话，那么这一贡献就在于他们努力把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朝着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向转化和推进了——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消极的、否定的、解构的，它也可以是积极的、肯定的、建构的。而对于拉克劳与莫菲而言，*post-Marxism*（*post*为斜体，*Marxism*为正体）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起点，而*post-Marxism*（*post*为正体，*Marxism*为斜体）才是整个理论的重心。

当然，也有人对拉克劳与莫菲这种正斜体交互搭配的差异书写不以为然。比如，丹尼尔·麦吉（Daniel T. McGee）在《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鸦片？》一文中这样写道：

对于暗示着表面的同义反复实则蕴涵着重要的意义差异的古怪的斜体字游戏的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乃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如下说法的一种简略表达方式：他们宣称他们继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而不相信另外一些部分。……拉克劳与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4.

莫菲不是墨守他们不再相信的传统，而只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把他们不相信的东西（诸如本质主义的阶级利益、社会的经济决论）筛掉，而把他们还相信的部分——霸权概念——筛选出来。……拉克劳与莫菲宣称他们既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同时又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既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又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这种明显的悖论和特殊兴趣只不过是如下观点在修辞表达上的模糊化：后马克思主义保留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范畴（即“它最好的碎片”）而拒斥了与后马克思主义逻辑不相容的其他范畴。拒斥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然性的信奉，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偶然性，对抗性斗争），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①

不难看出，麦吉并不否认拉克劳与莫菲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而是质疑拉克劳与莫菲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身份。麦吉之所以持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吃惊地发现，拉克劳与莫菲自称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霸权概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它的阐释很不相同：与其说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还不如说他们“变革”了霸权概念。既然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特意留下的霸权概念也已经“走了样”，那么还如何能说后马克思主义中留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呢？所以，麦吉断言，拉克劳与莫菲玩弄这个“古怪的斜体字游戏”完全是欺世盗名：他们想迷惑别人，以使人相信他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仍然“藕断丝连”，他们那里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过程，他们那里有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激进政治理论。而实际上，拉克劳与莫菲那里“既没有政治，也没有理论，既没有一套真理主张，也没有具体的规范性‘战略’”，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宣称“无非是一种认同或者‘鼓动’性的表述行为，无非是企图让别人把自己称之为某种后马克思主义者”。^②也

^① Daniel T. McGee: *Post-Marxism: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58: 2, June 1997, pp. 203 - 204.

^② *Ibid.*, p. 202.

就是说，拉克劳与莫菲弄出两种怪模怪样的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纯粹是掩盖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图和掩饰他们无所建树的空虚心理的一种巧妙花招而已。麦吉是想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被拉克劳与莫菲的“古怪的斜体字游戏”所迷惑，误以为拉克劳与莫菲真的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因而是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千万要认清拉克劳与莫菲的嘴脸：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是假的，或者说徒有虚名，而拉克劳与莫菲仅仅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这才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麦吉并没有真正把握拉克劳与莫菲赋予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特定含义。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并不是在原封不动地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命题、某些概念的含义上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变成了斜体，就是表明要借用“后学”的资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重构、某种改写。难道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采取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抛弃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吗？难道就不能“像解读弗洛伊德、黑格尔或柏拉图的文本那样去解读马克思的文本”^①吗？难道就不能“从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视域以及我们时代的情势出发去探析马克思的文本并对它们提出自己的疑问”^②吗？拉克劳与莫菲既不赞同非解构的拒绝，也不认可非建构的接受。他们的立场是：只有通过重塑马克思主义才能延续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而经过重塑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外观上也辨识不出原来的影子，但它依然“壮怀激烈”，依然抱有厚重的弥赛亚主义救世情结，依然构想着人类解放的光辉远景。“我们正生活在 20 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新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新一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Andrew Ross (edited):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6.

② Ibid.

解放话语。末世论的与认识论的目标更为适度，而解放的抱负却更为深广。”^① 不走先辈之路，不行先辈之法，只弘其道、现其韵、扬其神。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后现代境遇之下，这是唯一可行之策。

二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解构与建构同时兼备的“双重”后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特质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法国极端后现代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方面“反应过激”，而对它的建构方面却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像麦吉这样完全否认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具有建构性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保罗·雷诺兹公然宣称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挑战、重新阐释或拒斥的大总汇，要么就是“皇帝的新装”罢了^②——皇帝自以为穿上了最美丽的衣服，而实际上是一丝不挂！诺曼·杰拉斯则径直认定拉克劳与莫菲那里存在一个“学术真空”（intellectual vacuum）^③。事实上，拉克劳与莫菲从来没有妄言自己那里还有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业已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清除得一干二净，更不承认他们除了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付出真正有所成就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拉克劳与莫菲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是他们对话语概念的新阐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中，拉克劳与莫菲就已经使用了“话语”（discourse）一词，但那个时候，他们只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这一有限的范围之内使用它，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话语”总是附在意识形态一词的后面，即“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

^① Laclau and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New Left Review*, No. 166, November/December 1987, p. 80.

^② Paul Reynolds: Post-Marxism: Radical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Beyond Marxism? Mark Cowling (ed):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Palgrave, 2000, p. 258.

^③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p. 43.

这表明意识形态话语外部还存在着“非意识形态话语”。《社会的不可能性》(1983)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宣告话语摆脱了狭义的意识形态内涵而进入到与社会概念的界域等同化的境地。而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以及随后对杰拉斯的回应文章《无需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1988)中，拉克劳与莫菲深入阐述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

拉克劳与莫菲话语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对象与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而意义是由特定的规则体系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措辞来表达就是：意义乃是“接合”的产物。之所以是接合，是因为任何意义都具有关系性特征，即便是单个的语词，其本身也无非是能指和所指“合成”的关系性结构。接合就是把诸多原素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暂时的意义统一体的过程——接合既是差异性的连接，又是新认同的缔造，质言之，在对差异性原素进行连接的过程中，原素原先的“身份”不知不觉中被篡改了，而新的认同恰恰就建基于这种篡改之中。所谓话语，就是“如此的接合实践所达成的被结构化的总体”（the structured totality resulting from the articulatory practice）。^①

这一界定的关键点在于一个扩展了的彻底去本质主义（de-essentialism）的接合概念。此一接合概念已远远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对接合的规定——那时，接合的范围狭窄，效力有限，意识形态的核心原素在被接合之前已经具有外在于接合的“身份”，而且在接合中，这些身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被篡改的仅仅是中立意识形态原素的“身份”，严格说来，这种篡改不过是既定的主导身份的扩张而已！如果意义的认同不是由接合活动本身造成的，就谈不上完整意义的接合；而没有完整意义的接合实践，也就不会有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概念。正是由于这一点，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话语概念进行界定之前，预置了“社会形态与多元决定”一节，对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05.

阿尔都塞主义以及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展开了批判，这一“双重批判”的宗旨在于既抛弃总体的本质主义（an essentialism of the totality），同时又避免陷入原素的本质主义（an essentialism of the elements）。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阿尔都塞通过引入多元决定这一概念展开的对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的批判虽然“看起来开辟了从社会关系的多元决定的属性为起点阐发一种新的接合概念的可能性”^①，但由于阿尔都塞不放弃“经济的最终决定”，从而大大限制了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逻辑具有的解构功效，其自身反而陷入自己所批判的理性主义典范中去了，也就是说，阿尔都塞只是以一种总体的本质主义置换了另一种总体的本质主义。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尖锐地批判了阿尔都塞的“经济的最终决定”以及“结构因果性”，主张把社会关系看成是由种种制度设施、形形色色的组织形式、诸多实践以及不同的动因组成的聚合体（aggregates），聚合体的这些构成原素是相互分立的，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由于真正祛除了“单一决定”阴影和必然性的专制，这种“肢解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了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界域。但是，这一方法所秉持的“非相关性原则”（non-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却阻断了赫斯特、辛德斯等人与拉克劳与莫菲的汇通之途。在此，其根本症结当然不在于断言原素之间非本质性、非必然性的关系，而是在于将这种“破碎”关系本质主义化了：如果每一原素无需“他者”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自足性，就可以在其自身之内获得自我认同，那么这些分立的原素无疑就成了一个个封闭的逻辑原子。相反，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任何认同的意义都是多元决定的，因为所有的本义（literality）都会在建构中被颠覆、被超越。在多元决定的逻辑空间，既不存在本质主义的总体化，也没有对象之间的本质主义分割，处于他者地位的某些对象的存在阻止了任何认同的固定。在接合中呈现的对象并不像钟表装置中的零件一样，某些他者的在场妨碍了任何对象之认同的完全缝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98.

合。”^① 赫斯特、辛德斯等人疯狂地分割总体，其结局竟然是本质主义的幽灵不知不觉地潜入了一个个分立的原素之中！无论如何，附着在原素之中的本质主义依然是一种本质主义，而只要本质主义的阴魂不散，接合概念就无法真正确立。所谓接合，既要使一切皆可“接”，又要使一切被接者皆能“合”。如有不可“接”之物，如有不能“合”之状，则皆无完备之接合实践可言。

拉克劳与莫菲以如此的接合概念来界定话语，其用意在于凸显话语的生成机制。如果说话语有什么关键特征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建构性维度。当巴赫金断言语义既不来自言语者又不源于语词本身，而是在具体的对话语境中生成的时候，当阿尔都塞声称意识形态召询个体的时候，当福柯说临床医学话语在其内部的不同构成原素之间建立一种并非真正给定的、并非先验地建构出来的关系体系的时候，他们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话语的当下构成性。只不过，拉克劳与莫菲把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状态而已。话语的建构性之目标乃是话语整体统一性的形成，而这种统一性原则只能在话语本身中去寻找，它既不能诉诸话语之外的先验强制，也不能得之于话语原素固有的逻辑一致性的铺展。在这一点上，拉克劳与莫菲和福柯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正缘乎此，拉克劳与莫菲申言他们所归之于话语统一性的类型接近于福柯用以说明“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的所谓“离散中的规则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

话语建立于话语场之内，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和福柯共享的准则，但是，他们对“内部”的理解迥然有别。对于福柯来说，话语的内部意味着话语之外存在着非话语实践（non-discursive practices）；对于拉克劳与莫菲而言，话语内部仅仅表示多样性的话语场之间具有界线，而这些界线本身也是一种话语事实，因此，话语内部仅仅是就具体的个别的话语样态而言的。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和福柯的不同之处：在福柯那里，非话语实践作为影响话语建构的一个层面被谨慎地保留下来，而拉克劳与莫菲则彻底取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04.

消了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这种分歧点的存在源于不同的话语担忧：福柯担心话语统一性的“单调”与“重复”，所以才强调非话语实践对话语构型的影响，而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要焦虑是话语统一性的外部宰制问题，因而才断然否弃非话语实体的存在。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福柯的担忧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极有可能损害话语的建构性原则：如果特定的话语事实被非话语实践所包围，并且，这种非话语实践又能够刺入话语场的内部并塑造着话语形态，这无疑给“外来干涉”留下了口子，如此一来，不仅建构性的自治性质无法确保，“先验决定”亦可能“随机潜入”。再者，福柯只是简单地把某一话语场之外的东西称为非话语实体，却没有在理论上说明这种做的理由：为什么在话语之外的东西就一定非话语？当你断言某某是非话语的时候，你如何保证你的这种言说本身不是一种话语？

这类类似于黑格尔对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的批评：当康德说物自体没有任何的思维规定性的时候，他恰恰是在用思维把握这个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这个“剩余的渣滓和僵尸”^①；同样，当福柯说有一种非话语实践存在的时候，他其实正在特定话语的视界言说着话语的对象。与话语的建构性的激进化相伴的必然是话语空间的最大化。为了表明取消福柯关于话语与非话语区分的正当性，拉克劳与莫菲提出两条理由：其一，“就对象不能在导致其呈现的话语条件之外被给予而言，一切对象皆作为话语对象而被建构出来”；其二，“社会实践的所谓语言学层面与其行为层面之间的任何区分，要么是一种不正确的区分，要么这种区分应该在意义的社会生产（它在话语总体的形式下被建构出来）的范围之内获得理解”。^②

第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准先验的”解释。^③它是康德关于现象的观念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5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07.

③ 拉克劳在《话语》一文中曾把福柯的话语研究方法称之为第二层级的现象学（second-level phenomenology），认为古典现象学把现象与外在现实的参照进行了分隔，而福柯继续进行了第二层的括置（second bracketing），在现象界中隔离出一个话语层面，这是一种“准先验的”举措。Laclau: *Discourse*, in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by R. Goodin and P. Pettit,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431-437；该文的中文版本可参见《文化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8—105页。

性的“移置”与“转化”。康德认为，呈现在认识主体面前的只能是现象，而物自体是什么我们无以获知，拉克劳与莫菲则断言，人们所遭遇的对象只能是话语对象，而不是脱离话语场域的纯粹存在。

迄今，在我们与世界的交换过程中，对象从来没有向我们呈现为纯粹的实体，它们总是在话语接合中向我们呈现它们的存在。树林可能是原材料，或者是制造品的部件，或者是森林沉思的对象，或者是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物；大山能够用来抵御敌人的进攻，或者作为旅游胜地，或者矿物开采的源地，等等。要是我不在那里，大山原本不会是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种，但是，这并不表明大山不存在。正因为它存在，它才可能成为上述这些东西，然而，上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种必然来自于大山的纯粹存在。作为某一社会中的一员，我们绝不会遇到一个处于纯粹存在状态中的对象——如此的观念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确切地说，我们遇到的存在总是表现为在话语总体之内被接合的某种事物。^①

第二点是一个后分析哲学的解释。它是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language-game）学说在话语领域的转换性应用。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语言与语言进入其中的具体行为构成了一个语义整体，这意味着语言原素与非语言原素的二元对立被彻底打破了：不仅是从言语的视角认定“语义”本身具有“以语行事”和“以语取效”的功能，而且，行为过程也必须从“语用”构成的领域加以理解。只有在特定的语用情景之中，语义才能真正确定，因而语言成分与非语言成分的区别并不等于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语言与非语言共同构成了话语这一意义总体。在此一视域之下，把话语仅仅归结为“说”与“写”难免流于片面，而坚持话语只具有精神性特征的观点乃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意识形态的“物

^① Laclau and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New Left Review*, No. 166, November/December 1987, p. 85.

质性”早在葛兰西以及阿尔都塞主义学派那里就提了出来，并且在一种“社会地形学”的困境中获得了艰难而出色的论证。拉克劳与莫菲关于话语的总体描述是：话语作为一个意义总体先于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分，由此，它根本超越了语言与实在、精神与物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元对立。

如果对象之呈现不能脱离其呈现的可能性条件，如果这个可能性条件本身也是一种意义建构的结果，那么就必须从理论上直面这个话语生产的“源头”。这里的实质问题是：为什么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可能的？或者说，为什么意义的建构总能不断延续下去？拉克劳与莫菲的回答是：每当一种意义向我们呈现的时候，这种呈现本身已经是一种失败——是一种完美呈现的失败，也就是说，每一种意义认同都是一个失败的总体。人们追求的那个本真性，人们意欲捕获的那个“本义”，乃是一个隐喻罢了。总有某些东西从意义的固定中悄然滑脱。这种以拒绝象征秩序的方式成就象征秩序的永恒滑动之物便是“意义的剩余”，拉克劳与莫菲把这种意义的剩余称之为话语性：

我们称“话语”为一个异质体的系统（即诸多环节所构成的差异性体系），而如此的系统仅仅作为了颠覆体系本身的“意义剩余”的局部限制才能存在。这种内在于每一话语情景之中的“剩余”是一切社会实践之建构的必要领域。我们将这一领域称之为话语性场域（the field of discursivity）。这个术语表明了它（即话语性）与每一具体的话语发生关系的方式：它既决定了任何对象必然的话语特性（discursive character），同时又决定了任何既有话语实现最终缝合的不可能性。^①

话语性是标识对象的构成性以及此一构成性的未完成性和非稳定性的哲学范畴，因此，它本身并不是对象，而是对象的界线和限制——它赋予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1.

话语对象一个必要的边线从而使意义的局部固定成为可能；同时，它又不断限制边线的完全划定，使意义的充分固定成为不可能。话语性就是使对象“是其所是”的理论视域（theoretical horizon）——或者说，它是使对象成为如此之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对象的话语性在逻辑上（不是在时间上）优先于话语对象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追问话语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却不能进一步追问话语性的可能性条件，就像在康德哲学中，我们可以追问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却不能再追问先验自我是如何可能的一样。话语性宛如一条地平线，没有它，我们便无法获得一种视域。但是，我们的目光又永远无法穿越这条线，当我们力图靠近它的时候，它便立即向更远处退去。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不断“剩余”下去的“剩余”。

三

拉克劳与莫菲对话语概念以及话语性范畴的阐发并不是单单为了建立一种新的话语认识论，而是为了介入对政治的重新解析。这种介入的第一步，就是从理论上重塑一种全新的“对抗”（antagonism）概念。从这个意义说，拉克劳与莫菲的“新话语理论”可以看作是对抗的概念化所必需的理论铺垫。当然，在话语论述中明确地引入“对抗”范畴，并不是拉克劳与莫菲的首创，阿尔都塞的高足米歇尔·佩舍（Michel Pechéux）在1975年出版的《语言、语义学和意识形态》一书中分析个体的主体化运作的两种话语模式（two discursive modalities）时就论及到了“对抗”概念。佩舍认为，个体被“召询”实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个体应答了召询从而实现了肯定性的认同；第二种是个体听到了召询却不应答，召询虽然尴尬但毕竟起了作用，个体在这种“反认同”（counter-identification）过程中被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了。在佩舍看来，只有在主体化的第二种模式即主体的“反认同”运作之中才会产生才“对抗”作用。^①

认同中的“反认同”标识了主体化过程中的“对抗”关系，这也正是

^① Michel Pechéux: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Stating the Obvious*, Macmillan, 1982, pp. 157 - 158..

拉克劳与莫菲的立场。然而，拉克劳与莫菲对“反认同”的理解不同于佩舍。在佩舍那里，“反认同”只存在于某种特别的话语模式中，并且他似乎只把“反认同”作为主体化的一个消极结果来呈现。而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所有话语模式中都存在“反认同”。“反认同”并不是主体化的“结果”，而是主体化运作的可能性条件。由于“对抗”与主体生成是同一个过程，所以，对抗之阐明也就是一种“主体解释学”。正因如此，拉克劳与莫菲在着手阐释自己的对抗观念之前，首先展开了对本质主义主体范畴的批判。齐泽克深谙拉克劳与莫菲此意，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引论”中，他大谈四种主体观，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引”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对抗大唱对台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观念。^① 齐泽克的这一做法无非是对拉克劳与莫菲的煽情性模仿——在这种模仿中，齐泽克以一种张扬的方式再现了拉克劳与莫菲的基本观点：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对抗观念乃是根植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主体观。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提出以“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来置换传统的主体：“在这个文本中，不管我们什么时候使用‘主体’这个范畴，我们都是在话语结构内部的‘主体位置’这一意义上使用的。”^② “主体位置”这个用语来自于福柯，福柯用它来表示主体的弥散状态，从而说明统一的主体模式的不可能性，但是，由于福柯本人没有真正贯彻在“话语结构内部”构建“主体位置”的原则，他所谓的“主体位置”实质上从“分散”（dispersion）转化为“分割”（separation）。而问题在于：“从分散到分割的转化显然造成了我们先前已指出过的那些分析上的问题——特别是在以原素的本质主义置换总体的本质主义里面所固有的那些问题。”^③ 这也正是齐泽克指责福柯的地方：从表面上主体似乎抛开了任何普遍法则的支撑，然而，每一个分散的主体却在自制模型内恢复了自我形象。问题不在于由宏大主体蜕变为微观

①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5.

③ Ibid., p. 116.

主体，而在于自足的自我形象的完全瓦解；问题不在于承认差异性立场，而在于这种差异性立场的去本质主义化。

拉克劳与莫菲对“主体位置”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福柯。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由于拉克劳与莫菲在福柯的概念框架中融入了德里达与拉康的思想酵素。^①一方面，话语构造的主体位置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主体性是延异的一个结果”，主体的当下在场是一个神话，“主体唯有在与自身的分离中、在生成空间中、在拖延中以及在推迟中才被构成”。^②另一方面，主体位置的话语特征也“脱化”了拉康的作为“缺失”的主体的观念：主体的呈现永远是一个假象，它或者是借助于他者的虚构，或者是某种“匮乏”的象征。“‘我’作为主体是以不存在的存在而到来的。这个主体与一个双重疑难相协调：一个真正的存在却会因自知而破灭；一个话语却是由死亡来维持。”^③在此，拉康俨然给人们呈现了一个可持续的“缝合”（suture）现场：在某一个“节点”（nodal point）上，创伤的裂口似乎要被缝合，然而就在缝线“打结”的一刹那，一种“内爆”又使缝口崩裂。缝合在缝口的不断崩裂中延续。巴丽特曾说，拉克劳与莫菲提供了一个“策略性人体（a body politic）——其皮肤永久性地裂开着，以使外科手术室中持续的值班成为必要”。^④其实，这个“策略性人体”的原始提供者并不是拉克劳与莫菲而是拉康。拉克劳与莫菲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把这个“策略性人体”从精神分析治疗室“搬到”了政治分析领域而已。

拉克劳与莫菲对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的主体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接合”。主体在经历其“主体位置”时的丰富性（福柯主义）被最大程度地

① 拉克劳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后结构主义传统有助于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理论宝库。从这一点来看，主要的影响是德里达和拉康。在一定程度上，福柯也有帮助，不过，我总是与他的方法保持一定的距离。”可参阅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② 德里达：《多重立场》，余碧平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33页。

③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611页。

④ Michèle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 66.

削减了，主体的内在丰富性被指认为主体化对根本性“残缺”的掩饰（拉康主义），并且借助于德里达，“主体位置”被构想为对书写进程的“撒播”的驯服。主体不可能由既定的单一“位置”所捕获，相反，主体在话语结构中有诸多不同的位置（positions）“闪现”，并且，这些差异性位置并无实证性——“位置”本身不过是某种深度匮乏的“征兆”而已。正因为“位置”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像”，所以主体才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总是“站错”地方——他站在这个点上说出话似乎总是与此一位置不大吻合。主体位置就是不断延异中的一个“闪动点”，就是持续缝合中的一个“节点”。主体在寻找合适位置时总是“站错”位置，因为主体没有“本来的”位置，他此时此地的“占位”很快就证明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举动。用拉克劳的话来说：“主体的位置就是错位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the subject is that of dislocation）。”^①

主体是话语结构内的差异性位置，而位置就是错位，错位所表征的实际就是主体认同的困境（即认同的不稳定性和未完成性），所有的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这种错位式认同的话语表现形式就是对抗：“有没有这样一些‘经验’、这样一些话语形式，在其中，被显现的不再是‘先验所指’的连续延宕，而是延宕的空洞无用以及任何稳定的差异和客观性的最终的不可能性？答案是：有。这种关于一切客观性的限制‘经验’确实具有一个明确的话语表现形式，它就是对抗（antagonism）。”^② 由于某种“阻滞力”的作用，主体无法表现为一种完整的存在，主体的位置永远不是“本来”的位置：“对抗构成了每一客观性的限制（antagonism constitutes the limits of every objectivity），在这种限制中，客观性只展现为局部性的、不稳定的客观化。”^③ 只要不把主体当作一个透明的完全主体，只要不把主体位置当作是一个实证性的空间，主体认同的对抗性维度就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中，拉克劳再次申言：“关键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41.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2.

③ Ibid., p. 125.

的一点是，对抗是所有客观性的限制。在其最本来的意义上，这应该被理解为：对抗并不具有客观的意义，而是阻止客观性本身之构成的某种东西。”^①

哪里有认同，哪里就有对抗；对抗伴随着主体认同的始末。对抗的“不可排除性”宛如矛盾的“普遍性”，然而，对抗不同于矛盾，“矛盾也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②在通常情况下，对抗往往被等同于矛盾或者理解为矛盾的一种表现形态。拉克劳一度也不例外，为此，拉克劳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注脚中特意做了自我批评。^③颇有意味的是，拉克劳的自我批评以及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矛盾与对抗的区分所做的理论努力并没有引起齐泽克最起码的关注。齐泽克自己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破天荒地把黑格尔称作“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已提供了一个与后马克思主义最为一致的“对抗”模式。^④惯于煽情的齐泽克往往在大力张扬拉克劳与莫菲的观点时有意无意地窜出了拉克劳与莫菲的界线。在把对抗的解释诉之于黑格尔这一点上，齐泽克可谓是“反拉克劳与莫菲之意而用之”。因为拉克劳与莫菲对“对抗”的阐释本身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自觉背离。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的反黑格尔手法是无比高明的：他们借科莱蒂之口引出康德关于“现实对立”与“逻辑矛盾”的区分，以说明矛盾并不存在于一切领域之中，矛盾出现于命题领域，而对立则出现于现实的对象领域。然后，他们又说，对立只能描述现实的对象领域中已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而在现实领域中，还有大量未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只能用“对抗”来命名。对抗既不同于矛盾也不同于对立：对立表示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17.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4.

③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Chapter III, Note “40”, Verso, 1985, p. 148.

④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矛盾表示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已经确定所是的东西，才使这一关系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涉及的是完全的同—性。”^① 而对抗表示的是两个没有最终定形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种对抗的范围内，我不能成为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与我构成对抗的这一力量也不能成为如此完整的存在：它的客观存在是我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这样看来，对抗关系就被多重意义所充溢，这些意义阻止它的存在被固定为完全的实证性。”^②

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展现了理念不断异化的动态过程并彰显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裂隙，但是，这种辩证法最终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理性主义极限：一切差异性原素均得之于概念的演绎，所有的关系规定都是逻辑的规定，那些不确定性、模糊性、变动性不过是理性的狡计，一切的一切最终必然被理性系统所吸收。质言之，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通过这种“内在的超越”，“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③ 在理性完全控制的世界里，矛盾关系中的差异、对立及转化无不被理念的深邃性所吞噬，对立面作为“他物”也仅仅是在彼此相互规定的限度内对“此物”的超出。从这里不可能通达拉克劳与莫菲的对抗观念，因为拉克劳与莫菲一再申明：“既不存在通过对抗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理性的狡计’，也不存在任何类型的使对抗服从规则体系的超级游戏。”^④

对抗就是对抗，它不能被还原为矛盾。对抗不是从某种运动规律中衍生出来的，也不是因果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它不听从绝对理念的召唤，也不服从泛逻辑主义的规约。如果矛盾是内在的超越（immanente Hinausgehen），那么对抗就是“外在的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⑤ 如果矛盾是深层的理性表象，那么对抗就是“对被理解的可能性的逃避”（escapes the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4.

② Ibid., p. 125.

③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76页。

④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Verso, 2001, xiv.

⑤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17.

possibility of being apprehended);^① 如果矛盾是一种遵循规则的游戏, 那么对抗就是意外的搅局, “就对抗而言, 所有的规则与一致性都被亵渎: 对抗者不是游戏者, 而是一个骗子”。^② 如此的对抗观念是对黑格尔矛盾概念的“反动”——这种“反动”的根本之处在于: 被矛盾所吞食的偶然性被重新释放出来, 从而构成主体化完全实现的障碍。主体的主体化遭到不可收编与归化的“偶然性逻辑”的搅扰, 它的完备的对象性(即客观性)存在被永久地延迟了。

偶然性的介入使完满的认同空间现出了“漏洞”, 一度严整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对抗就是破碎的、失败的经验, 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 “一方面, 如果主体只是通过语言部分地、隐喻性地被整合进象征秩序从而建构自身, 那么对这一象征秩序的任何质疑必定构成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 这种失败的经验并不意味着走进完全不同的本体论秩序, 走进某种超越诸种差异的什么东西, 这仅仅是因为……(在对抗关系中)并不存在超越。”^③ 现代认同的危机既不能诉诸旧的形而上学来解释, 也不能通过构造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获得解决。构造完整存在的失败已经从根本上远离了任何“在场”形而上学的吁求。但是, 如果对抗关系中不存在内在超越, 那么总体的完整存在又是怎样被瓦解的呢? 换言之, 作为一种“失败的经验”, 对抗是如何呈现自身的呢? 这需要对抗的实际运作“形式”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四

对抗是一种限制(limit), 同时也是一种展现(revelation), 限制的是客观性, 展现的是偶然性。对抗之所以是限制, 恰恰是因为“它显示了所有客观性的最终的偶然性质”。^④ 对抗的展现功能是通过“差异与等同”的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5.

②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11.

③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6.

④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18.

双重逻辑作用而实现的。对抗不同于矛盾，对抗的基本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于矛盾的基本关系。所谓“差异与等同”实际上就是对矛盾基本属性——“对立与同一”的后现代置换。之所以用“差异”替代“对立”，是因为：一方面，对立总是意味着获得了完全的对象规定的两方之间的对峙与冲突，而对抗中的关系项则处于“半身份”状态——没有完全“定形”的对象之间无所谓僵硬的对立；另一方面，对抗关系并不像矛盾关系那样处于理性的内在性之中并表现为“二元对立”，而是一个开放的差异体系中的“多元决定”。之所以用“等同”替换“同一”，是因为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同一”仅仅具有隐喻性质，实质上的同一乃是一种不可能性，所谓等同就是把不同的东西姑且当作同样的事物来看待，在另一种视域之下，这些事物完全有可能不被当作同样的事物。换言之，等同只是一种象征秩序的建构，而丝毫没有实在论的意涵。拉克劳与莫菲以“差异与等同”置换“对立与同一”的做法多少有点类似于克罗齐的“差异辩证法”，因为，克罗齐也同样认为，矛盾的辩证法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差异并不必然发展为矛盾，对立与差异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在试图把差异从对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并重新确立差异本身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方面，克罗齐可以视为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先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宣称克罗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① 不过，应该看到，克罗齐虽然主张取消矛盾原则而代之以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断言“两个相异概念甚至在它们的相异中自行联合起来”^②，但是，由于他仍然坚持在精神活动内部理解差异之间的互动，并且，他也没有对差异之间如何进行“自行联合”以及达成怎样的联合作出相应的理论说明，所以他和拉克劳与莫菲之间的思想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克罗齐是修正辩证法，而拉克劳与莫菲是完全抛弃辩证法；克罗齐是以“差异的同一”简单地代替“对立的同一”，而拉克劳与莫菲则是把重新定义“差异”和“同一”归属在一个全新的对抗概念之下。

^①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

^② 克罗齐：《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王衍孔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页。

依拉克劳与莫菲之见，没有差异，对抗就是不可构想的；而如果只有稳定的差异，对抗就会“沦落”为矛盾。如果“每一个差异性位置被固定为特殊的、不可取代的环节”^①，那么获得完全规定的差异就构成了一个本质主义的闭合空间。对抗的限制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差异性位置之“特殊性”的颠覆上——这种颠覆是通过等同链条（chain of equivalence）实现的。所谓等同链条，就是不诉诸特定差异的“内在法则”的同质扩张而在彼此并无必然关联的差异性原素之间构建一种等同关系。当一系列差异是相对于某一个共同的外在指涉而言的差异的时候，这个共同的指涉也就“悬置”了这些差异的实证性。“如果一个对象所有的差异性特征都变成等同的了，它就不可表述任何关于那个对象的实证性东西。这仅仅意味着：通过等同，此一对象所不是的某种东西得到了表达。”^② 差异体系的共同的指涉，由于不是在体系内部实证地必然地确立的，所以，由它所提供的“同一性”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这种否定性并不是内在于对象之中的，而是在对象之外的话语建构。

正是因为纯粹否定的同一性表现了对象“所不是的东西”，所以它不能从差异内部直接显露出来，而必须通过不同环节之间的等同关系得到间接展现。“等同只能通过对差异性原素的差异性质的颠覆作用才能存在。”^③ 这就是说，等同不是差异的实证性表现，而是这一实证性的破坏，就像偶然性不是必然性的实证性表现而是这一实证性的破坏一样。在等同关系中，由于诸差异的实证性的瓦解，所有差异最终的非固定性和根本的不稳定性完全浮现出来，“这正是对抗的形式，通过这一形式，对抗把自身确立为对社会的限制”。^④ 对抗的形式显然不同于矛盾的形式：在完全受到矛盾原则宰制的逻辑领域，“不是（not being）某物，就因为它是（being）与某物不同的另外之物，是（being）的实证性主宰了整个话语”；而在对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7.

② Ibid., p. 128.

③ Ibid.

④ Ibid.

抗渗透的空间里，“通过等同，某种话语形式消除了对象的完全实证性并赋予否定性本身以真正的存在”。^①

等同作为差异的瓦解力量而存在，但它只瓦解“绝对的差异”（total difference），而不根本消除差异，如果等同彻底消除差异，那么就会产生“绝对的等同”（total equivalence）。而绝对的等同和绝对的差异一样不可能完全实现。“就像差异逻辑无法构建完全缝合的空间一样，等同逻辑也达不到这一步。通过等同的缩合（equivalential condensation）对主体位置的差异性的消解从来都没有完成。”^② 这就是说，不只是等同颠覆差异，差异也反过来限制等同。在政治空间的构建中，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发挥着迥然不同的功效。为了戏剧性地展示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特意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千禧年运动，一个是迪斯雷利（Disraeli）的政治学。在前一种情形中，话语空间被严格划分为两大阵营，即“一个最大化的分离达成了：在等同体系中除了跟其他体系中的原素相互对立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原素进入到等同关系中……在那里，并不存在能够在等同链条之内建立差异的话语”。^③ 而在后一情形中，各种差异闭合为系统内部的客观差异，即这些差异被当作具有完全“实证性”的纯粹差异而从等同链条上分离出来。由此，拉克劳与莫菲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

等同逻辑是把政治空间加以简化的逻辑，而差异逻辑则是扩展此一空间并增加其复杂性的一种逻辑，借用语言学的例子，可以说，差异逻辑倾向于扩展语言的横向组合端（syntagmatic pole），也就是说，它增加差异性位置的数量，使这些位置进入到组合关系之中并由此形成彼此相连的连续序列；而等同逻辑则扩展语言的聚合一端（paradigmatic pole），即引入用以替代某些原素的另外一些原素，如此一来，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p. 128 - 129.

② Ibid., p. 129.

③ Ibid., pp. 129 - 130.

就减少了可能被连续组合进来的差异性位置的数量。^①

等同逻辑作为一种“简化逻辑”，其本身潜伏着取消“中介”而直接表现自身的倾向，它的极端膨胀必然导致无中介的“自在自为的普遍性”^②，这种普遍性可以直接诱发极权主义的狂想。差异逻辑作为一种“分散逻辑”，其本身隐含着抵制同化的潜势，它的过度泛滥势必酿成完全排他主义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能够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幻觉把任何政治认同的希望彻底剿灭。拉克劳与莫菲既不要等同逻辑的完全专制，也不求差异逻辑的绝对主宰，他们寻求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有效的制衡。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等同与差异各有短长，不可偏废。等同占据绝对优势，政治空间易于清晰划界，但民主斗争的多样性会减少；差异占据绝对优势，政治斗争具有多样性，但分散的主体立场却不易形成统一的认同。如何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把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巧妙地接合起来，成为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要关切与核心目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条件下，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的发挥作用机缘与空间是大不相同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一再强调，在面对着政治专制高压和外敌严重威胁的情景之下，人民这一主体容易建构成形，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空间一开始就被划分为“两个阵营”的原因所在。而在经济相对发达、市民社会结构颇为稳固、公共空间比较开放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体立场的分散、民主诉求的多样化使得构造统一的“大众斗争”主体的力量大大减弱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条件正日益远离 19 世纪清晰划分的‘边界政治’（politics of frontiers）模式。”^③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困局：如果当代民主斗争没有把政治空间界划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0.

^②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46.

^③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3.

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其结果就是民主的对抗在与其他原素的关系体系中占有一个明确的位置，从而一个实证的关系体系在它们内部就建立起来了，如此一来，对抗的否定性负荷就大大减少了。人们可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民主斗争只是次要的斗争，而只有经典意义上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才是唯一真正激进的斗争。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忧虑所在，也是他们力图加以扭转的东西。赋予民主斗争以更加激进的政治色彩，使民主立场与大众的政治诉求贯通起来，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全部理论工作的着眼点。而困难在于：民主斗争要求差异链条的扩展，而差异链条越是扩展，等同链条越是难以建立。其中的缘由不言而喻：差异越繁多，立场越分散，共识便愈不易达成。

在差异占主导的社会里，等同逻辑的运作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拉克劳与莫菲坚信机遇也同样存在：一方面，由于差异的急剧增生，对抗点会越来越多，“对抗并不必然出现在单一的点上，在差异体系中的任何位置，只要它被否定，都有可能变成对抗的场所”^①；另一方面，由于差异体系的不圆满、不稳定，“等同链条将会因为此一链条所包含的对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它们可能以矛盾的方式影响并渗透到主体本身的认同之中”。^②这两个方面包含了拉克劳与莫菲对抗理论的关键因素：对抗并不必然在单一点上发生，也不必然源于某一内在关系，而是由外在的否定所构成，易言之，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而是建立在外在的、偶然性的关系中。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并不必然发生在生产场所，并且它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在所固有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它的主体认同之间。（基于此，拉克劳与莫菲提出，既存在着没有对抗的矛盾，也存在着没有矛盾的对抗。）对抗的外在构成必然导致反抗的共识不可能在种种反抗的内在性中去寻求——它既不可能是某一内在性的同质扩张，也不可能是所有内在性的均匀的集结。必须从限制之外（即界限之外）理解限制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实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1.

② Ibid.

现,或者说,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总体必须是在“特殊性本身的内在逻辑之外运行的一种接合”。^①

五

在多元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等同链条的构造,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也就是如何在不全面瓦解特殊性的条件下建构普遍性的问题。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关于等同链条与差异链条的论述开启了一条在后现代视域中重审认识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新路径。等同离不开差异并通过差异而存在,但是,等同并不是先在的完满同一性,它仅仅在颠覆差异的活动中存在。这表明,对抗关系中普遍性并不是从特殊性中“内部生长”出来的,而是特殊性“外在建构”的产物。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完全弥合的裂痕,它们相互需要又相互拒斥。特殊性只有与自己的实证性发生某种脱离,才能“容纳”普遍性——普遍性就是特殊性“脱离”特定所指的印证。“当能指与特定的所指脱离之际,它经历的是一种被掏空的过程(即意义的空无化过程),此时,它开始象征一个等同的所指的长链”^②,这就是说,普遍性本身是空的,它是一个空的能指(empty signifier)。在《解放》(1996)与《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2000)中的一系列文章中,拉克劳致力于从等同链条这一重要概念发展出他独特的普遍性理论。^③齐泽克认为,拉克劳提供了普遍性概念的第三个版本:第一版本是笛卡尔式的中立的普遍性,即作为实体的

①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301.

②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Andrew Ross (edited):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1.

③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主要以“等同与不稳定的边界”来揭示霸权关系的特征而并没有引入空的能指概念;在《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1989)一文中,拉克劳从等同链条的扩展引入空的能指概念,却并没有论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新型关系;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中,拉克劳使用了“空的普遍性”(the empty universality)这一措辞(参见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Preface, Verso, 1990, xiv)。真正把空的能指与普遍性、特殊性结合起来阐述霸权构形,是拉克劳在1994年发表的《为何空的能指对政治至关重要》一文(后来收入拉克劳的论文集《解放》)中完成的。这无疑可以看作是霸权阐述方式的翻新和意义的持续深化过程。

普遍性（它像特殊性一样具有客观的、自然的内容）；第二个版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概念，即作为特选的某种特殊性之同质扩张的普遍性；第三个版本是拉克劳式的空的普遍性，“普遍性是空的，然而它总是已经被某些偶然的、特殊的内容所填充，即被它们暂时主导了：这些偶然的、特殊的内容充当了普遍性的替身……普遍性所有的积极内容都是霸权斗争的偶然结果——就其自身而言，普遍性是绝对的空无”。^① 齐泽克精彩地道出了拉克劳式的作为“不在场的完满性”的普遍性概念的悖论性存在：它只有悲壮地牺牲自己的实在性躯体，才能赢得普遍性的光荣；它只有一无所，才能拥有一切；它只有在特殊性的伪装下，才能确证自己的非特殊性；它只有与特殊性保持着一定的紧张，才能与之达成某种妥协与和解。

普遍性没有自己的躯体；就像一位大元帅没有自己的军队一样——他借别人的军队来施展自己的革命抱负。拉克劳式的普遍性与此类似：普遍性只能借众多“特殊性”的躯壳而现身。当普遍性只“附体”于某一特殊性之中（即某一特殊性独占了普遍性）的时候，普遍性也不成其为普遍性了。在拉克劳与莫非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概念固有的缺陷：它一边断定在市民社会内部没有合适的躯体来承载普遍性的功能，一边却同时宣称在市民社会结构中完全可以构想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特殊躯体。在描绘市民社会的特殊躯体的局限性时，马克思这样写道：“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贺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窄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② 一句话，市民社会的特殊躯体永远不可能变成真正普遍性的躯体。可是，马克思很快就在对某一“特殊等级”的形塑中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

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

^① Slavoj Žižek: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Verso, 1999, pp. 100 – 10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①

拉克劳认为，马克思构想如此唯一的普遍化的特殊阶级，乃是依赖于一个社会学的目的论假设：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将导致中间阶级和小农阶级的无产阶级化，以至于同质的无产阶级群体将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在最后与资产阶级摊牌。基于如此的社会图式而进行的人类解放将是会产生“一种未经中介的完满性，一种本质的恢复——这种本质不需要任何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就可以成为它之所是的东西”。^②然而，资本的逻辑并没有沿着马克思所预示的方向演进。社会结构不是被简化为二元对立，而是被特殊主义极大地丰富化、多样化了。在此情状之下，社会和政治认同的复杂性质疑了任何狭隘的、基于阶级主义的视角，没有哪一种代理人是无限的社会行动者，“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③在一定的意义上，拉克劳与莫非倒退到了马克思所抛弃的“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的图景之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就是某一社会集团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从事普遍的解放——这一特殊代理人不是同化、也不是消灭其他代理人，而是联合他们、代表他们，质之言，一定的特殊性“被看作是和被认为是”普遍性的代表，但它毕竟不是普遍性本身。

如果普遍性本身是一个空位，而抢占这一空位的只能是某一具体的特殊性，那么，在众多的特殊性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war of posi-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5页。

②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46.

③ Laclau, *Class War and After*, *Marxism Today*, April 1987, p. 32.

tion)。正缘乎此，齐泽克才说，“每一种普遍性都是一个战场”^①——谁来填充这一空位，谁将是这一空位的“霸主”。作为空的能指的普遍性与作为普遍性之替身的特殊性必然导出“霸权”概念。霸权是一个转喻 (metonymical)：就像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大动干戈一样，相异的特殊性为了普遍性的“名分”而你争我夺。空的能指表明内在普遍性的缺失，这意味外在性 (exteriority) 对于霸权构成的极端重要性。“霸权主体，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主体，必然部分地外在于它所接合的东西，否则根本不会有接合。”^② 霸权总是意味着“占有”本来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它多少带有超出应有的权力界线、向外部延展势力、扩展控制范围之意。这正是俄国社民党理论家最初引入霸权概念的真正缘由：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使无产阶级介入进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任务的阶级性质与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存在着断裂”^③。换言之，无产阶级所承担的是异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常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外在”的介入，就无法确切地言及“霸权”。

没有外在性就根本不会有霸权，但是，这种外在性却“不能构想为两种不同本体论层面之间的外在性”^④，即是说，这种外在性并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绝缘于任何霸权接合实践的“纯粹外在性”。纯粹的外在性与纯粹的内在性一样不可建立霸权关系。对拉克劳与莫菲来说，所谓纯粹的外在性实质上就是话语之外的非话语；既然拉克劳与莫菲否认了非话语的存在，他们当然不会容忍纯粹的外在性。正是由于这一点，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说明霸权的外在性特征时再一次引入了话语与话语性的区分——外在性只是相对于不同的话语构形而不是相对于话语性来说的：某一原素虽然相对于某一具体话语体系是“外在的”，但它可能隶属于另外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身而言，它依然处在

① Zizek: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Verso, 1999, p. 100.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5.

③ Ibid., p. 49.

④ Ibid., p.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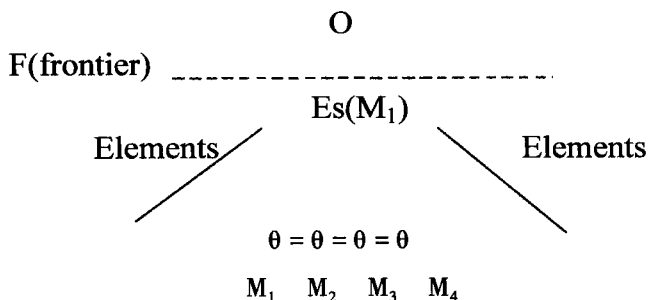
话语性的场域 (field of discursivity) 之内。外在性不可能脱离话语性的“矩阵”，这只能表明外在性本身不可能完全固定为两个成功的差异体系之间的确定边界——外在性所以是外在性恰恰是因为它是话语性“矩阵”中的话语剩余：因为它是话语，所以排除了外在的先验决定；因为它是剩余，所以化解了外在性完全转化为内在性的危险。

在“霸权构形” (hegemonic formation) 中，外在性的作用明显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由“原素” (elements) 向“环节” (moment) 的转换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如果完全实现了，外在性就消失了，差异体系将完全焊接在一起，霸权接合也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霸权”一节，拉克劳与莫菲给予“霸权”开门见山的描述便是：“霸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接合实践的领域，即‘原素’尚未凝结为‘环节’的领域。”^① 其二是诸多差异性环节通过偶然的外在性悬置其特殊性而建立一种等同关系——由于对抗力量的存在，特殊性的客观性受到限制 (limit)，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殊性之间不能确立任何边界 (frontier)。如果边界完全固定了，当然不会有霸权；但是，如果没有边界，就更不会有霸权。“霸权构形意味着边界现象”^②，不稳定的边界是霸权构形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外在性关系将特殊性的内在性加以颠覆从而建构普遍性的这种“霸权构形”过程，可以通过一个图示直观地呈现出来 (该图参照了拉克劳的图例与台湾学者林淑芬的图例并略作改变^③)：

① 值得指出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所出的中译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将这个十分关键的句子 (The general field of the emergence of hegemony is that of articulatory practices, that is, a field where the ‘elements’ have not crystallized into ‘moments’.) 的意思完全译反了，它译成：“领导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连接实践的领域，即‘要素’具体化为‘因素’的地方。”可参照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6.

③ 拉克劳在《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一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建构中的普遍性》中提供了一个图例，参见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303。台湾学者林淑芬在《拉克劳霸权理论中的敌对与异质性》(载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30期，2006年12月，第97—130页)一文中对拉克劳的图例作了局部改动，而笔者又在林淑芬的图例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修改。



用拉克劳最偏爱的例子^①——罗莎·卢森堡对俄国1905年群众大罢工的分析——来说明就是：在俄国沙皇政权的高度压迫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抗诉求（Elements），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学生要求学科的宽松性，自由主义政治家要求新闻自由，等等。这些诉求中的每一种就其各自特有的内容来说与其他诉求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这些分散的、局部性的诉求有可能在某一个“瞬间”（moment）统一起来，而那些被“收编”进某一体系中的“原素”（Elements）也就变成了某种政治话语的“环节”（Moments，即 M₁，M₂，M₃，M₄……）。在此，一个极为重要的关捩点是：这些不同诉求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体，“并不是因为具体的目标具有内在的关联，而是因为它们在对压迫性政权中被看作是等同的（equivalent）。因此，并不是这些不同诉求所共有的肯定性的东西（something positive）构造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是某种否定性的东西（something negative）——它们反对共同的敌人——构造了它们的一致性”。^② 差异性“原素”所以能转化为“环节”乃是由于等同逻辑的作用（θ），等同链条建立的标志是这些不同的反抗诉求对应于一个共同的否定性指涉物（O），就此例而论，沙皇政权不再仅仅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压迫者，它俨然成为纯粹

^① 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开篇就以卢森堡对俄国1905年群众大罢工的分析为例阐述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雏形，但那时，拉克劳与莫菲尚未引入空的能指的概念。在写于1994年的论文《为何空的能指对政治至关重要？》中，拉克劳首次以空的能指来重新诠释这个例子，而在2000年出版的《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中，拉克劳再次借用这个例子来阐释霸权概念。

^② 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s)*, Verso, 1996, pp. 40–41.

的邪恶，成为对所有不同的反抗诉求具有同样的否定意义的公认祸首。换言之，等同作用把压迫性体制从社会的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从而在被等同的诸环节与沙皇政权之间划出了一个不稳定的边界（上图中 F 所标示的间断线）。之所以说这个边界是不稳定的，是因为它不断受到差异逻辑的干扰与动摇，比如说，沙皇政权会变革性地吸收一些对立的要求，从而使这些要求严格地局限于特殊性之内。如果特殊性的这个“界限”不被打破，如果众多反抗诉求的具体目标不表现为一个“同一体”，那么等同链条就建立不起来，这就是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霸权构形取决于“将界限转化成边界”（transforming the limits into frontiers^①）的含义。

显然，等同与不稳定的边界的建立，其根本契机乃在于特定差异性原素对自身“特异性”的某种疏离。质言之，建立等同链条的关键条件是差异性原素必须部分地超越其所是而表现为自己所不是，一如拉克劳所言：“不存在纯粹特殊性的政治。即使是最特殊的要求也会按照超越于它的一些东西来实现。”^② 并且所要建立的等同链条越长，差异性原素所要持存的具体内容就会越少，少之又少，以至于空无。“达至极限，等同链条就变成了与所有具体宣称无涉的纯粹共同存在。”^③ 反过来说，只有差异性认同彻底崩溃了或被完全颠覆了，这种“纯粹的等同功能”才呈现出来，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特殊性的剩余总是根深蒂固”^④，总是不可能完全被排除掉。但是，这种空的能指（上图中的 E_s）却又必须获得某种程度的呈现，因为只有透过这种空的能指，特殊性本身才能反过来被看成是“不同于它自身、与其自身无法匹配的某物之象征，即看成是阻止社会同它自身吻合、阻止社会达到它的完满性的障碍”。^⑤ 正是基于此，拉克劳才断言，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43.

②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305.

③ 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s)*, Verso, 1996, p. 42.

④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305.

⑤ Ibid., p. 55.

空的能指既是一个不可能的对象，又是一个必要的对象。

作为不在场的完满性 (absent fullness)，空的能指没有具体的指意与之相连，它不可能具有自己的再现形式，所以，必须借由等同空间中的一个具体环节 (上图中的 M_1) 获得自己的再现。由一个特定的能指来体现空的能指的功能，就是霸权关系。由于系统内部这个发挥再现功能的能指原本并不是一个纯粹空的能指，而是一个与特定所指相连的能指，因此，由一个具有特殊内容的能指来体现空的能指的功能永远都是一个不充分的、不恰当的体现。这既彰显了霸权的结构性错位——由于普遍性的“缺位”，才导致了特殊性的“越位”，从而最终铸成了霸权的“错位”；同时也突出了霸权的建构性特征——由于特殊的能指对普遍性的体现是一种“特殊”的体现，普遍性本身才被视为“一种特别的历史构造”。^① 用拉克劳的话来说，霸权的普遍性总是一种“建构中的普遍性” (constructing universality)。

六

确立霸权，就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构一种特别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建构不是通过肯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并且这种否定不是可以纳入理性调节体系中的纯粹否定性。正是这种构造方式的特别性成就了特别的普遍性形态：不是差异性原素本身具有共同的肯定性内容成为共同体的聚合剂，而是由于这些彼此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原素遭受到了共同的否定（或排斥）才形成了一种否定性认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竭力彰显霸权构形的外在性的原因所在——既然不可能从内在的本质中寻求体现历史力量的必然普遍性，那就只有从外部“通过具体要求的不确定的、开放领域的多元决定”来展现“非确定的‘相对普遍性’”。^② 应该说，这种霸权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认同的一个特征：在面临着共同的外在威胁的时候，原本分散的（甚至是对立的）主体立场比较容易达成某种团结；一

^①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193.

^②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80.

且共同的外敌消失了，一度被悬置的特殊利益会立即暴露出来，统一性再度瓦解甚至陷入更大的纷争。一般来说，内讧常起于外患平定之时，在胜利之后，对外敌的仇汽消失了，而对“自己人”的敌意可能随之而生——敌人的存在是政治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

正是在这个地方，齐泽克和拉克劳与莫菲的分歧出现了。齐泽克认为，过分强调共同的外敌在霸权构形中的作用，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如果没有外部的威胁，自我原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完满的存在，整体原本完全可以是一个完满的整体。由此则可能导致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当与我形成对抗的敌人最终消灭之时，对抗本身将化为乌有。而问题的根本却在于：“并不是外在的敌人使我们不能达到与自身的认同，而是每一认同本身已经被一种不可能性所阻碍。外在的敌人不足挂齿，这个外部借托只不过是“展现”或“外化”我们内在固有不可能性的方式而已。”^① 在外部的阻碍与压抑被化解之后，一种更危险的对抗会不期而至，这种对抗由于顿然失去了外部的借托，转而直指自身并可能把自身推入崩溃或者错乱的深渊。基于此一考量，齐泽克提出必须把“作为实在的对抗”（antagonism as real）与“现实的对抗”（antagonism in reality）区分开来。所谓“作为实在的对抗”（即纯粹的对抗），就是内在于所有主体认同之核心的不可根除的原初匮乏；所谓“现实的对抗”，则表现为主体位置之间的关系。

应当看到，齐泽克的这一区分并不在于否认对抗在霸权构形中的轴心作用，而是在根本上激进化对抗的自体论地位——由于真正的对抗并不是源于外部而是源于自我认同的内部，所以对抗永远不可能被根除。正是由于齐泽克以维护对抗、深化对抗的理论姿态现出，所以尽管他对于对抗的“外在构成”提出了非议，拉克劳还是乐意接受这一批评。^② 作为对齐泽克批评的回应，拉克劳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把论述的重心从对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249.

^② 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一书序言的末尾，拉克劳这样写道：“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理论方法持以热情欢迎的齐泽克对我们关于主体问题的探讨提出了激发性的批评。这种批评对我产生的影响可以在本书第一部分清楚地看到。”参见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Preface, Verso, 1990, xv.

抗转向了错位。就像拉克劳自己承认的，他对错位的强调在于表明在社会对抗发生之前主体已内在地具有了对抗的面向，即是说，“外在的对抗”只是“内在的对抗”的话语表现形式——此一内在的对抗就是错位。与其说拉克劳此时对错位与对抗进行了某种区分，倒不如说拉克劳着力彰显了对抗与错位之间的内在纠缠。实际上，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有时仍然用对抗来说明错位：“我们所指的错位并不是因某个零件失调而坏掉的机器，我们正在探讨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错位：一种源于对抗力量之存在的错位。”^① 由此看来，施泰埃利（Urs Stäheli）关于拉克劳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存在着对抗与错位之间的循环论证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②

错位不能通过更换一个零件而轻松地得到调适，它永远是一架调整不过来的坏机器。基于错位对主体认同的始源性作用，拉克劳得出了“所有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的结论。应当说，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确实表现出了欲把此一结论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所有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的观点兼容起来的意图。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拉克劳却改换了口径。在回答保罗·鲍曼（Paul Bauman）1998年提出的“对抗与困局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拉克劳声称他正在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对抗的力量不能变成对立的他者（不成为它的对立者的构成因素）？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它以此种方式通过对立的辩证复归而达到某种内在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就对抗概念本身而论，没有什么能保证它将一直与作为偶然性和错位的场所的特定的社会力量联系在一起。‘对抗’与‘错位’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对立正是我在最近的作品中试图加以探索的。”^③ 而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拉克劳更是把他晚近关于对抗与错位的明确区分的源头回溯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40.

② Urs Stäheli: *Competing Figures of the Limit: Dispersion, Transgression, Antagonism, and Indifference*, in Simon Critchley and Oliver Marchart (ed.):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Routledge, 2004, p. 234.

③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Polemics and Academics: An Interview by Paul Bowman*, *Parallax*, Vol. 5, No. 2, pp. 93 - 107.

到1990年:

我与莫菲在写《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1985)时坚决主张:社会关系错位的契机,即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之界限的契机,是由对抗给予的,但后来我们认识到,这是不充分的,因为一种社会错位(即对抗)的形成,其本身已经是一种话语反应。你认为是他者导致了你身份的错位从而将其建构为敌人。但总还是有替代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中坚持把错位于比对抗更优先地位的原因。^①

可能由于拉克劳本人的这种回溯,致使有些学者认为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已经在有意淡化对抗的作用。比如,诺弗尔(Aletta J. Norval)认为:“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错位概念发挥了‘社会的界限’的指示器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先前是由对抗概念承担的。作为结果,对抗不再简单地与认同的个体化环节相一致,而是变成了诸多可能表述中的一种。”^②但这种评价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拉克劳在1995年发表的《政治的主体与主体的政治》一文中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抗与排斥是所有认同的本质”^③。因此,中肯的结论应该是: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拉克劳才“一反过去的坚持”并对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反省与修正”。^④在2004年的一个文本中,拉克劳把自己观点的调适

① Ernesto Laclau: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Ernesto Laclau'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L. Worsham and G. A. Olson (ed.): *Race, Rhetoric, and the Postcoloni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② Aletta J. Norval: *Trajectories of Future Research in Discourse Theory*, in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3.

③ 这篇文章是拉克劳提交给1995年1月9日至23日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第七届东西方哲学家论坛:民主与正义:一种哲学探讨”的会议论文,该文正式发表于在 *Differences*, 7, 1, Spring 1995. 此文后来收入拉克劳的论文集《解放》中。参见 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s)*, Verso, 1996, pp. 52-53.

④ 林淑芬:《拉克劳霸权理论中的敌对与异质性》,载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30期,2006年12月,第116页。

明确地表达为“并不是所有的错位都要以对抗的方式被建构”。^①

如果“所有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与“所有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后者并不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化，而是表现了后者对前者的限制，那么这无疑意味着对抗作用范围的缩小，由此便带来了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既然对抗是阐述霸权的核心概念，如今，对抗覆盖面的收缩是否会影响到霸权概念的有效性？换言之，拉克劳对霸权的阐释是否相应地要作出根本性的修正？从拉克劳与莫菲晚近的著述来看，他们虽然承认主体内在的不可能性并不必然通过敌对化他者而展现——即是说，它也可能以非对抗的形式面对错位关系，但是，他们依然坚守一个基本立场：以非对抗形式出现的话语构造不足以成就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霸权接合。我们看到，在《论民粹主义理性》这部新著中，拉克劳通过对抗性边界的划分重申了霸权构形是對抗造成的总体效果这一根本观点，从而再次彰显了政治的对抗维度。他说：“并非社会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因为总会有一些沉积的社会形式模糊了原初的政治建构的踪迹”，但是，只要有政治，就会有对抗，就会有斗争，“严格地说，‘政治斗争’乃是同义反复”。^②这表明，虽然拉克劳承认并非所有的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但是，他却并不认为政治认同可能缺失其对抗的维度。

颇有兴味的是，拉克劳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不遗余力地强调对抗对于霸权构形的基础地位，却再也不提错位概念，好像错位概念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理论架构之中，好像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错位的阐发只是一段可以忽略的往事。^③这可能与拉克劳同齐泽克的关系变化有关。由于拉克劳当初对齐泽克的批评的一定程度的接受，促使拉克劳由对抗转向错位；同样，由于拉克劳最近对齐泽克批评的一定程度的拒斥，遂又导致拉克劳以一种新的替代方式来深化对霸权概念的阐释。这集中体现在拉克劳

^① Ernesto Laclau; Glimpsing the Future, in Simon Critchley and Oliver Marchart (ed.):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Routledge, 2004, p. 319.

^②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 154.

^③ 不仅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拉克劳对错位概念三缄其口，在2006年拉克劳发表的两篇重要论文《意识形态与后马克思主义》和《为何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中，错位概念也完全销声匿迹了。

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对异质性 (heterogeneity) 的探讨上。

拉克劳对异质性的探讨源之于他关于对抗作用机制的重新检视。拉克劳坦承,他一度把对抗与排斥 (exclusion) 并置相称并认为对抗就意味着根本的排斥 (radical exclusion)。而问题在于:对抗仅仅是将社会空间二元化的一种机制,在对抗关系中,不仅与我形成对抗的另一方的存在是再现空间存在的必要保证,而且,对抗也只是暂时“悬置”差异而不是根本消除差异。因此,如果说对抗是一种排斥的话,它只能称作是吸纳式的排斥 (inclusive exclusion),而不是根本的排斥。但这远远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拉克劳进而指出,在等同链条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些差异性原素根本没有进入对抗所形构的再现空间之内。在由吸纳式排斥所形成的边界之外的被排斥者之外,相伴而生的还有另一种被排斥者:它不仅游离于等同链条之外,而且游离于整个再现过程之外,因此,它是不可表征的剩余之物,是表征原则本身固有的困局。拉克劳声称,黑格尔所谓的“没有历史的人” (peoples without history)、马克思所谓的“流氓无产者” (lumpenproletariat) 就是这样的被排斥者。这样的被排斥者的存在表明:虽然所有的对抗都包含排斥,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排斥都是对抗性排斥。存在着非对抗性的排斥:它是被对抗性排斥所排斥的一种排斥。拉克劳认为,这种非对抗性排斥所标示的就是一种异质性关系。异质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差异,“两者之间所以谈得上差异,是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空间——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空间内,它们的差异才得以表现”,而“异质性以共有空间的缺失为条件”。^①

应该看到,拉克劳指证非对抗性排斥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否定对抗性排斥,从而从根本上撼动对抗在霸权构形中的地位。恰恰相反,依拉克劳之见,非对抗性排斥虽然没有构成性地进入再现空间,但它却是对抗性排斥得以存在的条件。首先,对抗以差异性环节对于自身“特异性”的坚持为必要前提,而异质性所标示的正是差异性环节的极限。异质性是差异不能被彻底消除的象征,如果差异总是同化中的差异,那么差异中不可公度的

^①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 140.

内核就会被遮蔽或者被忽略，从而差异就可能沦落为等同的附属物；同时，异质性也是差异逃避同化的最后避难所，被暂时悬置的差异可能在某一历史时刻与等同链条发生抵触甚至脱离其中。其次，某一等同链条之外存在着不可收编的异质性因素，这本身就表明此一等同链条的局限性与非完满性，从而预示着以其他方式建构另一种等同链条的可能性，因为，被此一等同链条所排斥的异质性并非不可能被另一个等同链条所吸纳从而化为一个再现空间的差异性环节，就此而论，异质性彰显了对抗本身的建构性以及此一建构的未完成性。最后，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霸权，是以差异性“原素”向认同体系内的“环节”的不断转化为条件的，正是这个“不断地转化”才使得对抗的边界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旦所有的社会实体都被单一的再现空间所吸纳，那么对抗的边界就会完全固定，而对抗边界的完全固定则意味着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霸权构形的彻底终结。在此意义上，异质性是颠覆对抗边界之僵化和稳定性的必要力量。总之，如果没有异质性，没有认同空间的根本断裂，对抗就会被内在性逻辑所捕获，从而化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拉克劳才一再强调，“没有异质性，也就没有对抗”^①，“对抗是建立在根本的异质性之上的”。^②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拉克劳新近对于异质性的探讨并不像托马森（Lasse Thomassen）所说的那样表明了拉克劳理论立场的重大转折，更不存在着所谓拉克劳与莫非霸权理论的核心由对抗向异质性的转移。^③实际上，拉克劳对异质性的探讨不过是对早就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作过阐发的外在性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深化无非是从另一路径来理论化“霸权逻辑运作的排除性、偶然性、开放性以及不可能完满的特性”^④，无非是从另一视角来揭示：作为一种政治认同的霸权构造，它终归

①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 149.

② Ernesto Laclau: *Ideology and Post-Marx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June 2006), 11 (2), p. 105.

③ Lasse Thomassen: *Antagonism, Heterogeneity and After Heterogene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October 2005), 10 (3), p. 290.

④ 林淑芬：《拉克劳霸权理论中的敌对与异质性》，载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30期，2006年12月，第124页。

是一个“不成功的总体”，是一个“完满性无以恢复的场所”。^①当然，在拉克劳与齐泽克因民粹主义之争而失和的背景下，拉克劳借由异质性对霸权构形的外在性（或对抗的外在构成）的极力彰显，无疑也包含着对齐泽克过度强调对抗的内在性的抵制与批评。

七

拉克劳与莫菲挪用后现代主义的资源对来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一如阿迪蒂所言，霸权俨然就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codeword）。^②从多元决定、接合、话语到主体认同、对抗、等同与差异、普遍与特殊再到错位、空的能指、异质性，这一系列关键词被用来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层面来描述、界说同一个霸权概念。通过这么一种新型的“概念工具”的锻造，拉克劳与莫菲不仅展示了一种富有创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视野，而且积极地将这种视野引向民主的革命性建构。就像亨特（Allen Hunter）指出的那样，拉克劳与莫菲致力于探寻一条把霸权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这使得他们与以往的霸权阐释者大为不同：在以往的阐释者们那里，‘民主逻辑’与‘霸权构造’的关系被减缩了”。^③在对霸权的概念化阐释中，拉克劳与莫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极权主义由于“否认了民主逻辑形成的明显社会分化”^④而将权力中心绝对化，而新自由主义则诉诸保守哲学的话语来限制民主斗争的领域，并反对“那些建立在平等权利和人民主权上的民主因素”。^⑤基于此，诺弗尔断言，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霸权

①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70.

② Benjamin Arditi: *Post-hegemony: Politics outside the Usual Post-Marxist Paradigm*,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13, No. 3, p. 205.

③ Allen Hunter: *Post-Marxism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7/6, 1988/89, p. 897.

④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87.

⑤ *Ibid.*, p. 175.

就是一种“民主形式的主导权”(democratic form of hegemony)。^①拉斯廷(Michael Rustin)似乎没有弄清这一点,以至于他竟为霸权的“反动”运作而忧心忡忡:“为什么偶然性的论点和对抗中的集体决断不像符合共和主义或激进民主那样符合非民主的社会同一性呢?如果所有的社会认同都这样来确认,都这样在实践中被建构,那么谁能够合理地说明一种集体意志形式比另外一种更加优越?他们所勾画的那种观点看起来至多是相对主义的。在最差的情况下,它是一种政治形式的哲学合法化,这种形式比拉克劳与莫菲开始思考的可能更加可怕。”^②诚然,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霸权,它“依赖于某一集团把自己的特殊目标表达为与共同体的实际功能相一致的能力”^③,换言之,霸权就是把特殊话语“合法化”为普遍话语的政治建构形式。这听起来好像是非合法性“变为”合法性的政治魔术,似乎一些仇视民主的、极权的、独裁的政治动员,只要能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成功地把大多数召集在自己的旗帜下,就可以称为霸权操作(the hegemonic operation)。然而,这并不符合拉克劳与莫菲对霸权概念的基本规定。在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阐述中,霸权作为一种差异不能完全固定、异质性不能最终消除的认同建构体,已基本上把同质扩展的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治逻辑排除在外了。

民主形式的霸权操作似乎是一个不通的表述,就像说“方的圆”一样。毕竟,在汉语语境中,霸权在极大程度上是与武力征服、强制屈从联系在一起:霸权就是废“王道”而行“霸道”。这个刚性的“所指”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概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干扰。阻抗并降解这个干扰的有效方法是要牢记:hegemony这个源于古希腊语的“外来词”原本就有一种较为温和的古义,即通过言语、辩论、修辞的说服力而获得的权威性影响和指导地位。葛兰西正是借此一古义将“hegemony”阐

^① Aletta J. Norval: Hegemony After Deconstruc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Undecid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June 2004), 9 (2), p. 141.

^② Michael Rustin: Absolute Voluntarism: Critique of a Post-Marxist Concept of Hegemon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43, Winter 1988, p. 173.

^③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p. 54.

释为与专制、暴力相对的“智识霸权” (intellectual hegemony)^①，它不是在政治国家层面上直接运作，而是在市民社会领域中间接生效的统治形式。霸权即使不可能祛除对从属集团的支配与控制，也必须把这种支配、控制加以温和化或者巧妙地掩饰起来，以至于它使被统治者、被领导者感到自己不是由于被压制而屈从，而是基于赞同和共识而心悦诚服。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的这种霸权观念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影响至为深远、经久不息。虽然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进行了后现主义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没有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所内蕴的以非强制方式构造政治认同的核心观念超越“掉”。拉克劳与莫菲宣称，他们在两个关键方面远离了葛兰西：其一，他们抛弃了葛兰西所谓只有基本阶级才能成为霸权主体的观念；其二，他们抛弃了葛兰西所谓每一社会构形仅仅围绕单一的霸权中心建构的思想。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抛弃，就是把葛兰西霸权概念所潜含的根本制约民主建构的决定论因素和本质主义成分彻底剔除，从而使“集体意志”的锻造朝着更加平等、更加自主、更加民主的方向延伸。在对霸权的重构中，拉克劳与莫菲对多元性、差异性、外在性、异质性的突显，无不是对霸权的“存异构同”的民主机理的浓墨重染。

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观念充斥着强烈的民主精神，但是，霸权概念内蕴的民主想象并不等于一般的民主逻辑，否则，通过霸权这一路径来达成政治认同的“拉克劳与莫菲方式”的独特之处就无法真切地被领悟到。拉克劳与莫菲之所以特别偏爱“hegemony”一词并将之加以重新概念化，不仅是因为“hegemony”有一种“去暴力化”、“去强制化”的葛兰西主义阐释，更是因为这种“去强力化”所留下的“力性残余”。霸权可以被“缴械”，但不可能丧失“张力”。霸权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霸权更具有“力感”，更具有“能动性”。在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架构

^① 关于“霸权”(hegemony)一词的古义的考证以及葛兰西对“霸权”一词的独特运用，可参阅拙文：《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第20—22页。

中，无论是霸权的倾斜性（它来源于权力的不平衡），还是霸权的潜越性（它源于权力的扩张），抑或是霸权的颠覆性（它来源于权力的置换），都没有真正地“去功能化”，它们只是通过解构的效力获得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转换。在论权威问题时，恩格斯曾说，一些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常常会把“权威”巧妙地改称为“委托”，但是“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在开我们的玩笑”。^①实际上，那些以为在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架构中“hegemony”已被彻底“去权威化”的人们也是在开玩笑，因为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使主导性权力“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②，而仅仅只是改变“霸权构形”的方式而已。霸权永远是一个不平衡的力场（the field of force），在这个力场中，离散与规则、差异与等同、特殊性与普遍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能指与所指、漂移与固定、排斥与包容、我群与他群、中心与边缘、缝合与断裂皆处于无法化解的紧张之中。就像雷蒙德·威廉斯正确指出的那样，霸权具有明显的动力学特征，霸权不是一劳永逸的成就，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造、捍卫和修正”。^③霸权是权力的建构，而这一建构充满着斗争，这种斗争虽不能理解为阶级斗争，但它依然弥漫着斗争的气息。因此，如果说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概念承载着深厚的民主寄托的话，那么这种民主并不是以平息争议、减缓冲突、化解对抗为取向的民主，而是洋溢着反抗精神和斗争情怀的民主。在此意义上，齐泽克的如下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把民主和抗争精神融合在一起，从而排除了两个极端：一方面，颂扬的英雄式的对决会终止民主及其主要法则（尼采、海德格尔、施米特）；另一个方面，在民主空间里排除真正的斗争，结果只会剩下贫血的、规则操作下的竞争（哈贝马斯）。”^④

民主是斗争的产物，它只能在斗争中发展。而民主又具有高度的歧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

② 同上书，第224页。

③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2.

④ Slavoj Ziz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32, No. 3, Spring 2006, p. 558.

性，它在不同的语境中萌生并可能沿着不同的方向“成长”，就像拉克劳与莫菲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所说的那样：“民主革命完全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平等主义的想象所支撑的置换逻辑发挥着作用，但是，它并不能预先决定这种想象产生作用的方向。”^①就像在一定历史契机下，非民主的行为能够为民主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样，民主的想象也可能朝着危害民主、践踏民主的方向“漫游”。新自由主义宣称民主是保护内部和平与个人自由的一种手段，但最终却走向了以颂扬等级制和不平等为主题的反民主道路。极权主义引导人们把民主理解为在社会层面上构造一个等同的结构并将此一层面转化为一种统一的原则，其结果是，它借人民的名义或民族的名义“自己抬升到社会秩序之真理的唯一拥有者的地位并试图控制所有的社会网络”。^②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走出“民主悖论”（the democratic paradox）的途径并不在于给民主规定一个确定的方向，也不在于给民主设置一种先验的图式，而在于回到民主的根本（the radical）上，所谓民主的根本，就是把人民（demos）与权力（kratia）连接在一起，使人民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源。但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并不构成一个整体，而是处于原初性分裂（original division）甚至对立的状态，因此，根本的民主应该承认多样性的斗争、冲突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性格。在国家仍然衍生宰制与压迫关系的情势下，人民反抗国家的不正当干预与制度性特权的权力也必须被许可。民主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也不能完全受制于固定的宪政框架，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体制性的政治代议形式，它必须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敞开并积极吸纳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形式。一切使民主教义化、规程化和操作化的企图只能使民主丧失活力并最终葬送民主。民主就像社会空间一样，永远不会完全“缝合”，它只能被构想为通过不断的斗争而表达政治认同的持续努力。民主要真正具有“人民性”，就只能“激进化（彻底化）”，正是在此意义上，根本的民主也就是一种“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68.

^② Ibid., p. 188.

第八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

按莱斯利·里普森 (Leslie Lipson) 的说法, 最极端的政治变革就是革命。“一个集团在同一宪法体系的框架内并按宪法规定的和被广泛接受的程序从另一个集团手里取得权力时, 不是革命。当宪法和政府都被重建时, 革命就发生了, 除宪政的革命以外, 社会也经历自上而下的变革, 革命本身的特性也变得更加彻底, 通常会出现巨大的动荡和无序。”^①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政治, 这表现在它不仅把政治国家理解为暴力统治的机器, 并且执意要以血腥的暴力彻底摧毁这种政治暴力的最后形态, 而更为重要的是, 它把激进革命的最终目标确定为一种无对抗的透明社会——这种激进政治的终极目的恰恰在于取消政治本身。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写道: “在发展进程中, 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 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② 后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运用某种特定的系统方式来全面修改这种激进主义的政治观念, 之所以是全面修改, 是因为它既要改其方式, 又要改其目的; 之所以说它是“修改”, 是因为后马克思主义不愿意与激进政治决绝, 它要以重构的形式将“激进精神”保留下来, 但是这种延续下

①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 刘晓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1年, 第3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 1975年, 第45页。

来的激进种子已非原来的激进面目，它是被阉割的激进，被驯化的激进，抑或像齐泽克所说的，是反激进主义的激进主义。本章的任务就是通过展示拉克劳与莫非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的哲学改造来阐述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概念的性质与特征。

第一节 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

马克思一向以普罗米修斯自况，他想盗来天火将资本世界烧个精光。我们通常说卢卡奇早年曾经过救世乌托邦主义阶段，其实，马克思的革命弥赛亚主义情结比卢卡奇更浓重。每次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背的一句诗：“我渴望地下的烈火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天火当然是没有的，所以马克思只能借助于“地下的烈火”。大抵是1843年，马克思终于发现了“地下的烈火”——无产阶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决意摧毁现存的秩序”，并且有能力“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由一个普遍的阶级来实现人类彻底的、全面的解放，这无疑是颠倒乾坤、气吞山河、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恢宏之举。斯特龙伯格指出，青年马克思所以有这样涤荡寰宇、气吞万里如虎的大气度，是由很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除了他年轻气盛、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之外，还由于马克思“思想深处的浪漫主义结构表现为他的造反观念、普罗米修斯不惧天神的精神、对受压迫者的同情以及对商人市侩的敌意”。^①

斯特龙伯格的解释肯定是不充分的，因为他太偏重于从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来说明马克思的宏大革命政治的根源。马克思所以对“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不屑一顾，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地下的烈火”受到压迫不是部分的压迫，而是全面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苦难不是某种特殊的苦

^①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新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

难，而是普遍的苦难；“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不公，而是一般的不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不是对人性的某种疏离，而是人自身的“完全丧失”。既然无产阶级身上不止一条锁链，而是无数条锁链层层封锁而形成的“彻底的锁链”，那么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就不能只打开一把锁链或一些锁链，而是必须将所有的锁链彻底砸碎。人的全面异化的观点导致马克思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各部分看作是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总体，总体的异化只能通过对异化的总体扬弃才能达到，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念，它来自黑格尔关于精神的异化学说。正因为无产阶级经受了普遍的苦难，所以它才具有普遍的性质，马克思显然把资本主义加之于无产阶级身上的种种痛苦看作是黑格尔式的“理念”走向绝对的“大全”的异化环节。这就好像说，由于你得了所有的病，所以你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神医！在黑格尔那里，总体内部的丰富的多样性不过是同一精神本原在异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这意味着具体的局部性要素并没有声称实在性的资格，只有当特殊性达到了具体的普遍性，它才为真实的东西。黑格尔的这一观念对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的理论的影响既深刻又长久，它并没有因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失去作用。

浸润于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和全面解放的总体性话语之中的是马克思的启蒙主义信念。在对理性、科学、社会进步、历史的线性演进以及人性的统一性的信奉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孔德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正是由于他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可以把握的连续进步的上升过程——它由低级的、简单的阶段向高级的、复杂的阶段演化——他才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理性完全展开、欲望与道德秩序完全和谐的人间天堂，他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会有任何具有支配和宰制性质的政治权力。一般来说，后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再接受马克思所抱有的这种现代性观念，即便是像哈贝马斯这样极力捍卫现代性遗产的人，也不满足于马克思基于劳动及劳动阶级概念之上的那种狭隘的现代性。就像阿伦特通过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来“肢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样，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行为概念来拓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们所做的工作的隐含的共同意义无非是认为劳动（或生产）概念构成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那些对现代性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后现代主义者（比如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鲍德里亚、德里达、福柯等等）则径直将马克思的现代性政治观念斥责为一种宏大叙事或元叙事。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资本逻辑所蕴含及其伴生的现代性，但马克思的这种批判仍然没有超出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围，马克思的政治观念内在包含着现代性政治固有的局限性——一元的权力概念（自由主义认为权力发源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权力来自阶级结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拒斥总体化的同源性的基础性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这一观念的现实结果便是对趋向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的关注与倡导。差异政治、欲望政治、身体政治、族群认同政治、性政治、边缘政治、文化政治等等，都是后现代的微观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总结的那样：“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① 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仅仅局限于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之中，而是使一度神秘而庄严的政治以日常化的面目混迹于人类普通生活的各个角落。权力不仅异质化了，而且也去中心化了。反叛在学校、家庭、文化机构、医院、消费和娱乐场所、疯人院以及监狱等多种层面展开，政治反抗的主体也不再锚定在某种特选的“普遍主体”身上，学生、妇女、少数民族成员、同性恋者、文职人员、病人、囚犯、教师、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战分子、工人、失业者等等都是平等的政治主体。斯蒂文·塞德曼对微观政治的性质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他写道：“如果权力在社会领域中四处弥散，如果权力已经被编织进了日常生活这张无形的大网，那么社会冲突和反抗就不可能集中于某一处。政治反抗运动就不可能被归于诸如反政府主义、反资本主义或反父权制的旗帜之下。社会反抗也必然是复杂多样的；反抗的实践也一定是局部的（地域性的）、分散的，并遵循

^① 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其特定的社会领域（如监狱、学校、性）所特有的社会逻辑。”^①

在对总体的权力理论的拒斥以及对微观政治的诉求上，拉克劳与莫非同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即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基本是一致的。拉克劳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就有意避免从资本积累引发的经济危机的视角来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试图以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分析策略将政治理解为去总体化的多元要素的连接与凝聚过程，这与赖希关于法西斯主义对人的心理领域的征服、德勒兹与加塔利将法西斯看作是对主体欲望的控制具有潜在的相通之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克劳与莫菲更加自觉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前提，并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和概念工具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政治。他们认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已经趋于终结一样，普适性的宏大政治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象的最后基础”。^②一方面，经典的左派政治分析形式在后现代境遇之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传统激进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女性主义的兴起，少数民族的、民族的及性征上的少数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发动的反体制的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发生的种种不定型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的冲突性质扩大到更加宽广的范围”^③。这些“新的积极现象”的不断涌现催迫着新左派理论家在一种新的理论构架内重建激进政治的话语空间。所以，我们看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部最负盛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明显表现出“双层结构”：对传统激进政治的理论基础的解构和对后现代语境下新型激进政治的重新建构。

^① 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2.

^③ *Ibid.*, p. 1.

第二节 由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

在一定意义上,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仅仅是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一种粗略的视觉化的表象性描述。导致这一政治空间外观“变形”的根本性东西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质疑、修正与抛弃。正是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坚信当代政治对抗运动已不再围绕阶级来组织和展开,所以他们才致力于把政治斗争的关注点从“生产场所”转移到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似乎可以说,所有类型的微观政治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的一种强劲消解。

像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拉克劳与莫非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政治界定为阶级政治。对于他们的这种界定,我们目前还难以提出过硬的反对意见。因为,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心力使马克思表现出一种温和的面貌,却总是无法抹杀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终其一生一直信奉阶级斗争的学说。《共产党宣言》正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坚定的阶级斗争观念:“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52年马克思在写给约·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谦逊地承认了他自己对于阶级斗争学说所添加的三项新内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①而马克思最宏大的著作《资本论》的最后一章也以“阶级”为论题。当然,在这尚未写完的简短一章里,晚年马克思似乎变得没有年轻时那样坚决。他承认:“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②然而,当马克思提出“是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01页。

么形成了阶级”这个问题并试图回答的时候，文稿却中断了。

马克思的这一中断引起了几十年的争论，并激发了无数的政治想象！从这一中断处，似乎可以演绎出种种不同的“下文”：比较正统的想法是，如果马克思继续写下去，他也不会提出一个与事实上他已使用了几十年的阶级概念相抵牾的阶级定义。但这不过是众多想法的一种而已！丹尼尔·贝尔对着“这一中断”发呆良久，从马克思所说的“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这句话中，他受益多多。他感觉出马克思晚年可能想修改他原先的一些过于激进的观点，因为《资本论》第三卷在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上已表现出与《资本论》第一卷的差异，基于此，贝尔提出了所谓马克思的“两大图式”说。贝尔本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正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的兴起与壮大之上的。当然，还会有更为偏激的推想：马克思意识到他对阶级概念的使用存在太多太多的问题，必须要来一个根本性的重构！但马克思的性格和脾气又阻止他在基本观点上尖锐而明确地反对自己，于是马克思就故意来了一个欲言又止的“中断”：马克思刚刚开启他的思索，却又突然打住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倾向于把马克思本人理解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始作俑者。比如，陈乐民和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就认为：

其实马克思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是激烈的行动，赞成暴力革命，这个方面得到恩格斯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具有非凡的分析能力，这一点随着时间的增长，在他那里越来越明显。而正是由于这个能力，使他在一些问题上与恩格斯有些分歧，这些分歧不是挑明了的。他越来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感兴趣，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越来越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直接与之进行斗争。比如，1857年至1858年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时，恩格斯在准备以军事武装战胜普鲁士，他甚至开始以身作则，进行体育锻炼，重新开始练剑等等，而马克思却完全沉浸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分析中。由此我们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还是朋友。恩格斯还不断向马克思提供信息资

料，可是他自己在练习骑马和击剑，准备与普鲁士军队骑马打仗。^①

无论如何，《资本论》末尾的中断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中断，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中断！在马克思以后，大凡致力于研究社会分层或阶级问题的思想家无不面对这一中断而“浮想联翩”。马克斯·韦伯说，在这个中断处，马克思“显然想探讨无产阶级的阶级统一性问题，尽管无产阶级在质的方面是不同的”。^② 韦伯正是从马克思这一“中断处”开始构想他的社会分层理论的。他的《阶级、地位和政党》一文就是试图填补马克思的这一“中断”所造成的这个“空场”。在对阶级的理解上，韦伯明显受惠于马克思，他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人们的市场处境（market situation）是社会分层的基本维度，人们在经济秩序中的位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的有无、多少）是客观的阶级归属的轴心。但是，韦伯不同意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唯一原则，他不仅在阶级、地位与政党概念之间作出了仔细的区分，而且彰显了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性。（比如，一个破落的贵族，尽管他客观上丧失对财产权的控制，但他通常并不与穷人认同，而是同富人结伙。）强调“认同感”对于阶级规定的重要性，是韦伯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不过是韦伯的主观认同感的一个不适当的变体，因为，韦伯认为“阶级”与“政党”是基于两种不同的“秩序”而产生的分层结果，它们是互相关联的，有时是一致的，但并非必然一致。而卢卡奇却把韦伯的这一著名区分给取消掉了，他虽然强烈地意识到了阶级意识的不稳定性和“外源性”，但他却把这种外源性直接等同于政党的灌输和赋予。卢卡奇对韦伯的这一区分的背离，是导致卢卡奇赞同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源所在。可以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卡奇抓住了主观认同感，旋即又将它放逐了。在卢卡奇那里，相对于强大的物化意识，阶级意识显得既纯洁又高贵，可悲的是，它无比地脆弱，同时又出奇地稀少！

① 陈乐民、史傅德：《启蒙精神·市民社会》，载《万象》2006年第8卷第3期，第2页。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7页。

正如卢卡奇没有听从韦伯的忠告，超越作为职业的学术与作为职业的政治之间的界线而投身革命一样，卢卡奇也没有按照韦伯的范式认真对待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非对应性。韦伯像康德一样处处都力图划一条界线；而卢卡奇则像黑格尔那样，极力把种种界线模糊化或取消掉。两人思想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对阶级概念的不同处理方式：韦伯通过区分财产阶级、获利阶级和社会阶级表现出一种关于阶级的多元主义宽松观念；卢卡奇则由于把阶级归属完全等同于阶级意识从而走上了一条严格的阶级主义道路。正缘乎此，拉克劳与莫菲对卢卡奇思想的评价一点都不高，他们更加偏爱将阶级认同复杂化的葛兰西。

20 世纪下半叶孕育而生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韦伯的问题。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表现得更加明显，影响阶级认同的因素远远超出了韦伯当年的“三元”（即经济、社会、法律）互动的狭隘想象。在客观层面上，由于知识转化为财富的过程缩短，大量小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的多样化带来了更多的个体化工作机遇，从而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而风险社会的到来更是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和社会身份的变动性；在主观层面上，人们关注的政治问题转向了过去被认为不重要甚至被忽略的一些问题，比如生态环境、女性权利、同性恋、生活格调等各种不同的新型社会问题，这导致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碎化、个人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个体主义化，这一切都拉大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的逻辑连接变得更加困难。

像韦伯一样，拉克劳与莫菲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试图对阶级认同问题进行某种超出经济限制的理论“解严”。但他们比韦伯更加激进化。一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韦伯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再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还不够激进”^①，韦伯之所以还不够激进，是因为他

^① 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社会分层》，王俊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 年，第 133 页。

“没有牺牲掉作为阶级这个概念之基础的经济学涵义”。^① 拉克劳与莫菲在思考“什么形成了阶级”这一问题时，并不像韦伯那样引入其他因素来限制经济因素的独占性，而是企图将经济悬置起来（即将之虚化）。如果说，韦伯（以及后韦伯主义者）的理论努力旨在提供“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中所缺少的东西，即对阶级概念的一个清晰明确的讨论”^②，那么，拉克劳与莫菲则企图通过疏离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经济基础从而将客观的阶级归属化为乌有，如此一来，政治主体统一性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就仰仗于主观层面的认同感的缔造。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达成的主要结论。

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拉克劳与莫菲思想的康德主义影子。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关于生产方式层面上的阶级存在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形式的二元区分上。也许正是由于拉克劳与莫菲与韦伯共同的康德主义根源，使得他们都否认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意识层面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之处在于，拉克劳与莫菲在对阶级认同对于阶级归属的影响上更加强调整康德的“形式”原则：在康德那里，“现象”不是由“物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在“物本身”的作用下，通过直观形式和思维的范畴形式建构而生成的。同样，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不是由生产方式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接合”的产物。正是拉克劳与莫菲对“形式”原则的建构性的过度信誓，才导致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超越了韦伯主义的视界，因为韦伯总是在一种修正过的阶级框架内思考问题，而拉克劳与莫菲的一只脚已经踏出了阶级分析的领地：他们宣布，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要素都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拉克劳与莫菲不再谈论“意识形态的接合”，而是直言及“霸权接合”，何以如此呢？其根本性

^① 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的原因是：在前一部著作中，拉克劳与莫菲虽然断言了中立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以及这种非阶级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的作用，但是，拉克劳与莫菲仍然把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主导力量，此时他们依旧坚守葛兰西的信条——只有“基本阶级”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就此而论，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扩大了，但并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性，即是说，拉克劳与莫菲还是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相对自主的界域之内带着链子“跳舞”，这个链子就是与意识形态异质但却宰制着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话语。后一部著作的实质性的跃进即在于，拉克劳与莫菲义无反顾地砸碎了这条“锁链”：他们坚决地取消了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区别，这种取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福柯的话话理论的修改，在其关键意涵上，它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大的范式转换。就像艾伦·伍德所指证的那样，在此，“独立的意识形态（更准确地说，是话语）已经涵盖了整个社会领域，已经不再仅仅是把意识形态从任何社会基础中分离出来的问题，现在，社会本身是由意识形态或‘话语’所构成”。^① 既然一切都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既然一切都是意识形态，那么核心问题就不再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是意识形态自身的主导权与非主导权的关系。这就好比康德的《实践理论批判》不再称之为“纯粹实践理论批判”一样，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要面对一个与之并不完全同质的世界（在认识论里物本身是理性无法最终把握的对象），这就有一个防止理性的潜越问题；而到了实践理性的范围，不再是怕理性过于“纯粹”，而是怕理性不“纯粹”，因此，也就不存在批判理性的“纯粹”问题，这样一来，称“纯粹实践理论批判”也就不很合适了。同样，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意识形态的“纯粹性”问题已经解决了，因而再谈意识形态的接合反而会造成某种误解，好像还有非意识形态的接合似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拉克劳与莫菲还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将一只脚缓缓地挪出阶级分析之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3.

外；而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他们异常坚决地把另一只脚也跨了出去。因此，在对阶级概念的消解上，从前者到后者，是一种扩展关系，后者将前者的“理论与政治逻辑发挥到极致”^①：前者只是留出一个非阶级意识形态的空隙，而后者则彻底解除了阶级的“武装”；前者仅仅是反对阶级还原论，而后者则是告别阶级政治。从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到宣称意识形态的非阶级特性，拉克劳与莫菲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内在“颠覆”：拉克劳与莫菲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固有秩序倒置过来，不是阶级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而是意识形态形塑了“阶级”——当然，这种由意识形态所形构的政治群体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它只是一种由主导话语所暂时缝合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认同团体而已！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拉克劳与莫菲也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后一章的那一中断处开始的——马克思的问题是：什么形成了阶级？拉克劳与莫菲的回答是：什么也形成不了阶级，因为通过认同而达成的政治统一性根本就不能冠以“阶级”之名，阶级在当代已不再是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范畴。由此，我们才可以真正体认到吉登斯所说的“韦伯还不够激进”并不是虚言一句。韦伯试图重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而拉克劳与莫菲则解构并抛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当然，后者比前者要“激进”得多！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格伦斯基把那些尝试着修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理论家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者”^②，他的这种归类与当前流行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规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严格来说，这些人只能称作“准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半后马克思主义者”），但它至少表明了后马克思主义是发轫于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质疑！这一点，我们从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巴里·辛德斯、保罗·赫斯特、斯特德曼·琼斯那里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

如果说告别阶级政治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倾向和特征，那么后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3.

② 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社会分层》，王俊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马克思主义就不像诺曼·莱文所说的仅仅“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① 它的值域可能会超出目前中国学界对它的谨小慎微式的局限。我们注意到，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借用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卡尔帕娜·米斯拉（Kalpana Misra），她在《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1998）一书中把从毛主义到后毛时代中国政治话语的转变指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过渡。米斯拉的如此认定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观念是阶级及阶级斗争，因此，放弃了阶级斗争也就疏离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东西。依米斯拉之见，毛泽东虽然在实践上做得了头，但在主观上他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邓小平时代尽管“实际业绩超出了期望值并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极大提高了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但是统治的合法性（政权的正统性）却下降了”，米斯拉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悖论式的政治发展”。^②

米斯拉竟把中国当代政治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界域之内，中国学者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或者在心里暗自琢磨一番，纵使觉着有几分道理，也决不愿意从口中说出来。而米斯拉却全然没有中国学者所特有的顾忌。然而，出人意料地是，米斯拉并没有拿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诋毁我们中国，更没有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她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诺曼·莱文近乎一致。诺曼·莱文坚持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另一个阶段……后马克思主义在后工业世界的任务是工业劳动背景中对于民主的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方法的信念上，意识到历史是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它发现自身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而重新定义自己。”^③

①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致中国读者”，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② Kalpana Misra: *From Post-Maoism to Post-Marxism*, Routledge, 1998, pp. 3-4.

③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致中国读者”，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

我们看到，米斯拉在《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只是借用拉克劳与莫菲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的“转换”。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实际存在的。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及“后邓”时代，中国人实际上经历了两种不同取向的政治体验，一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一种是以“淡化”甚至“去阶级化”为倾向的政治。任何一位既亲历“文革”之劫而又躬逢“改革开放”之盛的中国人，对此恐怕不仅有心有所“感”，而且身有所“受”！上海一位时下颇有名的美男作家最近写了一本名叫《身体政治》的书，他所谓的“身体政治”不过是描述政治的变化在人们身体上（尤其是外表、着装上）产生的“效应”，虽然此书缺乏理论探讨的起码形式，更谈不上具有什么理论的深度，但是，这种“政治现象学”式的刻划却有助于让人省悟并反思中国当代政治业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此明显的政治变化之所以在文学化的描写中才让人触目惊心，其原因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这种变化归属在同一种“政治理论”名下，从而平息了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野对这种变化加以概念化的冲动和念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政治实践已昭然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定性为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理论错误。但是，时过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对“阶级政治”本身进行认真的考量，以至于在实践上我们已远离了阶级政治，但在理论上，我们却抱着阶级政治不释怀。阶级逻辑在当前的政治实践中已经被悬置起来，但它在名义上仍然被作为唯一合法的解释原则。实际起作用的东西没有被理论化，而不起作用的东西却不退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危险的现象：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宣传，另一方面是大力引进西方的政治学说，而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去建构一种真正有说服力的中国政治理论的努力则付之阙如，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理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米斯拉借用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肯定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问题。（比如，如何能断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概念等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将拉克劳与莫菲基于西方世界的新社会运动而建构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意“中国化”又有多少合法性？）但是，米斯拉有一点是值得特别称道的，即她不把“后马克思主义”看作

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背离，更不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她甚至说：

苏绍智、王若水、胡绩伟、李宏林、李泽厚以及其他一些人所代表的思想主流在不同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理想和目标的信奉，甚至那些肆意公然针贬时政的批评家也坦言他们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那些更自觉地谴责从前的主导思想框架的人并没有同样远离作为他们批判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Marxian dogmatists）。对这些新的改变信仰的人们来说，西方所提供的现代性模式是“deceptively simple”（杜维明语）。多元主义的资本主义目标被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所代替，并且，他们对必然达到那种理想未来的信念是基于同样的历史决定论。从这方面看，出现在邓时代的思想话语就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毛时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十分明显，它俨然是后毛主义的和后马克思主义的。^①

显而易见，米斯拉在此引入了一种甚至比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后马克思主义，因为拉克劳与莫菲毫无保留地拒斥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米氏之所以如此“变通”，或许是为了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治现实，或许是认为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值域过于狭窄，但无论如何，这种宽松化之所以能够进行，乃是源于她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一个鉴别性标识的认定，即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阶级”（non-class）的政治理论。

第三节 由“对立的政治”到“对抗的政治”

阶级是马克思构想政治的轴心概念，因为马克思总是把政治理解为一

^① Kalpana Misra: *From Post-Maoism to Post-Marxism*, Routledge, 1998, pp. 15 - 16.

种阶级统治。在《哲学的贫困》的末尾，马克思以近乎福音书般的语调宣告：“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①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异化、没有了剥削、没有了阶级、没有了国家，当然也就没有了“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的政治权力。阐述政治是为了消灭政治，就像研究疾病是为根除疾病一样，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社会的病痛！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之内，抽掉了阶级也就等于毁弃了政治。而拉克劳与莫菲抛弃了“阶级”，却留下了“政治”，这正是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与其说他们成功地实现了阶级与政治的分离，倒不如说他们要在阶级的消失之处重建政治的威严。著名左翼学者艾伦·伍德将自己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取名“退出阶级”（the retreat from class）可谓画龙点睛，十二分准确地点住了后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穴位”！艾伦·伍德原意概指拉克劳与莫菲等人退出了阶级分析范式，而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从“阶级”那里退出的“政治”。“政治”从阶级那里退下来之后并没有死去，它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

其实，拉克劳与莫菲这里的“政治”不过是改了装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阿尔都塞断言，人是意识形态动物，只要人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因为人与意识形态是一个双向互构关系：没有人，当然没有意识形态；但人作为主体，又是意识形态“召询”的结果。阿尔都塞的困局在于，他一方面声称意识形态是永存的想象之镜，同时又毫不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的透明社会的命题。按照前者，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还应该存在，也必须存在，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还存在。可是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天然地具有阶级性，阿尔都塞从来就没有怀疑这一点，而这恰恰与后者相矛盾：在无阶级的社会却存在着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想不开这一点，所以他疯了；普兰查斯也想不开这一点，所以他绝望地自杀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8页。

阶级结构本身并不在结构主义的结构之内，它成了结构主义之结构本身的框架。拉克劳与莫菲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已洞察到此一问题，于是他们从阿尔都塞主义转向了葛兰西主义。他们之所以转向葛兰西，就是为了把这个不是作为结构的可分立元素而是作为结构之整体性的框架打破。这相当于德里达对结构主义所隐含的基础主义的解构。

作为阿尔都塞的门徒，拉克劳与莫菲还是保留了老师的很多东西：他们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把政治理解为意识形态，也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永不消失的“形态”。变动之处在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阶级属性，更不是永远具有阶级属性。这可谓“意识形态常有，而阶级不常有”。我们不可以想象没有意识形态的阶级（马克思主义），却可以想象没有阶级的意识形态（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说：“一切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构想的。”这是一句很重的话，它实质上是拉克劳与莫菲政治哲学的一句宣言，因为它的潜台词是：政治既是“构造的”（constitutive），又是“想象的”（imaginary），由于是“构造的”，所以政治获得了自主性和建构性；由于是“想象的”，所以政治永远不会终结，不会彻底“缝合”。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人们或许认为它主要是一种“解构的政治学”，如果以此来概括那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鲍德里亚等），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以之归结拉克劳与莫菲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失之偏颇矣！因为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着力点并不是解构，而是建构；他们只是运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策略为重建新型的政治统一性服务，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强调过这一点：

在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霸权接合实践。因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西姆正是按他们的这一启示区分出两种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在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这两

方面不仅紧紧纠葛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论建构的努力要远远强于解构的冲动，甚至可以说，其理论重塑的意向在逻辑上“先于”并成功地规导了其拆解企图。这恰恰切合了利奥塔对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诠释：“后”（post）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存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把一个非斜体的“后”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乃表征一种在时间上后发的东西在逻辑上的预先莅临，正是在此意义上，巴丽特指出，拉克劳与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①

拉克劳与莫菲激进地弃绝了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持一种极端的反政治的立场，也不意味着他们走向了政治虚无主义的道路，更不意味着他们把政治空间构想为一种没有冲突与斗争的和谐世界。相反，他们阐明的“新政治观念”（new conception of politics）就是要为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形式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分析范式。^② 问题在于，如果否定了阶级与阶级斗争，又如何来解释现代社会日益繁密增生的各种社会冲突？换言之，社会冲突与政治斗争要在怎样一种概念框架和分析策略之下得到诠释？如果你认为阶级冲突的模式不能充分说明当代群体冲突的状况，那么你必须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替代模式来描述和阐发已经改变了条件和发生形式的群体冲突的事实。任何一个不满足于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并试图以一种新的理论代替它的理论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基础性的任务”。拉克劳与莫菲当然也不能例外，即便他们声称要消解掉构成政治之基础的一切基础，从而使政治获得真正的优先地位和独立性，但他们仍然需要寻求一个支撑性的概念来为一种自主性的政治提供立论的依据。

拉克劳与莫菲用来说明他们的新政治观念的核心概念是“对抗”（antagonism）。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实质上是一种“对立的政治”，

^① 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76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3.

而他们的非阶级政治则是一种“对抗的政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虽然使用了对抗这一概念，并提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①但是，马克思倾向于把一切对抗都简约为阶级对抗，也就是说，马克思一开始就是在阶级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对抗概念的。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政治观念的批评之要点即在于反对马克思将多种多样的异质性的对抗关系系统还原为阶级对立，从而压制并排斥了一些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变得重要的紧张和冲突关系。一如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把社会生活中个别的层面当作理论上不可分别的层面来对待的倾向也表现在他把统治、剥削和阶级这些术语简缩为单一的法，其结果就导致了大多数形式各异的统治——帝国主义、对妇女的暴力、国家专制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不宽容、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统治——或者落入晦暗，或者落入阶级分析的模式。马克思话语之中术语的这种简缩使我们或者无视以诸如战争掠夺、对妇女和儿童劳动的家长制控制、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强制纳税之类的机制为基础的各种剥削形式看作阶级关系的结果，或者也许视为这些关系的长久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关系的结果，或者也许视为这些关系的长久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因而，官僚和家长制同样得以免遭批判。^②

毋庸置疑，马克思对社会冲突的分析是以对抗为起始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人道学派“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作出了批评，他自己对“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也表明阶级的“对立意识”是由最初的对抗形式发展而来的，“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③马克思把两个阶级之间的整体对立理解为对抗的典型形式，或者说“纯粹形式”。即是说，局部性对抗有待于发展为整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② Samuel Bowles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Basic Books Inc., 1986, p. 1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5页。

的对立，也只有达到对立状态，“自在阶级”才能变为“自为阶级”。由于“对立”是经过主体自觉意识“中介”过了的对抗，所以它是一种臻于“成熟”状态的对抗，或者说是一种“完成”了的对抗，既然这种对抗是定型的、到了极致程度的对抗，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便是这一对抗形式本身的“终结”，对抗的终结之结果便是一个无对抗的透明社会的诞生。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政治逻辑”根本性不当即在于把对抗视为是一种封闭的、可以最终凝固的实体性，既然对抗可以“完成”，那么它当然也就可以“终结”。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的政治概念的重构恰恰就体现在这个要害之处——对抗的完成永远处于“延迟”状态，因此，对抗不可能被根除，以为对抗“终究可以被消除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① 拉克劳与莫菲的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就是围绕着这全新的对抗观念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将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指称为“对抗的政治”是恰如其分的。

齐泽克在《超越话语分析》一文中曾提出这么一个观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基本命题是“社会并不存在”（Society doesn't exist）——它使人想起拉康的命题“妇女并不存在”（Woman doesn't exist），而“社会并不存在”（Society doesn't exist）这一命题又体现在“社会对抗”这一概念中。“《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真正成就凝结在‘社会对抗’这一概念中：远远不是把所有的实现都还原为话语游戏，社会象征的领域被构想为围绕着某种创伤性的不可能性而构成，围绕着不能被符号化的某种断裂而构成，简言之，拉克劳与莫菲再造了一个拉康式的作为不可能的真实界的观念，他们使社会对抗这一概念成为分析社会与意识形态的有用工具，这听起来很简单，然而这一新颖性的突破，在对《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大多数的回应中，通常没有被领悟到。”^②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与莫菲自己也承认，社会对抗是“本书

^① 莫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②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New York, p. 249.

的主要观点”，“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①

既然对抗构成了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中心内容”，拉克劳与莫菲必须为这一中心内容提供足够理论化的阐释。既然拉克劳与莫菲在根本上修正了对抗这一概念，那么仅仅拒绝把对立视为对抗的纯粹形式已经远远不够，拉克劳与莫菲的抱负似乎要大得多，他们试图从哲学的层面在对抗与对立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来。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对立与对抗的界线模糊化和取消之上的，而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却是奠基于对立与对抗之间的区分之一上的。为了真正把握拉克劳与莫菲政治建构的核心内容，我们必须更为详细地了解他们对对抗的概念规定。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一提到对抗，就会想到对立（opposition）、对立性（contrariety）、矛盾（contradiction）等概念，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对抗（antagonism）与这些概念不能相混同，对抗表示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为了清楚地揭示这种特殊关系，他们首先引入了卢西奥·科莱蒂关于“现实的对立”（real opposition）与“逻辑矛盾”（logic contradiction）之间的区别的分析。

科莱蒂是从分析康德的矛盾观开始的。我们知道，康德只把矛盾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矛盾既不存于对象之中，也不存在于先验范畴之内，只有当我们的企图以知性范畴去把握物自体的时候，矛盾才会产生，也就是说，矛盾仅仅属于理念本身，是主观思维不正当活动的结果，它是理性的幻象。而现实世界大量的对立现象，康德并不把它们称为矛盾。科莱蒂认为，在康德那里，“现实的对立”的公式是A—B，而“逻辑矛盾”的公式是A—非A。在现实的对立这一类型中，对立关系中的每一项都有自己的确实性，而不依赖与另外一项的关系，而在逻辑矛盾这一类型中，每一项与另外一项的关系都详细地说明了它们两者的真实性。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Verso, 2001, xiv.

康德有一个明确的划界：对立出现于现实对象之间，而矛盾出现于命题层面，而且康德一直把矛盾当作是一种应该加以排除的消极性的东西。黑格尔则取消康德式的划界，将矛盾扩大到一切领域，即现实对象之间的对立也被理解为矛盾。在黑格尔那里，对立与矛盾的区分被消解了。但是，黑格尔这样做有一个前提：主体就是客体，现实本身也是概念，一切都是绝对理念的展开或外化，因此，完全可以说，黑格尔的矛盾仍然处于“理念”内部，既然“思外无物”，一切都在思维之内，那么矛盾当然也就在“思想”之内。在科莱蒂看来，由于预设了现实的精神性，黑格尔把矛盾引入现实还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在马克思那里，情况就不同了：他不承认现实的精神性，即不承认思维与存在统一于思维，却坚持现实世界存在矛盾，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不承认现实世界与概念世界的一致性的前提下，将矛盾扩大到一切领域。

拉克劳与莫菲指出，科莱蒂的分析建立在一个二难选择的基础上：不是对立，就是矛盾，不是矛盾，就是对立。而这种分析模式隐含着：如果存在对抗，它要么被归于对立，要么被归于矛盾。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对抗既不能归之为对立，也不能简单化约为矛盾，对抗所表示的关系与对立、矛盾所表示的关系并不相同。对抗不是现实的对立，而矛盾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

既然对抗与对立、与矛盾都不相同，那么为什么它忽而被归于对立，又忽而被归于矛盾？这是否说明对立关系与矛盾关系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对立关系和矛盾关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一个在现实对象层面有效，一个在命题层面有效，但是，这两种关系还是“共享”一个东西：它们都表示一种客观的关系。在第一种关系中，是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是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已经确定所是的东西，才使这一关系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涉及的是完全的同—性。”^① 拉克劳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4.

与莫菲的意思是说，在对立关系中，即 A—B 关系中，A 已完全是 A，A 本身获得了完全的一致性，正是在这个确定的身份的前提下，它才构成与 B 的关系；同样，在矛盾关系中，即在 A—非 A 关系中，A 也完全是 A，正因为它完全是 A，它才构成与非 A 的矛盾关系。由此可见，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客观关系”说是说关系是稳定的、确定的、可定义的，换言之，处于关系中的对象是已经构成了的。

那么，对抗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拉克劳与莫菲描述道：“‘他者’的存在使我无法完全成为我自己，我与‘他者’的这种关系并不是从完全的总体中产生出来，而是从它们构成的不可能性中产生出来。‘他者’的存在并不是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它存在着，所以它不是一个矛盾。但是，它也不可归类为在因果链条中的一种实证性的差别性环节，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关系将由每一力量已经成为的东西所决定，因而也就不会有对这一存在的否定。”^① 显而易见，这一描述的关键点是：处于对抗关系的两项都是非完成的，“我”不是完全的自我，“他者”亦非完全的他者，“我”与“他者”都不是因果链中的“实证性环节”，正因如此，总体也不是完全的总体，一切都是不完全固定的，一切都处于生成之中。这种关系当然与“现实的对立”不同，在“现实的对立”中，对立的两项在发生作用之前都已获得了完全的规定性，并且它们各自的规定是不相干的，比如，两辆交通工具的相撞，两个石头的相碰。这种关系也与矛盾关系不同，处于矛盾关系中的两项处于纯粹否定状态，一方的客观存在是另一方非存在的象征。

我们也许会说，拉克劳与莫菲的分析仍然以对立与矛盾的区分为前提，并且他们也与科莱蒂一样仅仅把矛盾理解为“逻辑矛盾”，而没有考虑到黑格尔的矛盾是“辩证矛盾”。这一质疑当然可以构成对拉克劳与莫菲的批判的一个角度，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对“矛盾”概念进行详细的考察，也没有就矛盾概念与对抗概念的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而只是轻描淡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5.

写地提了一句“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就把这一问题绕开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们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区分开来，也无法把拉克劳与莫菲的“对抗”概念与“辩证矛盾”等同视之。为了解拉克劳与莫菲的对抗概念，必须就此作一些补充性说明。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理解上，拉克劳与莫菲是不同于阿尔都塞的，阿尔都塞为了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实质差别，而刻意贬低黑格尔，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简单的还原过程：“大家可以看到，黑格尔模式的这个严格的逻辑推理势必把简单性、本质、同一、统一、否定、分裂、异化、对立面、抽象、否定之否定、扬弃、总体等等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就和盘托出了。换句话说，这个辩证法完全取决于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即简单的原始统一体通过否定的作用在自身内部不断发展，而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在它每次变为一个更加‘具体的’总体时，它所恢复的无非还是那个原始的统一性和简单性。”^①正是基于这种指控，阿尔都塞才提出“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企图以“结构因果性”置换黑格尔的“表现因果性”。

拉克劳与莫菲对黑格尔的认识没有阿尔都塞那么简单、武断，他们充分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杂性，并肯定了黑格尔的当代性恰恰在于：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绝对不是肯定的和封闭在自身之中的，而是作为转变、关系和差异被构造的。“黑格尔的反思开始于不透明的社会对立难以捉摸的理性形式，而且只有参照使分裂返回统一的狡黠的理性才能看透的可理解性，黑格尔因而处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上。”^②拉克劳与莫菲并不否定黑格尔对差异性、流动性、可变性的强调，他们提出的非议是，黑格尔总是以理性主义的方式把握这些偶然性，他虽然从不透明性开始，但最终狡黠的理性能看透一切，而拉克劳与莫菲坚持认为：并不存在通过对抗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狡黠的理性”，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使对抗服从于规则体系的超级游戏。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9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95.

拉克劳在 90 年代的一个文本（《同一性和霸权：普遍性在政治逻辑学构造中的作用》）中，更加清楚地描述了他们的霸权接合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绝对精神没有自身的客观内容，它仅仅是全部辩证转化的连续，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建立一种决定性重叠的不可能性的连续，但问题是，这些辩证转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那么黑格尔的全部规划的泛逻辑主义特点就是不可避免的。“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辩证运动排除了全部的偶然性，很难逃避这样的结论：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是现代理性主义的至高点。这向我们表明，霸权关系为什么不能吸收进辩证的转化：因为尽管在概念上掌握霸权联系的先决条件之一——普遍和特殊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由辩证逻辑来把握的，但另一个——两者之间联系的偶然特点——不可能被把握。”^① 在拉克劳看来，黑格尔的辩证转化展示出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永久性差距”：每一个特殊的形式永远不会与它的普遍观念同一，特殊对普遍的连接“填充”为理解霸权接合提供了部分充分的本体论工具，但是，黑格尔对拉克劳的“启示”仅限于此，因为辩证转化进程中的一切断裂、差别、不连贯都被理性所吞没，甚至含糊性、不严密性也完全由逻辑的运动所构造，正因如此，拉克劳说，黑格尔的辩证转化是一种精确的修辞学，一种泛逻辑主义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地控制着辩证转化的过程。

尽管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没有论述“辩证矛盾”与他们的对抗概念的关系，但是，从他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抗不同于“辩证矛盾”，因为在辩证矛盾之中，关系项仍处于逻辑主义的严格规定之下，这一规定哪怕是虚假的，它也依然借逻辑的名义来表现自身。而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对抗”则根本脱离了逻辑总体的必然性控制，处于对抗关系的一种力量不能完全规定另一方，“在一种对抗的范围内，我不能成为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与我构成对抗的这一力量也不能成为如此完整的存在：它的客观

^① 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托·拉克劳、斯拉夫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董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存在是我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这样看来，对抗关系就被多重意义所充溢——这些意义阻止它的存在被固定为完全的实证性”。^① 由此，拉克劳与莫菲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界说：对抗构成了每一客观性（objectivity）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中，客观性只展现为部分性的、不稳定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

这正是对抗概念的特别之处：现实的对立和矛盾关系描述的都是客观关系，而对抗揭示的则是客观关系的限度。“对抗，远非是一种客观关系，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每一客观性的限度都被显现出来。”^② 这里的关键在于，对抗并非完全不相容于客观性，而是说，在对抗中，客观性表现了一种不自足和短缺，它不能完全实现“客观化”。既然没有完全的客观化（对象化），因而也就没有“客观关系”，对抗是一种展现，并且是一种永不止息的展现，但这一展现永远不可能构造一个完全客观化的实证空间。

因为对抗是一种展现，所以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它处于语言之中；但是，由于这种展现本身是一种逃逸、一种缚失、一种残破、一种填写的失败，所以它又是对语言的颠覆。“对抗逃避了通过语言而被理解的可能性，因为语言只作为企图固定对抗所颠覆的东西的努力而存在。”^③ 语言在描述意义，而对抗总是对这种描述的破坏，语言在捕捉某种东西，而对抗是对这种捕捉的滑出，语言企图表现一种连续性，而对抗却是对连续性的打断，在此意义上，对抗相当于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的东西。

这种对抗概念之要义在于：对抗具有了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它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存在之本身；它不是“在者”，而是“在”，这种“在”栖居于语言之中，但这种栖居是一种奇异的栖居：它通过语言的无能来表达自己的，通过语言的困境来展示自己，它存在于语言的断裂之中，因此，它是语言的症候学！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5.

② Ibid.

③ Ibid.

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现所有客观性限度的一种特定关系，这样一来，把社会关系当作是由必然性支配和决定的实证性空间的这一观点就完全瓦解了，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而对抗总是逃避意义的固定，所以社会根本就不会最终缝合，用拉克劳与莫菲的话来说就是：对抗是社会不可能最终缝合的证据。

不过，对抗概念的理论意义并不仅仅局限证明社会最后缝合的不可能，它有更多的政治蕴含：

其一，既然对抗具有本体论维度，而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那么，对抗就是社会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没有对抗，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the social），不可能构想一个完全消除了对抗的透明的、和谐的社会。在马克思的构想中，共产主义是一种完全和谐的社会，这种完全和谐的达成要以取消国家、取消政治为代价。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代价还远远不止这些。按照他们的“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这一命题，“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完全“和谐”了，不仅没有了“政治”，也没有了“社会”本身。由此看来，在把政治社会化的取向上，拉克劳与莫菲和马克思是一致的：尽管马克思把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来分析，可他实际上认为政治问题不能通过政治本身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他要研究经济、研究社会制度、研究社会形态，他企图通过“社会革命”达到“政治革命”；而拉克劳与莫菲不是借“社会”这个路径而达到政治的目的，他们直接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看作是政治关系。其实“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泛政治主义”的表达，只不过这种“泛政治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基础逻辑”之上的绝对同一的政治，而是对分散、破碎的主体立场的一种艰难的“连接”、一种费力的“接合”：纵使偶然获得了一个连缀的组合图，在它的上面，也依稀可以看到一条条裂缝。《重读拉克劳与莫菲》的作者兰德利和麦克里安打了一漂亮的比喻：“‘缝合’标志着先在同一性的缺席，正如当刀口愈合时却留下伤疤标明差异一样。”^① 在马克思那

^①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Rereading Laclau and Mouffe,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4, No. 4 (Winter 1991), p. 46.

里，政治是阶级社会躯体上的“病痛”；而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政治的“身体”上也布满了道道伤痕。两者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一劳永逸地根除“病痛”；而拉克劳与莫菲则说，有些伤痛是“内在的原痛”，它注定寄生在我们人类的根脉之中！我们不要指望彻底根除它。这不是我们人类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说，它根本就不能被完全消除。当我们执意要完全删除它并且我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消除了它的时候，它只不过转换了形态而已，它以另一种方式顽强地生存着！更危险的还在于，当人们以彻底革命的名义铲除某些病痛的时候，却陷入了更大的不幸之中！正缘乎此，莫菲才说，“认定冲突有可能获得最终解决的信念是危险的”；波兰尼才说，“那些要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不公废除掉的人只会建立更大的不公”。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齐泽克说，拉克劳与莫菲的“激进民主”恰好不是“激进的”——面对激进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必“激进”，就“激进民主”对“极端方案”的激进拒斥而言，它甚至是一种反激进主义的激进主义。

其二，由于对抗不可根除，因此作为控制对抗、调整对抗的政治也就不仅仅是“上层建筑”，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最宽泛对抗的观念取消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并最大程度地赋予政治以真正的自主地位。由于对抗点的增殖，政治冲突可能在每一个层面上激发出来，也可能由每一种主体立场来“执行”：政治的限制被打破了，它不是少数统治者的事务，它不是所谓政治精英的专利，每一种政治群体在政治参予权和建构“主导权”方面都具有“等同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说，政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等同链条”；一是要有“一条不稳定的边界”。必须认识到，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激进民主政治”就是“政治的根本化”和“民主的彻底性”。“政治的根本化”在于它是人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拉克劳与莫菲以另一方式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古老命题。一如莫菲所言：“政治不能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

度。”^①“民主的彻底性”在于民主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政治想象”，社会主义如果想优越于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丰富自己的民主想象力并在政治实践中把民主扩大、深化到每一领域之中，即便真正达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状态的民主，民主政治仍然不可能“终结”。就像“政治”（the political）永远是处于“形容词”状态一样，民主也不可能固定化为一个有固定所指的“名词”：民主本身是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它是一个空位，它不停地引诱种种填补的欲望，然而又总是使独占性的填写溃败而去。莫非对这种激进民主的描绘永远使人对民主怀着一份难以言表的激动，她说，应该把激进的民主想象设想为一种圆善：“只有当它作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时，它才成其为善。因此，如此的民主将始终是‘将至’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②

① 莫非：《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第九章 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卢卡奇与后马克思主义

—

马克思、卢卡奇、拉克劳，是迄今为止激进政治思想史上三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主体位置”。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拉克劳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这三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生活在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开始向全球扩张的时期，卢卡奇见证了帝国主义的形成、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拉克劳主要生活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瓦解、晚期资本主义在调整中平稳发展的时期。尽管这三个“主体”在不同的位置“经历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尽管前后相继的两者之间在年龄上相差至少达半个世纪之久，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这三个人都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都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加以追求。在气质上他们都相当激进，都是各自所属时代的左翼斗士，他们都曾被自己的祖国所驱逐而流落异国他乡。反抗是他们的中心话语，批判

是他们的共同武器。他们著书立说，目的都是为了全球解放规划。他们都在寻找激进的反抗群体并从理论上为这一群体的反抗提供合法性。马克思认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卢卡奇断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历史的建构力量，拉克劳认为只有一种非阶级的“混成式”主体才能担负起当代“民主革命”的任务。尽管面对着不同的“主体境遇”，他们都试图通过阐发一种激进政治理论来发动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所以生产场所是对抗形成的中心地带。如果生产停止了，整个社会就立即陷入瘫痪，因此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威胁最大。马克思的想法是，只要把资产阶级的剥削秘密有效地展示给工人，工人就会把自己创造的、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从而实现“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局面。马克思从没有怀疑工人阶级埋葬资产阶级的意愿与能力。在他看来，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会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工人阶级遭受的普遍苦难，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最彻底、最激进的普遍阶级。

卢卡奇因亲历革命失败而感觉到问题的复杂性：把工人阶级内定为“掘墓”的天然选民是一回事，他们主动去“掘墓”却是另一回事。在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回事”的不统一导致西方革命屡屡失败。卢森堡寄望于群众的革命“自发性”，但自发性并不掌握在理论家手中，卢卡奇不愿意坐等“自发性”，他更想激发它、塑造它、壮大它，使它变成一种强大“阶级意识”的洪流。卢卡奇发现，工人在其主体化过程中由于资本世界“物化”的强大干扰而常常发生自我错认，因此，主体效果的真正形成有赖于不断的激发、灌输和教育，这就需要从意识形态、文化、心理、审美、日常生活等层面展开全面的社会批判，从而使潜在的阶级意识得以涌现、迸发，形成主客体真正统一的革命主体。

拉克劳看到，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日益减少、在政治重要性上日益衰微，作为与资产阶级构成二元对抗力量的大写的工人阶级不再存在了。社会对抗不再表现为阶级对抗，而且对抗的构成空间也不仅仅是生产场所。反抗点高度分散并且迅猛增殖了，在交换领域、分配领域、消费领域、文化领域，甚至私人

生活中，都可能激发政治性对抗。反抗主体的形成不仅更加多样化、更加不稳定，而且，它并不必然因经济的缘由而起，也并不必然朝经济阶级的方向建构，在此情形下，唯一可行之策只能是把各种分散的“反抗点”连接起来，“合成”为统一的反抗力量。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锻造集体主体的“统一性”，而不在于确保主体统一性的纯粹阶级属性。

同一个反抗主题，三种不同的“主体镜像”：马克思的完整、卢卡奇的分裂、拉克劳的破碎。同一个文题，三种不同的书写：马克思是原创，卢卡奇是改写，拉克劳是对改写的改写。因为是改写，卢卡奇曾经受到来自于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尖锐批评。直到如今，仍然可以听到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激烈争辩。因为是对改写的改写，“后马克思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颠覆，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

二

马克思曾说，黑格尔由于“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①，从而陷入了幻觉。马克思做了彻底的颠倒，把辩证法的“脚”重新立在现实的坚实地面上。而卢卡奇却又把辩证法带回到精神的内在性中以阐发阶级意识的生成，这种对黑格尔的“回归”总难脱“改写”之嫌。不过，卢卡奇从不承认自己在“改写”马克思主义，他说那只不过是在恢复马克思的真面目。他一再声明自己忠实于马克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它或改正它”^②，他自己的理论阐述只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但他同时又表示，可以只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而放弃马克思的个别结论甚至全部论点。众所周知，他曾留下惊世名言：“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19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页。

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①实际上，卢卡奇只是这样说说而已，他从来没有这样做。60多年后，有一个人真正这样做了，这个人就是拉克劳。就拉克劳“落实”了卢卡奇当初的“豪言壮语”而言，卢卡奇似乎可以算作拉克劳的真正先驱。英国学者西姆就有这个想法，他从这一点推断说，卢卡奇“开辟了一条指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探索路径”。^②

其实，西姆的话说得有些过头。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知道，卢卡奇说的话并非出于自勉，而多半是讲给两类人听的：一是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是伯恩施坦之流的修正主义者，前者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圣经”来读，后者企图把马克思的论点完全抛开。在卢卡奇看来，这两种方式都不可取，都算不上真正的“正统”。他既不赞同死守每一个个别结论不放，也不同意把马克思的论断一古脑儿全扔掉。他说，即便我们真的要放弃马克思的全部结论，也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伯恩施坦主张放弃辩证法）地放弃，因为伯恩施坦放弃的并不是马克思的个别结论，而恰恰是马克思的方法。卢卡奇的真正意思是说：你扔什么都可以，扔多少都可以，但有一条，你就是不能扔掉作为马克思方法的辩证法！然而，卢卡奇自己果真除辩证法之外什么都往外扔吗？对此，帕金森有精准的把握：“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方法，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必要的话，他真的准备去抛弃马克思所提出的所有正确命题。现在看来，显然并非如此。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至少依据这样一个命题的真理——即在近代社会，无产阶级就是革命阶级——并且他只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就肯定会相信它的真理性。”^③

卢卡奇既要辩证法，又要无产阶级。他之所以要辩证法，就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能真正像无产阶级的样子。在卢卡奇眼中，那个时候无产阶级明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48页。

②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74.

③ 帕金森：《格奥尔格·卢卡奇》，翁绍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显缺了点什么，他们倦怠、惰性、软弱、分散，他们麻木不仁、苟且偷安、萎靡不振、摇摇摆摆。无产阶级这副模样，革命又怎么能够成功呢？卢卡奇觉得必须给无产阶级打点强心剂，或者给他们喂些兴奋药，抑或抹点清凉油什么的，总之，是要让他们迅速觉醒，以便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在卢卡奇看来，只要无产阶级认清了自己，看透了社会，获得了某种“总体性”意识，就会威猛如虎，所向披靡。卢卡奇敏锐地感觉到了无产阶级的内在不足，就像他敏锐地感觉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内在不足一样。但是，他还相信它，他也只能够相信它。

卢卡奇是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20世纪第二个10年间，革命在东方的苏联成功了，在革命理论滥觞之地的西方，革命却屡试屡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时空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错位的产物。在这种时空错位面前，卢卡奇对无产阶级感到不满，甚至有些失望，他也觉察到阶级意识并不是天然地“窖藏”在无产阶级身上，并且，他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那里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已经发生了。但是，他断定这种分裂是一种迷误、一种虚假，他渴望总体性，因为总体性才是真实的东西。认同出现了裂隙，只有想法修补，“阶级意识”就是卢卡奇实施修补的法术。

三

拉克劳也是从卢卡奇所解决的问题出发的。但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在卢卡奇面前，无产阶级好像是病了，卢卡奇想用一种“精神疗法”来使它康复并进入正常状态。而拉克劳看到的是，无产阶级这个大写的主体已经死亡，已经没有任何救治的余地。卢卡奇发现了主体的表现病症学：一种大全式的总体在异化中被延迟了，实际“表现”的东西不是并不真实的东西。在卢卡奇那里，无产阶级有一种“本体”之在，如果它不在现实中存在，它也一定要在意识的整体性中存在。拉克劳决心要“改写”卢卡奇式的现象学：卢卡奇只想到无产阶级表现得不像无产阶级的样子，而没有想到无产阶级的“本来的样子”本来就是一种表现的结果：你怎样表现你自己，你就是怎样的人。

卢卡奇与拉克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卢卡奇只被附带地提及一次。拉克劳是在颂扬葛兰西的时候勉强提到卢卡奇的。拉克劳曾充满感激地说，他的作品的主旋律就是重新阐发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在拉克劳那里，似乎有一个高大的葛兰西，有一个矮小的卢卡奇。事实上，卢卡奇并不比葛兰西矮小，卢卡奇的幽灵也并没有从拉克劳的精神世界完全消失。拉克劳把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作为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雏形，岂不知，卢卡奇当年不也正是把这个自发性概念作为他阐发阶级意识的蓝本吗？在拉克劳看来，卢卡奇对自发性的改写并不成功，他要对卢卡奇的改写进行再改写。如果说阶级意识是自发性的不适当变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就是阶级意识的不适当变体：把霸权中的阶级意识“中性化”（neutralize）为一种非阶级性的认同意识，这是拉克劳工作的实质。相对于卢卡奇，拉克劳做了两件事：一是放弃作为“本体”的无产阶级概念；二是放弃为抢救这一“本体”而重新阐发的辩证法。拉克劳不是做抢救工作，而是致力于再造一种新型的主体。当然，这种再造也不是克隆，因为拉克劳再造的主体不可能是阶级主体。用非阶级主体去做马克思与卢卡奇指派给阶级主体所做的事，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错位。拉克劳坦承，他就处在一个革命主体发生深度错位的时代，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为这样一个错位的时代提供一个关于错位的理论。

拉克劳看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弹性生产方式的推广，资本主义非组化程度的提高，福利国家的影响，平等话语向经济领域的延伸，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主体的身份建构以及政治对抗的形成越来越复杂化。工人在生产场所中的时间越来越少，其参与到非生产性活动中的机会却愈来愈多，他对社会生活许多领域的参与导致他的身份并不能因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完全的规定。一个工人可能是反种族主义者，可能是反堕胎协会的成员，可能属于绿色环保组织，可能是反全球化的斗士，可能是同性恋者，等等。这些生产之外的关系可能比他在工作场所中的关系更重要，更能牵动他的心——他在工作场所谋生却可能把自己的情感、兴趣、偏好、甚至精神的寄托放在工作场所之外。

这就是拉克劳所说的“错位”：主体并没有一个“本位”，他似乎总是站错位置。反抗在哪一个“节点”中爆发，主体身份就在哪一个“节点”上构成。

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而是建立在外在的、偶然性的关系中。每一个政治身份都不可能完全固定、完全缝合。拉克劳把福柯的“主体位置”、拉康的作为“缺失”的主体以及德里达关于“主体性是延异的一个结果”的观念都吸收过来，建立了一种在承认身份的破碎化、不稳定性和多元化的前提下积极创造集体性政治认同的“主体解释学”。相对于卢卡奇的完整主体以及阿尔都塞的稻草人式的虚假主体，拉克劳提供了一个“相关的半身份构成区”——没有哪一个主体是完备的主体，没有哪一种代理人是无限的社会行动者，“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①，但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和新出现的身份的多元化不一定意味着政治能力的丧失，相反，它们可以指向新的斗争形式，它们可以创造出‘更难把握’的条件”。^②简单的二元阶级对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分散的对抗形式，这些局部性的、零碎的、微观化的对抗如何在某种激进目标或想象的霸权接合下形成深化民主、改造社会的积极力量，成为拉克劳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

第二节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尤为喜爱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智识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并把它奉为座右铭。而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又把葛兰西的这一座右铭拿过来作为“新左派”在新历史时期从事激进

^① Laclau, *Class War and After*, *Marxism Today*, April 1987, p. 32.

^② 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政治斗争的口号，对此，英国老派左翼思想家拉尔夫·密里班德发表了著名的评论。他断言，这一源于浪漫激情的高贵“口号”没有任何值得信赖的功效，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它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它让人确信，“没有什么能指出社会主义的前景可能是什么，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建立一种没有剥削和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可能是虚幻的，但我们仍然必须为实现它而努力奋斗，在一种坚定的悲观失望的心情中，与所有的不平等作斗争”。^①密里班德的评论表达了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嘲讽与轻蔑，在他眼中，后马克思主义者无非是那些已经丧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却又残存着激昂斗志的前左派分子，这些自己把自己搞垮的迷茫的一代贸然把“指示牌”毁掉而心中又没有清晰的路线图，于是只能在迷宫中以自欺性的胡乱行走抒发空疏的斗争情怀。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神描绘中，密里班德没有对葛兰西说什么。他没有告诉人们，葛兰西赋予这句话的特定内涵究竟是什么，他也没有告诉人们，后马克思主义者把葛兰西的座右铭当作“口号”对于葛兰西本身以及人们对葛兰西的认识将会带来什么。但这一言说的空白里面似乎潜伏着诱人想象的模糊引力，以至于人们可能在脑海中把囚禁葛兰西的牢狱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迷宫重叠起来，而这种重叠对于葛兰西无疑是灾难性的。难道10年的法西斯牢狱没能摧毁葛兰西的坚强意志，却彻底动摇了他内心的信念？难道墨索里尼的监狱早已造就了一位后马克思主义的先知？难道《狱中札记》竟是一本出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手的后马克思主义启示录？密里班德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言说中包含着对葛兰西的不敬，更不会承认他的无所言说里面会包藏着什么祸心，他会说，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的踪迹，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惯用的手法，而我密里班德作为一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连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都分不清呢？

同样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同样是对葛兰西的座右铭的解读，奈

^① Ralph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No. 150, March/April, 1985, p. 26.

杰尔·格里维斯直接而明快：他断然拒绝任何把葛兰西的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内在贯通起来的不良企图，而且，在他看来，“智识的悲观主义”在葛兰西那里非但不是失望的流露，反而是信念与信心的表达。葛兰西的目标是“使人们批判性地思考从而避免变成陶醉于准宗教的‘某某主义’的非批判的‘某某主义者’。对宿命论教条的接纳无疑会助长大众在运思上的‘缺位’，这种‘缺位’使像法西斯主义那样的恐怖成为可能”。^①正是这种“智识的悲观主义”使葛兰西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并强化政治上盲目服从的一切东西，“从这里，葛兰西引出了他的第一个看法：第二国际时代的许多左翼思想家并没有领会到马克思的真正要旨”。^②

就像康德对唯理论的怀疑与批判丝毫无损于他对理性的肯定一样，“智识的悲观主义”的立场并不意味着葛兰西主张降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更不表明他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概念，恰恰相反，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必须向真正的“实践”开放，必须真正在“市民社会”中占据“阵地”，必须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盘旋于左派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教义性观念，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封存于历史文化档案中的完整文本，而不在反对经济剥削、权力宰制与政治压迫的实际斗争中显露它的批判锋芒和革命性威力，这只能意味着它的僵化与实现性的死亡。葛兰西与卢卡奇一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的经济宿命论中解放出来，化为一种符合现实斗争的实践力量。对于卢卡奇而言，阶级意识本来是一种直接具有实践能力的实践意识，可是，当他迎合列宁的基调而将阶级意识规定为是从外面“赋予”的时候，他自己又重新把阶级意识萎缩在“理论化”之中了。葛兰西面对着与卢卡奇同样的问题，但他的解决方案与卢卡奇大不相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葛兰西秉持着比卢卡奇更深的“智识的悲观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葛兰西才更有耐心、更有柔性、更具包容性和战略眼光。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的理论与实践

① 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② 同上。

中葛兰西的影响力何以会远远超过卢卡奇。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派别一个派别地衰微，葛兰西思想的“渗透力”却在不断地加强。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再到文化马克思主义，有哪一个“学派”没有从葛兰西那里汲取灵感呢？从“草根环保”到“黑人权力”再到所谓的公民权运动，又有哪一个“运动”未曾得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滋养呢？就连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愿轻易“放过”葛兰西，竟然声称是葛兰西遗产的继承者。葛兰西的当代形象被极大地多样化、丰富化了。然而，在对葛兰西林林总总的描画中，最终却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幅别出心裁的“写意图”而引发了空前的争议与喧嚷。人们从阿尔都塞的“意萨司”（ISAs）理论中读出葛兰西，可能不会惊奇；人们从陶里亚蒂或贝林格的联盟策略中读出葛兰西，可能不会惊奇；人们从伯明翰学派的社会分析中读出葛兰西，可能也不会惊奇；可是，从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读出葛兰西，一些人不仅会莫名惊奇，而且也会像格里维斯那样莫名地愤怒。

二

葛兰西与后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由拉克劳与莫菲最先“带入”的。这两位“肇事者”把葛兰西引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深巷后院，有意无意地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是与葛兰西对话的结果。这恰恰是格里维斯的愤怒所在，在格里维斯看来，与其说是拉克劳、莫菲之流在葛兰西思想的“激发”下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他们这些畸变了的“新左派”把后马克思主义的阴影“投射”到葛兰西的身上。有很多方式可以抒写后马克思主义的情境性主题，比如像辛德斯与赫斯特那样，像琼斯那样，或者像卡斯托里亚迪斯那样，为什么非要把葛兰西牵扯进来？“要么葛兰西是我们今天解开特别复杂的市民社会的——它依然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有效途径，要么我们就不要去打扰葛兰西的英灵，而是考虑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描述我们赖以生活其中的新时代，

就像葛兰西用他的方式描述他所处的时代一样。”^①

或者完全适用，或者被彻底甩开，这种非此即彼的激进排他主义选择或许并不是唯一合理的方式。但是，让人不借用别人的思想而径直“自主创新”恐怕也近乎苛刻。所有的思想家在还没有锻造出具有自家特色的概念工具之前，总是要借助于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概念不仅能带动自己的思考，而且也往往能在自己的问题里面得到重新启动，而在为自己的问题运转的过程中，别人的概念会发生一些变形，也可能获得新的轮廓。尼采告诫哲学家们不要满足于别人交到自己手里的概念，而要进行措试，使其重放光芒，足见改造别人的概念并非一定就是可耻的蠢行。当然，这并不是指责格里维斯起而捍卫葛兰西的原初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说，更多的注意力应当放在概念重新剪裁的历史契机及其根据的分析上。澄清葛兰西的原始语境固然重要，而在新的内在性平面上营造一种重生的格局可能更有价值。

拉克劳与莫菲是经由葛兰西这个中介而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并且，在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葛兰西的核心概念以一种新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这是无法抹去的事实，而他们也从未想到要去抹掉它，相反，他们一再申明，如果没有葛兰西，他们的整个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规划就是不可能的。这里丝毫没有故意的成分，他们并不是存心要把葛兰西卷到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来。他们自己也左右不了自己当时的兴趣，任何人都是自己兴趣的奴隶，格里维斯也不例外，谁能说格里维斯现在批判拉克劳与莫菲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呢？我们如何责备康德对休谟的兴趣？又如何去责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兴趣？要是康德被禁止进入休谟的问题，可能就没有如此的康德；要是马克思被禁止进入黑格尔的问题，可能就没有如此的马克思；同样，如果拉克劳与莫菲被禁止进入葛兰西的问题，可能也就没有如此的拉克劳与莫菲。

格里维斯已经十分可贵地注意到像福柯、利奥塔和鲍德里亚这样的思想家进入后现代性的非同步性，遗憾的是，他却完全忽略了拉克劳与莫菲

^① 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11页。

转向后现代性的具体契机、动因及其独特性。格里维斯脑袋里面装着一个严格的三段论：属于现代性历史时期的葛兰西思想只有当后来的环境中可能发生的状况和特征与葛兰西自己的时代一致的时候才是可以被援用的，而后现代与现代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所以对葛兰西的任何后现代解读必定是误读。格里维斯想用这个威严的推论把拉克劳与莫菲的努力一笔勾销，可是，他没有弄清一个基本事实：拉克劳与莫菲最初转向葛兰西的时候，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思想家通常都有一种超强的回溯性感知力，他们能出人意料地体验到当前的新观念在前人或古人那里向自己显现的神奇状态，只不过，拉克劳与莫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初与葛兰西遭遇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的“神谕”并没有降临。也许拉克劳与莫菲还不够杰出，或者葛兰西那里的后马克思主义酵素实在过于贫乏。在2001年的一次访谈中，莫菲率直地表达了她对葛兰西的看法：“甚至在葛兰西那里，仍然存在着经济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因素。最终，我不得不承认，完全非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正是导致我与欧内斯托·拉克劳详细阐发我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称作‘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因。”^①由于不满意葛兰西，他们才起而走向后马克思主义，这起码能够说明拉克劳与莫菲对于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顽固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当然，莫菲在发表如此见解的时候已经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了。戴着后马克思主义的眼镜去看葛兰西，与不戴这副眼镜去看，视觉效应肯定会有所不同。我们犯不着为这种视觉差异而怒火中烧，毕竟，在应该向葛兰西致敬的时候，拉克劳与莫菲表现了足够的忠诚。他们不像那位德里达先生，在认定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之后在那里对着马克思的幽灵庄严地致敬。当拉克劳与莫菲由于不满意阿尔都塞的科学认识论而把目光投向葛兰西的时候，葛兰西对于他们绝非一种幽灵性的存在，相反，葛兰西极富活力的思想光芒正在点燃他们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热望与激情。在《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的开头，莫菲这样写道：“如果马克思主义在20世

^① 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

纪60年代的历史发展可以概括为以‘阿尔都塞主义’的盛行为特征，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葛兰西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见证了并正在见证人们对于葛兰西著作的兴趣的空前高涨，他的思想的影响已经扩展到马克思主义探索的若干领域之中。”^① 翻阅拉克劳与莫菲20世纪70年代所有的作品，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们对葛兰西哪怕是只言片语的非议，他们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淘金寻宝的劳作中，在发现一处处闪烁的光亮后，他们欢呼雀跃，喜不自禁，然后虔诚地把一块块宝石揩拭干净，以便让其发出夺目的光环。在他们如沐春风般地徜徉于葛兰西思想的“林中路”上的时候，葛兰西向他们呈现的原本就是现代性面孔。对于葛兰西的现代适应性，拉克劳与莫菲应该比格里维斯有更深的体会。

三

我们必须弄清在现代性的界限之内葛兰西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拉克劳与莫菲，而这一问题势必会引出一个更深的追问：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69）中，阿尔都塞声称他正走在“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个人有所涉足”的道路上，他的理论努力在于为葛兰西提出的“引人注目的”观念作出一个非常图式化的概括。^② 这表明，阿尔都塞已经把葛兰西主义元素部署在他的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了，在此情景下，拉克劳与莫菲重新走入葛兰西意味着什么？难道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解读真的像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我击败的工程？

我们切不可把朗西埃（《读〈资本论〉》第一版合作者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对阿尔都塞的尖锐指责同拉克劳与莫菲对阿尔都塞主义的疏离混为一谈。因为，朗西埃在看来，阿尔都塞根本不应该把葛兰西引为同道，——导入葛兰西主义必然会败坏阿尔都塞先前所秉持的与科学相对立的只具有纯粹认识功能的意识形态概念；更为糟糕的是，把意识形态与国家问

^① Chantal Mouffe: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

^②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LB, 1971, p. 136.

题搅合在一起，势必会以假乱真，从而使革命斗争错失真正的打击目标。拉克劳与莫菲绝没有像朗西埃那样憎恶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兴趣，相反，他们认为，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解读是他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自觉调整自己的概念策略所迈出的可喜步伐。阿尔都塞的错误不在于他接纳了葛兰西的观念，而在于这种接纳并没有把葛兰西的独特理论配置和政治难题充分暴露出来。莫菲指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所作出的一些重要贡献“已经被阿尔都塞接受，已经被阿尔都塞详尽地阐发并通过阿尔都塞学派而广为传播”^①，比如关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比如关于葛兰西对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批评；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在葛兰西向阿尔都塞“说话”过程中，隐藏在葛兰西话语中的最可宝贵的、也是在当前处境下急需发挥的东西却在阿尔都塞的凝神聆听中悄然流失了。

毫无疑问，葛兰西改变甚至颠覆了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最初的贬抑性的认识论构想。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尚在以“不指责”的方式指责葛兰西这位“卓越的历史和政治天才”跌入了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漩涡。^②但在1967年，情况发生了逆转，阿尔都塞开始谈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声称，除哲学和科学之外的“第三个角色”的实践的意识形态终于“登台亮相”了。^③实际上，《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对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化探讨，它标志着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转折——意识形态不再被当作仅仅与特定集团的利益相关的歪曲的表象体系，它毋宁是所有个体成为主体的普遍结构和机制，毋宁是政治身份得到建构的实践基地。这种转折必然会把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带到阿尔都塞的面前。任何对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必然会削弱意识形态的负面意义并潜在地通向一种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意识形态就像武器一样，可以对“任何具有资源和技术能来取得和使用它的战斗者开放”。^④但是，对阿尔

① Chantal Mouffe: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99.

②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4—152页。

③ 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④ 约翰·B.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都塞而言，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所可能导致的中性化趋向不仅是一项理论难题，而且潜藏着某种危机，阿尔都塞以他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这一点，并过多地承受了这一预期危机的理论重负，他在感觉到自己正滑向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之后又十分警觉地加以遏制。阿尔都塞纠缠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纠缠在意识形态的一般机制与意识形态特定的阶级属性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附记（1970）中，阿尔都塞把特定社会形态中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作为一项难题提了出来，并且尝试着提供一种解答。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一般的“机制”是一回事，各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是另一回事，意识形态一般的“机制”只是一种抽象的分析，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意识形态的实现形式。对于这种解答，无论是朗西埃还是拉克劳与莫菲都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在朗西埃看来，阿尔都塞的这一附记分明是他误入葛兰西主义的陷阱而恣意淡化阶级斗争之后的虚伪掩饰；而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完全是由于阿尔都塞还没有充分领会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精髓，以致被严格的阶级主义束缚了手脚。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机理与意识形态的实现形式的区分，也不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赌注与场所，而在于他把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实现”都归结为“国家机器”内的政治操作。众所周知，葛兰西把市民社会作为霸权的领域，并认为市民社会可能构成国家外围的“壕堑”，但是，葛兰西从来没有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国家机器”。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国家机器”，必然会忽视那些并不必然与统治现象相联结的作为一种经验模式和自我认知条件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忽视那些在统治阶级的象征体系之外、甚至是在任何阶级关系之外的支配与从属形式，从而导致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直接等同于统治阶级对从属集团或大众阶层的意识形态控制。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中坚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论及人们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误用时指出：“成问题的是，我看到葛兰西的许多概念直接被某些东西所代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走进葛兰西时所要避免的。例如，人们把‘霸权’当作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同义词来谈论。20年来，我一直竭力反对这样来解释‘霸

权’概念。”^①霍尔的这一批评对那些至今仍然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简化为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的人具有一定的纠偏矫正效应。事实上，莫非也正是在同样的方向上批评阿尔都塞的，在《重铸马克思主义：霸权与新政治运动》一文中，她这样写道：“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主要误解即在于把霸权简化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按照这种观念，只有当一个阶级能够把它自己的范例性的意识形态强加到整个社会，它才是霸权阶级。霸权因此成了‘象征性暴力’现象，它被视为通过意识形态手段来增强统治。如此的阐释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呈现出来：在卢卡奇那里，霸权被理解为阶级主体的阶级意识的施加；在阿尔都塞那里，霸权在于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来施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②无疑，对阿尔都塞的这种不满直接导致了拉克劳与莫非离开阿尔都塞主义的视角去开辟一种新的解读路线。

四

耐人寻味的是，晚年阿尔都塞在称赞葛兰西能够抓住马基雅维利的难以捉摸之处时，突然若有意会地说道：“事实上，葛兰西也是难以捉摸的。”^③不知这是否流露了阿尔都塞对自己先前解读方式的某种缺憾意识。不过，在拉克劳与莫非看来，阿尔都塞确实没能抓住葛兰西的“难以捉摸之处”来理解他。在葛兰西的文本中，存在着统治与反抗的双重论述与交织，但是，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的积极意义并不在于一种统治的方术，而在于一种革命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关键点恰恰在于打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牢笼，这种牢笼之所以能够打破，就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独占意识形态的所有地盘，总会存在着一些空隙，总会存在着一些裂缝，总会存在着一些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它是国家机器尚没有有效覆盖

^①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 10 (2), pp. 59–60.

^②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Recasting Marxism: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Movements, *Socialist Review*, 66 (1982): 91–113, Antonio Gramsci: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edited by James Martin, Vol. 4, Routledge, 2002, p. 143.

^③ 陈越主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

的地方，或者是最抵触国家机器染指的地方。西方革命的艰难即在于这些地方大多已沦为并正在沦为国家的“堡垒”与“工事”，但是，革命的契机也正在于此——在于占据这些地方，在于争夺这些地方。在此意义上，霸权表现为把那些表面上看来与直接斗争无关的一些边缘地带或中立区纳入进来，霸权表现为把那些似乎在自己的内在目标之外的一些内容囊括进来，霸权甚至表现为把那些与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的主体吸引过来。因此，霸权的要义不在于坚守自己本来的辖区，不在于固持本有的纯粹性，而在于以超越或扩张的方式在新的场所构造新的政治空间。

这种能动主义的霸权概念不仅建立在打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牢笼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求从事“阵地战”的革命者能够从自己的狭隘的意识形态自缚中解放出来。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这样写道：“最‘先进的’思想家是这样一种人，他懂得他的对手可能表达的一点真理，哪怕微乎其微，也应当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来。实事求是地理解和估价对手的立场和道理，的确意味着自己从意识形态的牢笼中——从盲目的意识形态狂热中——解放出来，从而有了批判的精神。”^①从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所有真正能读懂葛兰西的人应该从他那里获取的最大教益。阿尔都塞着力于“意萨司”（ISAs）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区分，但“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的直接而紧密的显性关联总是令人感到沉重和压抑，并且时时让人生出一种无计逃脱的绝望来。葛兰西的努力恰恰在于拆解“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固定捆绑。如果人们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强迫，人们就会嫌恶它并加以抵制，即便它仍然不断地在“召询”主体，即便主体根本没有能力消除这种声音，但它对主体的建构力会大打折扣。也许久陷囹圄的葛兰西将强烈渴望自由的心愿不自觉地映射到了他的意识形态概念上，人们可分明地感知到，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外在强制性被最大限度地降解了。

一如拉克劳与莫菲正确指出的，葛兰西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霸权形态：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344.

一种是有限的霸权 (limited hegemony), 即通过将対立的利益中立化或同化而减轻它与霸权主体的冲突以达成“消极同意”; 一种是扩展性霸权 (expansive hegemony), 即真正吸收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创造一种基于“积极同意”的集体意志。准确说来, 后一种霸权形态才是葛兰西心仪之念。既然霸权对于葛兰西来说并不意味着既定的单一意识形态的扩散与传播, 并不意味着某种强势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绝对排斥与根除, 而是标示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从其与狭隘的社团利益、阶层利益或阶级利益的严格对应关系中部分的超出并把异质的意识形态成分吸收、合并、收编进来从而构成一个政治认同空间的过程, 那么, 霸权就不能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生成后的一种布展, 而只能被理解为意识形态总体性和统一性的塑造与建构。基于此一解读,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 葛兰西远远超越了列宁主义的“阶级联盟”意义的霸权概念, 并在一个至为重要的关捩点, 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带来了一种里程碑式的置换: 葛兰西结束了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

非还原论的构想隐含在关于意识形态的复合性中——只要把某种历史性的意识形态看作是多种成分的联结, 并且这种联结可以达到某种统一性, 那么就不可能认定各种意识形态成分必然带有不可祛除的阶级符码。如果每一种意识形态原素都具有严格的阶级性, 那么众多的阶级属性如何能造就单一的阶级属性呢? 在某种历史性意识形态总体的阶级性还必须被承认的前提下, 可选取的解决方案要么是设想作为这一总体之构件的意识形态诸原素的阶级性就像颜料的色素一样可以在不同颜色的相互濡染中发生变化甚至褪色, 要么就是直接断定原本就有一些意识形态“素材”并没有必然的阶级归属, 这两种选择共同指向一种非阶级的中性的意识形态原素概念。实际上, 这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拉克劳与莫菲解读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所迈出的颇为谨慎的一步, 正是基于这一步骤, 他们提出了被誉为新葛兰西主义理论标志的“接合理论”。

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原素的能动过程, 这原本就是葛兰西构想霸权的独特方式, 因而, 从“接合”这一创建联结关系的建构主义视角阐述霸权的涵义可谓恰中肯綮。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拉

克劳与莫菲并未切断意识形态与阶级的关联，并未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只是稍稍减缩阶级决定的范围，只是部分地减轻意识形态过于沉重的阶级负荷，只是力图在“阶级成分”与意识形态的自主建构之间达到一种稳妥的兼容论的解决。冲破严格阶级论的樊篱，空出一个广阔的非阶级区域，从而使意识形态斗争更加灵活、更加自主、更加富有成效，这是“接合”的最初理论承担。可以说，这种解读虽然读出了葛兰西本人并未明确言及的东西，但并没有超出葛兰西思想的有效延伸范围。只要想到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曾把它们著名的“历史性妥协”规划看作是对葛兰西思想的贯彻，只要想到“欧洲共产主义”曾把和平过渡的战略归之于葛兰西思想方法的当代运用，我们就可以切实地体会到“接合理论”既没有亵渎葛兰西的声名，也没有脱离左派斗争的政治实践。有更少的经济主义，并且它打开了反阶级还原论的可能性，这种新葛兰西主义对于当时的拉克劳与莫菲来说，已经足够了——那时，他们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并非所有的政治主体都是阶级主体”、“社会阶级并不必然具有固定的意识形态范型”归属于读解葛兰西所取得的收获时，他们并没有忘记作出必要的附带说明：“葛兰西本人从来没有以明确的形式提出过反还原论问题，尽管此一问题实际地存在于他构想霸权概念的方式之中。”^① 这等于说，所谓反还原论的接合概念乃是对葛兰西的文本进行“症候阅读”的结果——这种阅读不是添加、增补，而是一种显现和澄明，它力求把葛兰西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幽远意味尽可能清晰地展示出来。

五

有趣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把这种“症候阅读”坚持下去。在挣脱阶级还原论的束缚之后不久，他们越发强烈地意识到葛兰西的文本所留下的可资解读的症候空间十分有限，他们也愈来愈感到葛兰西并非如他们当初认定的那样在保留经济的“最终决定”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意识形态的自主性问题。在进入80年代之后，在“欧洲共产主义”衰败之后，

^① Chantal Mouffe: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88.

拉克劳与莫菲终于喊出了“超越葛兰西”、走向“新的霸权概念”的理论口号。也许朗西埃会嘲笑他们“既然如此何必当初”，也许霍尔会指责他们对葛兰西的某种不忠。但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不与葛兰西思想中的本质主义残余决裂，就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免受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规制的意识形态概念。当拉克劳与莫菲宣称不是阶级优先于霸权而是霸权优先于阶级的时候，他们的脚已踏入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是两项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理论规划。新葛兰西主义可以导向后马克思主义，但并非必然如此。葛兰西是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先驱，但这种关系并不适用于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涉及的不是对葛兰西主义基本宗旨和本义的坚守，而是对它的某种改造和重构。正因如此，我们说拉克劳与莫菲始终没有“误读”葛兰西：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一直避免与葛兰西主义闪开明显的缝隙（即使那些反对他们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蜕变的人也不可能把他们70年代对葛兰西的解读定性为反葛兰西主义）；而在80年代及其以后，他们已经“超越”了葛兰西，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力图恢复或展现葛兰西思想的原貌，而是借用葛兰西的“敏锐洞察和话语形式”来抒写自己的理论抱负——他们不是要避免与葛兰西主义的疏离，而是要尽可能把间距拉开扩大，从而显示出“意识形态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宣布已经被根本重塑的东西脱离了原来的旧貌，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能恰当地指称为一种误读。

尽管如此，葛兰西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仍然是一件不可回避也不可否认的理论事实，因为葛兰西主义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且它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首先，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理论”本身潜伏着解除“接合”的外在限制的倾向。接合既然是一种把不同原素联合在一起的活动，那么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原素都是可以被接合进来的“环节”，因此，就不可能存在着独立于接合实践之外的“决定者”，如果霸权是接合的产物，如果霸权主体的统一性是由接合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由被接合的原素的性质事先决定的，那么主体在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位置所派生的“阶级属性”就

不是像拉克劳先前论证的那样是在政治意识形层面的转换性“重现”，而是这种阶级性质的先验地位的根本丧失。从新葛兰西主义部分解除意识形态原素的阶级性，到后马克思主义否认阶级对意识形态的必然决定作用，这种跨越完全可以看作是接合范围的扩大与接合自由度的增强。实际上，拉克劳与莫菲也正是这样顺利滑入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以“接合”言述“霸权”并逐步提升“接合”的自主性，从而把“霸权建构”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解读葛兰西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他们阐释霸权概念的一种独特方法论构架。不管后来他们如何脱离了葛兰西的语境，如何溢出了葛兰西的“本义”，从接合实践来阐释霸权构形的基本取向并没有任何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其次，葛兰西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接合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把不同构件连接起来的活动，而且也是一种语言表述行为，只有某种政治言语获得了表达，某种政治主体才真正建构出来。从“接合”的角度来阐述霸权，无疑凸显了霸权一词原本就具有的语言学内涵，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以及它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十分重要。艾维斯认为（Peter Ives），葛兰西在大学时代对“自发性语法”与“规范性语法”辩证关系的探讨中，就已经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触及了霸权的实质性要素。^①在《语言、中介与霸权：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主义回应》一文中，艾维斯更是明确地断言：“葛兰西在他大学时代的语言学研究中实际上已经采用了霸权这个术语。”^②可以说，葛兰西所以能够在霸权概念的理论化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新的语境中恢复了霸权的一项古希腊语义——即通过言语、辩论、修辞的说服力而获得的权威性影响和指导地位。借此一古义，葛兰西将“hegemony”阐释为与武力征服与强制屈从相对的“思想、文化与道德领导”。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就是在此基础上对“he-

^① Peter Ives: *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Pluto Press, 2004, p. 90.

^② Peter Ives: *Language, Agency and Hegemony: A Gramscian Response to Post-Marxism*,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8, No. 4, December 2005, p. 455.

gemony”进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改造。如果没有葛兰西引入的语言学视域，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接合”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成分的接合，在他看来，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的这种观念被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这就是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用来描述霸权主要特征的“差异性”与“外在性”概念。拉克劳与莫菲认为，没有差异性就谈不上接合，没有外在性就没有霸权，“霸权主体，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主体，必然部分地外在于它所接合的东西——否则，根本不会有接合”^①。人们之所以常常把葛兰西的霸权混同于一般意义的领导权，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葛兰西赋予霸权概念的这一至关重要的维度。无论如何，对本来属于自己的统辖范围之内要素的“领导”不能称之为霸权。霸权总是意味着超出边界、去管他者之事、去行潜越之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就是解构奠基于内在性之上的政治观念，进而建构一种以外在性为主导的激进斗争模式，所以他们才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招术确保霸权构形不蜕变为一种同质的扩张：其一，为了抗衡等同逻辑（logic of equivalence）的简化趋势，他们导入了差异逻辑（logic of difference）作为一种解毒剂；其二，为了防止差异体系的完全焊接，他们坚决否定“原素”（elements）完全转化为“环节”（moment）的可能性；其三，为了消解矛盾的内在的客观必然规定，他们重新阐述了一种以偶然性和“外在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为取向的新对抗观念；其四，为了拒斥本质主义的透明主体，他们对福柯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施以“错位化”的拉康主义改造；其五，为了颠覆对抗边界之僵化和稳定性，他们对“异质性”附加了特别的理论内涵。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的激进回应。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35.

六

无论把拉克劳与莫菲回应葛兰西的激进方式看作是“重读”、“再思”，或是“改写”与“重构”，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种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的思想确实存在着方法论意义上的某种连续性。诺曼·莱文在最近的著述中竭力阐明马克思的方法论的黑格尔主义基础，他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在理论原则上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了，但是，马克思在方法论领域从来没有抛开黑格尔，“虽然黑格尔把实存看作是思维的产物，但是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方法形式，并把它运用到社会经济形式中”，“马克思重新配置了黑格尔的方法论。虽然黑格尔运用‘本质论’的方法来阐释实存的发生学，但是，马克思却用这同一种方法来解释社会经济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① 诺曼·莱文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这种理解方式基本上能够挪用到关于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主义的关系的考辨中——我们不妨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谈论后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主义基础。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世界观与方法论说成是完全一致的，其实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幻象。同一种方法可以用之于不同的目的，甚至可以完全相反的目的，同一种思想观点也可能通过不同的运思方式而达成。葛兰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之上灵活运用“连横合纵”的策略来构想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蓝图，拉克劳与莫菲则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界域内来设计“接合主义”的激进抵抗战略。这两种方案毫无疑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与读拉克劳的《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思考》必定会获得两种不同的“革命印象”，但是，这仍旧不会妨碍人们从后马克思主义那里依稀体察到一点葛兰西主义的“余韵”。

葛兰西的革命策略与《狱中札记》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是一致的。葛兰西面对着力量远为强大、较之他的先辈所设想的“更经得住经济崩溃的资本主义政权”（佩里·安德森语），他不得不采取一种化整为零、

^① 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第54页；亦可参阅 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Lexington Books, 2006。

长期潜伏、伺机而动的“阵地战”方式，就像他身陷囹圄的监狱生活使他的写作不得不呈现出明显的不规整的“片断化”形态一样。不过，对于葛兰西所处的时代来说，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出鲜明的后工业化特征，而反抗资本逻辑的激进斗士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也不可能对宏大的革命叙事持有一种普遍的怀疑情绪。即便真的像佩里·安德森所说，法西斯主义的非人摧毁使葛兰西“带着一种凄凉淡泊的禁欲主义情调”，但是，我相信，在葛兰西的革命规划中自始至终有一幅完整而连贯的图像。有一次，葛兰西无奈地写道：“在雄狮一样生活的一天，或绵羊一样生活的一百年之间，甚至并不存在选择的余地”，他说自己的生活“并不像一头雄狮，哪怕一分钟也不是，远远不是：你年复一年过着比一头绵羊还远远不如的生活，并且你知道不得不那样生活”。^①然而，在这种不无感伤的言辞里面隐含着多么强烈而深沉的“愿为一日雄狮而死无憾矣”的革命情怀。

拉克劳的《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思考》在形式上也是一种“断片化”的书写（共33个“断片”），只不过，这种书写与葛兰西那种书写完全不一样。葛兰西的断片是“形散而神不散”，而拉克劳的断片则是“形神俱散”。葛兰西式的支离破碎是表面的，而拉克劳式的支离破碎是深入骨髓的。从拉克劳那里，我们再也感受不到一种内在的总体性渴望与涤荡一切的彻底革命精神了！“后马克思主义”是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话语——在一个革命不再是时代的迫切主题的氛围下构想激进的革命远远比被隔离出实际革命斗争的葛兰西更为困窘。在革命的时代，革命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进程”，一种客观而残酷的形势把人们卷入到革命中去，而在后革命时代，革命更多地需要“人为地造就”。在生产场所，革命销声匿迹了，革命的主体隐退了，“无产阶级堕落了”（鲍德里亚语），于是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家便在经典意义上的革命之外构想一种另类的革命——这种革命是一种“质地柔软的革命”，革命不再被寄托于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对决式”的暴力上，而是建立在任何单一政治主体皆无法完成总体建构

^① 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71—172页。

的“普遍性匮乏”的前提之下。这是葛兰西没有把握到也未曾预示过的激进政治想象。格里维斯说得对，葛兰西基本上属于现代主义的思想传统，因此他不可能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监狱中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革命提供详备的理论蓝图，但格里维斯不对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看到：拉克劳与莫菲从来没有把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归之于后现代的认识论。

杰米诺 (D. Germino) 认为，相对于卢卡奇诉诸纯粹的阶级意识的直接爆发而言，葛兰西的“消极革命”策略成就了一种新型的革命政治。^①而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葛兰西的“新政治学”已经不能自然地适应后现代社会的革命要求了，葛兰西主义的政治大厦不仅过于残破，而且过于狭窄，从这个地方虽然不断散发出一种诱发灵感与激情的神秘气息，但它的根基已经不再被认为能够稳固而坚实地支撑起新型解放政治的抱负与期待。尽管如此，拉克劳与莫菲仍然希望葛兰西构想政治的方式在后现代主义的空间里得到某种转换性延续。在超出经济决定与阶级规定的更加宽广而多元的认同建构中实践“接合主义”的激进政治规划，当然是对葛兰西遗产的一种“不忠实”的继承，但也只有通过这种“不忠”，葛兰西的某些“真精神”才可能得以保存。

^① D. Germino: *Antonio Gramsci: Architect of a New Politic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

附录一 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从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看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尽管有人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归入“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之列，但这丝毫不能遮掩一个明确无误的基本事实：正是这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早在1985年（即拉克劳与莫菲出版《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同一年），詹姆逊就毫不客气地嘲讽后马克思主义者是“精神分裂者”^①，而在随后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中，他更是尖锐地指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就是“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而“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经典修正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更复杂的形式和更多数量再次出现”。^②此一“判词”非同小可，要是搁在中国“文革”时期，它足以夺人性命。幸而，在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年代，修正主义似乎并不那么恐怖吓人了，否则的话，詹姆逊此言就够得上“恶毒之极”了。一个激烈地批

^① 参见詹姆逊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原话为：“不然的话，我们便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成了精神分裂者。”参见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② 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王则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6页。

判后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被指认为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这无论如何是极其耐人寻味的！这让人不得不产生这样一种比附性想象：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同一间牢房。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不对头，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错。

—

詹姆逊通常被指称为后现代理论家，但是，他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有些暧昧不明。正是基于这种“暧昧不明”，霍姆（Haynes Home）才在《詹姆逊的遏制策略》一文中诋毁詹姆逊，说他名义上好像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后现代状况”，而实际上是通过反现状的方式来强化“现状”。^① 如果霍姆的观点成立，那么詹姆逊俨然就是一名十分阴毒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自己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塞壬之歌的蛊惑之后，又不露声色地把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后现代主义的乐园并使他们在那里痛饮狂欢、流连忘返。詹姆逊文本隐蔽的“反效应”不仅在他对后现代的文化分析中被“揭秘”，而且它又一次在他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论纲中被“再现”出来。1996年，詹姆逊写了《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命题》一文。^② 而詹姆逊稍后发表的《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在内容及观点上与《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命题》基本相同。^③ 不无费解的是，《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命题》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后来也以《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为题而刊出。^④ 詹姆逊好像故意要考验每一位阅读者，因为单是文题的置换就足以令人产生把捉不定的模糊感：后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

① Haynes Home: Jameson'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in *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 Matissonneuve Press, 1989, pp. 268—300.

② 詹姆逊：《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命题》，宁跃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第9—13页。

③ 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王则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5—51页。

④ 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载王逢振主编：《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8—316页。

义”吗？詹姆逊论述的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纲要，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纲要？而詹姆逊于行文之中，在彰显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与批判的同时，偏偏时不时地表现出对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概括的指认，比如，他说：“如果承认对资本主义时代作上述的总体概括，那么，很显然，19世纪末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或80年代的各种后结构主义恰好与资本主义的重构和扩展的各个时期相伴随。紧随其后的，是各种更加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它们试图对资本主义本身一些出乎意料的新趋向进行理论概括。”^①在此，詹姆逊是否像霍姆所指控的，在玩弄那种假批判之名而行兜售之实的阴谋伎俩？

中国一些学者对确认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没有一丝的犹豫与迟疑，这比之于霍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怎么说，霍姆毕竟承认詹姆逊确实发出了质疑与批判的声音，可是，那些把詹姆逊认同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则径直把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陈述看作是一种特别的赞许。比如，一位学者这样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看到，每当资本主义重建或扩张时，马克思主义便面临危机或‘死亡’，并因此出现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其使命是对资本主义的每一阶段呈现的最新维度加以理论化’。”“也许正是基于对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这种固有矛盾的思考，詹姆逊才着手建构所谓适应后现代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并为此撰写了《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条论纲》。”^②这就是说，詹姆逊由于认可了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而乐于再重建一种属于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学者已隐约觉察到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契合”，不过，他们虽然承认詹姆逊对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颇有微辞，但还是认为詹姆逊“也不十分反对”这些后马克思主义。有鉴于詹姆逊既反对“形形色色的后马

^① 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王则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7页。

^② 陈永国：《詹姆逊：全球化的哲学问题与后马克思主义》，载《外国文学》2000年第3期，第56页。

克思主义”，同时又“表达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框架”^①，加上詹姆逊在一些观点上凿实又颇为激进，为了标示詹姆逊的这种特殊性，詹姆逊最终也就被验明了“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正身。

然而，不论是贸然将詹姆逊混迹于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之中，还是小心地作一点甄别并送给詹姆逊一顶“红色后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这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愈时常、愈反复阅读詹姆逊的主要作品，我们就愈是不断印证并加强这样一种感觉：詹姆逊是抱着马克思主义信念充满活力地穿行在五光十色的后现代长廊之中的。一如佩里·安德森所说，詹姆逊“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典立场上制定自己的规划”。^② 或者宛若乔纳森·克拉克对詹姆逊思想肖像的图绘：“詹姆逊不仅仅是一位文化分析家，而且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将后现代主义认定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是其研究远不只是一种分析。詹姆逊对后现代性的描述是仅有的一种陈述，这一陈述对于社会本身的解放或从资本主义日渐衰微的理性中逃脱出来是非常需要的。詹姆逊认定，主体拥有必然的能力以克服所有的错误意识，并且将自己从资本主义灾难性的控制中脱离开来。要达到这一点，詹姆逊就必然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③

实际上，詹姆逊不是不得面对马克思主义，而是自觉地、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自觉和真诚源自于他自始至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来对待。他喜欢开玩笑地说他自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马克思主义一神教者（a Marxist Monotheist），因为他坚信，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天敌”——资本主义还在扩大它的统治，那么，作为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最有效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不会失去生命力。可是，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热忱的信持者，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一神教者”，在中国却被戴上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桂冠！

① 曾枝盛：《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43页。

② 詹姆逊：《文化转向》，前言，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③ 王逢振主编：《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1页。

二

詹姆逊是何种后马克思主义者呢？很清楚，他与利奥塔这样的“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post* 为斜体）绝不是一路人。在《后现代的诸种理论》（写于1982年春，发表于1983年）一文中，詹姆逊说利奥塔公开地用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涂改革命传统的价值，由这种涂改而产生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最终则与反马克思主义很难区分开来”。^①应该说，詹姆逊的这一判断是精准无比的。利奥塔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前就已经怀疑马克思主义具有解释当代世界变化的能力，正是这种怀疑促使他甘愿在欲望哲学和“利比多经济学”中漂流并最终定泊于“后现代状况”之中。对革命不再抱有希望，对宣扬革命的理论不再膺服，这是利奥塔后现代转向的内驱力。利奥塔不是由后现代主义者过渡到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先成为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才成长为一名后现代理论家。任何人只要粗略浏览利奥塔的《利比多经济学》（1974）一书，自然就会赞同詹姆逊对利奥塔所下的结论。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断言“在《利比多经济学》中，利奥塔毅然决然地同马克思主义以及那些未能同马克思主义截然决裂的同代人划清了界线”。^②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上，几乎没有什么论著能够比利奥塔的《利比多经济学》更加恶毒。”^③在该书中，利奥塔疯狂地丑化马克思的形象，肆意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双性欲望体”：其中的女性部分对朝三暮四的资本躯体的性变态大为光火，于是她渴望一种伟大而纯正的爱情；而男性部分则以惩办性变态者并创造一个合意的情人（无产阶级）为己任，于是他迫使自己研究被指控的资本躯体的卷宗。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随着“男性马克思”对资本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己对这个放荡不羁的性变态（资本躯体）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女性马克思”天天

①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②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③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0.

梦想着与她的情人会面并憧憬着她的“社会主义婴儿”的诞生；而“男性马克思”却在与资本躯体的神交中难以自拔。“女性马克思”的梦想与期待激起了“男性马克思”惩办的欲望，而“男性马克思”与资本的无止境的调情却使“女性马克思”限入了更大的困窘与痛苦之中。

在此，可以看到，利奥塔对马克思“一体两性”的隐喻式描述与霍姆对詹姆逊的“招安”指控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利奥塔对“利比多马克思”形象的刻画中，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堕落为一种丧失脱出意愿的长驻不止的话语嬉戏。譬如，一位长期潜伏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已习惯于与他的敌人巧妙周旋，过着一种紧张而充满刺激的生活，以至于他根本不想离开敌人而到“解放区”过一种平淡无奇的日子。实际上，利奥塔所展示的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马克思不是别人，正是利奥塔自己的幻象！利奥塔心中的革命理想已被他自己与后现代性的“公正游戏”永久性地搁置与延迟了。或者说，在利奥塔的心像中，后现代游戏已把他最初的革命憧憬挤压到记忆的最边缘甚至是记忆的背后。利奥塔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性倒错者：他抛开了惩处资本躯体的男性使命而与此个堕落的男性躯体纵情媾合。利奥塔曾说，“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失去的叙事的怀念本身，这绝不是说他们因此注定要走向野蛮。”^①利奥塔本人也在这“大多数人”之中，不幸的是，他虽然没有走向野蛮，却陷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欣快症和梦游症之中。不过，奢谈失去怀念的人，往往就是被怀念所折磨的人，只是这种怀念是一种特殊的“变形”的怀念——不是你去追忆失去的东西，相反，你想忘掉过去甚至想把这忘掉也忘掉！可是，失去的东西却不肯放过你，它像一个鬼魂，像一个幽灵，出现在你不思不想之处，出现在你的无意识之中！你想失去对失去的怀念，可是已失去的却不失去对你的“纠缠”。正是由于你激烈地拒斥在思想中复原过去的情景，所以过去的情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你不思之处与你照面。这是一种根本无法拒绝的照面。可以断定，这种照面不仅在利奥塔那里发生了，在鲍德里亚那里、在克洛克（Kroker）那里，在德里达那里、在许许多多的人那里发生了。正是由于这种照面发

^①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86页。

生了，西姆才把那些不愿与自己的过去照面却发生如此照面的人称之为斜“后”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他们想把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地全盘抛弃，从而走上“后学”的斜路之上，然而马克思的幽灵却不时地“垂顾”他们，使他们在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莫名痛苦。德里达在晚年表述了自己所遭受的利奥塔式的精神分裂的痛苦，他说：“在我现在不得不加以抵制的所有诱惑中，有一种诱惑就是记忆的诱惑，即去叙述我以及我这一代人在我们的整个一生中共享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几乎慈父般的形象。”^① 这是德里达几十年努力忘掉马克思却又为马克思的幽灵所侵扰之后不堪忍受折磨之苦的自我抚慰！且不要以为德里达在晚年幡然悔悟，“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从而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是，绝对不是！德里达从20世纪60年代就一直致力于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在场，就像他自己坦白的：“就我个人而言，把《共产党宣言》中最为醒目的东西忘得如此彻底，这肯定是一个错误。”^② 只是到了90年代，当他发现他本以为已被清除的在场却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的时候，他几乎崩溃了！“无论如何，这里肯定有人疯了，他甚至想要解开此种宣讲的可能性的禁锢。”^③ 他想喊、想叫、想吼，好像在声泪俱下地哭诉：“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④ 但是，面对德里达哀恸的吼叫，我们不要为之动容。我们必须学会听，要听出德里达发出的叫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叫声！比如，丹尼尔·麦基（Daniel T. McGee）面对德里达的吼叫平静地问道：“对一种不再信仰或从未信仰过的理论或政治学表示认同，这意味着什么？”^⑤

想通过主动的回忆来缓解先前的抵制所造成的疲惫与苦楚，想通过向幽灵搭话的方式来减轻“梦魇似地压在活人脑袋上”的愈来愈沉重的幽灵重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21页。

⑤ Daniel T. McGee: *Post-Marxism: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58: 2, June 1997, p. 201.

负，在这方面，利奥塔比德里达做得更早，利奥塔发表于1982年的《追念马克思主义》（Memorial of Marxism）就是利奥塔版本的《马克思的幽灵》（原题为：《苏伊里：尚未完结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利奥塔比德里达更早地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他当然也就比德里达更早地去“回忆马克思”。而利奥塔的这种回忆，并不是为了唤醒某种沉睡的东西，也不是为了激活某种将要死去的東西，它是为了回忆而回忆，为了留下一个回忆的文本而回忆。但是，这种回忆的文本并不是复活“过去”，而是要再一次谋杀“过去”。詹姆逊曾经充满睿智地讲道，后现代的怀旧文本仅仅是一个“摹仿体”：它与原作样貌相同，但“此物此体并未曾仿照任何原制品”，并且它被指望“取代原作品而流存于世”。^① 利奥塔与德里达都不得不如此回忆、如此宣讲、如此书写，只要把马克思作为幽灵来照面，他们就注定无法逃避这种不可逃避的命运。只不过，我们要明白，由于他们拒斥真正的马克思，他们所书写的“马克思的幽灵”一开始就是一个幽灵，并且始终是一个幽灵。

詹姆逊则无需利奥塔与德里达这样的回忆、宣讲与书写，因为詹姆逊从来没有把马克思当作幽灵当来看待。只要以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论述方式能完全取代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人，就必然把马克思当作幽灵来看待；只要以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仍然可以拿来“观”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世界”的人，就必然不把马克思作为幽灵来看待。詹姆逊同利奥塔与德里达之间的分水岭恰恰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在詹姆逊这里，马克思的“真精神”是活生生的，它无需以幽灵的方式而在场。对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丧失它的有效解释力，并且就是凭借这种解释力才将它定性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不像利奥塔以后现代性置换马克思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历史性的而非道德性的评价，正如詹姆逊自己坦陈的，他既不“将后现代主义的自鸣得意作为式微的征兆加以指责”，也不“将这种新形式作为新的工业技术和专家政治的乌托邦的预兆加以欢呼”，而是“将这种新的文化产品置于作为

^①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455页。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重建整个体系相连的文化的全面更新之中加以评价”。^①在詹姆逊看来，对后现代主义，无论持一种正面而积极的道德立场，还是作一种负面的消极的道德评估，都是毫不足取的分析方式。前一种方式是“完全浸淫于后现代的新文化范畴里说话”，这种后现代的终极决定论与“一些后马克思主义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阐述同出一辙”。^②而后一种方式仅仅指责后现代主义重复演绎了资本的社会逻辑，却没能看出这种重绎的独特性，以至于这种义愤填膺式的旧式道德申斥既不合时宜又无法实现，最后终归陷入对后现代主义的天灾横祸般的幻想式的终日忧思之中，实质上，它依然没有“置身于后现代的空间以外来提出批判”。^③这无异于是说，抽象无力的超越性导致了瘫痪的内在性，而詹姆逊的历史分析则试图从有力的内在性寻求一种真正的超越性。就此而论，乔纳森·克拉克关于詹姆逊不在“滞留”而在“逃出”的断认完全是一语中的的。而詹姆逊所以能“逃出”，借助的乃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诺亚方舟。

三

尽管詹姆逊与利奥塔都被称作杰出的后现代理论家，但是，把詹姆逊与利奥塔区别开来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家，而后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家。后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是但并非一定是后现代理论家；同样，后现代理论家可能是但并非一定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不能说，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一定就是后现代理论家；也绝不能说，一位后现代理论家就一定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像利奥塔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与詹姆逊之间的界线就非常清楚。不过，还是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况。当某某后马克思主义者声明自己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特别是当某某后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或她）实现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成功“结合”的

①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②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488页。

③ 同上书，第502页。

时候，这种区分好像就变得模糊起来了。拉克劳与莫菲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他们一边宣告自己处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一边又郑重其事地重申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与莫菲确实和利奥塔之类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大为不同，正是基于这种不同，西姆才说，拉克劳与莫菲可称之一种“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他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全盘抛开，而是郑重地以 *post* 来改造 *Marxism*，而经过改造的 *Marxism* 于是就成为斜体的 *Marxism*。如此一来，另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詹姆逊不能归为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就罢了，可把他归之于拉克劳与莫菲一类，大概不成什么问题吧？

把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归为一类肯定比把他与利奥塔归为一类具有更为充分的理由。当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把后现代理论家分为互为冲突的两翼的时候，他们就把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并列归属在与极端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之内。毫无疑问，这种划分有一定依据——这个依据就是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在对后现代性的理解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交叠共识：首先，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都认为当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就是对这一变化的描述与指称。詹姆逊一再提醒人们要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坚持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文化转向”；而拉克劳在其著名的《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一文也明确告示：“在过去几十年里，文化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把这种变化视为后现代性进入的信号将不会带来什么麻烦。”^①

其次，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在对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上都持一种非绝对化的立场。表面上，詹姆逊极力强调后现代文化的“决裂性”：“不论从美学或意识形态角度看，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与现代主义文明的彻底决裂的结果。”^② 基于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文化形式的确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Social Text*, No. 21,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the Postmodernism*, p. 63, 亦可参阅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②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421页。

认，詹姆逊不同意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现代主义的一个阶段，他有时对所谓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既相类同又相连续的说法持有保留意见。他在所有文本中都不遗余力地反复描述、例证、阐发“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范式差别以及文化意义和社会作用的不同。但是，詹姆逊所谓的后现代的“彻底决裂”与利奥塔、鲍德里亚这些极端后现代主义者对后现代性的断裂性的理解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较之于后者，詹姆逊的“彻底决裂”恰恰是一种“不彻底的决裂”，因为詹姆逊的后现代“决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层面给出的，而不是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给出的。把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真正差异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脉络和背景中加以观照，正是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分析的最突出的一个方法论特色。这种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使詹姆逊把文化转向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后现代主义不仅作为一种风格的差别概念来体认，更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概念来对待，但是，这种历史分析一开始就是同一框架之内或者说是一个更长时段之内的亚分期。正是这种长时段效应和整体化视域保证了历史阶段之间内容上的连续性。一如詹姆逊自己所说：“两个时期之间的截然断裂一般并不关系到内容的完全改变，而只是某些既有因素的重构。”^① 既然内容没有完全改变，后现代性也就不可能与现代性彻底决裂。只不过，表面上“彻底决裂”的非彻底性被詹姆逊掩蔽在社会历史的深处。现代与后现代宛若两棵完全不同属种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外观、质地、姿态等等都迥然不同，然而，它们的根系却为同质的土壤所滋养，它们的叶虽然没有“相触在云里”，可是它们的根却“紧握在地下”。在詹姆逊那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某一意义上是不连贯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连贯的，“同时制造出连贯性与不连贯性的是现实世界，是资本主义”。^② 对詹姆逊来说，承认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逻辑与承认它们同样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时期和经济框架，这二者是不容分割的，也是并行不悖的。

^①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② 王逢振主编：《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如果说詹姆逊在深厚的历史意识的支撑下借助一种中介关系完成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辩证理解,那么拉克劳与莫非则既不靠历史意识又不依赖于中介因素,他们以一种近乎抽象的论辩形式执著地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非断裂性作出自己的辩护。拉克劳与莫非承认现代性的局限性而拒绝所谓“现代性终结”的观念。拉克劳认为,“现代性终结”这一观念本身表现的恰恰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之间划界的观念以如此的理论话语为前提:在这种理论话语中某某事物的‘终结’是可以思维的,即是说,它是透明的,从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把握的”。^①而实际上,事物的“终结”并不具有一种绝对自明的固定意涵,它本身是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从目的论的意义上,它或许被构想为某某事物达到了它最高的存在形式;从辩证法的意义上,它也可能被理解为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在永恒轮回的行进中,它也许被想象为形式的周期性变化的一种契机,或者,它被当成是展示其固有的偶然性的彻底湮灭”。^②把一个非自明的概念一劳永逸地自明化,把两个差异性的话语体系绝对地分开,这无异于把“刚刚抛弃的东西又偷偷地拿了回来”:引进“终结”这一范畴原本是为清除现代性的观念,岂不知,用来终结现代性的“终结”范畴本身可能就是现代性的残余。试图把后现代性的全部历史特点和现象与属于过去并可以归类在现代性名下的东西完全分割开来,这等于要求在后现代性界域之内出现“根本不同”的“全新”事物,如此一来,“基础”、“全新”等等这些典型的现代性观念便又不知不觉地重现了。“彻底抛弃元叙事,这一想法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为它在后现代话语之内再生产了被认为是现代性之特征的‘基础逻辑’。”^③拉克劳的结论是:后现代性不可能是对现代性的拒绝,它包括对现代性主题及其范畴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也需要现代性语言游戏的扩散增殖。莫非坚持在政治层面上界定现代性并在这一重要层面上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点。她认为,只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Social Text, No. 21,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the Postmodernism*, p. 64.

② Ibid.

③ Ibid., pp. 63 - 64.

要人们没有放弃对自由、民主、公民权利、群众性政治斗争等现代政治价值的承诺与追求，那么现代性规划的积极的一面就不会被根除。莫非把激进民主看作是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交织话语”——由此，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规划“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它奉行那种‘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规划’”这一哈贝马斯式的观念。^①莫非像拉克劳一样，不是把后现代性视为对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价值的简单拒绝，而是将之作为对现代性的绝对主义品格的一种特别弱化。一种被后现代性所“刺穿”的弱化了的现代性并不一般地抛弃启蒙普遍主义，而是要对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作一种新的表述。

最后，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非在看到社会斗争的多样性和分散性的同时，都没有放弃对后现代性境遇之下解放事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展望与筹划，而且，他们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倡导一种基于对小群体斗争立场加以认同的“联盟政治”策略。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证说，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推崇，并没有使他陷入教条的工人主义（workism），而是将他导向一种联盟政治，这种联盟政治有点像各种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后现代式的相互拥抱。这种观点最先概要地提出于《政治无意识》（1981）一书的一个脚注中”。^②在《时间的种子》（1994）中，詹姆逊不仅进一步阐发了在这个注脚中提出的观点，而且还特意对拉克劳与莫非所主张的在小团体认同的基础上构造一种认同政治的策略提出了有保留的赞同，他说，在对小团体的个别差异的综合处置上，“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拉克劳与莫非已经在他们的作品《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作了最好的描述”。^③尽管詹姆逊在对小团体政治连续效果的理解上与拉克劳和莫非不尽一致，但他对拉克劳和莫非作品的如此肯定仍然可以视为是他们政治策略存在某些交叠的一个例证。拉克劳与莫非

^① Chantal Mouff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Verso, 1993; 亦可参阅查特尔·莫非：《政治的回归》，王恒、藏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②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③ 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在多种场合下反复说明自己的激进民主规划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的回应，所谓的“社会主义战略”就是谋求以“霸权接合”的方式在不同的反抗主体之间达成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连接。不管怎么说，对于把不同主体立场“接合”起来从而使“群体政治开始向一种激进的方向发展”^①，詹姆逊是不会反对的。

既然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之间有这么多的聚合点，那么把他们同归于一类，并统称为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四

这个看起来没有问题的问题却恰恰大成问题。归为一类当然可以，但这要看是什么“类”。比如，把他们都归为后现代理论家，尤其就以上的相同点来说，把他们同样归属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确实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当把他们同样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确实就有了问题。由他们同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并不能从逻辑上推出他们一定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既不是“后马克思主义”下属的种概念，更不“后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可能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质言之，“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诚然不是全异关系、矛盾关系和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容关系，但是，这种相容关系并非是全同关系，也不是包含关系（真包含关系和真包含于关系），而仅仅是一种交叉关系。拉克劳与莫菲的领域就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个“交叉地带”，而詹姆逊虽然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之内，却在“后马克思主义”之外，即是说，詹姆逊的位置处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交叉部分之外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部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表明：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在关于后现代及其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上的相似观点或相近的立场并不足以构成将他们同归于后马克思主义界域之内

^① 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的根据。

詹姆逊身上被贴上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其根据在于他被确认为从文化阐释的路径竭力促成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这个俏皮的理由一下子就把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变了志同道合的“同仁”关系。因为按斯图亚特·西姆的说法，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恰恰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这岂不正与詹姆逊殊途同归了吗？既然拉克劳与莫菲是名副其实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而和拉克劳与莫菲“同心同德”的詹姆逊的身份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就是在这个“不言而喻”之处却缺失了一种正当性的言说和明辩性的理喻。因为，对一名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判定，仅仅看他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积极的”（即建设性）态度还不够，仅仅看他主张把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也还不够，关键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持何种态度，关键在于他如何实现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即是说，要看这种结合究竟是何种结合——如果在“结合”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被后现代主义的东西“置换”了或者说被它“接管”了，由此，是后现代主义观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他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在“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被蚕食、被弱化，而是得到了真正的延续和加强，那么他绝对不能被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能称他为后现代境遇下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沿用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说法，把他称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postmodern Marxist）。

值得注意的是，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并不否认，在引入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政治进行创造性的重建方面，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存在着某些共识，并且他们也不否认，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在主观上都试图使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和适用性。尽管如此，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却没有将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一道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将詹姆逊归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其中原因就在于，他们明确体认到，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之间的思想差异是，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存在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他们的共同点：拉克劳与莫菲尽管“赞成社会主义政治，但他们

拒斥马克思主义，信奉后现代理论和现代自由主义传统，把社会主义理想重新界定为“激进的多元民主”；而詹姆逊却与此不同，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优于所有的挑战者，并试图汲取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最好的洞见来更新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① 显而易见，在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看来，在不拒斥马克思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来更新马克思主义，就不算是后马克思主义；而如果在拒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来“更新”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因此，詹姆逊和拉克劳与莫菲之间的区别是十分醒目的：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后者是后马克思主义者。

英国学者贝弗莉·贝斯特（Beverley Best）的硕士论文以詹姆逊与拉克劳的比较为题。^② 她说，她其实在做一件很“不合常规”（unconventional）的事情，因为被比较的两个对象简直就是“黑夜中的陌路人”，“我深知，对詹姆逊和拉克劳的著作进行比较，在下述意义上无论如何是不合常规的：不要说把这两位理论家很正式地搁在一起，就是他们的立场偶尔一致的情况也并不多见”。^③ 贝弗莉·贝斯特把这种不合常规的比较称之为“不大可能的连接”（the unlikely conjunction），之所以不大可能连接而仍要有些异常地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在思考、讨论共同的论题：“他们都试图（不论成功与否）寻找一种协调马克思主义信条与后结构主义的途径，而不认可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化程式……詹姆逊和拉克劳的著作代表了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这两种理论立场的关系重新加以概念化的两种努力。”^④ 贝弗莉·贝斯特既希望像詹姆逊那样维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实质力量，同时又不愿意否弃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可能具有的某些积极意义，这或许正是她把这两个“陌路人”连在一起进行不可

①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② Beverley Best, *Post-ing Marxism: A Totalizing Critique of Fredric Jameson and Ernesto Laclau*, 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 1997.

③ Beverley Best, *Strangers in the Night: The Unlikely Conjunction of Fredric Jameson and Ernesto Laclau*,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11, Number 3 (Fall 1999), p. 1.

④ *Ibid.*, p. 2.

比较的比较的意图所在。不过，这种“不大可能的连接”终究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而把二者“兼容”起来，看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就像贝弗莉·贝斯特自己承认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詹姆逊和拉克劳之间存在的明显的非连贯性，因此，对他们的著作进行调和或连接，如果看上去没有什么成效的话，这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①

在《黑夜中的陌路人》中，贝弗莉·贝斯特罗列了三条异常“耀眼的非连贯性”（glaring discontinuities）：第一，詹姆逊一直致力于显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有效范围并强调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范畴的重要性，而拉克劳的作品则展现了疏离马克思主义以至于最终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范畴（比如辩证法、矛盾、总体性等）的坚实行程；第二，詹姆逊把马克思主义构想为一种能够洞察相异的分析传统之间的关联并不断超越各种不同的理论立场的“辩证的历史编纂学”（dialectical historiography），而按拉克劳的叙述，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概念仅仅代表了民主革命的一个时期，而且，这种话语体系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损害而不能把民主革命推向最后阶段，因此，它必将被清除了实证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第三，詹姆逊和拉克劳对社会领域（人与人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刻画是截然相反的。对拉克劳而言，“既然客观性（或对象性）被外在于它的事物所决定，那么在不同的客观性之间也就不可能存在必然的、本质性的或内在性的关系，因而，社会关系不过是一种霸权接合，即是说，这些关系纯粹是彻底的偶然性的社会逻辑的功能。”^②而詹姆逊则讲着不同的故事：“辩证的阐释总是反思性的，总是讲述着事件的必然性，即说明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何以如此发生。”^③也就是说，在詹姆逊的“认知测绘”中，不论社会还是政治以及文化，它们的本质并非拉克劳所说的偶然性，而是承载着必然性重荷的历史性。

^① Beverley Best: *Strangers in the Night: The Unlikely Conjunction of Fredric Jameson and Ernesto Laclau*,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11, Number 3 (Fall 1999), p. 4.

^② *Ibid.*, p. 5.

^③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y of Theory*, Vol. 2, *The Syntax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41.

五

显然，对于贝弗莉·贝斯特来说，指陈詹姆逊和拉克劳之间的非连贯性比之于寻找他们的理论聚合点要容易得多。只不过，贝弗莉·贝斯特指陈的这三条“非连贯性”看起来顶多是笼统的宏观描述，即便如此，它对于我们总体上把握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之间的分野也是大有裨益的。如果把这种分野的界线划得更显著、更深入一些，我们完全可以在贝弗莉·贝斯特的不太精巧的理论架构之下提出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的差异性表征。实际上，这个工作并不难做。只要稍稍翻阅一下詹姆逊的著作，就可以轻松地得知：詹姆逊有四个“耀眼的坚持”，即坚持总体性概念，坚持生产方式理论，坚持阶级分析（他主张重构阶级之图），坚持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历史主义观念，而所有这“四项原则”恰恰就是所有后马克思主义者口诛笔伐的所谓“本质主义残余”。

对总体性概念的猛烈攻击几乎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象征性指数”。其实，詹姆逊本人也正是这样看待后马克思主义的，早在1985年他就指出，有些人“认为并不存在总体性，只有个别事物，只有‘异样性’，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①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曾论述过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总体化”的解构：“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相，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主义，而且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携着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巢臼。”^②然而，就是这个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声名狼藉的概念的总体性概念却受到詹姆逊的大力维护

^①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② 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75页。

与颂扬，他不仅对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投以嘉许的目光，同时也乐于把卢卡奇的“赋予其再现客体以形式统一的那些形式框架或遏制策略”的总体性概念当作一种有效的“叙事分析工具”^①，而且还竭诚为黑格尔的“表现性总体性”作方法论的辩护：“这里与黑格尔和卢卡奇相关的表现性总体性蕴含着有时被称作有机形式的价值，而提出了把艺术作品作为有秩序的整体观念：因此，批评家的任务——从表现性因果律的观点看作是阐释的任务——就是寻求作品的不同层面和组成因素以等级制方式促成的一种统一的意义。”^②对詹姆逊来说，这种对总体性的“占用”不仅是揭示文化制品的社会征象所必需的阐释学要求，而且也是政治视角得以构成和当代左翼“小团体”达成统一“政治联盟”的基本前提。詹姆逊还试图在哲学层面上论证完全放逐总体性的不可能性，他援用萨特的描述来说明：“总体就在它被否认的运动中得到了证实，并在否认其所有可能的再现的同一语言中得到了再现。”^③他甚至认为，后结构主义哲学尽管“以差异、流动、播撒和异质性的名义公开拒斥这种‘总体化’”，但它们最终“将通过对总体概念的反动来重新确立总体性概念的地位”。^④当然，这种以否认的方式“再现”总体性的运动乃是一种“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隐蔽运作。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总体性观念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不过是一个更“实在”的历史客体——生产方式——的“抽象”或“幻影”而已，因此，要真正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念，必须摧毁“生产方式”这一本质主义的堡垒。在《生产之镜》（1973）中，鲍德里亚指出，正是马克思将生产方式的概念明确激进化、合理化、辩证化并“赋予它高贵的革命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马克思的无条件关联，这个概念才获得了它的巨大成功”。^⑤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巨大成功”既高度危

①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44页。

④ 同上书，第43页。

⑤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险又十分可疑，因为“生产镜像”这一隐喻体系背后隐藏着一种生产主义的神话：“生产主义的话语支配一切，不管这种生产力具有客观的目的还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它都构成了自身的价值形式”，以至于人们“根本不可能思考超越或走出生产的普遍图式问题”。^①“走出生产的普遍图式”并由此拆解生产的幽灵与革命想象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成了所有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主导旋律，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的想象性建制》是如此，赫斯特与辛德斯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构成》是如此，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以及拉克劳的《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也是如此。在“生产方式”理论遭受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质疑与摒弃的“后革命氛围”下，詹姆逊勇敢地“逆流而动”，他毅然拾起被众多后现代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屑一顾地扔掉并企图加以焚毁灭迹的生产方式概念，以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独特眼光重新阐发并激活生产方式在后现代主义文化阐释与叙事分析上的基础性功能。他断言，生产方式的问题框架是无疑是最传统的一个领域，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活力的新领域”。^②像迪斯金（Jonathan Diskin）和桑德勒（Blair Sandler）一样^③，詹姆逊坚决反对把“经济”作为本质主义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中全部革除，他强调，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它要求你最终触及到经济结构……在我眼里，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何处着手，如果你的步骤正确，你最终会谈及资本主义。因此，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④不过，重新确立对经

①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②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③ Jonathan Diskin and Blair Sandler: *Essentialism and the Economy in the Post-Marxist Imaginary: Reopening the Sutures, Rethinking Marxism*, Vol. 6, No. 3. (Fall 1993), pp. 28-48; 亦可参阅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46—367页。

④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17—18页。

济概念和关系的辩证分析并不意味着詹姆逊要做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者，在他看来，马克思生产方式的范畴不仅不能误解为技术的或“唯生产”的决定论形式，而且必须根据“新出现的历史意识或历史性形式”并“以一种新的话语范式”来加以描述。詹姆逊提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解决生产方式概念本身的地位问题，一方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观点从根本上是差异性的（differential），也就是说，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从结构上以差异规划了其他可能存在的生产方式空间；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分析多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它的矛盾覆盖层和结构上的共存性，“生产方式并不是那种令人生畏的意义上的‘总体系统’，它包括种种对立的力量和在自身产生的一些新趋势，既有‘残存’的成分也有‘初生’的力量”。^① 质言之，对于生产方式，不仅要分析其历史演化与线性发展，同时也要充分考量生产方式的共时性结构与层次，唯其如此，才能够深入洞察生产方式与社会构成及其与文化客体之间的错觉复杂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凭借这种洞察，詹姆逊才把后现代主义定性为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文化生产的特殊逻辑，就像他自己所申明的，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是对生产方式理论的又一贡献。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中，生产方式的废止必然伴随着阶级“分析仪”的失灵，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生产方式就是阶级机器得以运转的驱动力。一如鲍德里亚所言：“只有逃离生产和代表的转盘，才能让这种转盘的机制失常，才能从盲目状态的深处策动‘阶级斗争’的转向，这一转向很可能是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几何场所的完全终结。”^② 从实质上看，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生产力概念的批判以及对经济主义内生性的封闭空间的解构也正是为了斩断阶级关系的“根系”及其能量补给线，从而使“阶级政治”成为一具缩水的干壳。在《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劳在“逃离生产”之路上走得更远了，他试图从理论上论证“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之

①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②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间的结构性“错位”，他认为“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遵循不同的逻辑规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没有对抗的矛盾；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却是没有矛盾的对抗。这一貌似怪诞的晦涩论调无非就是为了“从深处策动阶级斗争的转向”而已：因为，如果工人与资本家的政治斗争不是建立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必然矛盾上，而是源于生产方式外部主体认同的随机性的“不满”之上，那么这种政治斗争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了——工人在这种斗争中不是获得关于自己的阶级地位的意识，而是这种意识的根本丧失。在阶级意识根本丧失之后重新构想激进政治的新图景，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的方向。毫无疑问，詹姆逊并不在此一“向度”上，恰恰相反，他把这一“向度”本身视为与具有阶级性质的“晚期资本主义”相伴随的“需要加以解释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现实”。他曾以自嘲的口吻说，他的中心工作无非就是“貌似有理地声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或‘生活方式’是整个新的阶级分化的‘意识’表现”。^①确切地说，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剖析不是模糊、淡化或者掩饰甚至埋没文本生产中的“阶级内涵”，而是力图揭示沉淀于文本深处的“阶级意识符码”。詹姆逊之所以致力于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探寻阶级意识的符码转换与传递，是因为他始终相信：“阶级既是一种依然存在的社会现实，也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它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各种图画。作为一种对立的现象（在每种生产方式中，只存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它能吸收并折射性别的对立和意义；同时，它本身又隐藏于残存的旧阶级意象和阶级态度之中。”^②正是基于这种信念，詹姆逊才断言，以为阶级范畴多少有些过时和多少有些斯大林主义色彩从而放弃这一丰富的领域，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显而易见，詹姆逊的这一批判主要是针对后马克思主义的。

后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生产方式理论和阶级范畴，这一系列的“错误”必然导致它在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上背离马克

①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② 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王则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9页。

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并不是说，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构成”之间的任何联系从而把意识形态完全“掏空”，而是说，它不再认为意识形态必然是经济基础的“副现象”，必然是客观历史利益的“表达（再现）”，必然是阶级意识的“反映”。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意识形态仍然是一种表征体系，是永存的想象之镜，只不过，它不再是既定的经济条件或阶级关系的忠顺而自发的表达：“被表征的东西决不是‘残酷的’（brute）事实，它将由表征实践本身所铸造。政治和意识形态由此而产生它自己的所指，即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境况概念化。”^① 某一政治主体成为其所是并不是由于事先被给予的某种统一性先验地“决定”了它，而是由于种种话语原素在霸权斗争的场域中构建集体认同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极端自治型的意识形态论，它或许可以用来减轻那种饱受机械决定论折磨的意识形态的过多的捆绑之苦，毕竟它以一种“片面深刻”的方式彰显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建构威力，一如特里·伊格尔顿正确指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核仅仅在于：‘能指’或政治与意识形态表征的方式对它们所指称的东西而言总是积极的。”^② 就詹姆逊而言，他未必不同意伊格尔顿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性的称许，因为他在多种场合一再申明，阶级斗争与文化产品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他本人也尤其反感“以阶级和政治的标记”去装饰文学艺术话语，“阶级斗争以及真正的阶级意识缓慢的、断断续续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有机群体的形成过程，是机体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具体分裂的过程。在这一点上，说这种集体存在和说它产生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活与表现方式，实际上并无不同”。^③ 然而，十分清楚的是，詹姆逊并不认为只有把生产方式和阶级抛开才能恰当地言说意识形态的“有机形成过程”，无论如何，对意识形态的“接合形式”的强调不能以牺牲意识形态的“内容”为代价。意识形态话语可能像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具有一种回溯性的“篡改”效

① Terry Eagleton: *Ideology, Discourse and the Problems of "Post-Marxism"*, in Simon Malpas (ed.): *Postmodern Debates*, Palgrave, 2001, p. 88.

② Ibid.

③ 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

应，但是，只有已存在某些话语事实，我们才能谈论“接合实践”对这些事实的“篡改”。正是由于詹姆逊对意识形态的内容（或先在事实）与意识形态形式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指认，他才避免了后马克思主义否认社会因果关系的偶然性政治逻辑对其文化批判的侵扰，就此而论，詹姆逊乃是一位自觉抵制后马克思主义并取得巨大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佩里·安德森说：“詹姆逊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得一片奇异和灿烂。”^① 面对这样的评论，我们的唯一感悟是：詹姆逊的著作之所以具有这种神奇魅力，詹姆逊的思想之所以焕发出这样的奇光异彩，乃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当代接合。

^① 詹姆逊：《文化转向》，前言，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附录二 拉克劳与莫菲简介

一、欧内斯托·拉克劳简介

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是一位社会和政治理论家，出生于阿根廷，1964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大学时代的拉克劳十分活跃，他积极投身于激进的学生运动和各色左翼组织，曾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中心委员会（即大学评议会）的学生代表，哲学与艺术学院学生联合会主席，1958年，他加入阿根廷社会主义党（PSA），1963年，他成为60年代阿根廷十分活跃的一个党派即从PSA分离出来的一个派系——民族左翼社会主义党（PSIN）的领导成员之一，并曾担任该党的周刊《工人的斗争》（*Lucha Obrera*）的编辑。尽管PSIN非常关注反帝斗争的民族的和民主的方面，但是它的阶级还原论立场对于充分理解当时涌现的大量现象（尤其是庇隆主义运动、“第三立场”所展示的东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随着对PSIN政治原则不满的加深，拉克劳于1968年离开了该党。1966年，拉克劳获得阿根廷土库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ucumán）讲师职位，但是，这一年6月阿根廷继1955年、1962年军事政变之后又一次发生了军人政变，反对庇隆主义的军人推翻了伊利亚政府，前陆军司令翁加尼亚任总统，他宣布“阿根廷革命”，关闭议会，禁止政党和工会的活动。拉克劳由于参与了反对翁加尼亚军人政府独裁统治的学潮而受到

通缉，也因此而丧失了在庫曼大学执教的机会。

1969年拉克劳流亡英国，获得了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从事博士项目研究的奖学金资助，他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求学深造毕业后，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ssex）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从1973年开始在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系任教，目前是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理论教授。1982年，拉克劳在政治系建立意识形态和话语分析文艺硕士点。1990年，拉克劳主持创办埃塞克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心并出任中心首任主任，意识形态和话语分析项目扩建为博士点后挂靠在该中心，拉克劳出任该博士项目的主任。多年来，拉克劳做过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他曾是多伦多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以及多所拉丁美洲大学的访问教授，并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拉普拉塔大学的荣誉教授，获得了古根海姆研究员职位（Guggenheim Fellowship, 1989—1990），并是美国普林斯顿一个高级研究所、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1989）及加利福尼亚人文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还曾到北美、拉丁美洲、西欧、澳大利亚及南非的许多大学访问讲学。目前，拉克劳的学术研究兴趣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比较视域中的政治理论，社会对抗的话语建构，解构，修辞学，精神分析，伦理学。

拉克劳的早期作品是关于民粹主义、欠发达问题及国家理论方面的，1971年他在《新左派评论》总第67期上发表了《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文，1975年在《经济与社会》第一期上发表了《政治的特性：普兰查斯与密里班德的争论》。1977年他的第一部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面世，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第一篇即是1971年发表的论文《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第二篇是1975年发表论文的《政治的特性：普兰查斯与密里班德的争论》，第三篇《法西斯主义与意识形态》和第四篇《走向民粹主义理论》是专为此书而写的。1985年他和尚塔尔·莫菲合作发表了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他的著作还有：《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

《政治认同的制造》(1994) (编辑并是撰稿人之一), 《解放》(1996), 《偶然性、霸权、广泛性: 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2000) (与巴特勒、齐泽克合著, 2004), 《论民粹主义理性》(2005)。

另外, 拉克劳还在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出版了一些著作, 较重要的有: 《拉丁美洲的国家与政治》(*Estado y Política en América Latina*, 1981)、《解放与差异》(*Emancipación y Diferencia*, 1996)、《神秘主义、修辞学与政治》(*Misticismo Retórica y Política*, 2002)等。拉克劳还在一些杂志和由别人编辑的文集中发表了许多关于民粹主义、霸权、意识形态、现代性、国家、阶级、政治、民主、话语实践、接合理论等方面的大量论文,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民主的对抗与资本主义国家》(1980)、《民粹主义的破裂与话语》(1980)、《社会主义战略, 下一步在哪儿?》(与莫非合撰, 1981)、《发达工业社会的变化与主体理论》(1983)、《新社会运动和社会的多元性》(1985)、《阶级战及其之后》(1987)、《隐喻与社会对抗》(1988)、《政治和现代性的局限》(1989)、《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认同问题》(1992)、《政治的主体和主体的政治》(1995)、《意识形态理论的死亡与复苏》(1996)等。

二、尚塔尔·莫非简介

尚塔尔·莫非(Chantal Mouffe, 1943—)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政治理论家、女权主义理论家, 出生于比利时的布雷, 20世纪60年代在卢汶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卢汶大学期间, 她积极参加比利时的学生运动, 是两个社会主义小杂志的主编和社会主义党一个左翼派别的成员。60年代中期, 她来到巴黎, 进入阿尔都塞的高级研讨班, 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 她受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但是对于阿尔都塞试图给法共提供一个理论更新的做法, 她一点也不感兴趣, 所以她当时在法国并没有参与到法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 莫非的大学时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 时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危机、古巴革命及全球范围普遍高涨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蓬勃开展, 左派活动频繁高涨, 学生运动此伏彼起。作为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她将自己的革命激情释放在第三世界的反帝

斗争中，她加入了几个拉丁美洲解放团体，并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于60年代末远赴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试图将其师阿尔都塞的理论范式运用到对哥伦比亚当时的实际状况的分析中。1967年至1973年，莫菲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波哥大）哲学系讲授哲学，并致力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研究，但她很快发现这类哲学根本无法建立与哥伦比亚实际情形的理论关联，于是她对阿尔都塞的理论路线开始感到厌倦和不满。

70年代中期，莫菲决定重返欧洲学习政治学，以便将来在哥伦比亚得到更有实用价值的训练，但实际上她后来并没有回到哥伦比亚。她来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MA），她的硕士论文论题是关于哥伦比亚工业化的政治问题。由于她的哲学学科背景，不久她就从政治学转向了政治哲学领域。毕业后，她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几所大学当过访问学者。目前，她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的政治理论教授，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CSD）高级研究员。1988年至1989年，她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1989年至1990年，她在康乃尔大学人文协会担任高级研究员，1989年至1995年，她是国际哲学协会项目部主任。

莫菲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的本性，自治的命运，当代哲学的后本质主义趋向，政治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批判，政治的激情，女权主义，民主和公民身份的未来发展，等等。多年以来，莫菲的著述、学术报告及谈话广泛涉及阶级、意识形态、政治、霸权及话语等主题，目前，她正致力于精细地阐述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政治理论探讨方法与立场，提出了“竞争性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的概念，眼下她正在从事一项关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及“第三条道路”的局限的研究。莫菲勤于写作，著述颇丰，1979年她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该书收入诺贝托·博比亚、雅克·泰科西尔、克里斯坦·布西-格鲁克思曼等八位当代著名左翼学者论述葛兰西思想的八篇论文，莫菲不仅为本书撰写了长篇导论，而且还提交了一篇重要论文：《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1985年，她与拉克劳合作出版了《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部著作奠定了她在当代政治理论界作为一名

原创性思想家的地位，并使她与拉克劳以后马克思主义旗手而齐名于世界。莫菲的重要著作还有：《政治的回归》（1993）、《政治家及其赌注——保卫多元民主》（1994）、《民主的悖论》（2000），以及2001年她与路德维希·纳哥尔合著的《维特根斯坦的遗产：实用主义与解构》一书。她编辑出版的著作还有：《激进民主的维度：多元主义、公民身份、社群》（1996）、《解构与实用主义》（1996）、《卡尔·施米特的挑战》（1999）等。2005年，她出版了新著《论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莫菲在《哲学与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政治家和社会》、《社会主义评论》、《今日马克思主义》、《新左派评论》、《新的生成》等刊物上及由他人编著的论文集中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政治、民主、权力、对抗、认同、公民身份、女权主义及话语政治学方面的论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及新左派内部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与拉克劳合撰）、《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和完全国家》（1981）、《工人阶级霸权与社会主义斗争》（1983）、《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结构》（1983）、《罗尔斯：没有政治的政治哲学》（1987）、《霸权与新的政治主体：走向新的民主概念》（1988）、《公民学的教义》（1988）、《激进民主还是自由民主》（1990）、《多元主义与民主：关于卡尔·施米特》（1991）、《公民身份与政治认同》（1992）、《政治的终结和激进右派的兴起》（1995）等。

参考文献

一、外文文献

1.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Verso, 1977.
2. Ernesto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1985.
3.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4. Ernesto Laclau (e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y*, Verso, 1994.
5. 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s)*, Verso, 1996.
6.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7.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8.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9. Chantal Mouffe(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Verso, 1992.
10. Chantal Mouffe: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Verso, 1993.
11. Chantal Mouffe(ed.): *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 Routledge, 1996.
12. Chantal Mouffe (ed.):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Verso, 1999.
13. Chantal Mouffe: *The Democratic Paradox*, Verso, 2000.

14. Chantal Mouffe: *Politics and Passions: The Stakes of Democrac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2002.
15. Chantal Mouffe: *On the Political*, Routledge, 2005.
16.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Polemics and Academics: An Interview by Paul Bowman, *Parallax*, 5 (1999) (2), pp. 93 - 107.
17. Ernesto Laclau: Can Immanence Explain Social Struggles?, *Diacritics*, 31 (2001) (4), pp. 3 - 10.
18. Ernesto Laclau: 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 In *Emancipation(s)*, Verso, London, pp. 36 - 46.
19.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Democracy and 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1995), pp. 259 - 266.
20.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Recasting Marxism: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Movements, *Socialist Review*, 12, No. 6 (1982): 91 - 113.
21. Göran Therborn: *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Verso, 2008.
22. Paul Bowman: *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Politics and Interven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 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2006.
24. Philip Goldstein: *Post-Marxist Theory: An Introduc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25. Simon Critchley and Oliver Marchart (ed.):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Routledge, 2005.
26.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27. Anna Marie Smith: *Laclau and Mouffe: The Radical Democratic Imaginary*, Routledge, 1998.
28. Nicos p. Mouzelis: *Post-Marxist Alterna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Macmillan, 1990.
29. Jacob Torfing: *New Theories of Discourse Laclau, Mouffe and Zize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30. Michele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31.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Verso, 1989.
33. Slavoj Zizek: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Verso, 1999.
34. L. Tønder and L. Thomassen: *Radical Democracy: Politics between Abundance and Lac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35. L. Althusser: *Machiavelli and Us*, Verso, 1999.
36.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37. H. F. Haber: *Beyond Post-Modern Politics: Lyotard, Rorty and Foucault*, Routledge, 1994.
38. N.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39. J. Rancière: *Disagreemen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40. R.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1. J.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Routledge, 1994.
42. N. Geras: "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63 (1985).
43. J. Valentine: The Hegemony of Hegemony,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4 (2002), pp. 88 - 104.
44. A. Norris: Against Antagonism: On Ernesto Laclau's Political Thought, *Constellations*, 9 (2002), pp. 553 - 573.
45. G. McLennan: Post-Marxism and the Four "Sins" of Modernist Theorizing, *New Left Review*, 218 (1996), 53 - 74.
46. A. Robinson: The Politics of Lac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2004), pp. 259 - 269.
47. M. A. Wenman: Laclau or Mouffe?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9 (2003), pp. 581 – 606.

48. A. J. Norval: Norval, Hegemony after Deconstruc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Undecid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9 (2004) (2), pp. 139 – 157.

二、中文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0卷，人民出版社，1956—1985年。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
5. 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
6.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9. 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
11. 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12. 拉克劳、莫菲：《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陈璋津译，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
1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14.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下），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

16.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17. 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高信奇、童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 查特爾·莫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 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袁志田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
21.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
2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
24. 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6.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27.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相》，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28.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9.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
30.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31. 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2年。

32. 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蔡嵘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33. 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4.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35. 尤尔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沈清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6.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7. 尤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38.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2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人民出版社，1994年。

39. 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0.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41. 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42. 斯拉沃热·齐泽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郭英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43. 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44. 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胡大平、余宁平、蒋桂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45. 斯拉沃热·齐泽克：《易碎的绝对——基督教的遗产为何值得奋斗》，蒋桂琴、胡大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46.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
47.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48. 陈越编译：《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49.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50.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1.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
52.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53. 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54.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
55.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56.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57.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58.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9. 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6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61.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62. 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63. 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64. 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65.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体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66. 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
67.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68.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69. 王南湜：《追寻哲学的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